



基督教入华史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to China

陈上宇 著

美国南方出版社

基督教入华史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to China*

《基督教入华史》陈上宇著

封面设计：庄倩

责任编辑：周景玲

校 对：何文 田佳友 蒋瑞华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to China ©2018 by China Soul for Christ
Foundation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Website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版权所有：神州传播协会

2018年8月DWPC第一版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2018952170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18952170

ISBN-13: 978-1-68372-144-4

ISBN-10: 1-68372-144-6



作者简介

陈上宇，美国纽约大学艺术教育博士，原纽约曼哈顿图书馆馆长，现神州传播协会执行主任。《老子与圣经》英文版译者，纪录片《彼岸·纽约日记》女主角，历史专题片《宣教士》制片人和总撰稿之一，散文集《与你同在》和诗歌集《赞美者》作者。

人对神的回应史

《基督教入华史》简介

序言

历史是什么？

汤因比说得好：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人对神的回应史。

雨果说，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听到怎样的回声？她的源头在哪里？她将流向何方？

当她流经中华大地，她的水质，或清澈甘甜，或苦涩浑浊，与每一位中华儿女息息相关。

回首观看，我们发现，无论当时和后来的人们如何评说，这条河流始终忠诚地、坚定地、自然地，在天光下、神光中，在水声、风声、人声中，朝着一个既定的方向，奔腾向前。

中国通史，巨著诸多。中国教会史，也有不少研究。

神，如何呼唤中国人；人，如何回应神的呼唤？或许，基督教入华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的窗口，开阔我们的眼界，启发我们如何前行。

我们渴望，通过基督教入华的故事，以较为系统而生动的阐述，看到神在中国大地上的脚踪，感受神的手指对中国人心的触摸。因而，我们看到，当人们的灵魂被唤醒，生活如何被翻转和建造；当人们愚顽

悖逆，神又如何施展怜悯救恩。

这个故事值得听，是因为，中国人如何呼应创造主，不仅关乎她的昨天和今天，更关乎她的明天。

《宣教士》

自2011年起，为了制作三集历史专题片《宣教士》，我们开始陆续在英国、美国、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档案室、研究院、图书馆、互联网，以及私家收藏，采集并梳理相关文字、图片和视频资料，将零散的史料聚集在一起，加以整理阐述。

我们希望，将历史还原，让真相袒露，使源头澄清，以便人们看清她的起源和走向，保护她的水质，为滋养中华民族的未来尽一份心力。

历经五年的搜索、整理和编辑，三集《宣教士》于2016年圣诞问世。

内容如下：

第一集：叩门

从汉朝多马入华的传说，经唐朝景教，元朝也里可温教，到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一千多年间叩门、开门和关门的故事。主要人物有：唐太宗、马可波罗、忽必烈、沙勿略、范礼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徐光启、康熙等。

第二集：落地

从马礼逊来华，经鸦片战争；到戴德生来华，经义和团事件；直至本土教会的兴起。两百多年间，万名宣教士以生命作福音的种籽，落地死去，扎根发芽，生出丰硕的果实来。

第三集：光照

第一所学校，第一家医院，第一座孤儿院，第一个戒毒所，第一个实验室，第一份报纸，第一支球队，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几乎在中国现代化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宣教士尘封的脚印。

《基督教入华史》

《基督教入华史》书卷，是根据为三集历史专题片《宣教士》所提供的资料整理完成。时间跨度涵盖从东汉时期第一世纪使徒多马来到东方，直至1952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西方传教士全数撤离中国。期间历经唐朝景教、元朝也里可温教、明朝天主教，以及明末清初和民国初年基督教新教在华流传的经过。

虽然我们所作的不可能完全，但我们力所能及地翻遍了世界各地可能的矿藏，采集了所有可用的原料。正如今天我们站在前人的肩头，希望后来者亦能借助我们的工作，在来华宣教这个领域，走得更深、更远、更明晰。

愿这条历史长河，在将来对过去的反映中，神对中华民族的祝福，响彻神州大地。

内容和结构

《基督教入华史》分四卷。

卷一、历史溯源，概述汉朝多马传闻、唐朝景教、元朝也里可温教、明末清初天主教入华传播的历史。

卷二、道成肉身，分三部分：清末民初，基督教会在华立足的艰难历程；宣教士对教育、文字、医疗、慈善等各个社会领域的贡献；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

卷三、英雄之歌，讲述马礼逊、戴德生、李提摩太、富能仁的故事，以及18位宣教士的精彩片段。马礼逊，这位孤独的行者，首位来华基督教新教宣教士，为基督教在华传播奠定了基础。戴德生，一位流血流泪的巨人，创建内地会并带领内地会宣教士，将福音传遍中华大地。李提摩太，带着天国的使命，用文字启蒙大众，参与社会改良，启迪人心，影响深远。富能仁，少数民族宣教的楷模，在傈僳族留下第一粒福

音的种子，创造文字，建立本土教会。至今，怒江一带依然是赞歌频传的福音谷。

卷四、前赴后继，系统介绍了105名来华宣教士的事迹。根据入华年代先后次序排列，包括中英文名字、生辰、国籍、差会、贡献，并尽可能罗列个人参考书目。既可阅读，亦可查考，如历史长廊，一贯而终，一目了然。从头到尾阅读，读者便可基本掌握基督教入华大事件，事件中的人物，以及他们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

使用建议

《基督教入华史》可作为独立的历史书籍，亦可用作《宣教士》三集历史专题片伴随读物。对象是普通读者。有助于了解基督教在华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来华宣教士在教育、科学、文字、医疗、禁烟、放足、体育、慈善等各个领域里开创性的贡献。

写作的过程怀着感恩，带着与人分享的心，尽力将线索理顺，将故事讲明，因此具有知识普及和历史教育的作用，也适合神学院学生阅读。

历史性的，震了！ 《宣教士》中外回应

历史性的，震了！多年的心血、多年的心愿终于结出丰盛的果子！——圣乐家黄安伦

为你们排除万难，做成此项伟大圣工而感恩！！——史学家李亚丁

我惊叹！这些古老的历史资料是从哪里搜集来的！又是怎样把它汇总和编辑、记录和整理，且拍摄成三辑影片的！历史资料贯穿之完整，背景音乐编配之完美，影像制作技术之精良，无不使人感到神奇。——指挥家杨永康

很感动，看见神的爱激励许多宣教士到中国，宣教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此话是真的！——耶鲁大学加略山华人教会林敬祥长老

太好了！历史被拍得如此清晰和富有美感，确定是一部好的宣教史教材。——《中信》主编钱志群

有关马礼逊的历史，让我非常惭愧，只有二十五岁，离乡背井，来到一个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方式的地方，又是一个封闭的、拜偶像的中国，而且单枪匹马。五十二岁去世，全身献给了中国。他翻译了圣经，甚至编了《华英字典》，实在作了好大的贡献。《宣教士》，每个传道人都应该看。——《甘泉》社长95岁孙约西牧师

很喜欢。非常有感触，特别是硅谷工程师说的，我们华人现在出国是为了要有更好的生活，宣教士们却为了福音放弃更好的生活。吃水不忘挖井人，真的是这样！上帝把这么多那个时代最杰出的西方人送到中国，毫不带私心地在这片土地上长年付出，精力无穷地在社会各方面为中国争取最好的资源，让我们今天不但有福音，也有与世界接轨的文化教育医疗，真是个神迹。我要给我爸爸看看。——德国电影制片人徐天琳姐妹

通过《宣教士》，我全面了解到基督教传入中国鲜为人知的发展历史，这是许许多多带着神的使命的宣教士用坚定的信念、艰苦卓绝的奋斗、甚至生命和鲜血，前赴后继、不屈不挠书写出来的，非常感人！——温州一幕道友

基督教的传扬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一直在寻找一种更好、更普世的方式。康熙年间，基督教被先扬后抑，宣教做了自身的反省，摒弃了强硬的方式，采取了办学校、办医院等方法，让爱用最深入人心的方式传达出来。我觉得，这是基督教和这个片子最感动人，最成功的地方。——杭州一幕道友

宣教士的爱，血泪与牺牲，传扬了神的爱，并打下了中国现代化的根基，这项史实是应当记录下来，并传扬出去的。宣教士还带来了教育、医疗、科学等等西方现代文明的重大成果，让华夏大地直接与西方文明有了深入的联结。可以说，若没有众多宣教士的努力，我们离现代文明会更加遥远。同时也让我认识到，未来中国的真正复兴一定是在基督教信仰的启蒙下发生结果！——深圳一弟兄

谢谢你们的精心付出，我坚信《宣教士》必将影响中国14亿灵魂。——宁波一弟兄

在我原来的印象中，宣教士来华的所作所为和殖民主义是混杂在一起的，甚至是为殖民主义开道的。看了三集专题片《宣教士》，终于

对福音入华史有了第一次相当完整的认识 and 了解。当初福音的传播如此艰难，国人对福音的认识如此迟钝、麻木。我有时在想是不是这块土地的人民没有资格得到上帝的垂顾，在不断的反复中仍然无法享有神的光照并且还上演了义和团的暴乱，无数宣教士和信众死于非命。但值得欣慰的是西方宣教士的执着，勇气，牺牲，最终还是换来了福音的落地生根，生发结果。——深圳一慕道友

在带着感恩，悲伤及感动的泪水中一口气看完了《宣教士》三片影碟。内容安排，人物的叙述，画面呈现的技巧，音乐的编配，等等，一切都达到了极高的意境及水平！宣教士的爱，血泪与牺牲，传扬了神的爱，并打下了中国现代化根基的这项史实是应当记录下来并传扬出去的。——波士顿青云和纪德

沙勿略、利玛窦、马礼逊、戴德生、李爱锐、魏特琳……这么多尘封记忆里闪光而凝重的名字重重地撞击着我们的心灵。千千万万的西方宣教士们舍弃一切，在中国最困难，最黑暗，最软弱的时刻，用热血和生命把福音，把上帝的爱带给中国，留在中国。这种旷正世道的大义大举即使至今也非世人所能理解。我们知道，那是万事万物所指向的源头——爱，来自天父的爱！我们能为自己的国人做些什么呢？——多伦多基督徒苗剑和散儿

加拿大任不寐牧师：

我特别感动的是《宣教士》聚焦的这些数据：马礼逊在华27年，只有10个中国人受洗。1835年，第一间华人基督教会只有12位成员。

从马礼逊到戴德生，200多位来华宣教士中，有40位宣教士和51位妻子病死（马礼逊的妻子病死的时候年仅29岁，而且有孕在身）；进入内地的宣教士，平均存活只有7年。

1900年义和团一个月就杀害了241位西方宣教士和2万多中国基督徒；其中内地会58名宣教士和21个孩子遇害；义和团之前，1894年，来华传教士1324人；义和团之后7年，传教士增加到3833人。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1200名传教士被日军关进潍坊集中营，1945年只剩下600名。

南京大屠杀期间，金陵大学美国宣教士魏特琳将大学变成避难所，保护了上万名中国妇孺；美国宣教士贝德士组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救助了20多万难民。

中国基督徒1834年马礼逊逝世时只有10人，1906年马礼逊来华100年有17万人。2006年，200年后，发展到几千万人。

截止1900年，宣教士在中国建立各种学校2000所。1918年，增加到7382所。

截止1920年，宣教士在中国建立医院和诊所820间……他爱我们。

耶稣前行，我们跟随 美国各界回响

戈培理外甥Tullian Tchividjian牧师的祈祷：

感谢您，上帝！感谢您的话语通过《宣教士》纪录片赐给我和观众们亮光，让我们知晓您在中国的作为。您并没有让中国偏行己路。一代、一代、又一代，您派遣您众多的儿女们，带着福音的好消息来到中国。直至今日，您的工作仍在继续。我祈求您将《宣教士》派送至所需之处，所得之人，使用它在您的国度彰显大能。不仅在中国，并且在全世界，不仅对个人，并且对整个文化，提升人们对基督信仰及其重要性的认识。

我感谢您，为我在神州传播协会的朋友们，为他们对中国的负担，对中国人民的热爱，最重要的是，为他们对您，耶稣的爱。为他们，我祈求您的保护、您的带领、您的方向。我祈求您，赐给他们您全能的帮助，为推展您呼召他们的使命。也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那就是，耶稣前行，我们跟随。因此，我祈祷，您成全所有这一切，而且更多。

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大卫·艾克曼，前《时代》杂志驻北京办公室主任，《耶稣在北京》作者：

感谢您寄来中英文《宣教士》书碟。我极感兴趣，读了书，同时非常享受视频。我认为这是一个重量级的作品，应该让所有人看到这部片子。最热烈的祝福！

爱梅，乐手：

我热爱《宣教士》！我要与朋友和家人分享。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多么完美的制作！多么美妙的方式纪念神美妙的工作啊！我们要将耶和華的美德、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诗篇78：4）

百瑞德博士，美国教会主任牧师：

《宣教士》展示了神的手推动福音在中国发展的一幅全景图。史料充足、鼓舞人心、令人振奋，我数次感动落泪。此片让人对神爱世人和宣教士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查理和朵仁·吉尔摩，基督徒夫妇：

我们爱极了《宣教士》。神在中国的作为深深地感动了我们。这部纪录片描述了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共同成就神的工作的挑战。对于我们西方人，看到劳动的果实，祷告的回应，极得安慰。同时，也坚固了我们的信心。

尤卡·洁柔波克，社会工作者：

多么繁重的工作，多少的感恩之情倾注在这个片子里啊！为展现这么多牺牲的榜样，感谢你们！

荣恩·华伦，殉道者之声前执行主任：

非常棒的研究工作，铺陈清晰、明确、易懂。多棒的纪录和研究工作啊！

《宣教士入华史》资料来源

耶鲁大学神学院档案室

University of Yale -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

耶鲁大学拜内克古籍善本图书馆

University of Yale - Beinecke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University of London -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

剑桥大学圣经专馆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Cambridge Bible Society Library

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

University of Oxford - Angus Library, Regent's Park College

牛津大学东方善本部

University of Oxford - Bodleian Library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梵蒂冈宣教图书馆

Vatican Mission library

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Center for the Pacific Rim

伦敦贵格会总部图书馆

Friends House Library London

美国国会图书馆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U.S.A.

目 录 Contents

人对神的回应史 《基督教入华史》简介	VII
历史性的，震了！《宣教士》中外回应	XI
耶稣前行，我们跟随：美国各界回响	XV
《宣教士入华史》资料来源	XVII

卷一 历史溯源

基督教入华大框架	2
福音入华时间线	2
福音入华路径	3
福音入华口岸	4
福音在华大转机	5
福音入华经济来源	6
福临中华契机和中国皇帝年号	7
是巧合，还是神谕？	9
汉朝：多马传疑	10
西汉：耶稣降生	10
东汉：孔望山画像石	11
美丽的传说：由于多马，天国在中国飘然升起	11
十八字福音：徐州《汉代基督教福音铭文镜》	12
最早的文字记载：丝国、“沙门之外”	13
什么是福音——十字架：万民怀大泽	14
唐朝景教：天启之石	15
一、石破天惊	15
出土始末	15
碑中之碑	17
碑文内容	17

目 录

碑文研究	18
传教影响	20
二、灵石载道	20
景教渊源	20
景教教义	21
异端黑锅	21
在唐盛况	22
景教没落	23
元朝也里可温：长明灯里一滴油	25
元朝前夕的景教	25
马可·波罗与忽必烈	26
狱中著述	28
三圣王的传说	29
柏郎嘉宾	29
孟高维诺	30
汗八里和泉州	31
神马与人杰	32
也里可温遍布中土	33
发展路线	34
涓流中断	34
明朝天主教：利玛窦	36
叩门——沙勿略	37
开路——范礼安	39
领路——罗明坚	40
奠基——利玛窦	40
花园国度	41
地理认知	42
政治制度	42
转僧为儒	43
首起教案	43
文化传承	44
广交儒士	44

目 录

“哑式传教法”	45
回生之方	46
风俗礼仪	47
进京波折	47
建造南堂	48
另类福音	48
安息主怀	49
后世影响	50
明朝天主教：徐光启	52
圣教一石柱	52
上海徐家汇	53
科举烂路遇大光	53
中西文化搭金桥	55
博采众长	57
南京教案	57
救国梦碎	58
代代相承	59
明清天主教：汤若望与康熙帝	60
康熙“十字歌”	60
科隆的少年、罗马的才俊	61
里斯本码头的圣歌	62
北京故宫博物馆里的《崇祯历书》	63
琴声之外	64
紫禁城大炮边的小祭坛	65
《正教奉褒》	66
独守南堂	66
仰望星空	68
京城繁华处	69
赏酒下厨	70
《景教碑》和《天主堂碑记》	71
小皇帝与洋玛法	72
康熙与若望	73

目 录

接班人南怀仁	73
康熙初年的希望	74
礼仪之争	75
石羊的述说	77
附录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原文、中译文、英译文	78
附录二：《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	98

卷二 道成肉身

第一部分 流向中国的生命河：教会建立	104
历史架构	104
时代背景	105
拓荒时期（1807—1842）马礼逊入华至《南京条约》签订	106
马礼逊两件大事：中文圣经、华英字典	106
马礼逊及拓荒者们首创	107
最初的牧者	107
初熟的果子	108
撒种时期（1842—1900）鸦片战争至义和团事件	109
门户洞开、后援充足、遍地撒种	110
深入内地	111
圣经广传	112
太平天国	112
历史小结	112
扎根时期（1900—1949）庚子事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113
血的浇灌	113
世纪大事	113
教会增长	114
非基运动	115
抗日战争	115
撤离中国	116

目 录

二、中国教会的本土化	116
自立教会	116
布道团	117
本土传道人领袖	118
教派合一运动	120
校园事工	121
学联会	121
国外宣教	122
第二部分 大光普照在人间：社会影响	124
西学东渐：千年一觉，中国醒来！	124
西学范畴	124
东渐过程	125
历史帷幕	125
西学载体	127
西学先驱	128
调整初衷	129
西学动力	130
西学层面	130
西学目的	131
冲突回应	132
光照中华：教育、文字、医疗、慈善方面的贡献	133
兴办教育	134
100年的翻转	134
从3个穷学生开始	134
西方教育渊源	135
耶稣送来了精兵	136
输入科学	137
兴办女学	138
建立学制	141
中西接轨	142
庚子赔款	143
平民教育	144

目 录

文字启蒙	145
圣经翻译	145
刊物出版	145
汉学研究	147
医疗保健	147
今昔反差	147
西方医院和护理起源	148
伯驾：第一所西式医院	148
焦点：十字架的故事	149
医疗传教广泛展开	151
一条通往心灵的途径	152
阻止鸦片泛滥	153
放足	156
体育	158
慈善救灾	159
圣罗伦斯的故事	159
寻找失丧的人而拯救之	161
因怜悯所建的诸多“第一”	162
第三部分 回应冲突	164
基本认知	164
宗教传统	165
冲突概述：马礼逊前	165
唐朝：利益之争——最早记载的宗教迫害	165
元朝：皆为我用	166
明朝：艰难前行	167
首起教案	167
南京教案：正邪之争——第一次大教难	167
明朝天主教的发展	168
清朝：剧烈交锋	168
康熙历狱：华夷之争——第二次教难	168
礼仪之争：政教之争——第三次教难	169
什么是礼仪之争？	170
争论的苦果	170

目 录

冲突概述：马礼逊后	171
一、宣教准备时期（1807—1842）：逆流而上	172
二、教会创建时期（1842—1899）：改造土壤	173
天津教案——最具典型意义的教案	174
庚子教难——中国教会史上最大的教难	176
庚子教难的后果	176
拆毁为着重建——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177
质与量的增长	177
庚子赔款用于教育	178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179
非基督教运动——中国教会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教难	179
本土教会领袖出现	179
政教关系良好	180
新文化运动产生	180
思想土壤：民初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四种看法	181
导火线：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	182
第一次高潮	182
第二次高潮	183
第三次高潮	183
第四次高潮	184
非基后果	184
殉道者之歌：惧怕什么？	185
附录：各省开教宣教士名单	187

卷三 英雄之歌

孤独的行者：马礼逊	196
英雄的诞生	197
冒死前往——我不能，上帝能	199
小女孩的问题	200

目 录

商人的冷笑	200
记者的报道	200
国务卿的信	201
天使的帮助	201
石头开花——中国拓荒	201
勇往直前——冒死学中文	203
毒药和地窖	203
白蚁和书籍	204
一片丹心——决死译圣经	204
竖立于寒冬——孤独的橡树	206
一信难求	206
喜结良缘	206
痛失同工	207
生离死别	208
孤寂恐慌	209
大火烧不烂	210
初熟的果子	210
初期信徒	213
芬芳四溢的葡萄园	213
英雄的灵魂	216
马礼逊——克里斯多夫·汉考可专访	220
戴德生：流血流泪的巨人	230
如果赐下一儿	230
与神立约去中国	231
像刀一样刺透	231
中国的第一个早晨	232
第一次中国装束	233
基督的香气	233
见死不救	234
她是我的珍宝	234

目 录

以便以设耳	235
为什么不早来？	236
假如我有千条性命	236
走向灭亡的人龙	237
十镑加神所有的应许	238
猪尾布道团	239
摘取的玫瑰	240
比宝石还珍贵	241
我向他呼求	241
与猪同寝	243
但是我能信靠	243
再也不离开	244
戴家后代	245
出使天国：李提摩太	246
骏马待飞	247
驾驭奔马的少年	247
期待神作大事	248
一、山东八年（1870-1877）	249
初到烟台	249
贩书之行	249
“洋鬼子小贩”的消息传开了	250
沿途死城和睡着37个人的土炕	250
福音的追述	251
从“说书的洋人”到寻找“好土”	252
“道”与上帝	253
治病：道成肉身的福音	253
考场上福音萌芽	254
行善：一块不倒的磐石	254
青州府换装	255
结识李鸿章	255

目 录

终于住进自己的房子	256
用中国词汇表达基督思想	256
寻找“上等人”	257
上帝之灵派遣我	257
李提摩太与毛拉的一段对话	258
农夫们的回报	258
扇子上的赞美诗	258
丁戊奇荒	259
用主耶稣的方法分粮	260
从孤儿院到技术学校	260
预防灾难	261
二、山西九年（1877-1883）	261
哀鸿遍野	261
“鬼子大人”赈灾	262
“我有家了！”	263
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拯救	264
平阳府：景教徒郭子仪的家乡	264
太原：为圣餐礼自酿葡萄酒	265
为什么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一个基督徒？	265
水往低处流	266
风筝、飞行器、改良	267
“正如上帝所愿”	268
三、文字的号角	269
出任广学会督办	269
上任三件事	270
广学会四元老	271
献给慈禧60大寿的圣经	271
向国外博采众长	272
为“天足会”代言	272
会见总理大臣翁同龢	273
四、介入维新	273
一个非同寻常的“甲子”	273

目 录

接触康有为、梁启超	274
广学会出版物风行	275
给总理大臣的建议	276
戊戌变法的快车	276
义和团运动	277
五、化危难为祝福	278
大学和铁路：梦想成真	278
维新并未凋零	278
六、南方旅程	279
南方：拥有宗教潜质的沃土	279
旅馆墙上的处方	280
是谁派你到中国来的？	281
对不朽的追求	281
《西游记》英译	282
七、和平使者	282
成立红十字会	282
基督教青年会	283
夫人去世	283
青州基督教大会	284
四次基督教大会	284
“器物”背后的英国精神	284
伟大的教训	285
劝说孙中山	285
天国将要降临	286
最后的日子	287
李提摩太的笑声	288
爱的焚烧：富能仁与傜傜人的故事	290
一、傜傜人的渴望	291
二、傜傜王的传奇	292
三、远方来的“三哥”	293
四、上帝的挽留	295

目 录

五、新生命：书声、歌声	296
六、共负一轭的美眷	298
七、不朽：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299
多彩多姿的人生：宣教士警句、趣闻、精彩片段	302
不，我是个基督徒	302
圣经的价值	302
但是我能信靠	302
以膝代步	303
永恆价值	303
缠足惨状	303
六位宫女换一位师母	303
失之交臂	304
“万能校长”	304
世界不配的人	304
明日世界	304
可喜的伴侣	304
儒释道轮廓	305
母亲的作用	305
播种者	305
我不是摩西	306
神迹千里	306
不后悔	307

卷四 前赴后继

东汉多马传说	311
65-68年 圣多马 Saint Thomas	311
唐朝景教	312
635年 阿罗本 Alopen Abraham	312

目 录

635年 景净 (Adam)	312
元朝也里可温教	313
1246年 柏郎嘉宾 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 1180-1252	313
1271年 马可·波罗 Marco Polo 1254-1324	314
1291年 若望·孟高维诺 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1246-1328	314
明朝天主教	314
1549年 圣方济各·沙勿略 St. Francis of Xavier 1506-1552	314
1578年 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	315
1582年 罗明坚 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	316
1583年 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1610	316
1593年 郭居静 Lazaro Cattaneo 1560-1640	317
1597年 龙华民 Nicholas Longobardi 1559-1654	318
1610年 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	318
1620年 邓玉函 Johann Schreck 1576-1630	319
1620年 汤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319
清朝天主教	320
1659年 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320
1672年 徐日昇 Thomas Pereira 1645-1708	320
1687年 白晋 Joachim Bouvet 1656-1730	321
1687年 张诚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	322
1715年 郎世宁 Ginseppe Caseiglione 1688-1766	323
清朝基督教	323
1807年 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323
1813年 米怜 William Milne 1785-1822	324
1816年 麦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325
1827年 台约尔 Samuel Dyer 1804-1843	325
1830年 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326
1830年 雅裨理 David Abeel 1804-1846	326
1831年 郭实腊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	326

目 录

1833年 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	327
1834年 伯驾 Peter Parker 1804-1888	328
1837年 艾迪绥 Mary Ann Aldersey 1797-1868	329
1837年 罗孝全 Issachar Jacox Roberts 1802-1871	329
1839年 包留云 Samuel Robbins Brown 1810-1880	330
1839年 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330
1839年 雒魏林 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	331
1839年 合信 Benjamin Hobson 1816-1873	332
1842年 文惠廉 William Jones Boone 1811-1864	332
1842年 娄理华 Walter Macon Lowrie 1819-1847	332
1843年 艾约瑟 Joseph Edkins 1823-1905	333
1847年 慕维廉 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	333
1847年 伟烈亚力 Alexander Wylie 1815-1887	334
1847年 晏马太 Matthew Tyson Yates 1819-1888	335
1850年 丁韪良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	335
1851年 宾惠廉 William Chalmers Burns 1815-1868	337
1853年 嘉约翰 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	337
1853年 包尔腾 John Shaw Burdon 1826-1907	338
1854年 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	338
1854年 倪维思 John Livingstone Nevius 1829-1893	340
1854年 赫德 Robert Hart 1835-1911	341
1855年 韦廉臣 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	342
1855年 杨格非 Griffith John 1831-1912	343
1856年 纪好弼 Rosewell H. Gaves 1833-1912	343
1857年 梅理士 Charles Rogers Mills 1829-1895	344
1859年 施约瑟 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 1831-1906	344
1860年 林乐知 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	345
1861年 傅兰雅 John Fryer 1839-1928	346
1863年 狄考文 Calvin Wilson Matteer 1836-1908	347
1863年 马雅各 James Laidlaw Maxwell 1836-1921	348
1863年 郭显德 Hunter Corbett 1835-1920	349
1864年 富善 Chauncey Goodrich 1836-1925	349

目 录

1865年	李修善 David Hill 1840-1896	350
1865年	花之安 Ernst Faber 1839-1899	351
1866年	曹雅直 George Stott 1835-1889	352
1869年	谢卫楼 Davelle Z. Sheffield 1841-1913	352
1870年	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	353
1870年	景雅各 James Gilmour 1843-1891	354
1871年	马偕 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	354
1872年	明恩溥 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	355
1873年	香便文 Benjamin Couch Henry 1850-1901	355
1873年	慕拉第 Charlotte Digges “Lottie” Moon 1840-1912	356
1875年	马根济 John Kenneth Mackenzie 1850-1888	356
1880年	赐斐德 Harold Schofield 1851-1883	357
1882年	司督阁 Dugald Christie 1855-1936	358
1882年	李佳白 Gilbert Reid 1857-1927	358
1882年	苏慧廉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1861-1935	359
1884年	梅耐德 Annette Mills 1853-1929	359
1885年	剑桥七杰 The Cambridge Seven	360
	盖士利 William Cassels 1858-1925	360
	司米德 Stanley Smith 1861-1931	360
	施达德 Charles Thomas Studd 1860-1931	361
	杜明德 Arthur Polhill-Turner 1862-1935	361
	杜西德 Cecil Polhill-Turner 1860-1938	361
	章必成 Montague Beauchamp 1860-1939	361
	何斯德 Dixon Edward Hoste 1861-1946	361
1886年	卜舫济 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 1864-1947	362
1887年	柏格理 Samuel Pollard 1864-1915	362
1888年	古约翰 Jonathan Goforth 1859-1936	363
1895年	和受恩 Margaret E.Barber 1866-1930	363
1896年	毕得经 Horace Pitkin 1871-1900	364
1896年	穆德 John Raleigh Mott 1865-1955	365
1896年	盖落窪 Archibald Edward Glover 1859-1954	365
1897年	路思义 Henry Winters Luce 1868-1941	366

目 录

1897年 金纯仁 Gershom Whitfield Guinness 1869-1927	366
1899年 马士敦 John Preston Maxwell 1871-1961	367
1902年 乐灵生 Frank Joseph Rawlinson 1871-1937	367
1902年 盖群英 Alice Mildred Cable 1878-1952	368
1904年 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	368
1906年 胡美 Edward Hicks Hume 1876-1957	369
1906年 郭慕深 Karen Gormsen 1880-1960	370
1908年 富能仁 James Outram Fraser 1886-1938	370
1908年 柏立美 Victor Plymire 1881-1956	371
民国基督教	371
1912年 魏特琳 Wilhelmina “Minnie” Vautrin 1886-1941	371
1916年 钟爱华 Lemuel Nelson Bell 1894-1973	372
1920年 贝德士 Miner Searle Bates 1897-1978	373
1925年 李爱锐 Eric Henry Liddell 1902-1945	373
1928年 杨宓贵灵 Isobel Kuhn 1901-1957	374
1930年 艾伟德 Gladys Aylward 1902-1970	375
1932年 师达能 John Cornelius Stam 1907-1934	375
1934年 艾得理 David Howard Adeney 1911-1994	376
三集历史专题片《宣教士》解说词	377
第一集 叩门	378
第二集 落地	391
第三集 光照	408
参考书目选录	423

卷一 历史溯源

汉、唐、元、明福音入华概述



基督教入华大框架

有一部大书

由六翼天使用天堂的光芒写就，
在书上，神的目光并不难显现，
一部行动的编年史真实而明澈。

——库珀（英国诗人William Cowper 1731-1800）

我已经立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徒13：47）

福音入华时间线

基督教入华一千三百八十多年或断或续的历史，除了唐前传说外，普遍分为四个阶段：

- （1）唐朝景教
- （2）元朝也里可温教
- （3）明朝天主教
- （4）明末清初更正教（即基督教新教）

→ 汉朝，传说使徒多马传教到丝绸之国，411年已在东方建立教区。

→ 唐朝，大秦国（东罗马）主教阿罗本，于635年来到唐朝京都

长安（今西安），见唐太宗，景教传播210年，据景教碑记载“法流十道”、“寺满百城”，教徒20万。845年，唐武帝下诏灭佛殃及景教，福音沉寂400多年。

→ 元朝，天主教方济各会教士意大利人孟高维诺，于1291年抵达元朝京都大都（今北京），见元世祖忽必烈。也里可温教在地跨亚欧的元朝大帝国流传近100年，元终时教徒4万。1368年，元灭，也里可温教随之流散至蒙古边疆，福音再度沉寂200多年。

→ 明朝，1583年，意大利天主教徒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汤若望等人进入朝廷，修历制炮，与崇祯、顺治、康熙皇帝建立关系，明末清初，成功地将基督信仰传入东方帝国，明朝重臣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皈依。150多年间，信徒达30万。康熙年间因礼仪之争而中断。1742年雍正开始实行禁教，福音沉寂半个多世纪。

→ 清朝，65年禁教之后，第一位新教传教士，25岁的苏格兰人马礼逊，于1807年抵达广州。新教入华为近代中国带来第一本中文圣经、第一间现代学堂、第一所西式医院、第一份报刊杂志、第一座基督教堂、第一个基督徒、第一位中国传道人。从此，古老的中国，迎来了一个爱的新纪元。

福音入华路径

（1）西北丝绸之路

“国道”，指西汉（前202年-9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从长安（今西安）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公元6世纪时，中国的蚕种传到了中亚细亚和外高加索、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7世纪传到阿拉伯和埃及，8世纪传到西班牙，13世纪传到意大利，15世纪传到法国。各国使者、商人、传教士等沿着张骞开辟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狱犯，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

地中海。广义上丝路的东段已经到达了朝鲜、日本，西段至法国、荷兰。

（2）南丝绸之路

“蜀身毒道”（“身毒”为印度）总长约2000公里，是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早在距今两千多年的西汉时期就已开发。它以四川为起点，经云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腾冲，从德宏出境，进入缅甸、泰国，最后到达印度和中东。也被称作“南方丝路”，与西北“丝绸之路”齐名。

（3）海上丝绸之路

经过中国南方各个港口如广州、泉州等，乘船西行，到达东南亚、印度、阿拉伯，甚至更远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印度地区之间的航海已经很发达，佛教僧人法显到印度取经就是由陆路去而由海路返回的。唐朝时，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海上贸易发达，而许多僧人也是通过海路往返中国与印度之间。元朝时造船技术和罗盘导航技术已相当进步，可以满足远航的需要。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便是通过传统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以海路返回意大利。明朝时海上丝绸之路更进一步发展，以至有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西行（1405年），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海上贸易有着运输成本低和数量大的优势，使得海上丝绸之路后来居上，在宋元以后超过陆地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主要通道。

福音入华口岸

唐朝景教：

大秦（东罗马）主教阿罗本635年从叙利亚沿丝绸之路到达京都长安（西安）。长安是丝绸之路的东起始点，叙利亚则是这条道路的另一端。

元朝也里可温教：

孟高维诺年从伊儿汗国（今伊朗）走海路，途经印度，1291年抵达中国泉州（福建，东方第一大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于1294年进入元大都（今北京），受到元成宗铁穆尔的欢迎，获准在大都自由传教。

明末清初天主教：

沙勿略1551年到达中国沿海上海川岛。

范礼安1578年进入澳门。

罗明坚1580年进入广东肇庆。

利玛窦1582年进入广州，1601年进入都城北京。

汤若望1620年入京，进入明廷为思宗崇祯制历，被清世祖福临称之“法码”（爷爷）。康熙帝几乎皈依。

清朝基督教：

马礼逊1807年抵达广州。

福音在华大转机

1807年，马礼逊入华，广州是唯一的通商口岸。外国人只能居住在广东13行，家属不许入内。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华文明进入数千年未曾有过的变局。《南京条约》签订，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西方传教士随之进入通商口岸。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条约》签订，允许外国人在内地传教。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允许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租买土地及兴建教堂。

1865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创立中国内地会，差派了大批不畏艰险的宣教士如柏格理、富能仁、郭慕深等，使福音深入中国内地以及边陲地带。同时，宣教士成为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参与者和同道者，在文字、教育、医疗和社会各个领域，引入西学，启蒙大众。伯驾、李提摩太、林乐知、傅兰雅、狄考文等西方宣教士在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1888年，美国人慕迪（D. L. Moody）成立学生志愿运动，向国外派出大批宣教士。

1900年，义和团事件后，福音本土化。至1920年代，开始有独立教会（如真耶稣教会、聚会所、耶稣家庭、王明道的教会等），自治、

自传、自养的“三自精神”萌芽并发展。据1920年统计，7000多位西方宣教士驻扎中国，布道建堂、设立学校、开办医院、办报译书，引进西学、改良风俗、救灾济贫。

今天，21世纪初，马礼逊来华200多年以来，据非官方统计，信徒约8千万人。福音燎原，势如破竹，不可阻挡。

福音入华经济来源

葡萄牙王室：17世纪，殖民大国葡萄牙拥有海上霸权，并拥有基督教在东方国家传播的保教权。保教权是指由罗马教廷授予的由世俗政权承担的保护天主教在非天主教国家传播的权利和义务，包括命令建筑教堂、任免主教和神甫、划分教区、负担教区传教经费等。

西班牙王室：从1689年开始，另一个殖民国家西班牙开始为在华基督教教会提供资金支持。西班牙、葡萄牙王室为在华教会提供的经费先送到澳门，再由澳门的代理处转发到内地。

罗马教廷：据史料记载，罗马教廷提供的经费高于西班牙、葡萄牙王室提供的数额。

明、清朝廷：朝廷对传教士的赏赐以及传教士在朝为官所获得的俸禄也是基督教传教的一个重要的经费来源。据史料记载，利玛窦在北京传教的时候，经常得到明神宗的赏赐。如汤若望、南怀仁、徐日升等，明、清朝廷不仅为他们提供“薪金与米粮”，满足其生活之需，有时还有额外的封赏。史载，清顺治年间，孝庄文皇太后就曾赏赐银两给外籍传教士，王公贵族变相捐助传教士者亦不乏其人。

中国教友：由于教会宗主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海上交通的阻隔等原因，在华传教士的活动经费有时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在华教友的资助成为传教士主要的经济来源。《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利玛窦进京后，其在北京的住房和教堂均得益于明朝内阁大学士徐光启的捐献。《明清之际中国天主教会传教经费来源》和《徐光启集》卷十二《景教堂碑记》等文献资料记载，明朝末年，知名天主教徒杨廷筠出资在杭州建一教堂，并设一修院。韩霖、韩云兄弟也多次捐款在山西平

阳、太原等地建教堂。

本国教会：鸦片战争以后，在华基督宗教教会的经济来源除原有的房地产、田产收入外，其余的主要来自美国，包括传信部年例津贴、救济物资及教区修会在美国的募捐、弥撒献仪等。¹

福临中华契机和中国皇帝年号

基督教入华遵循一条规律：在强盛时期，福音藉着苦难，传入中国。

（1）福音盛传时期，恰是中国强盛时期：

东汉：光武中兴，刘秀25年始，以柔道治天下，相传多马将福音传到中国。

唐朝：贞观之治，唐太宗召见阿罗本。开元之治（唐玄宗713-741年），景教盛传。

元朝：元世祖忽必烈建地跨亚欧大帝国，见孟高维诺，也里可温教盛传。

清初：康乾盛世，汤若望等耶稣会士在清廷治历，天主教盛传。

21世纪：中国强盛，福音再度燎原，基督教盛传。

（2）福音藉着苦难，屡次传入中国：

汉朝：主后65年尼禄王虐杀基督徒。69年耶路撒冷被灭，基督徒逃难东来，这年正是东汉“光武中兴”年间，永平12年。

南北朝：431年以弗所第三次会议，聂斯托里派因注重耶稣为人之道而被亚历山大派定为异端，开除教籍。聂派流亡到阿拉伯及埃及，被波斯学者所接受，由波斯布及印度、中国等地。《洛阳伽蓝记》卷四永

¹ 海宝明，“历史上在华基督宗教教会的主要经济来源”，《中国民族报》2010年06月08日。<http://minzu.people.com.cn/GB/166719/11814322.html>

明寺条记北魏（386—534）都城洛阳佛教盛况说：“百果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秦国，尽天地之西垂。”这里说的大秦国“沙门”，当指混迹于洛阳佛寺的景教士。

唐朝：默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建立神权政权，632年基本统一阿拉伯半岛，其年默罕默德去世。后继者被称为“哈里发”（意“真主使者的继承人”），开始率领阿拉伯人对外军事扩张。635年，打败东罗马，占领叙利亚，次年攻陷大马士革。两年后进军耶路撒冷地区。继而分兵东西两路，展开全面进攻。东线接连攻破波斯军队防线，占领了伊拉克和伊朗大部分地区；西线继续连败拜占廷，顺势占领巴勒斯坦和埃及。635年，正是大秦国大德阿罗本来到长安的年份。

元朝：蒙古铁骑席卷亚欧时，正值欧洲基督教国家与回教徒苦战之中，屡次十字军东征，教皇及君主们希望能与东方约翰王联手夹攻，打败地处中央的回教徒。此时，有人伪造一信，署名“长老约翰王”（圣三博士的后代），寄给欧洲君主，请求共同收复耶路撒冷，产生极大震撼。蒙古太宗窝阔台17年（1245年）率大军进逼欧洲，教皇因诺森四世（Innocentius IV）刻不容缓，派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o di Carpini, 1182-1252）使华，于1246抵达蒙古都城和林，觐见大汗贵由。这是天主教首次正式使华。

明朝：马丁路德于1521年被判异端后，用了13年终于在1534年将《圣经》译成普通人可以阅读的德文。同年，耶稣会建立。天主教在宗教改革中大受挫折，于是在海外宣教中寻求复兴。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沙勿略成为被派遣到东方的第一位宣教士。他于1551年到达离广东只有8海里的上川岛。

清朝：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和西方诸国签订《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条约中规定，允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传教，并可置地建立教会，客观上打开了福音大门。

是巧合，还是神谕？

中国几个年号与基督教入华似乎有所关联：

西汉：汉平帝“元始”（1—6）：耶稣降生，元年开始。

东汉：汉明帝“永平”（58—75）：传说使徒多马将永生神平安的福音传到中国。

唐朝：唐太宗“贞观”（598—649）：“正道示人”，635年东罗马主教阿罗本入华传道。

元朝：元世祖“至元”（1264—1294）：“至哉坤元”，天主教神父孟高维诺于1291年抵达元朝京都，见元世祖忽必烈，在华建立第一个天主教区。

明朝：明万历“神宗”（1563—1620）：1583年意大利神父利玛窦入华，奠定天主教基础。

明朝：明熹宗“天启”（1620—1627）：1625年（天启五年）唐朝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

清朝：清世祖“福临”（1638—1661）：小皇帝与汤若望神父免礼相交，称汤若望为“法码”（爷爷）。

清朝：清仁宗“嘉庆”（1760—1820）：“普天同庆”，基督新教首位宣教士马礼逊入华。

清朝：清宣宗“道光”（1820—1850）：“大道光辉”，马礼逊圣经《神天圣书》于1823年出版。

清朝：清德宗“光绪”（1871—1908）：“光大未竟之功业”，戴德生带领内地会进入中土，福音遍传。

汉朝：多马传疑

西汉：耶稣降生

耶稣降世，正是中国西汉年间（前202-8年）。

那一夜，天使向伯利恒野地里的牧羊人报告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大队天兵和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路2：10-14）

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在加利利海滨传道。三十三年后，被钉十字架。上十字架前，耶稣向十二个门徒颁布大使命，将福音传到地极。门徒们将福音向西传至罗马，向东传到叙利亚和印度。

据传说，福音于东汉年间传到了中国。

光武帝刘秀于25年建立东汉，建都洛阳。洛阳史称“神都”，是中国十三个朝代的都城。

自黄帝开始，中国古人称华夏为“神州”。

冥冥中，先贤们似乎早已将中国这片土地，归给了创造并掌管宇宙的那一位。

东汉：孔望山画像石

孔望山，位于江苏省连云港通往洛阳途中，因孔子（约前551年—前479年）登临而得名。

孔子登高远望，掩须长叹：朝闻道，夕死可矣！

奇妙的是，人们发现就是在这座山上，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在公元60年左右刻制的画像石上，留有各种信仰的标记：十字架、洗礼、执事、棕榈枝、圣号等。它们似乎述说着一个闻道得救的故事：楚王刘英，受圣多马启发，接受了信仰，受洗成为基督徒。

圣多马头戴十字冠冕，身穿礼仪长袍，右手握一大十字架置于胸前，左手持一权杖，权杖顶端是基督标记，身边是助手竺法兰。

多马，就是那个非要摸一摸耶稣的钉痕才肯相信救主复活的使徒。传说是他，将福音传到了“神州”。

相传圣多马（又称“多默”）于公元52年左右进入印度，Malayattur是多马当时生活及传教的地方，镇内的“圣多默堂”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多马在印度殉道。

又有印度的传说提到，多马到了印度，另一位使徒巴多罗买则到了中国传教。²

美丽的传说：由于多马，天国在中国飘然升起

1862年到中国传教的罗马天主教主教樊国梁（Pierre marie Alphonese Favier）在《燕京开教略》里推测，公元65年，罗马帝国尼禄迫害基督徒，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部分逃难的基督徒来到了东方，侨居中国。

研究口传福音的法国专家皮埃尔·佩里埃（Pierre Perrier）和中

² 参考：皮埃尔·佩里那（Pierre Perrier）、沙威·瓦尔特（Xavier Walter），《多默宗徒在华建立教会》（*Thomas fonde l' Eglise en Chine*）。巴黎：Hachette出版社，2008。

国问题专家沙威·瓦尔特（Xavier Walter）合著《多默宗徒在华建立教会》（*thomas fonde l' Eglise en Chine*）一书，阐述公元65-68年（汉明帝永平8年至11年），圣多马带领助手竺法兰在徐州、开封、洛阳传福音，向皇帝、皇后讲道，在中国建立了天主教会，并在洛阳建造了一座带有尖塔的教堂。后来竺法兰一人留在中国当主教，多马回到了印度。公元72年，圣多马在印度梅拉普尔殉道。

早期印度的天主教会流行一个传说，多马曾经从耶路撒冷出发，来到巴比伦城，然后坐船到达印度南部的马拉巴宣讲福音，使国王和民众都归信了基督。后来，他搭乘商船到达中国。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曾在京城洛阳建堂布道。

印度马拉巴主教所著《迦勒底史》称：“天国福音，散遍各处，竟至中国……中国人……得信真理，皆出于圣多马之力。”

在马拉巴教会迦尔底亚祈祷书中记载：“中国人和埃提阿伯人，因多马的劝勉，信仰真道。”“基督教借着多马的宣扬，犹如双翼之鸟，飞往中国。”

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沙勿略和利玛窦都相信此说。在一本叙利亚文的《圣务日课》中，有两段话：

“由于圣多默（多马），印度人摒弃了崇拜偶像的错误；由于圣多默，中国人同埃塞俄比亚人已转向真理。由于圣多默，人生真谛之光照亮了整个印度；由于圣多默，天国在中国飘然升起。”

“印度人、中国人、波斯人、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爱奥尼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在此纪念多默之际，敬拜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十八字福音：徐州《汉代基督教福音铭文镜》

《文汇报》2009-06-23报道：日前，徐州惊现汉代铜镜上有基督教十八字福音，此发现填补了基督教传入中国文字记载的空白。

发现者是徐州汉画像石馆馆员马焕跃，他师从于著名金文专家闫孝慈教授，学习金文四十余载，研究和鉴定铜镜二十多年。此镜是马先生的学生、铜镜民间收藏家王师所有。马先生称此铜镜为《汉代基督教

福音铭文镜》。

此镜直径13.4厘米，主体文饰外围是一圈十八个字的铭文，原文为“作神镜，尊一帝。德母目人子。有王赫。志，重，须，毓。”

现代文字解释为：作神镜，尊崇、信仰、敬拜独一上帝。圣德的马利亚亲自目证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之子，道成肉身，降卑为人子。他有王一般的显赫和尊荣，他是全人类的救赎之主。凡立志信他的，要重新，必须，再生一回。

徐州汉画像石馆的石室墓（建于公元86年）内，有旧约故事及看似耶稣降生、五饼二鱼的图案。

据此推测，福音于东汉中后期，经由叙利亚教士传入了中国。

最早的文字记载：丝国、“沙门之外”

《中国史略》记载：在东汉时代（25-220），曾有两个叙利亚教士到过中国，他们到中国来表面是为了学习养蚕治丝的方法，把蚕子带回欧洲，可是他们的本意是传教。

古罗马的阿诺比尤斯，于公元300年左右写《驳斥异教论》，说：“传教工作可以说是遍及印度、赛里斯（Seres，丝国，即中国）、波斯和米底斯。”

《洛阳伽蓝记》卷四永明寺条记北魏（386—534）都城洛阳佛教盛况说：“百果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秦国，尽天地之西垂。”佛教从未传至罗马帝国境内，这里说的大秦国“沙门”，当指混迹于洛阳佛寺的景教士。

《资治通鉴》卷一四七记梁武帝天监八年（509）说：“时佛教盛于洛阳，沙门之外，自西域来者千余人，魏主别为之立永明寺千余间以处之。”这段史料明言，从大秦国，即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到洛阳的三千余人属“沙门之外”。

《道藏》的《太清金液神丹经》中一段有关基督教的文字“谜障”：“昔中国人往扶南，复从扶南乘船……经六十日乃到岸边，不知何处也。上岸索人而问之，云是大秦国……此国是大道之所出，谈玄

说妙，唇理绝殊，非中国诸人辈作一云妄语也。道士比肩，有上古之风。”

西方学者莫菲特在《亚洲基督史》中曾说：“无论如何，早在455年，波斯使节已到达中国北魏首都……据此推断，则至迟在五世纪末，波斯的聂斯托里教教徒已在中国了。”³

什么是福音——十字架：万民怀大泽

明朝刘子高诗集和李九功《慎思录》，记载明洪武年间，江西庐陵地方，掘得一大铁十字架，上铸赤乌年月。赤乌（238—251年）是三国孙吴年号。刘子高作《铁十字歌》，以志其奇。十字架上铸有对联一副：

四海庆安澜，
铁柱宝光留十字；
万民怀大泽，
金炉香篆蔼千秋。

明朝又掘得过三个古十字石碑，一是福建省南安县，据考当是四五世纪（晋朝南北朝）的物件。一是泉州府东山寺旁，一是泉州水陆寺旁掘出，二寺都是唐初建造的。

这些记载都证明，唐朝以前中国已有基督教。

有关基督教如何传入中国，历来有一些文字记载，但因为没有足够的出土文物作为凭证，还不能称之为“信史”，暂且视之为传疑。

3 《群文天地》2011年第22期<http://wenku.baidu.com/view/5618b131ee06eff9aef807e1.html>

唐朝景教：天启之石

一、石破天惊

景教碑，高大俊美，在一个叫“天启”的年代破土而出，揭示着一个被掩埋了几个世纪的故事——基督救恩在中国唐朝的传播。

景教碑是迄今为止福音入华最可靠的考古凭证，记载了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中国的景教，全名《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出土始末

明熹宗天启五年，即公元1625年，利玛窦死后15年，景教碑被发掘。据各方记载，在长安与周至之间，因建屋，于败墙下掘地得此碑，完好无缺。西安府派人查验，认为此乃佛教之遗物，故将之移至西安府城外金胜寺中。《陕西通志》有云：“金胜寺，即崇仁寺……即唐三藏法师译经处。”

当时，不少人认为此乃神石。

“有一件事，看起来像巧合，那就是：基督教东来中国之时，正是中国人西行取经之际。公元629年，唐玄奘离开长安，一路向西走到印度。十几年后，带回657部佛经。

天意冥冥。正当唐玄奘西行取经止步于印度的第六年，阿罗本主教带着圣经自西而来，直奔长安。”

时值贞观大治，盛唐气象，雍容大度。宰相房玄龄出宫亲迎，阿罗本拜见唐太宗，住进皇宫，着手翻译圣经。⁴

第一个见到此碑的是住在西安附近岐阳的一个举人，名张赧虞（读gǎng yú）。他看到碑文字迹秀美，是唐代文士吕秀岩的手迹。作者是僧人景净，不到两千字，文意古奥，不易理解。张赧虞隐隐觉得此碑与一般佛道有异。碑上教义似曾相识，仿佛听过。他想起18年前，他在北京为官时，结识了一位洋人，名叫利玛窦。他长须抵胸，不婚不宦，博识广闻，通晓天文地理，人称西泰子。张赧虞细读碑文，发现碑文所载仿佛利玛窦所教，然而不敢妄自揣测，乃取得拓本，派人送到杭州至友工部侍郎李之藻家里，因为李之藻在利玛窦影响下皈依了天主教。

李氏一读之下，喜出望外，发现自己所信之教并非新近的舶来品，原来已在中国流行近千年。

景教之名，碑文上说：“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据李之藻解释，“景者，大也，炤也，光明也。”景教，乃“正大光明之宗教”。

第一个看到景教碑的外国人是法籍教士、后来享有盛名的汉学家金尼阁（Nicholas Trigault）。他在利玛窦死后数年来华，用拉丁文编辑利氏日记《利玛窦中国札记》，于1615年出版，轰动一时。金尼阁于1625年10月赶到西安金胜寺，研究碑上的记录。

1628年，葡籍教士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来到西安，对景教碑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和考证，又把碑文译成葡萄牙文在欧洲发表。通过他的译介，整个欧洲掀起了一阵轰动。短短数十年间，景教碑在西方宗教界及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旋风。

1907年，年轻记者、丹麦探险家何乐模（Frits Holm）不远万里来到西安，欲得原始景教碑不遂，于是仿刻景教碑并将之运往纽约。何乐模的到来引起了官方重视，景教碑方才被运往西安碑林保存。何乐模获取仿刻景教碑的事迹在欧洲广为传播，影响极大。景教碑在历史上曾经度过了一千多年默默无闻甚至艰难曲折的岁月，直到何乐模的来到，并将仿刻碑运往西方，并向罗马、美国、希腊、印度、委内瑞拉、丹麦、

4 远志明、陈上宇，《宣教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神州传播协会，2016年，p. 7。

加拿大、德国等13个国家的博物馆、大学等赠发模造碑，并就其赴华历史和景教碑的论题发表了50多次图文并茂的演讲。之后，景教碑才声名鹊起，享誉世界。

碑中之碑

景教碑建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唐会昌五年埋入地下，被埋在土中达780年之久。

今天，《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矗立在陕西西安碑林的第二展室中。

景教碑与目前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于1799年在埃及发现的“罗塞塔碑”（Rosetta Stone），巴黎卢浮宫收藏、1868年在死海发现的“摩押石碑”（Moabite Stone），和墨西哥国家博物馆收藏、在南美发现的古代亚阿兹特克族的“授时石碑”（Aztec Calendar Stone）并称“世界四大名碑”。四块奇石之中，以景教碑保存最好，堪称“石中之王”（the stone of stones）。

这块黑色石碑，刻字清晰，高约十英尺（高279厘米、宽99厘米），重约两吨。碑头上有飞云和莲台烘托着一个十字架，包围着十字架的是一种无角之龙螭，左右配上百合花。碑的正面刻字32行，每行62字，正书，总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字，背面无字，下面和左右两侧刻有70位景教僧人的名字和职称，这些人名，除八名外，都是叙利亚文和汉文相对照的。

碑文内容

碑文分序文、正文、颂词。

序文499字，由“奥若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句起，至“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照彰，强称景教”止，总括了景教之信仰，简述了它的礼仪规条，是一段极为简练的宗教信经。

景教碑借用了很多佛教和道教的术语。它只是借用，其实它非常

严格地反映了景教的教义和它的思想。

比如说，它讲到“大秦寺”，其实讲的就是景教的教堂。

“三一妙身”，指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

“阿罗诃”，叙利亚文的天父。

“弥施诃”，弥赛亚，耶稣基督。

“淨风”，Divinity，圣灵。

“景尊”，这个词是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因为佛教里面有“世尊”，道教里面有“天尊”，基督教里就有“景尊”。所以，弥赛亚就叫“景尊弥施诃”。

“匠成万物，然立初人”，这其实就是基督教的创世观。

“室女诞圣”，就是讲圣母马利亚生下了耶稣。

碑文讲到耶稣的受难和复活，比如它里面有一句话叫“开生灭死，棹慈航以登明宫”，讲他怎么救赎这些罪人。

“判十字以定四方”，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升真”，耶稣复活升天。

“经留二十七部”，新约一共二十七卷。

如此等等，基督教教义基本上介绍过来了。

正文介绍阿罗本到长安后受到的礼遇和景教最初150年间在中国的发展经过，由“惟道非圣不弘”句起，至“白衣景士，今见其人”句终，叙述景教在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到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立碑为止，历经五朝传衍兴衰，是一篇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献。

最后是颂词，用韵文表达。

碑文的撰写者景净系波斯传教士，中文功底深厚、学识渊博，大量引用了儒家、道教、佛教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以阐述基督教教义。

景教碑头的图像有十字架、飞云、莲花座，皆有寓意。

碑文研究

景教碑被称作“众碑之魁”、“中国基督教之昆仑”。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指出：“要讲基督教入华史，还是要从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讲起。”方豪论及中国的基督教时，更一再坚称“是碑为我国景教

第一文献”。

国人对该碑的研究，最早可溯至耶稣会的信徒李之藻（1565-1630），据云李在得到碑文的拓本后，即于1625年6月10日出版一小册该碑刊本，对碑文做了些解读和肤浅的注释，该书于1878年与阳玛诺的汉文注释本同时再版。李氏更有影响的文章是《读景教碑书后》。耶稣会信徒徐光启（1562-1633）著《景教堂碑记》和《铁十字箸》，从天主教的角度，解读该碑。明清语言学家顾炎武（1613-1682）曾亲视该碑，在其《金石文字记》卷四记录道：“景教流行中国碑，僧景净撰，吕秀岩正书，建中二年太簇月，今在西安府城外金胜寺。”另在卷六，又理校了碑文的一个字：“景教流行碑：‘宝装璀璨’，翠即翠字。”

葡萄牙耶稣会士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 1574-1659）用汉文撰写的《唐景教碑颂正诠》。是著完成于崇祯十四年（1641），三年后始刊行，尔后时有重刻。该书以中文疏解碑文，主要针对其中的教义部分。阳玛诺作为一个传教士，既精通天主教的经典，又熟悉中国文化，其对教义的诠释自然比李之藻、徐光启等更为头头是道。

20世纪前西人的研究，以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为主体。该碑的出土对他们来说，可谓如获至宝，因为其无疑证明了基督教在华之源远流长。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夏鸣雷（Henri Havret, 1848—1901）神父所撰的《西安府基督碑》凡三卷，出版于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该书不唯总结西人既往之研究，且将唐宋汉籍有关唐代景教的记录和明清儒家有关景教碑的考述，多行收录，其志似在集以往中西研究之大成。近百年来，研究该碑和中国景教的重要著作，无不参考此著。

清朝光绪庚子年间，也在敦煌发现景教经典，如《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一神论》等。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古籍的记载。

19世纪基督教新教来华，也有许多传教士对景教有浓厚的兴趣。比如著名的中国通伟列亚力（Alexander Wylie）写过景教碑的文章，美国第一个来华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men）也曾对景教碑作过论译，历史家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都对此碑作过研究。

然而，怀疑者也不乏人在。在欧洲，以法国著名的启蒙主义者伏尔泰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曾就该碑的真伪提出质疑，甚至直称该碑是耶稣会士所贗造。

传教影响

景教碑之大发现轰动一时，对传教大有裨益。公元1623年耶稣会报告：中国信徒人数为五千人。景教碑出土数十年后，据1663年统计，信徒则为11万人，陕西就占了四分之一。

二、灵石载道

景教渊源

景教是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的一个支派，即“聂斯托里派”（Nestorians）。叙利亚人聂斯托里于428年被任命罗马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他反对“马利亚是上帝的母亲”一词，主张基督的“神、人两性论”，即所谓“二性二位”说，遭到持“一性论”（神人二性合一）的亚力山大主教西利尔反对。

这本来是东方教会内部神学上的论争，但二派分别受到帝国皇帝和罗马教会的支持。双方论争激烈，聂斯托里终于在公元431、449年两次以弗所会议上被定为异端。聂氏本人被革职流放，郁死在埃及的沙漠之中。他的门徒被迫东迁，在波斯传教，逐步向东方发展，几乎遍及东方教会，于公元635年传入中国，称为景教。

东方教会最大的特点是对传教具有高度的热情，被人称颂为“火热的教会”。由于这种热情，聂派传教士活动于7世纪就已遍及中亚地区，今波斯、阿富汗，即我国古代所称的西域一带。东方教会驻巴格达中部，一度管辖从西亚到中国海的25个大教区，拥有信徒达好几百万，这是罗马系与希腊系的西方教会无法相比的。

景教教义

以景教碑文和1907年甘肃敦煌石室中发现的景教经典，经学者考证，其教义从上帝无始无终、三位一体、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讲到魔鬼引诱始祖犯罪，讲到耶稣降生，传道垂教，又讲到门徒宣传耶稣教训，成立教会等等，大体与基督教的教义相一致。

异端黑锅

据记载，皇帝狄奥多二世主持的449年以弗所会议，在以聂斯托里为首的安提阿代表团尚未到达之前，就宣布开会，匆匆表决通过西里尔对聂氏的定罪和革职，显然属不合法。当安提阿代表团到达时，一闻此情，即拒绝出席会议，以示抵制，继而吁请罗马教宗利奥一世向东罗马皇帝提出抗议，无济于事。教宗愤而称此次会议为“强盗集团”。

在《海外天主教动态资料》（1995年第4期）里有一篇以“天主教会与东方叙利亚教会握手言和，1500年的宿案终于和解”为题的文章，报道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与东方叙利亚教会主教马尔完卡四世，于1944年11月11日在罗马签订联合声明，追溯公元431年的以弗所会议，重申了尼西亚信经的有关信条，以及对当时论争的解释，“认识到，当时的分歧，只是表达方式的不同，并不涉及信仰的实质。今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引起分裂，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双方的误解。因之宣布：长达1500余年的神学论争已告结束……”

至此，对聂斯托里派的不公正处分，已不言而喻地得到改正、纠偏和撤销。聂氏长期以来所背上的“异端”黑锅包袱，也告卸下。基督教也可以放心地与景教认同，承认景教就是基督教，是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先驱……

185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所撰的《天道溯原》，在中卷著录景教碑文时，也称“今观其文，教中礼节，虽有少异，而道实大同”。

在唐盛况

东方教会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正式来中国传教是在大唐贞观九年（635）。聂派主教叙利亚人阿罗本来到唐朝首都长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率领仪仗队到长安西郊隆重接待，并且让阿罗本等人在皇帝藏经楼翻译圣经，还在皇帝的内室讨论福音道理。

太宗于贞观十二年（638）下令准其传教，并由政府资助在长安义宁坊建立“大秦寺”一所。北宋王溥撰《唐会要》四十九卷记载唐太宗贞观十二年七月的诏令：“道常无名、圣常无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奉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太宗死后，高宗继位，在宗教方面继承了太宗的遗风，继续采取兼容并蓄的宽容政策，景教有了很大的发展。除长安外，“而于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仍尊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维护了阿罗本为景教大总管的地位。

高宗统治后期，大权旁落到武则天手中，由于佛教帮助武氏夺位有功，因而对佛教大加提倡，景教则受到压制和攻击。

到了玄宗时期，由于他历精图治，开元年间（713-741）达到了唐朝的黄金时代。在宗教政策上，他恢复了太宗的宽容传统。景教碑说：他曾令他的五个兄弟亲自到景教寺设立神坛，并对被毁坏的建筑物进行修复。公元742年，令高力士送来太宗、高宗、睿宗的画像安置在景教寺内，并饰以送来的百匹丝绸。

景教碑还指出，从大秦派来了新的传教士佉和主教，玄宗召集过景教士罗含、普伦等17人与新来的传教士一同到兴庆宫“修功法”（今称做礼拜）。

景教先后受到过唐太宗、高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诸皇帝的青睐和支持，在唐代前中期的传播蔚为兴盛。

景教没落

公元755年冬，爆发了安史之乱，唐玄宗仓皇入蜀避难，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安史之乱长达七年，在唐朝大将郭子仪的支撑下才勉强取得了胜利。郭子仪对景教有好感，故德宗即位不久，即公元781年，景教碑得以建立。

由景教僧伊斯出钱，伊斯的儿子景净撰文，建立起《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来纪念伊斯，并记录、歌颂基督教聂派在唐朝传教150年的经过。

德宗以后，唐朝进入衰落时期。景教碑建立以后，经历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几代皇帝。大体上，这段时期景教仍有显著的发展。当时，佛教和道教盛行。

会昌五年（845）八月，唐武宗受道士赵归真的影响，下令灭佛，景教受到牵连。从此景教在中国一蹶不振，日趋消亡。大概也正是在此期间，景教徒为了保存景教旧物，以图东山再起，遂将景教碑埋入地下，之后景教碑几乎彻底被人们遗忘。

到了五代和北宋时期，中国史籍就不再提及景教有关的事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一位名叫那及兰的聂派教士奉大主教之命与另外五名聂派教士来中国整顿教会。公元987年他们回去报告说：“中国之基督教已全亡，教徒皆遭横死，教堂毁灭。全国之中，彼一人外无第二基督教徒矣。遍寻全境，竟无一人可授教者，故急归回也。”

其后，苏东坡与弟子游终南山大秦寺，见其荒烟蔓草，凭吊为念。苏东坡之子苏子由诗曰：

大秦遥可说，高处见秦川。

草木埋深谷，牧羊散晚田。

山平堪种麦，僧鲁不求禅。

北望长安市，高城远似烟。

到了13世纪的元朝，景教又重新在中国出现，蒙古人称之为也里可温。

景教参考书目：

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科院，2003年。

陈怀宇，《景风梵声：中国宗教之诸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

元朝也里可温：长明灯里一滴油

元朝前夕的景教

景教在唐朝流传200多年，因唐武帝灭佛，殃及景教，景教徒退至北部边疆一带。昔日名噪一时的景教大秦寺，在宋朝苏东坡笔下，荒草蔓蔓，已成残垣断壁。

然而，自唐末至五代北宋，在中国本土濒临绝迹的聂斯托里派，仍活跃在中亚一带，包括新疆、内蒙古地区。以吐鲁番出土的文献以及七河（现俄罗斯境内）、伊犁、内蒙古百灵庙发现的聂斯脱里教徒的墓碑为证。

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说，在辽金时代，整批整批的基督徒家庭住在从甘肃到南满地带。宋、辽、夏、金时期，中国北方及西北地区仍有不少景教徒在活动。在蒙古部落中，景教也相当流行。11世纪，外蒙古境内的三大部落：克烈、乃蛮、蔑里乞部，以及内蒙古境内的汪古部、雍古部，都崇景教。大辽皇帝圣宗（983-1032），西辽德宗铎德可汗，东辽兴宗，道宗诸帝，即为基督徒。

辽初，克烈部首领在狩猎时被大雪围困，被这里的景教士救出，随后带整个部族皈依景教。克烈部末代首领王罕之弟札合敢不，将其次女唆鲁禾帖尼，嫁给了成吉思汗幼子拖雷。她，就是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之母。

到了十三世纪，铁木真于1206年建立蒙古汗国。他的儿子窝阔台（元太宗）将蒙古汗国版图拓展至亚洲北部及俄罗斯、欧洲。到了1271年，忽必烈（元世祖）定国号为元，1279年灭宋，成为中国的统治者。

蒙古人占领中原以后，西辽的景教也随着契丹人进入中原地区。但大部分信徒是蒙古人和来自西域的色目人。

元朝宗教政策自由宽松，中亚至欧洲的商人、教士、使者相率东来中国。沉静400年的景教，以及中世纪主导欧洲的罗马天主教，也在这时传入中国。

在元朝，景教徒和天主教徒统称“也里可温”，Arcoun，即“也里可温”的古音，意思是“福分人”、“有缘人”、“奉福音人”、“有福缘的人”。⁵ 陈垣于1917年作《元也里可温教考》明确指出，“也里可温”即“敬拜耶和华者”，也里可温（Erkeun或Arkaim）为蒙古语，希伯来文上帝（Elohim）的转音，即上帝教，信奉上帝的人。

马可·波罗与忽必烈

元朝天主教入华，与大名鼎鼎的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一家有关。

波罗一家是意大利威尼斯城的巨商，而威尼斯是中古时代一大都市。在十四世纪，威尼斯的财富冠于全欧。蒙古铁骑西侵后，威尼斯更是盛极一时。

1260年，尼古拉·波罗（Nicolo Polo），偕其弟玛窦（Matteo Polo ou Matteo）到克里米亚经商，三年后东进至布哈拉。在那里，兄弟二人遇见元帝派来的使臣，使臣邀请兄弟二人同往北京。兄弟二人于1265年到达中国京城大都，元世祖忽必烈召见了他们，详询关于宗教、教会及罗马的情形，并拉丁人的风俗。两人熟知蒙古语言，据实应对，元世祖因此萌发了与西方沟通的意愿。

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派遣波罗兄弟带信给教皇，要求派100名学

5 参见多桑译著《旭烈兀传》。

者和教师到中国来进行交流。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如此记载：大汗传旨，命带信给罗马教皇，信中求教皇派传教士100人来其国，“来人皆精七艺，善辞藻，能答辩如流者；能使拜偶像及信异端之人，皆知基督教规为最善，余诸教均为虚言不经。设基督教能证明一切，则大汗及其臣民，均可改信基督教，为教堂侍仆。”元世祖又令大使自耶路撒冷圣地之长明灯取油少许，以便敬奉。⁶

大汗命令发出后，给大使金牌谕旨一道，令经过各地，供给马匹夫役，地方官妥为照料。途中，使臣男爵扩格他因病不能前行，波罗兄弟二人前行三年，至黑梅尼亚之拉耶斯城（Layas en Hermeni），因遇大雪大雨，瀑流阻路，不得继续前行，一路上万分艰辛。

至元六年（1269）4月，波罗兄弟终于返回欧洲，到达阿扣城（Acre），可是教皇（Clement IV）已死，于是求助于埃及教廷专使透俄把塔（Legat du Pape）。透俄把塔听波罗兄弟陈述后大喜过望，认为此事对圣教大有益处，指示兄弟二人回威尼斯等候。兄弟二人回威尼斯后，得知尼古拉之妻已死，遗有15岁的儿子马可。

兄弟二人在威尼斯数年，教皇久不选定，急于复归大汗，便由威尼斯启程，带上马可，觐见前专使透俄把塔，求其准许到耶路撒冷取圣墓长明灯里之油少许，归回大汗复命。专使许之。波罗兄弟到耶路撒冷取了油来，见专使曰：“举定教皇，遥遥无期，吾辈必须归见大汗，因流滞久矣，故不能再待也。”二人得了专使的信，离开阿扣城，归见大汗。到了拉耶斯城时，听说专使已被选为教皇，改号额我略十世（Gregorius X），兄弟二人大喜。专使派人追至拉耶斯，以教皇名义，请兄弟二人急回阿扣，觐见教皇。

教皇决定先派两名多明我会士，授予全权，随马可兄弟回到中国。二人皆当时该省最有学识的修士，一名为古拉卫深斯（Nicole des Vicence），一名为奇奥末托利拨而（Guillaume de Triple）。

波罗弟兄带了15岁的马可·波罗与两位传教士一同上路。途中因遇战事，两位教士半途而返，此次教廷与元朝的接触终未实现。元12年（1275）波罗一家三人经过三年多跋涉，带着新教宗书信回到中国大

6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p. 92。

都，觐见元世祖。大汗听闻波罗兄弟归来，欣悦非凡，特遣人远迎于四十日路程之外。

兄弟二人及马可到达京城上都，入宫朝见大汗。波罗兄弟呈上教皇的证书和书信，奉上圣墓长明灯油，大汗大喜，赏赐甚多。大汗见马可年方髻少，问之为谁，尼古拉谓：“此乃臣之子携以侍从陛下者”。汗曰：“亦欢迎优待之。”⁷

马可即研读汉文，同时学习蒙古、畏吾儿、西夏、西藏等语文，极受世祖喜爱，在中国生活了17年，曾作过元朝的官，游历过中国许多地方。屡求回国，都不许。至元27年或次年（1291）以护送公主阔阔真下嫁波斯王阿鲁浑，全家三人方才西返。

狱中著述

1295年，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三年后，在威尼斯与热那亚战争中被俘。在监狱中，向同伴讲述了他的旅游见闻，由难友罗斯底加诺（Rusticano）记录中国见闻。狱中著述《马可·波罗行记》，成为欧洲中古时期的名著，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游记第2卷第79章里，有一段记录元世祖对基督教的态度：大汗有时透露，承认基督教是最真、最好的宗教。因他曾说：凡不是完善的事，基督教决不许人做。大汗不愿基督徒执十字架，因他认为完善伟大如基督而被处死，实为十字架的耻辱。

马可最后说，假如教宗过去能够派遣传教的人，大汗必早已成为基督徒，因他极有此意，毫无疑问。

7 马星烺译，《马哥孛罗游记》。北美印刷局，1929年，第7章至第14章。

三圣王的传说

早在第12世纪，欧洲广泛流传着一个东方“长老约翰王”（Prester John）的故事。传说这个向耶稣圣婴朝拜的古代三圣王之后代，既是教长，又是俗世君王。

13世纪之初叶，蒙古人崛起漠北，蒙古首领铁木真统一蒙古，建立了蒙古汗国，定都和林，称成吉思汗。蒙古人东征西伐，所向披靡。1211和1215年，两次大举进攻，直捣黄河北岸，并占领中都（今北京）。1245年，进逼欧洲。1236年，蒙古铁骑出征高加索诸君，入俄罗斯、平波兰、侵匈牙利，所向无敌，形成地跨欧亚二洲的元朝大帝国。

当时，欧洲基督教国家正陷于与回教徒的苦战之中，教皇及君主们希望能与东方约翰王联手夹攻，打败地处中央的回教徒。正当此时，有人伪造一信，署名“长老约翰王”，寄给欧洲君主，请求共同收复耶路撒冷。听说朝廷有人信教，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ius IV）派意大利人方济各会（Franciscans）修士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o di Carpini, 1180-1252）使华。

1245年4月16日复活节，年愈六旬的柏郎嘉宾带领两名方济各会修士，由里昂出发。波希米亚人Stephen动身不久即病，独自返回，柏氏与另一修士继续前行。赤地千里，一望无涯，既无草木，又无水源，战争之地，白骨累累，昔日农田，尽成荒场，更不知生死如何，长途茫茫。

柏郎嘉宾

1246年7月22日，柏郎嘉宾和另一位修士抵达上都哈拉和林。24日正逢贵由登基大礼，获准参加，呈上教皇书信，大致内容是劝可汗信教、罢兵、勿杀无辜、优待教徒，并直言蒙古屠杀之非。⁸

定宗贵由复信道，“你们西方人，自以为独奉基督而鄙视别人，

8 全信见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p. 86。

但.....我亦信上天，赖上天之力，我将至东徂西，征服世界。”

此乃罗马天主教第一次正式与华交往。

1252年5月7日罗博鲁（William of Rubruck）奉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之命，以教士身份携带国王御礼前往东方。12月27日到达和林，次年1月4日，得宪宗接见。1255年，他用拉丁文写成了给路易九世的出使报告，即《东方行记》。罗博鲁提及外蒙古境内之克列、蔑里克、乃蛮三大部落亦有聂派教徒。内蒙古之汪古都在元史上占重要地位亦属聂派，契丹国许多城市有聂派教徒。

罗马教皇和法国圣王试图归化元朝，不断遣使，元朝皇帝亦趁机遣意大利商人波罗兄弟回欧洲，通使教廷。如此，为罗马教廷正式派遣使节来华作好了准备。

孟高维诺

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1247-1328）是第一个天主教中国教区的创始人，也是教廷正式以使节名义差遣来华的第一人。

孟氏于1247年生于意大利南部，为天主教方济各会教士。1289年，亚美尼亚王海顿二世（Haiton II）委孟氏为代表进见教宗尼古拉四世（Nicolas IV），作为使节去中国。

孟氏于元世祖30年（1293）年抵达泉州。1294年到大都，受到忽必烈的欢迎，并允许他常驻中国传教。

孟氏到中国第一年，即劝化了汪古部高唐王阔里吉思。其辖区为长城以北，河套五原县包头镇诸地。阔里吉思被孟高维诺称作“长老若望大王”（即传说中的长老约翰王）的后裔。他是中国人首位领受小品神职者。他和孟氏合译日课经，也可以说是首先从事文化事业的中国人。

孟高维诺孤军奋战九年，直至大德七年（1303），方得一德国修士来协助。1318年后，孟氏先后建教堂三座。1305年时，已付洗6000人。孟氏养40名7-10岁幼童，教以拉丁文和教会礼仪，组织圣诗队，并将《新约》及《旧约圣咏》译为方言，又和高唐王计划将拉丁文日课经全部译出。

1307年，罗马教宗闻孟氏传教成绩优异，特设汗八里，即北京，为中国主教区，委孟为总主教，统辖契丹（中国北部）以及蛮子（中国南部）各处主教区，并统理远东教务。

汗八里和泉州

1307年7月22日，教宗格勒门五世（Clemens PP. V）派圣方济各会士主教七人，来华协助孟氏。其中只有三人于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成功抵达中国，并祝圣孟氏为总主教。

1313年，罗马教廷派遣方济会修士日辣多（哲拉多·阿布意尼）等七人前往中国，其中一人留在途中传教，三人死于印度，到达中国只有三人。日辣多被任命为泉州教区第一任主教，斐莱格林和安德鲁留大都传教。至此天主教在中国建立了大都和泉州两个主教区。

据《中国方济各会志》记载，意大利人和德理（Odoricus de Portu Naionis）大约于1314年启程东来，十多年间，付洗极多。他回欧后，口述旅行经过，留下传记。教宗本笃十四世将他列入真福品。《和德理游记》在欧洲各国图书馆所藏抄本极多。光绪15年，有一位郭栋臣神父，在意国那不勒斯书院求学，曾把《和德理游记》译为中文，提名《真福和德理传》。

元顺帝天历元年（1328），孟高维诺在中国工作了34年后，在大都去世，享年81岁。此时，天主教徒在华人数量估计逾一万人以上，除北京以外主要集中在泉州。现存孟氏书信三件，是我国传教史上极重要的文献。

孟氏去世后，教友中有个阿兰官员请求元顺帝遣使罗马教廷，顺帝派了16人的使团，于1336年启程。两年后，使团抵达亚为农城，晋见教宗本笃十二世（Benedictus PP. XII）。教皇回派使团，送四位方济各会士回访，其中一人马黎诺里（John of Marignoli）在主后1342年到达，居留三年。留下手稿《波希米亚史》，略述来华经过。据他所记，皇帝对在华天主教士甚为优厚，教士生活费用由皇帝供给，十分丰足，当时信徒约三万。

神马与人杰

根据元史和其他文献，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阴历7月17日，佛朗国（Frank，元人对欧人的泛称）有使者在慈仁殿向顺帝献异马，长一丈三寸，高六尺四寸，昂高八尺二寸，身纯黑，后蹄皆白；并绘图，当时颇为轰动。上叹慕曰：“人中有脱脱，马中有佛朗国马，皆世间杰出者也。”

贡马的佛朗国就是罗马教廷，甘州的英杰脱脱后被召至京师为相。

元朝也里可温中名人很多。对教会贡献最大、建堂最多的当推马薛里吉思（Mar Sargis）。他在镇江建教堂四座，丹徒二所，杭州一所，名为：云山寺、聚明寺、四渎安寺、甘泉寺、大光明寺、大法兴寺。《马可·波罗行纪》中提到镇江有教堂二所。1278年，即元世祖至元15年，大可汗命景教徒马薛里吉思为当地长官，教堂即其所建。

元朝的汗八里（北京），出了两个颇为重要的景教人物，一个是修士拉班·扫马（Rabban Cauma），另一个是其学生麻可斯（Markus），都是畏吾儿人。主后1278年，二人同往耶路撒冷朝圣，动身西行，辗转波斯和巴格达，最后在马拉加城见到景教最高领导人总管马登哈（Mar Denha）。回程时马登哈逝世，麻可斯竟被推举为东方教会的大总管，后取名Jabalaha1 III）。

聂派也有不少文学之士，其中最著名的有14世纪赵世延和马祖常。马祖常是汪古都部人，精于诗文，文则“富丽而有法，新奇而不凿”，现存影印本《元四家集》。马氏是第八代基督徒，自称是极度华化的也里可温。赵世延是雍古族人，元史称他“天资秀发，喜读书，究心儒者体用之学”，是元朝的大文豪。⁹

元代也里可温留名的诗人有五位，三位属于雍古马氏，即马润、马世德、马祖常，另一位叫雅琥，及琥的婿别都鲁沙。

9 元史卷180和143专传。

也里可温遍布中土

“也里可温教”也称“十字教”。《至顺镇江志》卷九《镇江大兴国寺记》镇江儒学教授梁相记：“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道，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

十字教和也里可温教都是基督教的通称，不专指一派，都信同一真宰，同信耶稣降赎，同有洗礼，同传福音。

元廷女眷有不少景教徒。成吉思汗为儿子娶景教徒开尔托部公主为妻，营内设景教寺。别吉太后，成吉思汗儿子拖雷的夫人，是忽必烈的母亲，是景教徒。

1260年忽必烈继承蒙古汗位，1264年迁都中都，改称大都。1271年定国号为元。1279年灭宋，统一全国。

因蒙古宫廷对各种宗教兼收并蓄，在中国西部和北部活动的景教也卷土重来。元朝景教复兴，弥漫各地，不亚于唐朝。

马可·波罗游记中说：“由克什葛尔以东，直至北京，沿路一带，几无一处无景教聂派基督徒也。”又说，“在中国各地，如蒙古、甘肃、山西、云南、河北之河间、福建之福州、浙江之杭州、江苏之常熟、扬州、镇江等处就有聂斯托里派及其教堂。”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叙述，经过凉州州府宁夏、归化等处多遇景教人。后来另一次旅行，经过河间府，见该处有景教徒，也有教堂。南行经运河到扬州，记载该处及镇江有景教教堂两座，建于1278年。杭州也有景教教堂一所。

《元史》上也频繁提及也里可温教徒，有不少达官、孝子、良医、义士。中国各地，如蒙古、甘肃、山西、云南以及河间、福州、杭州、镇江、扬州、常熟等城，各处都有景教寺及景教徒。

元王朝设置礼部管理全国宗教事务，礼部之下，宣政院专管佛教，集贤院专管道教，崇福司专管也里可温教。泉州、新疆、蒙古出土墓碑十字型均刻有13、14世纪年代。

又据《至顺镇江志》记载的一则户口调查数字，平均167户中有一

户也里可温，每63人中有一名也里可温。¹⁰

张星烺据中西文书籍中推悉元代在中国各省的教堂有：直隶北京城内，圣方济各会1306年有天主教堂二座，1330年三座，景教教堂甚多；直隶长芦镇有一堂；聂派有主教居山东大同，天主教有富丽大天主教堂一所；甘肃沙洲（敦煌）、肃周、甘州有华丽教堂三所；额里折、鄯州（今西宁）、额里合牙、外套（今鄂尔多斯北，黄河北岸）、新疆、东三省、山东清州、江苏扬州、浙江杭州和温州、福建泉州、云南省城都有教堂。

发展路线

也里可温教发展的路线由北京出居庸关，经大同、河套、宁夏、凉州、甘州、肃州、嘉峪关，往西域之路途。或由北京运河南下，沿钱塘江、过仙霞岭、下闽江、经福州、西至泉州往海外诸国之水路。欧洲人元时来中国或返欧洲，都是经此二路。

总之，欧洲人记载的西方天主教，在元朝，有柏郎嘉宾、罗博鲁、马可·波罗、孟高维诺、和德理等。除马可·波罗外，其他四人都是公教教士或教廷专使。

涓流中断

元朝社会采取了种族等级制度，将臣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景教重返中原之前，一直在色目人和部分蒙古人中间流传，并未在中土社会扎根。汉人属下等人，政治上备受歧视，排外情绪极为强烈。终元之时的四万余信徒中，汉人绝无仅有。

¹⁰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p. 27。

元代的民族压迫政策给汉人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创伤，民族起义在全国普遍展开。1368年，朱元璋带领起义军攻陷京城大都，顺帝北逃，元灭。朱元璋建立了明朝。

随着蒙古人、色目人被逐出中原，基督教再一次涓流中断。

参照：元朝历代皇帝和在位时间

太祖	(铁木真成吉思汗)	1206~1227	
监国	(拖雷)	1228~1229	
太宗	(窝阔台)	1229~1241	
定宗	(贵由)	1241~1246	
宪宗	(蒙哥)	1251~1259	
世祖	(忽必烈)	1260~1294	年号：中统、至元
成宗	(铁穆耳)	1294~1307	年号：元贞、大德
武宗	(海山)	1308~1311	年号：至大
仁宗	(寿山)	1311~1320	年号：皇庆
英宗	(硕德八剌)	1321~1323	年号：延佑
泰定	(也孙贴木儿)	1323~1328	年号：至治
天顺	(阿速吉八)	1328	年号：泰定
文宗	(图贴睦尔)	1328~1329	年号：致和
明宗	(和世剌)	1329~1332	年号：天顺
宁宗	(懿麟质班)	1332	年号：天历
顺帝	(妥欢贴睦尔)	1333~1368	年号：至顺、元统、至元、至正

也里可温教参考书目：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明朝天主教：利玛窦

福音涓涓滴滴，断断续续，在唐朝兴盛200多年后，又在元朝流传100多年，随着元朝帝国的灭亡，沉寂了两个世纪。直至十六世纪中叶，利玛窦等天主教耶稣会士再一次踏浪东来，推开明朝帝国紧闭的大门。

明太祖朱元璋于1368年建立明朝，朝政混乱，外患不绝，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15世纪初，明成祖虽曾派郑和舰队七次远航西洋（1405-1433），却并没有为古老的中国带来新鲜血液。由于海盗对沿海地区的骚扰，终明之世，都在执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同时，中国内地向西通往欧亚的丝绸之路也因战乱而阻塞。

当明朝闭关锁国之时，欧洲却从中世纪醒来。

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在科学、文学、经济等方面突飞猛进。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519-1522年葡人麦哲伦环球航行。航海事业的发展使福音东来成为可能。

1517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震动了全欧洲，许多地区改信更正教（新教）。

1534-1538年天主教成立了宣教差会耶稣会（Jesuit Order）。耶稣会的成立，为福音东来预备了人力。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近代中国天主教奠基人，就是耶稣会的一员。

利玛窦

美国《生活》杂志将利玛窦评为公元第二千年内（1000-1999）最有影响力的百名人物中的一员。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週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对利玛窦的评价可以代表天主教会观点：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利玛窦传》一书的日本作者平川佑弘在中文版序言中称利玛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种学艺，和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学问于一身的巨人。”他还将利玛窦看作是“地球上出现的第一位‘世界公民’（homo universale）”。

利玛窦的故事还得从头道来。

叩门——沙勿略

唐朝和元朝之后，第一个带着爱向中国叩门的人，就是被称之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圣方济·沙勿略（St. Francis of Xavier, 1506-1552）。

方济各·沙勿略于1506年出生于今日西班牙北部纳瓦拉（Navarra）沙勿略堡的一个望族家庭。1525年，19岁的沙勿略前往法国巴黎大学圣巴拉学院攻读哲学，五年后获硕士学位，开始担任讲师。在巴黎，一位比他年长15岁的同乡依纳爵·罗耀拉与他同租房子。一天，这位同乡给沙勿略一段《圣经》经文：“人即使赚得全世界，可是如果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对他有什么益处？”这句话如同一道

圣光照亮了沙勿略的心，他决心为主献身。

沙勿略生长的时代正是1517年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宗教改革后运动之后。改革者如廷得尔(William Tyndale)等人，不惜牺牲生命翻译圣经，以便人人能够自己读经祷告，建立与上帝的直接关系。这个时代，产生了脱离罗马教廷统治的基督教新教各种教派。

1534年8月15日，罗耀拉、沙勿略等七人在巴黎的蒙马特高地，共同誓发神贫和贞洁的誓愿，耶稣会诞生。耶稣会重视深入群众，展开通俗的布道活动，大力展开海外宣教活动。将福音的火炬传入东方，耶稣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自1542年到1552年，沙勿略赤足步行十万公里，烈日下，冰雪中，足迹遍及印度、西兰(今斯里兰卡)、满刺加(马六甲)、新加坡、摩鹿加(印度尼西亚)群岛等地，最后到达与广东台山一水相望、只相距八海里的上川岛。

1549年，当他踏上日本九州的鹿儿岛时，听到日本人称中国为“上国”，并获悉日本的一切文化都传自中国。当他宣讲福音时，日本人表示，“如果天主教确实有崇高价值，文明的中国早就信奉了。”他意识到，要真正获得亚洲传教的成功，一定要不畏千难万险，首先设法叩开中国大门。

在沙勿略的遗札中我们看到，他向欧洲人报道了福音在文明鼎盛、神秘莫测的中国最早流传的痕迹，他同时描述了他去中国的动机和对中国人印象：

第一函：致欧洲同会士，1546年(明嘉靖25年)5月10日，作于满刺加之安倍那。“.....许多人认为宗徒多默曾到中国，收过不少人信教。又说：葡人未来东方以前，东方教会曾派若干主教前往中国，访问圣多默和他的门徒所招收的教友。.....其中一位主教曾自称是葡人东征印度时来自印度的，当地主教曾告诉他：圣多默到过中国，并曾有不少中国人信教。”

第二函：致欧洲同会士，1552年(明嘉靖31年)1月29日：“葡人报告，中国为正义之邦.....就我在日本所目睹，中国人智慧极高，远胜日本人；且善于思考，重视学术。中国物产丰富，且极名贵，人口茂盛、大城林立、楼台亭阁，建筑精美，部分采用石料。人人皆说中国盛产丝绸。”

第三函：同日。“我准备今年前往中国京都；因为如谋发展吾主耶稣基督的真教，中国是最有效的基地。一旦中国人信奉真教，必能使日本唾弃现行所有各教学说和派别。”

第四函：同日。“中国人为白色人种，不蓄须、眼眶细小，胸襟豁达，忠厚温良，国内无战事。……中国一旦接受真道，日本必起而追随，放弃现有各派。”¹¹

沙勿略在信札中一再说明，中日两国需要饱经风霜、意志坚强的神父；又因中日两国人民博学好问，审思明辨，需要学术修养高深，笔谈流利而长于撰述的神父，不徒然善辩而已。

那时中国明朝实行海禁，严令外国人不得登岸入境。1552年8月，沙勿略冒险潜入中国。圣十字号把他和唯一伙伴费莱拉（Alvaro Ferreira）修士及二仆载到上川岛。因广州提督严禁通番，不得进入。与大陆隔海相望，却不能如愿以偿。沙勿略因长途跋涉，积劳成疾，贫病交加，心力尽瘁，死于上川岛，年仅46岁。

他留下的信札说：“仰赖天主的保佑，要向前去，我们深信耶稣基督的圣名，将来有一日必能进入中国。我高兴去给不怕牺牲生命的人开路。”

开路——范礼安

意大利籍传教士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8—1606）于1573年被任命为耶稣会远东观察员，前来视察澳门教会。

面对茫茫大海，明帝王严厉的海禁，他望洋兴叹，绝望地喊道：“顽石呀顽石！你何时才能为我主裂开？！”

1578年，他从印度调来了几位年轻传教士，让他们学习中国语言，采用中国风俗，为进入中国作准备。在这几个年轻人中，就有后来第一位得以居住在中国内地的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以及为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奠定基础的利玛窦。

11 见《耶稣会史料丛刊》。

领路——罗明坚

1579年7月，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奉远东视察员范礼安之命，与巴范济（Francois Pasio）同来澳门。于万历八年（1580），沙勿略逝世28年后，他们终于到达广州。

1543年，罗明坚生于意大利中南部的斯品纳佐拉（Spinazzola）城，曾获两个法学博士学位，供职于那不勒斯的菲利普二世宫廷。1572年，罗明坚加入耶稣会，自愿到印度传教。1578到达果阿。1579年到达澳门，向一中国画师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三年多后，罗明坚便开始用汉语写作。率先将油画带进中国的是罗明坚。

1581年期间，罗明坚随葡萄牙商人进入广州，并很快取得了广州海道的信任。广州海道认为罗明坚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是一个有中国文学修养的神父及老师”，所以允许他在岸上过夜。

1582年，应两广总督陈瑞的邀请，罗明坚偕巴范济同去广东首府肇庆，开始传教，并获准建立“仙花寺”教堂，用中文印发《十诫》，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吸引了肇庆的官绅。

1583年，罗明坚先后同巴范济、利玛窦三次进入广州，并通过与两广总督陈瑞、肇庆知府王泮等中国地方官员的交涉，终于得以居住在肇庆天宁寺。

罗明坚在广东肇庆时，与利玛窦一起编写了第一部汉语外语字典《葡华辞典》，以帮助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

罗明坚是唐朝和元朝后，第一个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早利玛窦两年。

奠基——利玛窦

真正有效地实现沙勿略理想，正式向中国介绍西方宗教与学术思

想最早、最重要的奠基人是利玛窦。

利玛窦于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中部，教皇邦安柯那（Ancone）省的马塞拉塔（Macerata）城。利玛窦天资聪明，早年教育练就过目不忘的本领。九岁的玛窦入本城耶稣会学校学习，16岁到罗马攻读法律。受圣徒沙勿略事迹的激励，这位青年人叩响了罗马耶稣会总院的大门。在罗马学院，他一边接受神学教育，一边学习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地理学、行星原理、透视学、天文仪器、星盘、钟表、修辞学、哲学等。

1571年，19岁的他在罗马加入耶稣会，继续在耶稣会办的学校学习哲学和神学，并师从当时著名的数学家克拉维奥（Cristoforo Glavio），学习几何学。

1578年，25岁的利玛窦到里斯本，与罗明坚、孟三德（Edouard de Sande）乘葡萄牙商船，开始了前往东方的“万里长征”。

1582年4月，应范礼安之邀，自印度果阿启程，同年8月抵达澳门，开始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和中国人的文化习俗。

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罗明坚引利玛窦进入广东，定居肇庆。

花园国度

对于中国名称，《利玛窦中国札记》如此描述：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人所知悉，最古老的名称是Sina（Ptolemy时代）。后来，马可·波罗，这位最初使欧洲人熟悉这个帝国的威尼斯旅行家，则称它为Cathay（即契丹）。然而，最为人所知的名称China是葡萄牙人起的，是陶器的意思。中国又是被称作丝绸国（Serica regio）的国度。可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外国人给他们的国度起过的各样名称，而且他们也完全没有察觉这些国家的存在。

这个国家的统治权从一个家族转移到另一个家族，新的统治者根据自己的爱好，赋予它一个合适的名称，比如，汉——银河，唐——广阔，虞——宁静，夏——伟大，商——壮丽，周——完美。

这个国家还有一个各个时代一直沿用的称号，叫中国或中华，Ciumguo or Ciumhoa，第一个词表示王国，另一个词表示花园，意思

是“位于中央的花园”。

利玛窦进入的“花园国度”，她的国号恰好是“明”——光明。光明，是耶稣基督带给这个世界的礼物。将光明传播给中国，正是利玛窦的愿望。

虽然当时明朝“国势如溃瓜，手一动而流液满地矣”，但是从外表看，它还是一个有足够力量维持半个多世纪的专制制度。利玛窦看见，南京市民欢度元宵节时大放烟火，“在一个月中用去的硝磺，要比欧洲连续作战三年用的还多”。他看到，北京城墙之宽可容三辆马车并驰。

1583年9月利玛窦与罗明坚同到肇庆后，得到知府王泮的协助，经总督郭应聘批准，在肇庆西门外建造一栋西式三层楼房，中层作教堂，由王泮题匾：仙花寺。这是天主教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传教据点。

利玛窦发现，中国人着手建造房屋时，似乎是用人生一世的久暂来衡量，是为自己盖房而不是为子孙后代。而欧洲人则遵循基督教文明的要求，根基深厚，富丽堂皇，似乎力求永世不朽。

利玛窦决心将不朽的盼望传递给这个国度。

地理认知

利玛窦观察，中国人的地理观是天圆地方，他们认为中国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

1584年，他向人展示他绘制的世界地图——《坤輿万国全图》，以及各种天文仪器，吸引人参观，建立感情、扩大影响。当中国人第一次看到利玛窦绘制的地图时，发现他们的帝国并不在地图的中央，而是在最东的边缘，不禁有点迷惑不解。为了适应中国人的心理，利玛窦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以中国字加以标注时，尊重中国人的看法，安排使中华帝国多少占据中央地位。

政治制度

利玛窦日记里记载，从远古以来，君主政体就是中国人民所赞许

的唯一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富豪政体或任何其他的形式，中国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过。

中国政府机构中分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刑部。礼部主管宗教事宜。他观察，最有威望的，是由科举进士组成、替皇上撰文书写的翰林院。

在中国，没有象欧洲的《十二铜表法》和《凯撒法典》那类可以永远治理国家的古代法典。凡成功取得王位的人，不管他的家世如何，都按他自己的思想方法，制定新的法律。

转僧为儒

1583年，罗明坚初入广东时，被地方官员视为“番僧”，赐予和尚服装。为了居留传教，罗明坚毫不犹豫穿上袈裟，自称“西僧”。

1591年，利玛窦在韶州遇见常熟世家，礼部尚书瞿景淳的儿子瞿太素。瞿太素引导利玛窦研读《四书》、《五经》，作拉丁文释义及注释，汉语基础大有长进。从瞿太素那里，利玛窦得知，中国儒生，而不是和尚，更受人尊敬。他立刻接受瞿太素的指点，易僧装为儒服，留须蓄发，改称“西儒”，尊称“泰西儒士”。

利玛窦敏锐地意识到，要使中国皈依基督，必须最大限度地使信徒成为这个国家社会文化中居主要地位的士大夫，而不是被官员轻视的和尚。这一转变成为他在中国的一个转折，也是基督福音得以在明朝帝国传扬的关键。

瞿太素后来成为奉教者。

首起教案

1593阴历新年，憎恨洋教的韶州百姓以石头掷击传教士。炎热的七月，十余个年轻人深夜闯入教堂，用斧子砍伤了入华不久的传教士石方西的头。情急之中，利玛窦从一扇窗户跳进后花园，扭伤了脚。

虽然这起教案后来得到了平息，从此以后，利玛窦只要走远路，

就会一拐一瘸，似乎成为传教士在这个儒家统治的中国艰难前行的预兆。

文化传承

利玛窦注意到，中国真是个喜爱戏曲的国家。可是，几乎所有的戏曲都起源于古老的历史或小说，没有新内容创作出来。

利玛窦在中国古典书籍中了解到中国的三种信仰体系：儒教、释迦、老子。他发现，从一开始，古人就记载着他们所承认和崇拜的一位最高的神，称为“天帝”，既管天也管地。古代中国人似乎在自然法则中得到了救恩的启示。

据神学家说，只要一个人根据自己良心的光芒，尽力去寻求得救，上帝就不会拒绝帮助他。利玛窦从中国四千多年的历史中断定，中国古人已经努力这样做了。

利玛窦还发现，当时的中国人所熟悉的唯一较高深的哲学学科就是道德哲学，在这方面他们由于引入了错误，似乎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涂了。

饱读儒经佛典的大学士徐光启，在大庭广众中被问及基督教律法的基础是什么时，只用了四个字：驱佛补儒。

徐光启试图借助天主教的道德观，借耶补儒，博采众长，“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以达到儒家理想中的三代之治。

广交儒士

利玛窦到肇庆后，很快就明智地悟出，西方异物珍品，虽能一时令人叹为观止，绝非传教的持久依靠，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之邦，无论是经济还是人文，都已处于高度发展阶段，艺术和文学受到推崇，只有饱学之士才能晋升为国家官员。

他一面努力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国情，一面向当地人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他自己刻意改变西方生活方式，在起居、饮食、仪节等方

面，力求中国化。

1595年受建安王的启示，利玛窦写了他第一本中文著作《交友论》。湖广监察御史冯应京将《交友论》和利玛窦的《二十五言》等论述集成一册，并同徐光启各写一序，大加推崇，建议受过教育的阶级都来读一读，大大地提高了基督教的声誉。此书先在江西文化中心南昌，其后在南北两京，及大江南北不胫而走，成为交友方面的权威书籍，不仅使他出了名，而且因此结交了不少朋友，为他打下了知名度和传教基础。从万历十二年（1584）起到万历三十六年（1608）短短十四年间，曾在肇庆、南昌、苏州、南京、北京、贵州等处翻印十二次之多。

利玛窦以文会友，打开了在中国儒士之间传教的局面。

利玛窦是第一个开始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他对他所学的东西十分精通，博得了中国知识阶层的钦佩。他开始对儒士们讲授地理学和天文学基本原理，虽然他传授的均是欧洲受过教育的人所熟知的，但在当时的中国，简直骇人听闻。

利玛窦学识渊博，很受总督郭应聘和知府王泮的器重，为肇庆士绅所接纳，交游甚广。晚明著名思想家李贽对利玛窦的人品和学识非常赞赏，誉之为“中极玲珑，外极朴实”的“标致致人”。

“哑式传教法”

利玛窦既有过目不忘的惊人记忆力，也有口若悬河的辩才，而且思维清晰。但是，他选择了一种以著作传教的方法，即所谓的“哑式传教法”。因为他观察到，中国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所有的宗教教派的发展以及宗教学说的传播都不是靠口头，而是靠文字书籍。

中国官吏似乎不喜欢人们聚集成群，所以消息主要是靠文字来传播。象形的中国文字，在中国人心中有一股特殊的力量及庄重的表达能力。读书人有以文会友的习惯。在中国，印在书上的东西往往被认为是真理。关于基督教义，中国人比较相信书本，只是口头讨论是不够的。总之，利玛窦发觉，中国似乎是一个重视视觉而轻听觉的民族。中国有许多传教士不能去的地方，书籍却能进去。

利玛窦于1593至1596年所著的《天主实义》风行一时，安徽进

士、湖广监察御史冯应京就是读此书而信教的。1692年3月22日，康熙皇帝因咏读实义而弛教禁。

利玛窦的另一本书叫《畸人十篇》，对死亡做了反复的沉思，把生命看作是一个不断在死去的过程；赏善惩恶并不常常在今生完成而必须等到来世等。此书包含的道德训诲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利玛窦通过此书向中国士大夫提出一个新的任务，即在认识上帝中认识自己——不只是道德反省，而是认识自己理性灵魂的本质，从而活出神原初造人的样子来。

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有一天，北京朝廷官阶最高的大臣之一，一位道里，主动上门拜访。他在利玛窦身旁落坐后，拿出一册《畸人十篇》，问：“你就是本书的作者吗？”利玛窦承认他曾在这本书上花了很多时间。于是客人接着说：“这样一部书的作者必定是位圣人……”离开前，他说，“有不少人说，他们并不怕象你们这样的外国人，因为信奉这种教义的人是不可能有益于公共福利的。”

利玛窦在中国近三十年中，一直勤于撰述，他的中文著作竟达二十种之多，除了科学译著外，还有关于宗教、哲学、伦理学等著作。

回生之方

冯应京重印利玛窦的《天主实义》时，利玛窦希望对文章作一些修改。冯氏用一个寓言答复道：从前有一个人被慢性顽疾弄得衰弱不堪，恰好有另一个人满口许诺用一种药来使他恢复健康。病人的朋友说，“好，快去治病吧，他目前的危机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许诺。”这时，那个陌生人说，“好极啦。我要回家，用一手秀丽的字体写一副漂亮的药方。”病人回答说，“我关心的是你的药，不是你那一手写得漂亮的好字。”

冯应京解释道：“病人就是中国，她因为昧于你那教义的内容，所以多少世纪以来受尽苦难。你有回生之方，而你宁可修饰文辞，不去救当务之急，难道你看不出这种方法是怎样影响公共利益吗？”

风俗礼仪

这个寓言恰好用来比喻中国繁杂众多的礼仪。利玛窦发现，中国的礼仪那么多，实在浪费了中国人大部分的时间。熟悉中国风俗的人实在感到遗憾，他们为什么不摒弃这种外在的表现呢？他发现，在这方面中国人远远超过所有欧洲人。

但是，智慧的利玛窦传教力求与中国习俗文化调和，务与中国思想不相抵触，期渐感化。他将当时流行的“敬孔”和“祭祖”解释为“敬其为人师范”和“尽孝恩之诚”的非宗教礼仪。后来康熙皇帝称之为“利玛窦规矩”，用来评判谁人应被准许在华传教的标准。

入境后不数年，信徒至二百余，包括朝臣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此三人被称为早期中国教会的三大柱石。

进京波折

利玛窦早就打定主意进入中国朝廷。他相信，如果能使中国皇帝皈依基督，中华归主便大有希望了。

1595年，希望之光在天边闪现。5月，已经退休的兵部侍郎石星受命去北京复职。石星经过韶州，令召利玛窦，因为他的儿子患有精神忧郁症，他指望得到利玛窦的帮助。利玛窦便趁机要求跟随石星进入南京。结果，虽未能在南京居留，利玛窦在折回到南昌途中做了一梦，梦中上帝答应他将在两座皇都（南北两都）向他启祥。在南昌，因为石星的关系，利玛窦受到巡抚陆万垓和知府王佐的接待。

1598年吏部尚书王忠铭经过南昌到北京为皇帝祝寿，利玛窦通过他向皇帝献礼。利玛窦的奏疏中写道：所献天主圣像，以祝圣上万寿无疆，以佑天朝国泰民安。臣惟事奉天主，不婚不娶，刁然一身，无所望幸。惟仰天恩浩荡，俯赐京都弹丸之地，供臣栖身.....

虽然未能成功，他得以在南京居住，并买了一处闹鬼的官邸，改为教堂，在南京广为交游。不料，利玛窦进贡未成，却被太监马堂投入了天津卫的监狱。

有一天，皇帝突然心血来潮，想起那份敬献奇物奏疏中的自鸣

钟，于是一纸诏书令使利玛窦出狱进京。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敬献了一幅《山海輿地全图》、一座八琴音、自鸣钟、圣像、十字架等。皇帝迷上了自鸣钟。因为常常需要修理，利玛窦得以留在北京。从此他便开始在北京传教。

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进出宫廷，取得了传教的合法地位，并结交了许多中国知名人士作朋友。除了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外，他与礼部尚书李戴、太子太傅大学士沈一贯、刑部尚书兼兵部尚书肖大学、礼部尚书冯琦等人都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可惜，据说万历皇上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除了太监和妃子，不与他人见面。利玛窦在北京住了大约十年，未能与皇上谋面，实现使中国皇帝皈依的梦想。

建造南堂

利玛窦在华传教22年，天主教稳步发展。至1604年，北京有利玛窦、庞迪我、费奇观；南京有罗如望、黎宁石、王丰肖、林斐理；南昌有李玛诺；绍州有龙华民、杜禄茂。利玛窦则负责中国全国的传教会。

1606年，利玛窦在徐光启的帮助下在宣武门内买了一处房子建立教堂——著名的北京南堂。

利玛窦除了在公卿士大夫中间活动外，还注意与社会下层的平民百姓交往，他毅然打破等级界限，开放教会的房屋，会见每一个来访的贫穷人。

另类福音

初来中国时，利玛窦发现最能吸引中国人的不是福音书，而是西方科学技术，如他带来的三棱镜、地球仪、浑天仪、世界地图等。

作为首批来华的西学代表人物，他不但第一次正式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宗教和科学技术，并且把有关中国的知识及其历史文化第一

次正式地介绍给西方。利玛窦与徐光启译的《几何原本》、与李之藻合作翻译的《同文指算》等科学著作，是为泰西科学输入之始。这些著作乍看与传教没有直接关系，但实际上对传教非常有利。数学真理向中国人表明，天主教是“理性的宗教”，传教人拥有严密逻辑推理知识，而不是迷信者。

西洋历法也是利玛窦等教士赖以在中国立定脚跟的重要工具。明末修历虽然主要在利玛窦死后，由徐光启在崇祯年间主持，但利玛窦身前即已将修历作为申请在北京居留的一个借口。万历皇帝也是因为地图、历算知识、还有常常需要修理的西洋乐器及自鸣钟等，而默许传教士居留北京的。这种需要和被需要的关系，使以传教士和士大夫为中介的中西文明的和平对话成为可能。

利玛窦等介绍给中国的是在希腊思想和人文主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中世纪托勒密体系中的天文学、宇宙观，如地球中心说等；也有体现毕达哥拉斯精神的科学，如《几何原理》、《同文算指》；还有文艺复兴后期的地理学，如《坤輿万国全图》；也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的近代天文学成果，如徐光启绘制的《见界总星图》，等等。希腊科学的传入，对于缺乏公理化、系统化、符号化的科学体系的中国来说，确实使士大夫大开眼界，对中国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利玛窦颇受士大夫的敬重，被尊称为“泰西儒士”。

安息主怀

1610年，全国来京的官员来觐见皇上的足有五千人之多，科举进士考试正在京举行。利玛窦因劳累过度而病倒。

李之藻是利玛窦最后一名皈依者，他派了自己的医生来照料利玛窦。可是病情未能得到控制。

利玛窦临终时对神父们说：“我把你们留在一个大门洞开的门槛上，它可以引向极大的报偿，但必须是经过艰难险阻才行。”5月11日临近黄昏时，他坐在床上，没有挣扎，身体一动不动，半闭着眼好像睡着了一样；然后他全闭上了眼，在上帝的怀抱中安眠了，享年57岁，在中国27年。

在他临终前的几个月中，他曾几次说，“亲爱的神父们，在我仔细想过我要努力确定做什么才能最好地推进中国教会的工作时，我得出的结论是，对它的进展最有利的事莫过于我寿终之日的到来。”

在李之藻、庞迪我、熊三拔等神父，以及利玛窦的朋友内阁首相叶向高的共同努力下，皇帝赐给一处坟地作为利玛窦和他同伴的长眠之地，滕公栅栏官地，地二十亩，房屋三十八间，改建堂宇。

此事使神父和教徒们大受鼓舞。金尼阁在《利玛窦中国札记》里说，“这个成就不仅肯定了整个传教事业，而且也差不多等于他们赞同了基督教的律法。……那些仍在这个葡萄园里劳动的人，不仅将在这里献身，而且也将在这里葬身，作为对这里的人民以及对全世界人民的一个见证。”

利玛窦在世时的中国传教团有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罗如望（Jean de Rocha）、扬玛若（Emmanuel Dias）、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艾儒略（Giulio Aleni）、毕方济（Francesco Sanbiase）等。后来又有邓玉函（Jean Terrenz）、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r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等人先后来华，以为明廷制砲、修历作为立足点，得以在中国传教，卓有贡献。

利玛窦去世时，教友约2500人。5年后，中国受洗者大约5000人。除广州外，韶州、南昌、北京、南京、上海、杭州、西安等城市都先后开了教，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¹²

后世影响

徐光启对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品行学识如此鉴定：臣累年以来，因与讲究考求，知此诸臣真最确……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在彼国中亦千人之英，万人之杰。

1615年金尼阁根据利玛窦日记编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出版，立刻轰动欧洲。三个世纪前，中国这扇门首先由马可·波罗打开。自

12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p. 60。

从这本书出版以后，没有任何一个汉学家不曾提到过利玛窦，中国史学家也无不引用金尼阁的书。利玛窦在朝廷受到礼遇，建堂传教，广布福音，跻身儒林，与中士共译西方经典，他在中国传教所取得的成绩和对中西交流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使罗马年轻神职人员心驰神往。

《利玛窦中国札记》里如此说：“一切事件，即使是后来获得巨大规模的事件，在开始时都是如此之微不足道，以致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希望会在后来发展成为重要的事情。”中国人有道，“千里之行，始与足下。”利玛窦的足迹，为基督进入中国，开启了一道漫长而辉煌的宣教之路。

圣教虽然在唐朝和元朝兴盛一时，但未深植其根，不久而灭亡。自利玛窦至今，仍然欣欣向荣，利玛窦可谓中国天主教开教的功臣。

明朝天主教：徐光启

圣教一石柱

徐光启（1562—1633），明朝文渊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是明朝天主教著名的“圣教三柱石”之一。其他两位是水局郎中李之藻和监察御史杨廷筠。

万历三十七年（1610），利玛窦在北京去世的消息传至上海，因父亲去世在家中居丧的徐光启“哀之如师傅”，立刻从上海赶赴北京。

徐光启是利玛窦中国友人中最亲密、最杰出的一位。他俩曾经朝夕相处，一同凝望星空、思索心中的道德律，仰望共同的上帝，正如《交友论》中所说的，彼此各以对方为“第二我”。是利玛窦将他引入神奇而令他着迷的科学世界，并领他来到灵魂的救主面前，他俩一同搭建中西交流的第一座桥梁。中西科学、哲学、宗教之间实质性的对话自此开始。

明朝天主教得以在全国十三个省份传播，仅西南地区的云南与贵州两省尚未派遣修会士进入传教，入教信徒持续增加，皈依者多来自汉人族群，与徐光启等身居高位的官吏儒士有直接的关系。

明末天主教的信仰传播，是从其个人，到其家族，再扩及到宗族、乡亲、从而使位处江南的大上海成为中国天主教信徒最多的地区之一。

上海徐家汇

德理贤（Paschal D' Elia）在《中国天主教史》中记载：“最著名的，便是那一六零三年领洗的，上海徐光启氏，洗名保禄；他是明朝的大学士，中华圣教多年的柱石，徐文定公。至今上海西乡徐家汇——文定公故里，现在天主教南主教区中心——‘徐阁老坟’还保存着，墓址在世界闻名的徐家汇天文台西北，相距有几百码的地方。”

徐光启于1562年阴历3月21日生于明帝国的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童年的家园深受倭寇侵扰。倭寇的侵扰使徐家陷入贫困的境地。祖父40岁去世，留下寡母和孤儿徐思诚。母亲请来舅父经商，并招来入门女婿管理徐家家政，徐家产业得以十倍于前。因为家境的磨练，徐光启个性务实。

他天资聪颖，胆识过人，喜欢读书。童年在龙华寺读书时，有一次路过邻塾，塾师命题，徐光启“随口成章，不假思索，师大奇之”。八岁那年，他竟淘气地攀上龙华寺古塔，到塔顶捕鸽子，不小心失足下坠，却手持鸽子，挑战同伴敢不敢冒险。

他思想敏捷，寻求有关来生和灵魂不朽的确切知识，不找到真理不能罢休。他“以天下为己任”，信教后成为“教堂的一盏明灯”。

科举烂路遇大光

万历九年（1581），20岁的徐光启考中金山卫的秀才，并于同年娶吴晓溪之女为妻。

1584年利玛窦在韶州绘制《山海輿地图》，首次向以中国为天下的中国人展示地球全貌，此图引起广泛兴趣。从这幅地图，徐光启得知有一位从西洋航海而来的“博大真人”利玛窦。

徐光启四次参加每隔三年一次的乡试。万历十六年（1588），27岁的徐光启与友人董其昌、陈继儒（后来成为明末大儒）等同赴太平府乡试。自己挑着行李，倾盆大雨下，左荡右晃，不禁悲从中来，徒生淡

然功名之志。不过，他别无选择，只能在科举烂路上爬行。

徐光启与耶稣会士的接触最早开始于1595年。那一年，徐光启这位穷苦秀才在韶州教学。一天，他信步到城西部的天主堂，遇见郭居静神父，相谈甚欢。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徐光启再次参加乡试。主考官焦竑从落第试卷中发现徐光启的文章，拔置第一，徐光启意外中举。其文章开篇论道：“圣帝之心，为虚而能通也。”他的文章中主张虚通、倡无为、主无我、倡去意，以期达到“不蔽于我”、“不滞于人”、“我与人相感”、“发与无端之内”、“岁一隅而已融为全体”的圣心之境。

上帝显然已经为中国预备了一颗赤子之心。

徐光启于1600年在南京遇见利玛窦神父。当时，利玛窦在南京传教，他的住宅成为士大夫们趋之若鹜之处。他们讨论的内容既有人性、道德等伦理等问题，又有天文、历算、地理等学问，士大夫们以与利玛窦交友为莫大荣幸。这一年，徐光启正好在南京，二人“邂逅留都”，听了利玛窦的言论后，徐光启久久低头沉思，认为利玛窦是“海内博物通达之君子”。

这次短暂的相会中，徐光启获知，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乃是万物之根本。然而，好象上帝要保留这个人使他自我启明，圣三位一体的神以某种方式在梦中呈现于他。他在一座庙里看见三间教堂。在第一间，他看见一个人的形状，有人称他是圣父。第二间里，他看到另一个人形，戴着皇冠，他听人称为圣子，他还听见有一个声音叫他向这些形象礼拜。在第三间教堂里，他一无所见，也没有敬礼。可能是上帝不愿把圣灵用教徒常见的鸽子形状来显示给一个尚未皈依的人。

他声称考进士的失败是上帝给他的殊荣，是他得救的原因。由于疏忽，他被算作第301号与试，而法定人数只限300名，所以他的试卷被摒弃了。他无颜回去见他的家人，便退到广东省。正是在韶州，他走进郭居静神父所在的教堂，初次和神父结识，也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礼拜了十字架。

1603年秋，徐光启怀着对利玛窦的旧情再次来到金陵古城，但利玛窦已到北京传教三年了。这次迎接徐光启的是罗如望神父。据柏应理记述：罗氏引徐光启瞻仰天主像，讲述三位一体的教理，并指着画像说，这便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圣子）降生为人之像，徐光启突然回

忆起那个梦，惊疑不止。罗氏送给他《天主实义》、《天主教要》等书，他回到住处读之，“达旦不寐，立志受教”，并连日去教堂观察教礼，学习教义，聆听罗氏讲解摩西十诫之理。在动身回家的那一天受了洗。回家后又捎来两封信，信中他极清楚地表明他受到基督教教义的熏陶有多么深。

几个月后，他返回南京，径直到教堂。这一次他跟神父们共处了两周，每天参加弥撒祭礼，不断提出询问，他从忏悔中得到极大的安慰。在他重返北京再参加进士考试时尤其如此。他曾劝两名士大夫和他家乡的几个朋友抛弃偶像崇拜，教他们作祷告，不久他们都在同一天受洗，成为基督徒。

1604年4月9日，徐光启到北京参加会试。他们到达北京第一件事就是来拜访教堂，行忏悔礼以及领圣餐。徐光启如此虔诚，以致在领圣餐时竟忍不住流下泪来，就连站在圣坛栏杆旁的人们看了也流泪不止。在他们成为基督徒以前，他们没有一个成功地获得自己所追求的最高学位。这次他们好象是去赴战场，对上帝的福佑满怀信心，结果完全超出二人最大的希望，与老师黄体仁同科成为进士，随即被派往都察院观政。徐光启经老师推荐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徐家两代单传，徐光启非常担心家庭断嗣，信教后喜得两个孙子。

徐光启把70多岁高龄的老父带到北京，想争取让他在寿终之前皈依基督。经过神父和他本人的大量工作，这位老人也认识了上帝。接着徐光启的儿子及夫人都入了教。

中西文化搭金桥

徐光启与郭居静在1595年相遇时，中国正处在科学人才辈出的年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于1596年在南京印行，程大位的《算法统宗》于1592年在徽州出版，朱载堉上疏要求改历，并进呈《万年历》和《律历融通》，王圻的《三才图绘》和《续文献通考》也将在上海进入尾期编写工作。

思想界呈现异常活跃的气象，阳明心学的影响在当时引导出一股

批判思潮。李贽是其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他敢于非圣非贤，敢倡乱道，成为试图突破正统学问的一支劲旅。李贽与利玛窦屡屡交谈，碰撞出思想火花。

人类文明的发展已不再允许中西两大文明航船毫无干系地平行行驶了。历史具有讽刺意味，然而却带有必然性地选择了似乎与近代文明有些格格不入的天主教耶稣会士来打通隧道。徐光启生逢其时，融会中西，开始创建新的、具有国际性的中国科学技术。借西方文化反思，检讨本土文化的重担，落到了徐光启以及同仁的肩头。

此后，年过四十的徐光启得以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从事一番前所未有的文化事业。徐光启真诚地认为，利玛窦传扬的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根本冲突，对中国本土文化不但不构成威胁，而且大有益裨。一个有知识、有声望的中国教徒正是向中国人传教的福音样板，传教士带来的科学和思想也是中国所需要的。这种彼此急迫的需要使他们的合作有效益、有价值，并达到精诚之境。

徐光启的主要科学贡献都成就于他与利玛窦等人有了思想上的实质性交流之后。徐光启与利玛窦携手合作，在中西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金桥。

成为进士后的徐光启一边忙于翰林馆课，一边留心经世致用之学。他曾学过声律，工楷隶，但自成为进士后，他将这些悉数摒弃，专攻天文、兵法、农事、屯、盐、水利，旁及工艺、数学。

一天，他与利玛窦谈到格物及几何学。在欧洲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的利玛窦谈到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非常精要，并说翻译这本书极其困难，他本人曾试图翻译，但难以坚持。徐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他决定知难而进，开始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这本传世之作。他每天下午三四点都布衣徒步到利玛窦寓所，请利玛窦口传，自己笔录，并反复辗转，力求合乎原意，反复订正，三易其稿，次年春天，译完前六卷，1607年春交付刻印。这部著作在当时士大夫心目中地位极高。梁启超赞：“字字金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¹³

此后二人又合作翻译了《测量法义》，不仅介绍西方测量方法，

1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11年，p. 13。

而且也详述其数理基础。

徐光启在上海居丧时，在《几何原本》和《测量法义》的基础上写成《测量异同》和《勾股义》，奠定了他在中西科学交流史和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突出地位。

利玛窦去世后，徐光启与教士熊三拔合作完成《泰西水法》。

利玛窦的科学知识不仅吸引了徐光启，还吸引了其他一些士大夫，其中卓有成效的是徐光启的诚友李之藻。1605年，水局郎中李之藻从利玛窦译完一部天文学著作《浑盖通宪图说》，并合译了《圆容较义》一卷、《同文算指》十卷、《乾坤体义》和《经天该》等。

博采众长

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突破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的禁锢，提倡“并蓄兼收”。徐光启曾写道：“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这种博采众长，以汇通超胜的理想若能在和平开放的交流中进行，中国近代史的命运也许不至于那样悲苦艰辛。

徐光启编写的《农政全书》，总结了许多农业生产经验和技術，引用了古代著作和文献三百多种，阐述了气候、地理、优种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介绍了农业生产技术，对屯兴水利等一些农业措施作了详细阐述。其中对番薯有特别的研究，包括种植、贮藏、加工法，并提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茎分种、扦插、窖藏干藏等技术，是最早系统介绍番薯种植法的著作，在徐光启死后由其子徐驥将此书推介给崇祯帝，于崇祯十二年（1639）正式出版发行。

南京教案

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尚书沈樞三次参奏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与白莲教有染，图谋不轨。徐光启上书辩护不

果。七月，王丰肃、谢务禄等外国传教士在南京被逮捕，后被押解澳门。十二月庞迪我、熊三拔等人从北京被押解澳门。他们所建立的教堂被拆毁，这次教案持续了三年，1621年沈樞被撤职，天主教重新恢复了活动。

在平息南京教难之中，内阁首辅大臣叶向高起了极大的保教作用。这是明朝末年西洋传教士在华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救国梦碎

明朝帝国国势的衰弱在徐光启看来已经“十倍宋季”了。万历皇帝对朝政的荒怠，随之而来的党争之祸，以及政府对百姓横征暴敛不断激起的民变和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预示着大厦将倾，“天崩地解”的时代正在迫近。

中央大国失去了昔日泱泱大国的雄姿和气度，她的心态更加妄自尊大，盲目排外。在与传教士的接触中，徐光启不仅了解到西方科学、军事技术较中国先进，更培养了一种开放的心态。

在翰林院时，徐光启提出富国强兵之术，多年后又提出治国方案，即利用科学技术，发展作为国民经济之根本的农业生产，组建一支新式火器武装起来的精良野战军。然而，因明廷党争不息、虚学逃禅之风盛行，徐光启始终无法施展其宏伟大志。

徐光启曾经上疏皇帝，吁请人力物力上的支持，希望组成一个科学团体，共同工作。可惜目光短浅的统治者无暇顾及，徐光启的“富国之略”只能“不见施設，仅见于纸墨流传”。

1618年，努尔哈赤起兵反明，万历皇帝急忙诏令徐光启训练新兵，防御都城。徐光启致书同僚教友李之藻、杨廷筠，请他们采购四门西洋大炮，吓跑了金兵，又在宁远战役中，使明军首获大捷。

因为兵变，徐光启建军计划功亏一篑。不久，他便怀着幻灭的建国梦离开了人世。

徐光启死后11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不久，清兵入关，明帝国成为历史。

代代相承

崇祯皇帝自缢后，万历皇帝之孙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称王，改元永历。皇太后、皇后，在庞天寿的劝导下领洗，宫中设一小教堂，宫中50人领洗。皇太后遣使罗马教皇未果，满清终于灭明。

明末，圣教传至13省。利玛窦时2500教徒。到1615年，增至5000人。1617年，有1万3千人。1636年，3万8千人。1650年，增至15万人。

利玛窦故世以后，徐光启对于中国圣教有极大之功。徐氏家族后裔代代相承，凝聚力强，又献地建教堂，更有了凝聚信仰的场所。鸦片战争后，来自法国耶稣会的大批会士也选择了徐光启的故里——徐家汇为重新开展传教工作的地区，造就了根基良好的上海地区鼎盛局面。

徐光启，灿烂的名字！藉着他，神光徐徐，启示中华民族。

中国人的回应，也将绵延不断。

参考：

孙尚扬，《利玛窦与徐光启》。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

明清天主教：汤若望与康熙帝

康熙“十字歌”

康熙（1654-1722）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61年）的皇帝，也是与耶稣基督距离最近的一位。

当时，天主教神父们期望康熙帝成为东方的君士坦丁大帝，归化基督。

君士坦丁（272-337），被西方称作“千古一帝”。这位历史上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皇帝，曾经统治着地球上最强盛、疆域最辽阔的罗马帝国，也就是中国古书中被称作“大秦”的国度。

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发展几乎都可以追溯到君士坦丁大帝。他使基督教成为一种合法的、自由的宗教，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基督教从属于少数人、被迫害的宗教，转变成在这个地球上最大的帝国里，自由的、居支配地位的法定宗教。

据说，在穆尔维亚桥战役（Battle of the Milvian Bridge）的前夕，君士坦丁看到天空上闪耀着十字架样的火舌，有声音告诉他：“这是你克敌的迹象。”在十字架的启示下，君士坦丁的军队赢得了穆尔维亚桥战役的胜利，他从此皈依了基督教。

这位君王在西方历史上绵延不断的影响力在于：他曾经与永恒相连。

一千多年后，康熙，这个东方大国的皇帝，也曾衷心赞扬十字架，称耶稣基督为“全能全知全美善，至公至义至仁慈”。

热爱上帝的人们曾经多么热切地盼望，康熙皇帝将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带到耶稣面前，成为名副其实的“神州”。

可惜，康熙与耶稣失之交臂，终究未能成为东方的君士坦丁。他留下对耶稣的赞美诗句，在历史长河中久久回荡：

十字歌

森森万象眼轮中，须识由来造化功。
体一无终而无给，位三非寂亦非空。
天门久为初人闭，福路全凭圣子通。
除却异端无忌惮，真儒偌个不钦崇。

功由十架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列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两番鸡。
五千鞭挞寸肤裂，六尺悬垂二盗齐。
惨动八垓惊九品，七言一毕万灵啼。

妙道玄玄何处寻，在兹帝监意森森。
群生蒙昧迷歧径，世教衰微启福音。
自古昭昭临下士，由来赫赫显人心。
而今基督恩光照，我也潜潜泪满襟。

是谁将康熙领到耶稣面前的呢？

这个故事，要从汤若望神父讲起。

汤若望神父，神的使者，远行八万里，从德国来到中国，在华47年，经历明清两朝，直接接触和影响崇祯、顺治和康熙三位皇帝，力图通过皇帝，将福音传给神州的臣民们。

科隆的少年、罗马的才俊

1591年5月1日，汤若望出生于德意志莱茵地区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贵

族家庭，命名为约翰·亚当·沙尔·冯·贝尔（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在这个世袭贵族家庭中，曾经涌现了不少勇敢善战的骑士。

据说汤若望出生在科隆城远郊吕符腾贝格（Lueftelberg）城堡之中，意思是“风凉之山”。铁灰色的瓦顶，纯黄色的墙壁，用绳索拉起的小吊桥，城堡正前方左右两角，各有一个桥头堡式的圆柱形小楼，楼顶酷似骑士的钢盔。古堡不远处，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小教堂，教堂的墙壁上至今还刻着一幅汤若望身着清代官服的像。

1608年，沙尔结束了他在科隆城的远近闻名的三王冕中学，一所贵族中学的学业。在六月间，一个风光明媚的日子，骑着马，开始了毕生第一次长途旅行，前往直意大利，来到罗马，这个天主教的圣地。谁都没有料到，他这一去，便是与故乡亲人的永远离别。

刚满17岁的沙尔进入了罗马城的日耳曼学院，当时是欧洲一所很有名气的学府，培养出类拔萃的贵族子弟成为教会的中坚，学员一律要穿神学院设计的红色大毡式的制服，接受严格的神学训练。

1611年，未满20岁的沙尔加入了耶稣会，开始了见习修士的生活。募捐济贫，护理病人，监狱探访，朝圣旅行。接着，沙尔进入了当时负有盛名的罗马学院，学习各种对外传教的知识，包括数学、物理、神学和天文学。

当时，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所取得的成绩在欧洲广泛流传。利玛窦在中国朝廷所受的礼遇，建堂传教，广布福音，跻身儒林，与中士共译西方经典，这一切都使罗马年轻的神职人员心驰神往，愿去继承利玛窦的事业，去奉献天主赋予的生命与才智。

里斯本码头的圣歌

1618年4月16日，从中国回来的法国神父金尼阁带着26岁的汤若望等22名神甫，登上“善心耶稣”号，远航东方。

里斯本码头，亲友们行吻足礼，高唱赞美诗句：“传布和平的使者们，他们的双足是多么可敬可亲啊！”

同行的还有邓玉函、傅汎济、罗雅谷、伏定原、齐惟才等。在船上，5名传教士因非洲疟疾而丧生。22人中，前后有14名殉教。

1618年，经过五个半月的苦难历程，航船终于抵达金色的印度果阿。1619年5月，赴中国的教士们重新启程，向中国南海方向驶去。两个月后，到达澳门。

利玛窦逝世后，中国圣教在襁褓中。上帝及时为中国送来了强有力的后继者。

北京故宫博物馆里的《崇祯历书》

汤若望曾被派往陕西西安传教数年。

崇祯三年（1630），在明廷任职历局的邓玉函去世，徐光启推荐汤若望进京任职。徐光启奏疏《修改历法请访用汤若望、罗雅谷》，崇祯皇帝三天后即准奏。汤若望奉召来到北京，接替刚刚去世的邓玉函，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

古代中国，民历对老百姓来说是不可须臾缺少的东西，百姓生活诸事，几乎都求助于《历书》。明朝使用的历法是大统历和回回历的推算法，常有错误。1629年（崇祯二年），礼部准奏，开设历局，地点就设在宣武门内“首善书院”。主持制历工作的是利玛窦的门徒、明朝天主教三石柱之一徐光启，其官职后来升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汤若望极得思宗崇祯皇帝的信任，不仅管理历局，而且监制火炮。据明史记载，“崇祯中，议用西洋新法，命阁臣徐光启、光禄卿、李天经先后董其事，成《历书》一百三十余卷，多发古人所未发。”参与者还有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和光禄寺卿李天经，西人有邓玉函、龙华民和罗雅谷。北京故宫博物馆里，至今仍珍藏着《崇祯历书》。

徐光启长汤若望30岁，二人相交时，徐光启已官至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光启慷慨解囊，关怀远臣，据《徐光启奏疏》透露，给“远臣”的报酬，“俱系辅臣自备”。《明史》记载：“光启盖棺之日，囊无余资。”

徐公病榻前，若望干脆搬到徐家陪伴他，随时给这位卧病老人以

帮助和安慰。光启临终的圣事，委托若望全权主持。直至1633年11月8日，汤若望给徐光启作了终傅礼，光启才告别人间。

琴声之外

修历原本不是汤若望远行八万里来到中国的初衷。

因为修历，明崇祯皇帝特许汤若望、龙华民、罗雅各三教士出入禁中，三人趁机传教，先后使太监庞天寿及嫔妃宫女等数十人入教，在宫内设教堂两所，举行弥撒。到崇祯末年，内宫奉教者达40人，宗室达114人。据1636年统计，奉教亲王有140人，皇族40人，诰命夫人中有教友80余人。

汤若望力求对崇祯皇上施加影响。1640年，他曾向崇祯帝敬献《进呈书像》。这是一本羊皮书，绘有耶稣经历和事迹，共150页。汤若望将原书中的说明译成汉文。这本书与绘画相配合，简略叙述了一些教理，如对“天主”的解释：“天主者，天上真主。主天亦主地。主神主人，亦主百物……”

有一天，崇祯皇帝命汤若望修理一架钢琴，是当年利玛窦进呈的，命译琴座上一行小字：Singt Herrn ein neues Lied.意思是：请你们为天主唱一曲新歌吧！

汤若望还进呈了一幅蜡制的三王朝拜耶稣圣婴像，藉着替皇帝修钢琴使皇上感受弦外之音。

汤若望敏锐地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国，如果能使京城，特别是皇亲国戚乃至皇帝本人皈依，教会定能取得势如破竹的发展。

朝中前后有数人领洗，太监庞天寿领洗后，间接把福音传给宫中命妇，皇帝颇为动心。据《圣教史略》记载，当军饷告急时，皇上命将宫中供奉之金银佛像悉数捣毁，以充军饷。远近哄传，皇帝要信奉天主了。

汤若望正是一个才德出众、得天独厚的人。1639年度报告称赞汤若望“魄力强健，语言娴熟，应付自如。”

1640年汤若望升任北京传教区区长。

紫禁城大炮边的小祭坛

万历44年（1616）南京教案后，西洋教士在中国几乎完全失去了立足点，但是天启年间因造炮，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善。

天启6年（1626），徐光启当年从澳门买回来的西洋大炮大显神威，在宁远一战，击败后金努尔哈赤。

崇祯9年（1636年），明廷内忧外患，后金攻入关内，崇祯帝有意使用大炮，阻止清军入关。于是南京教案后沉寂下来的传教士奉召进京，协助制炮，天主教士因此重新在中国获得立足之地。

早在南宋，军事家陈规所发明的火器被视为最早的火炮，到了元朝，这些火器随着蒙古人的西征而传入欧洲。后来火器在中国的发展反而落后，直到明熹宗在位时，徐光启力请铸造西洋大炮，以资城守，火器才重新得到重视。

一天，汤若望接待了一位普通来客，此人似乎对火炮格外着迷，问东问西。汤若望一向对中国朋友十分热情，凡他知道的都一一作答。突然此人亮明身份，原来他密藏皇帝圣旨，并立即宣若望接旨。汤若望急忙寻找退却之策，上疏皇帝，婉转阐述难以从命的理由。然而，君无戏言，圣旨既出，任何人不得违抗。

1642年，汤若望开始带领30名太监“学徒”在紫禁城内制炮。期间，有人向崇祯皇帝禀报：汤神父在每门大炮前都摆设了一个小小的祭坛，每门炮造成之前，他都披戴上祭服、祭巾跪在那里读经祈祷。不料，皇帝下达谕旨：任何人不要阻扰，要尊重汤神父的做法。就这样，在大炮试验场先后设过20个小祭坛。祭坛边，汤若望合铸成20门40磅重的大炮。

汤若望多才多艺，既是文人加设计师，又是金工、木工加铸工。他为皇帝制造了一个小小的木制模型，深得皇帝喜爱。据说，崇祯亲临工地视察，并出城观望试炮。

《正教奉褒》

就传播天主教信仰而言，天主教堂有形的建筑物就是天主教信仰的象征与指标。

明朝万历三十三年（1605）利玛竇获准在京居住后，即以五百金在宣武门购买房舍，建立南堂前身。

南堂（圣母无染原罪堂）是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京城所建的四座教堂中最负盛名的一座。四座教堂地处北京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其他三座分别为北堂，西安门内西什库的救世主堂；东堂，东安门外的圣若瑟堂；和西堂，西直门内的七苦圣母堂。

到了万历三十八年（1610），在利玛竇初设教堂的原址，即宣武门内东隅，由利玛竇、熊三拔、李之藻等人出资出力，设计并营建了一幢西式圣堂。圣堂内规划强调异国情调，与中国传统宗教场所大异其趣。可是，利玛竇在此堂竣工后未及二个月就去世了。

崇祯十一年（1638），因汤若望等神父在治历上的美好贡献，由礼部题请崇祯皇帝送御题匾额嘉奖。《正教奉褒》提及：“礼部题叙，汤若望等，创法讲解，卓有功效，并道气冲然，颇资矜式，理应褒异，上谕传旨嘉奖”。该御横匾额题有“钦表天学”四字，勒赐汤若望神父，悬挂于北京天主堂中，不仅可以当装饰品，而且表明天主教被明廷皇室肯定。无形中，也可以赖此匾额，向外界表明政教之间的亲密关系，打消外界对天主教会的种种不良企图与染指的野心。

独守南堂

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京师被李自成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破，崇祯帝吊死在紫禁城后煤山下，明朝灭亡。

兵荒马乱时节，百姓丧命，建筑被毁，与明廷关系密切的外国人不敢滞留京城，汤若望却处变不惊。他不愿堂中设施，特别是圣坛圣像受损，也不愿丢下存放在那里的珍贵天文仪器，以及历书刻板，毅然独

守南堂。在明清两朝交替的动荡岁月里，汤若望曾与这块土地共存亡，这里是他的心身所系。

据记载：“耶稣会址因贴近西城南门，所以首先被弃至于匪敌淫威之中，所有教士中，仅汤若望一人留于会所之中……北京传教会会长龙华民也劝汤若望同行逃避，但是他却宁愿死守他的教友，亦不肯他往。汤若望命会所中仆人到教堂中去，并且在这里听候天命底安排，可是他们并未受到搅扰。”¹⁴

虽然李自成手下有不少人走进会堂，并且到处观望，但仅取走一条绒毡子而已，其他则一无损失。

同年稍后的日子，镇守山海关的吴三贵，开启“天下第一关”之城门，引进满清军队，进攻北京，战火与抢夺再次爆发于全京师的巷道房舍之间。《汤若望传》提及：“……教会周围的一切房屋，都被火所燃烧，为使火焰远离教会底屋舍，他特将在祭坛上祝圣过的圣牌圣像投掷房上，所有的仆役除二人外俱已逃逸，汤若望把一切房门俱皆封锁，然后就同这两仆人到教堂内，向天主祈祷，听候天主之安排。”

“烧杀的贼兵由城墙上察见，惟独传教会尚未焚烧，因此他们就向传教会内燃放火球，并向其他的匪兵传呼，燃烧‘天主底教堂’。从街上扔入教会内之火把，竟有七次之多，可是这些火把皆自行息灭……”

不久，又有匪徒前来教堂，身负守护教堂重任的汤若望不惜挺身而出，与匪徒对峙：“有一天城内匪徒突然出现于会所之前，外边大门已经被他们用铁锹撬开，侵入的人们已经立在二门之前，其他的匪徒攀登房顶，用长枪和木棍向下攻打，这时汤若望骑士家世好勇乐战的血统在他心中燃烧了起来，他手执倭刀一把，气势汹汹地立于二门之后……”¹⁵

待清军控制北京，新王朝宣布要把居住于北城的汉人居民迁离，教堂再次面临挑战，不能再提供信徒礼拜所用了。

善于应变的汤若望勇敢地向新政府满清主事者提出免于迁离的请

14 魏特Alfons Vath，《汤若望传》。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0年，pp. 210-211。

15 同上，pp. 217-219。

求，结果因汤若望在天文历法上的名声，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新政府由于对天文历法上有殷切的需求，对汤若望神父们有诸多仰赖之处，所以得着官方的特别许可状，不仅允许天主教堂的保留使用，勿需迁离，而且还得着不许满洲军队或百姓搅扰教堂的谕旨。

汤若望在国变之际，使圣教度过一道生死难关。

仰望星空

满人初入关来，“圣朝定鼎，天运已新”，正需要新历法。摄政王多尔袞早知道西方传教士协助明廷修历制炮。

中国古来有敬天、测天的传统。实际上敬天是中国封建皇权神授的理论支柱。掌握天文历法，观象占验手段，不仅仅是为了敬授民时的实用目的，也是皇权的一种象征。天文学自然成了皇家御用科学。

1644年8月初一，汤若望与朝廷钦天监官员一同登上观象台，当场验证日食结果。结果大统、回回历俱差时刻，惟西洋推算密合天行。三个月后，皇上下诏请汤若望入宫接管钦天监。

汤若望考虑到他远道而来，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传道，所以具书辞谢，他在奏疏中写道：“……臣思从幼辞家学道，誓绝宦婚，决无服官之理。……乞皇上收回成命别选贤良……”然而，礼部很快奉如下圣旨：“汤若望著尊旨任事不准辞。”

就这样，汤若望出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钦天监洋监正（即天文台台长），也开创了西洋人在中国执掌观象台之始。

现北京建国门内的观象台正是明初建的，即今“紫微殿”所在地，一座四合院，工作室内挂着一幅大匾，横书四字“观察惟勤”。在这里，汤若望兢兢业业工作了20年，全心投入，编辑了《西洋新法历书》，共103卷，绘制了一幅突破中国千年传统的星像图，还制作了各种观象仪器。

当时，望远镜在中国明代人眼中还是十分蹊跷的东西，它被称之为“千里镜”。第一台天文望远镜是伽利略于1609年在意大利制造成功的。汤若望将伽利略的文章翻译后收集成《远镜说》一书。

同时，他与接替徐光启的李天经合作，一同把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论述欧洲开采和冶金技术的巨着《论矿冶》（*De re Metallica*）译成中文，取名《坤輿格致》。

他在《主制群征》里提到人体解剖学知识，是有关西方医学的最早信息之一。

继利玛窦后，汤若望成为西学东渐的有力前导。

李之藻曾经发出感叹，西洋人传入的历算、仪像、日轨、医学、格物穷理之类的书，是我国一向没有的，而这些书，“有资实学，有裨世用……其道使人心归实，虚骄之气潜消。”

中国人当时认定“天如伞、地如盘”，自己无疑是端坐在地盘中央，而随着西学传入，才开始认识到“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学术界风貌顿改。梁启超后来描述道：“那时候学界气象，如久经严冬，一旦解冻启蛰，万卉抽萌，群动蠕动，煞是可爱。”

京城繁华处

清初时代，汤若望与顺治帝及宗室、宦官、乃至宫女们都继续维持良好关系，吸引他们在信仰上皈依。

顺治七年（1650），钦赐汤若望宣武门内地基一块，位原利玛窦所建天主堂泮。孝庄文皇太后赐银两，众亲王官绅捐助，建造一座颇具规模的天主堂，命“圣母无染原罪堂”（即今北京南堂）。

汤若望仰恃他在朝中的威望，竟敢冒险在天子首都内，繁盛大街上，重要城门旁，起造公众教堂一座。以前，教民都是在一座外面瞧不出任何特征的圣堂内举行教会活动，现在却要盖一座真正的欧式教堂了。

教堂建筑图样之设计，以及动工后的监工工作，都由汤若望神父自己充当。汤若望完成了建筑术上一件伟大工程，此堂“恭勒纶音与石，以垂不朽，天下闻而荣之”，人们惊奇称道。顺治帝赐汤若望“通玄教师”名号，御书“钦崇天道”，并“通玄佳境”堂额。教堂左侧隔壁，曾是京师开设最早的讲学之所，名“首善书院”。

汤若望深得清朝摄政王多尔袞和顺治帝的信任，顺治十二年

（1655）受封为通政使，晋一品，封赠三代。

以俗称“南堂”而广为人知的北京宣武门天主堂，对于北京天主教会的发展而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是明朝一座在北京成立的天主教堂，教会房舍购自于明朝第一位成功地在北京传教的利玛窦神父之手；以后又重建于清初在京担任钦天监职务的汤若望神父之手。利玛窦和汤若望分别扮演了启基者、重建者和使用者的角色。

“南堂”历史，其初立、改建、扩建、重建的过程与整个天主教传入中国后兴衰过程环环相扣。南堂的历史无异是天主教在明清两代发展的缩影。1775年大火，乾隆重建；1900年义和团损坏，光绪重建；文革捣毁，1979年成为文物重点保护建筑。

赏酒下厨

顺治九年（1652），皇帝赐汤若望朝衣、朝帽、鞋袜，他开始着中国官服。柏乡进士魏裔介称他为“西海之儒，即中华之大儒”。

汤若望资质超群、做事干练、思想活跃、心灵手巧、气质谦虚、态度潇洒，俨然一派中国大儒风度。他性格开朗，讲得一口流利的汉语，结交皇上、太后、名臣、饱学之士、诗人画家，均为一时人俊，谈论的话题包括教理、天学、历法、火器、建筑等。他盼望通过对上层与名人的影响，大刀阔斧地传扬福音。

汤若望有情趣，重友情。有一次，皇上赐给他一瓶荷兰使节进贡的葡萄酒，当时，若望正受宠之时，皇帝一连三次对他封官加爵，称他“通微教师”，并怜悯他就别故土，好让他喝到来自欧洲的洋酒，聊以解思乡之情。

据《客舍偶谈》记述，汤若望请来甬东的范吏部潞公也共饮。刚一打开瓶盖，顿觉香飘满室。汤若望还亲手烘烤了鸡蛋糕，这个德国年老神父兼当朝一品，竟亲自动手下厨，足见他身上洋溢的生活气息以及他的平易近人。

他不但与中国朋友共品甘甜，也与他们共度难关。当教友孙元化（曾写过《几何体论》）和张焘（原李之藻门人）因兵变蒙难下狱被判

死刑后，若望不顾个人安危，扮成“黑煤子”，背上煤篓，俨然一个炭贩的样子，混在打杂工里潜入大牢，陪伴两人背诵圣经，一起祈祷，使得他们灵魂得到抚慰。

七十大寿时，中国友人描述他：“七十老人颜如丹，碧眼长须古衣冠”。

《景教碑》和《天主堂碑记》

明朝汤若望传教时代，唐朝大秦景教流传中国碑于1625年在西安出土，被天主教士视为至宝。细研碑文，使人得知，早在唐贞观九年（635），就有叙利亚聂斯托里派教士阿罗本到中国传播基督教。唐代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景教之盛，寺满百城，法流十道。

明代人有感于碑文所记，既然早在盛唐基督教就已广传，那么当代得到更广泛的重视和认可自然顺理成章。

1657年清世祖顺治御赐《天主堂碑记》，碑身是一块白色大理石，高两米余，宽一米，厚约33厘米。综述了汤若望来到中国的经历，回顾了中國天主教简史，表彰了汤氏在制历上的突出成就。

汤若望著述众多，梵蒂冈图书馆至今收藏着《主制群微》、《主教源起》、《真福训论》等。

汤若望曾到河北和陕西传教。献县天主堂设有图书馆，存放汤若望著作原版，以及顺治皇帝赐的诏书，康熙赐的匾额“万有真原”原件等。可惜在文革中被作为四旧烧毁。

汤若望在北京古观象台观测天象并编撰历书的工作室、在天主教南堂的居所以及他的墓地均保存至今，供游人参观。他和其他60位外国科学家、画家和传教士同葬的北京滕公栅栏墓地，位于车公庄北京行政学院内。

汤若望在利玛窦为中国奠定的基础上，为天主教再建功勋。

小皇帝与洋玛法

汤若望与顺治帝更如亲戚一般，史家陈垣说汤若望“犹魏征之于唐太宗”，这种关系是在皇帝童年时建立的。

清世祖顺治帝福临，于1643年登基时才六岁。顺治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是贤淑聪慧、深明大义、富有魄力的孝庄太后。她曾辅佐三代清初君主，即皇太极、顺治和康熙。

孝庄太后的侄女被选为顺治未婚妻。有一次她得了病，医治无效，孝庄太后向汤若望求药，汤若望手上没有药品，就送给她一块圣牌，嘱咐挂在病家头颈上，祈求天主帮助他恢复健康。结果没过几天病就痊愈了。此事非同小可，孝庄太后表示愿作汤若望的义女，福临自然成了义孙，后来他称汤若望为“玛法”（满语，意为尊重的长者、父辈或爷爷）。年轻的皇上身边有了一位难得的、温和而又博学的长辈。玛法就如一部活字典，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们之间频繁往来。据《清史编年》记载，在1656到1657年之间，“皇帝竟有24次临访汤若望馆舍之中，作较长之晤谈。”¹⁶

顺治后来热恋上弟媳董鄂，娶作皇妃，生子夭折，董妃过度伤心而死。顺治痛不欲生，又因受笃信佛教的董妃影响，渐渐深陷在禅宗里，欲剃度为僧。汤若望在《回忆录》中说，“皇帝把自己完全委托于僧徒之手”。顺治年仅24岁就因得天花，于1661年驾崩于故宫养心院。

有关谁继承皇位的决定，内臣奉孝庄太后意思询问汤公，皇二子福全和皇三子玄烨哪一个继位较合适。汤若望对皇三子比较中意，因为他得过天花，有免疫力。这位玄烨，就是后来的清圣祖康熙（1654-1722）。

16 《清史编年》第一卷，p. 471。

康熙与若望

小皇帝康熙八岁登基，辅政大臣鳌拜摄政。

康熙三年（1664）杨光先挑起事端，挑衅清朝初年新历上“依西洋新法”的说法，作成“历狱”。

杨光先作《辟邪论》，将儒教与天主教对立起来。李祖白撰《天学传概》加以驳斥。杨又发表《不得已》等加以反对。

杨光先诬告汤若望等潜谋造反、邪说惑人、历法荒谬，汤若望等被欺凌迟死刑。

判案当日北京地震，余震连连，人们议论纷纷，说是上天的惩罚，若不及时更正，恐有大祸降临，最后由“义女”皇太后孝庄文出面，汤若望方得免去一死。

历狱期间，清政府将外国传教士集中在广州，包括自1631年起从意大利、法国和葡萄牙来的多明我和方济各会传教士，全国教务由罗文藻支撑。

出狱后，汤若望于1666年8月15日，西历圣母马利亚升天节，也是中国农历京城荷灯节——祭告死者的传统节日，辞别人世。享年75岁，在华传道44年。

康熙14岁临朝亲政（1667），在孝庄太后的敦促下，于康熙八年（1669）为汤若望平反昭雪。

接班人南怀仁

接替汤若望的是耶稣会传教士、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南怀仁于1623年10月9日生于布鲁塞尔附近的小镇彼滕（Pittem），12岁起他进入耶稣会办的学校读书，17岁时开始了他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天主教教会大学之一鲁汶大学艺术学院学习。在鲁汶大学期间，南怀仁系统地接触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尤其是逻辑学和哲学体系，并通过宇宙

论的学习，掌握了天文学、数学、历法计算、地理等多方面的知识。南怀仁在1641年9月2日加入耶稣会。

1658年随同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神父前往中国，1659年抵达澳门。后来在山西传教。1660年南怀仁受召前往北京协助汤若望神父。

康熙八年（1669），南怀仁撰写《历法不得已辨》，逐条驳斥杨光先、吴明炫在历法推算方面的错误。针对中国传统的观象占候、堪舆占卜等观念，这一年他还撰著了《妄推吉凶之辨》、《妄占辨》和《妄择辨》。

历狱期间，南怀仁不顾个人安危，极力为重病在身的汤若望进行辩护，甚至在获释后，自愿留在狱中照顾汤若望。

南怀仁在与杨光先的历法斗争中表现出超凡的才干，逐渐取得康熙的信任。康熙八年三月初一日（1669年4月1日），南怀仁被授以钦天监监副，接替汤若望。

康熙十五年（1676），南怀仁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会长。1678年南怀仁写信给耶稣会总会长呼吁派人来华，得到法国路易十四的支持。1685年5名法国耶稣会士携带30项天文仪器来华。这是法国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开始。

1688年南怀仁逝世于北京，清圣祖追赠为工部右侍郎，谥为勤敏，与利玛窦、汤若望埋在同一个墓园，现在位于阜成门外的滕公栅栏马尾沟教堂。

康熙初年的希望

经过“历法之争”，康熙帝认识到西方科学的先进性，他大胆起用传教士，利用他们的知识为朝廷服务。传教士们为清廷观测天象、推算节气历法、制造天文仪器、编纂天文书籍，他们还设计和制造火炮，为平定三藩之乱立下功劳，并充当宫廷教师，为康熙帝讲授西方科学。

康熙帝对基督信仰有好感，他曾御撰颂赞基督：

立天地之主宰，造人物之根宗。

推之于前无始，引之于后无终。

弥六合兮无间，造庶类兮靡同。

本无形之可拟，乃降生之遗容。

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帝颁布了著名的“宽容敕令”，公开解除禁令，允许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

据贡道夫(Hebert Gundolf)统计，1650年，中国有15万基督教信徒，至1675年，增至30万人。康熙四十年(1701)据不完全统计，天主教住院修士120人，教堂229座，教师103人。

天主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礼仪之争的爆发，却使局面迅速逆转。

礼仪之争

明清改朝换代、杨光先历狱之灾都未能阻止福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然而，教会内部却发生了争执。时间之长、牵涉之广、影响之大、后果之重大大超过当事人的预料，使刚刚摆脱困境的中国天主教传教事业几乎陷入绝境。

明朝末年，利玛窦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那就是以学术叩门而入，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工艺美术引起士大夫直至皇帝等统治阶层的支持。在天主教教义和儒家学说之间寻找共同点，合儒、补儒、超儒，以适合中国习俗的方式传教。这种“适应策略”的核心就是尊重中国文化、适应中国文化，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这两种异质文化中寻找同一处，发现契合点。为了便于在中国传教，以利玛窦为首的一批耶稣会士顺从中国礼仪，对于教徒的敬天、祀祖、祭孔均不禁止。

利玛窦去世后，耶稣会内部产生了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儒家经典中的“天”、“天主”和“上帝”是否和拉丁文的Deus具有同一意义？敬天、祀祖、祭孔是不是偶像崇拜和迷信活动？这就是历史上的“礼仪之争”。

利玛窦去世，意大利耶稣会士龙华民(Nikolaus Longobardi, 1559-1654)于1610年接替利玛窦。他与利玛窦在对待中国礼仪的问题上观点不同。耶稣会士(除龙华民等少数外)主张“天主”、“上帝”、

“天”三者并用，多明我和方济各会士认为只能用“天主”来称呼造物主。耶稣会士认为祀孔祭祖乃是对先人的孝思，没有必要禁止信徒参与文化礼仪，多明我和方济各则认为是偶像崇拜坚决反对。同时，在中国信徒是否应参加迎神赛会等活动，为妇女付洗是否应免去中国习俗上认为不适的礼节等也产生了不可调和的争论。

康熙三十二年(1693)，担任福建代牧的法国外方传教会士颜当突然下令，禁止辖区内的中国教徒祀祖敬孔。随之，礼仪之争进入了高潮，在中国和欧洲引起激烈争论。

教皇格勒门十一世于1704年11月作出了关于禁止中国礼仪的决定，并派遣铎罗出使中国，解决礼仪之争。

康熙帝对待礼仪之争表现出极大的耐心，派遣耶稣会士到罗马教廷，将礼仪问题进行详明奏闻。然而，罗马教廷一意孤行，重申1704年的禁约，要求所有的在华传教士宣誓，表示无条件服从。

1721年，康熙看了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发布的禁令，旨批道：“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今见来臣条约，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从此，康熙帝对天主教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康熙帝虽与罗马教廷决裂，颁布了禁教令，但并没有实行严格的禁教。清廷所驱逐的还只是未领票的传教士。凡有一技之长，履行手续向清廷领取信票之后，便可留居中国。同时，康熙帝并没有改变招徕西洋科技人才为清廷服务的方针。

但是，康熙帝的禁教政策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成为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被此后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所继承和严格执行，进而采取关闭政策。天主教士受到致命打击，陷入瘫痪状态。

从1700年至1842年之间一百多年，天主教在中国失去了活动机会，宣教活动回到元朝以后利玛窦以前的情形。直到鸦片战争后，才又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耶稣会因此遭受致命打击。1773年教皇克莱孟十四世下令解散耶稣会。1775年，中国耶稣会被解散，使耶稣会在华前后472位传教士，190多年的传教工作遭到灭顶之灾。大部分耶稣会士返回欧洲，遗留下的传教残局由遣使会接管，一部分耶稣会士则继续留在钦天监供

职。据统计，到1840年，全国还有活动的传教士只剩数十名，信徒约20万人。

直至1939年，罗马教廷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中国礼仪作出了新的决定。

在追述清朝对基督教的态度转变时，丁魁良指出：伟大的康熙皇帝一度要变成这个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他赞助传教士，并鼓励他的人民皈依。但当教宗转到敌对阵营里去时，当教会的领袖们指责皇帝亲近的那些教派时，皇帝转到了十字架的对立面。不久，人们就看到了他的后继者，在尘埃中践踏神圣的象征物。

石羊的述说

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的墓碑如今坐落在北京市委党校校园中心，周围绿树成荫，显得优雅而宁静。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校一部分同事，在“横扫四旧”的名义下，将三个人的墓碑稳妥放倒，用土掩埋起来，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冲杀过来的时候，这里的四旧已被破除了，不需他们动手“砸个稀巴烂了”。

如今，昔日华丽的墓地，原来依次排列的石人、石马、石羊和石供只剩下一只孤独的石羊，兀自蹲在墓碑小院的门口，仿佛满怀失去伙伴的凄楚之情，默默地蹲在那里。石羊若有口，一定会滔滔不绝述说福音在中国的故事。

参考：

李兰琴，《汤若望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

魏特（Alfons S. J. Vath）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0年。

附录一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碑文：原文、中译文、英译文

景教碑文——原文

粤若。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窅然灵虚。后后而妙有。总玄枢而造化。妙众圣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欤！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二气。暗空易而天地开。日月运而昼夜作。匠成万物然立初人。别赐良和令镇化海。浑元之性虚而不盈。素荡之心本无希嗜。泪乎娑殚施妄。钾饰纯精。间平大于此是之中。隙冥同于彼非之内。是以三百六十五种。肩随结辙。竞织法罗。或指物以托宗。或空有以沦二。或祷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矫人。智虑营营。恩情役役。茫然无得。煎迫转烧。积昧亡途久迷休复。于是我三一分身景尊弥施诃。戢隐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庆。室女诞圣。于大秦景宿告祥。波斯睹耀以来贡。圆甘四圣有说之旧法。理家国于大猷。设三一净风无言之新教。陶良用于正信。制八镜之度。炼尘成真。启三常之门。开生灭死。悬景日以破暗府，魔妄于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宫。含灵于是乎既济。能事斯毕。亭午升真。经留二十七部。张元化以发灵关。法浴水风。涤浮华而洁虚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无拘。击木震仁惠之音。东礼趣生

荣之路。存须所以有外行。削顶所以无内情。不畜臧获。均贵贱于人。不聚货财示罄遗于我。斋以伏识而成。戒以静慎为固。七时礼赞。大庇存亡。七日一荐。洗心反素。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惟道非圣不弘。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象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宗周德丧。青驾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旋令有司将帝写真转模寺壁。天姿泛彩。英朗景门。圣迹腾祥。永辉法界。案西域图记及汉魏史策。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北极众宝之山。西望仙境花林。东接长风弱水。其土出火浣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壁。俗无寇盗。人有乐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广阔。文物昌明。高宗大帝。克恭纘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讪谤于西镐。有若僧首罗含，大德及烈，并金方贵绪，物外高僧。共振玄纲。俱维绝纽。玄宗至道皇帝。令宁国等五王亲临福寺建立坛场。法栋暂桡而更崇。道石时倾而复正。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赐绢百匹。奉庆睿图。龙髯虽远。弓箭可攀。日角舒光。天颜咫尺。三载，大秦国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诏僧罗含僧普论等一七人。与大德佶和。于兴庆宫修功德。于是天题寺榜。额载龙书。宝装璀璨。灼烁丹霞。睿扎宏空，腾凌激日。宠赉比南山峻极。沛泽与东海齐深。道无不可。所可可名。圣无不作。所作可述。肃宗文明皇帝。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资而福祚开。大庆临而皇业建。代宗文武皇帝。恢张圣运。从事无为。每于降诞之辰。赐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饌以光景众。且干以美利故能广生。圣以体元故能亨毒。我建中圣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默陡幽明。阐九畴以惟新景命。化通玄理。祝无愧心。至于方大而虚。专静而恕。广慈救众苦。善贷被群生者。我修行之大猷。汲引之阶渐也。若使风雨时。天下静。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殁能乐。

念生响应。情发自诚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大施主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闻道勤行。远自王舍之城。聿来中夏。术高三代。艺博十全。始效节于丹庭。乃荣名于王帐。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子仪。初恐戎于朔方也。肃宗俾之从迈。虽见亲于卧内。不自异于行间。为公爪牙。作军耳目。能散禄赐。不积于家。献临思之颇黎。布辞憩之金闕。或仍其旧寺。或重广法堂。崇饰廊宇。如翬斯飞。更效景门。依仁施利。每岁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备诸五旬。喂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布达娑。未闻斯美。白衣景士。今见其人。愿刻洪碑。以扬休烈。

词曰：

真主无元，湛寂常然。
 权舆匠化，起地立天。
 分身出代，救度无边。
 日升暗灭，咸证真玄。
 赫赫文皇，道衬前王。
 乘时拔乱，乾廓坤张。
 明明景教，言归我唐。
 翻经建寺，存歿同航。
 百福偕作，万邦之康。
 高宗纂祖，更筑精宇。
 和宫敞明，遍满中土。
 真道宣明，式封法正。
 人有乐康，物无灾苦。
 玄宗启圣，克修真正。
 御榜扬辉，天书蔚映。
 皇图璀璨，率土高敬。
 庶绩咸熙，人赖其庆。
 肃宗来复，天威引驾。
 圣日舒晶，祥风扫夜。
 祚归皇室，祆氛永谢。

止沸定尘，造我区夏。
 代宗孝义，德合天地。
 开贷生成，物资美利。
 香以报功，仁以作施。
 畅谷来威，月窟毕萃。
 建中统极，聿修明德。
 武肃四溟，文清万域。
 烛临人隐，镜观物色。
 六合昭苏，百蛮取则。
 道惟广兮。应惟密强。

名言兮三一。主能作兮臣能述。建丰碑兮颂元吉。

大唐建中二年岁在作噩大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
 时法主僧宁恕知东方之景众也

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书

助检校试太常卿赐紫袈裟寺主僧业利

检校建立碑僧行通

僧灵宝 僧内澄 僧光正

僧和明 僧立本 僧法源

僧审慎 僧宝灵 僧玄览

僧景通 老宿耶俱摩 僧明一

僧保国 僧志坚 僧义济

僧玄德 僧利用 僧元□

僧奉真 僧至德 僧和光

僧景福 僧太和 僧崇德

僧德建 僧去甚 僧广德

僧福寿 僧□□ 僧宝达

僧□明 僧和吉 僧□□

僧遥□ 僧日进 □□轮

僧[這一言+(衣-亠)]和 僧崇敬 僧惠通

僧□□ □居信 僧文贞

僧文明	僧昭德	僧曜原
僧仁□	僧玄真	僧明泰
僧利□	僧敬德	僧元□
僧千□	僧守一	僧光□
僧闻顺	僧普济	僧凝□
僧冲和	僧英德	僧灵德
僧灵寿	僧还淳	□敬真

后一千七十九年咸丰己未武林韩泰华来观幸字画完整重造碑亭覆焉惜故友吴子苾方伯不及同游也为怅然久之。

资料来源：

基督教网络图书馆<http://library.ccim.org>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大秦寺僧景净述<http://www3.fosss.org/DZZJian/ShowArticle.asp?ArticleID=235>

景教碑文——现代中文

奇妙真道，亘古不变，真实无声，在万有之先，无始无终。眼所不能见，自在永在。创造宇宙万物，至高至圣，三位一体，奇妙永恒的独一无二真神。判十字以定四极，赐圣灵以生二气；开天劈地，地不再空虚混沌；日月运行，昼夜肇始；万物匠成，始造人类先祖；赐予上帝本来良善和熙之形象，令人管理天地万物；性情宽厚谦卑，单纯朴素。撒旦魔鬼的诱惑，败坏了原初完美纯洁的本性；恶性渐长，善性渐微，自结365种罗网，纷然沓至；误以偶像为源头，或将原初旨意化为乌有，或藉祈祷祭拜以求福祉，或假冒为善自傲于人。营营役役，思虑愁烦，茫然无得，徒劳无功；久久迷途在愚昧之中，找寻不到原初路径。

因此，三一真神派遣光明荣耀的圣子救主弥赛亚，降卑为人，来到人间。神差遣天使报佳音，宣告童女马利亚怀孕生子于大秦（叙利亚）。明星告祥，波斯博士见星象带着礼物来朝拜圣子。二十四位圣者所著齐家治国之伟大古老的律法（旧约）因此而成全。他建立三一真神之新教，圣灵默默指引；因信而称义；他设定八方境界，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他开启真理之门，引人出死入生。他将日光照耀黑夜，摧毁魔鬼的罪恶；乘坐慈悲之舟登临明亮殿宇；受圣灵恩膏，日清月朗，回归真我。

留下二十七卷圣书（新约），阐明原初之智慧，开启灵魂之眼睛。行施洗之礼，洗涤浮华，洁净罪恶。以十字架为印记，万民归一。鼓瑟敬拜，恩惠之音远扬；朝东而行，奔走生命荣美之路。信徒留须以表明外在作为，理发以象征内在平静，不蓄奴婢，不分贵贱，不聚货财，有福同享，禁食警醒，洁身自好，一天七次礼赞，七日一次祭奠，洗涤心灵，回归圣洁。

永恒真理之道，奇妙而难以命名。其功用昭彰，勉强称之为景教。道不圣不能彰显，圣无道不能弘扬。圣道契合，天下文明。

唐代开国皇帝太宗年间，贤明的圣人大秦国主教阿罗本，从叙利亚来到中土。驾青云，载真经，乘风破浪，不畏艰险，于公元635年（贞观9年），抵达长安。太宗皇帝派遣宰相房公玄龄，带宫内臣仆到西郊欢迎，迎入朝廷。邀请至皇帝藏书室，翻译经典，皇帝在禁宫内亲自问道。深感此道之正义和真实，皇帝下令传授与民。

贞观十二年七月，皇帝诏令曰：“圣道没有恒定不变的名字，圣人没有始终如一的身体。教化随地域而设，为使众生得益裨。德高望重的叙利亚主教阿罗本，携带经文和圣像，远道而来，敬献于京城。详其教旨，玄妙自然，观其元宗，源于真理。言辞清晰，道理隽永。济物利人，宜行天下。”于是，命令在京城义宁坊建造大秦寺（教堂）一所，由二十一位僧人管理。周朝衰败，老子去了西方，唐朝兴起，基督的教导来到了东方。

太宗命画皇帝肖像一幅，悬挂于寺庙之壁，天姿泛彩，满室生辉。圣光带着祥和的气象，永远的光芒照亮了殿宇。

根据西域图记和汉魏史策，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北及众宝之山，西望仙境花令，东接长风若水。出产火棉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壁，夜不闭户，人民康乐。律法非光明不能通行，君主非贤明不能立。疆土广阔，文风昌明。

高宗皇帝继位，仰慕真道。于诸郡建立景教寺，立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大道畅通行于民间，国安民富。景教寺遍布各城，家庭殷实而幸福。

圣历年（699），佛教得势，佛教言语在东边盛行。先天末（公元713年），卑鄙之徒在西边讥笑诽谤。景教主持罗含，主教及烈，以及各城尊敬的高僧（教士）舍弃俗世的追求，同心合一，极力维护天道。玄宗皇帝命令宁国等五位郡主，亲临吉祥的景教寺庙，建立敬拜之所。他重修了倾倒的法梁，重竖了废弃的道石。

天宝初年（742），玄宗至道皇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皇画像，安置于寺内。并赐绢百匹，以示庆祝。龙须虽远，弓箭可攀，日角舒光，天颜咫尺。公元744年，大秦国僧侣洁和，望着这颗感化人心的星星（中国），监察如同日头发光的皇帝，来朝廷拜访。皇帝差罗含、普论等一行七人，在兴庆宫，与洁和主教做礼拜。于是，皇帝在教堂题字立碑。其光彩如翡翠霞光，其智慧如宏空光芒。美丽的馈赠高过南山，丰富的恩泽深于东海。大道包容万象，可行的均可命名。圣人无所不能，所作的便可述说。

肃宗文明皇帝在灵武等五郡重建景教寺，美善的福分临到国土，帝业建立，普天庆贺。代宗文武皇帝大力推广遵行圣道，崇尚自然无为。圣诞之日，赐天香以宣告成功，发粮食以荣耀圣道。圣人活出圣道

之美善，故圣道得以广传。

我们圣人般的文武皇帝设立了朝廷八个分部，以分幽暗与贤明。他分辟了九个类别，更新教义。阐明玄理，无愧于心。圣道宽广，专静而怨，救赎苦难，赐福大众。圣道扎根，渐渐推广。若能使风调雨顺，天下宁静，人顺道理，物体洁净，生活安宁，死者安乐，沟通融洽，情发自诚，此乃景教之功用啊。

大恩人伊斯僧，北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身着御赐金紫袈裟，性情温和，虔诚躬行。他从王含之城来到中国，睿智博学，多才多艺。先效力于宫廷，后在疆场扬名。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子仪，起先在北领兵，后随肃宗皇帝旅行。他虽为皇家内侍，路途中与他人等同。为肃宗之手足，军中之耳目。乐施善助。将御赐之珠宝以及黄金地毯献上。不仅修缮旧堂，而且建设新堂。修饰殿堂，使廊宇辉煌。在行为中彰显躬行真道，依仁施利。每年召集各寺僧侣，灵修侍奉五十天，寒冷有衣穿，生病的得医治，死者得以安葬。最虔诚的佛教僧侣之中，如此美善闻所未闻。身穿白衣的景教信徒，见如此信德，愿刻碑立传，以纪念弘扬他们的德行。

颂

无始无终，亘古永恒的真神，无声无息，无形无像，
拥有教化和完善的权柄和能力，创造了万物天地，
三一真神派遣圣子，降临人间，施行无边的拯救。
太阳升起，黑暗消失，见证真神的奥秘。
太宗皇帝，荣耀辉煌，继承前帝之道，
平定乱象，天地乾坤扩大，
光明的景教传唐朝，
翻译经典，建立教堂，生死有渡，
百福皆作，万邦康乐。

高宗继位，修筑圣殿，
和谐宽敞明亮的宫殿遍满中土。
真道宣明，封官正法，井然有序。

人民康乐，天下太平。

玄宗登临皇位，克己躬行，灵修正道，
御榜扬辉，天书蔚映，
皇图璀璨，全国崇敬，
百业兴旺，安居乐业。

肃宗继位，治理国土带着天威，
如日头般明亮舒展，和祥之风吹遍全地，
皇室归于安乐，肃杀之风永远凋谢。
骚动叛乱止息，皇朝坚立。

代宗孝顺公义，德合天地。
开明慷慨，国富民强，
赏赐恩德，仁爱好施，
如日辉煌，如月璀璨。

建宗统极之时，韦修明德，
武力平息四海，文章万域清明，
观测人心，镜观万物，
光照全地，百蛮景仰。

真道何等宽广！人之回应何等渺小！
三一真神难以命名！
主的作为是应当称颂的。
于是，建立丰碑，歌颂那自在永在的上帝。

建于大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元月第七日，主日。
建立时，法主僧宁恕主管东方景教众圣徒，
朝议朗前行太司土参军吕秀岩书。

（陈上宇参考英文版翻译）

景教碑文——英译文

Nestorian Tablet

Eulogizing the Propagation of the Illustrious Religion in China with a Preface composed by a priest of the Syriac Church, 781 A.D.

Horne Introduction:

This remarkable record of the fact that Christianity flourished in medieval China is a huge stone about ten feet high. Carven dragons and a cross adorn its summit, and its main shaft is completely covered with some two thousand Chinese characters. It stands now in the Peilin or “Forest of Tablets” in Sian-fu, this Peilin being a great hall specially devoted to the preservation of old historic tablets. Up to a few years ago the ancient stone stood with other unvalued monuments in the grounds of a Buddhist monastery, exposed to all the assault of the elements. Only European urgency has led to its being preserved in the Peilin.

The Nestorian sect of Christians still exists in Western Asia and was in a thriving condition in Syria in the sixth century. It sent missionaries widely over Asia. Marco Polo recorded having found Christian churches in China; and Roman Catholic missionaries of later centuries found there a few Nestorians still practising a debased form of their half-forgotten faith. This much concerning the Nestorian Christianity in China we have long known. Then, with the modern opening of the empire, the old Nestorian stone was found. It tells its own history, and tells it plainly, how the Nestorian monks came, how Chinese officials were appointed to listen to their explanations, and gravely approved of the new religion as having “excellent principles.” Various emperors accepted, or at least included, Christianity among their religions; and the faith prospered, and had many thousands of followers, and in the year A.D. 781 erected this stone in commemoration of its triumphs.

Now, alas, only the stone remains. The record of the sect's decay has needed no stone to make it manifest. Nestorian Christianity, shut off from its mother land by the rise of the Mohammedan powers in between, proved unable to resist the inroads of ignorance and superstition and changing political affairs. It degenerated and disappeared.

“Behold the unchangeably true and invisible, who existed through all eternity without origin; the far-seeing perfect intelligence, whose mysterious existence is everlasting; operating on primordial substance he created the universe, being more excellent than all holy intelligences, inasmuch as he is the source of all that is honorable. This is our eternal true lord God, triune and mysterious in substance. He appointed the cross as the means for determining the four cardinal points, he moved the original spirit, and produced the two principles of nature; the somber void was changed, and heaven and earth were opened out; the sun and moon revolved, and day and night commenced; having perfected all inferior objects, he then made the first man; upon him he bestowed an excellent disposition, giving him in charge the government of all created beings; man, acting out the original principles of his nature, was pure and unostentatious; his unsullied and expansive mind was free from the least inordinate desire; until Satan introduced the seeds of falsehood, to deteriorate his purity of principle; the opening thus commenced in his virtue gradually enlarged, and by this crevice in his nature was obscured and rendered vicious; hence three hundred and sixty-five sects followed each other in continuous track, inventing every species of doctrinal complexity; while some pointed to material objects as the source of their faith, others reduced all to vacancy, even to the annihilation of the two primeval principles, some sought to call down blessings by prayers and supplications, while others by an assumption of excellence held themselves up as superior to their fellows; their intellects and thoughts continually wavering, their minds and affections incessantly on the move, they never obtained their vast desires, but being exhausted and distressed they revolved in their own heated atmosphere; till by an accumulation of obscurity they lost their path, and after long groping in darkness they were unable to return. Thereupon, our Trinity being divided in nature, the illustrious and honorable Messiah, veiling his true

dignity, appeared in the world as a man; angelic powers promulgated the glad tidings, a virgin gave birth to the Holy One in Syria; a bright star announced the felicitous event, and Persians observing the splendor came to present tribute; the ancient dispensation, as declared by the twenty-four holy men [the writers of the Old Testament], was then fulfilled, and he laid down great principles for the government of families and kingdoms; he established the new religion of the silent operation of the pure spirit of the Triune; he rendered virtue subservient to direct faith; he fixed the extent of the eight boundaries, thus completing the truth and freeing it from dross; he opened the gate of the three constant principles, introducing life and destroying death; he suspended the bright sun to invade the chambers of darkness, and the falsehoods of the devil were thereupon defeated; he set in motion the vessel of mercy by which to ascend to the bright mansions, whereupon rational beings were then released, having thus completed the manifestation of his power, in clear day he ascended to his true station.

Twenty-seven sacred books [the number in the New Testament] have been left, which disseminate intelligence by unfolding the original transforming principles. By the rule for admission, it is the custom to apply the water of baptism, to wash away all superficial show and to cleanse and purify the neophytes. As a seal, they hold the cross, whose influence is reflected in every direction, uniting all without distinction. As they strike the wood, the fame of their benevolence is diffused abroad; worshiping toward the east, they hasten on the way to life and glory; they preserve the beard to symbolize their outward actions, they shave the crown to indicate the absence of inward affections; they do not keep slaves, but put noble and mean all on an equality; they do not amass wealth, but cast all their property into the common stock; they fast, in order to perfect themselves by self-inspection; they submit to restraint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mselves by silent watchfulness; seven times a day they have worship and praise for the benefit of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once in seven days they sacrifice, to cleanse the heart and return to purity.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a name to express the excellence of the true and unchangeable doctrine; but as its meritorious operations are manifestly displayed, by accommodation it is named the Illustrious Religion. Now without

holy men, principles cannot become expanded; without principles, holy men cannot become magnified; but with holy men and right principles, united as the two parts of a signet, the world becomes civilized and enlightened.

In the time of the accomplished Emperor Tai-tsung, the illustrious and magnificent founder of the dynasty, among the enlightened and holy men who arrived was the most-virtuous Olopun, from the country of Syria. Observing the azure clouds, he bore the true sacred books; behold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winds, he braved difficulties and dangers.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635 he arrived at Chang-an; the Emperor sent his Prime Minister, Duke Fang Hiuen-ling; who, carrying the official staff to the west border, conducted his guest into the interior; the sacred books were translated in the imperial library, the sovereign investigated the subject in his private apartments; when becoming deeply impressed with the rectitude and truth of the religion, he gave special orders for its dissemination.

In the seventh month of the year A.D. 638 the following imperial proclamation was issued:

“Right principles have no invariable name, holy men have no invariable station; instruction is establ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ocality, with the object of benefiting the people at large. The greatly virtuous Olopun, of the kingdom of Syria, has brought his sacred books and images from that distant part, and has presented them at our chief capital. Having examined the principles of this religion, we find them to be purely excellent and natural; investigating its originating source, we find it has taken its rise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important truths; its ritual is free from perplexing expressions, its principles will survive when the framework is forgot; it is beneficial to all creatures; it is advantageous to mankind. Let it be published throughout the Empire, and let the proper authority build a Syrian church in the capital in the I-ning May, which shall be governed by twenty-one priests. When the virtue of the Chau Dynasty declined, the rider on the azure ox ascended to the west; the principles of the great Tang becoming resplendent, the Illustrious breezes have come to fan the East.”

Orders were then issued to the authorities to have a true portrait of the

Emperor taken; when it was transferred to the wall of the church, the dazzling splendor of the celestial visage irradiated the Illustrious portals. The sacred traces emitted a felicitous influence, and shed a perpetual splendor over the holy precincts. According to the Illustrated Memoir of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historical books of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the kingdom of Syria reaches south to the Coral Sea; on the north it joins the Gem Mountains; on the west it extends toward the borders of the immortals and the flowery forests; on the east it lies open to the violent winds and tideless waters. The country produces fire-proof cloth, life-restoring incense, bright moon-pearls, and night-luster gems. Brigands and robbers are unknown, but the people enjoy happiness and peace. None but Illustrious laws prevail; none but the virtuous are raised to sovereign power. The land is broad and ample, and its literary productions are perspicuous and clear.

The Emperor Kau-tsung respectfully succeeded his ancestor, and was still more beneficent toward the institution of truth. In every province he caused Illustrious churches to be erected, and ratified the honor conferred upon Olopun, making him the great conservator of doctrin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State. While this doctrine pervaded every channel, the State became enriched and tranquility abounded. Every city was full of churches, and the royal family enjoyed luster and happiness. In the year A.D. 699 the Buddhists, gaining power, raised their voices in the eastern metropolis; in the year A.D. 713, some low fellows excited ridicule and spread slanders in the western capital. At that time there was the chief priest Lohan, the greatly virtuous Kie-leih, and others of noble estate from the golden regions, lofty-minded priests, having abandoned all worldly interests; who unitedly maintained the grand principles and preserved them entire to the end. The high-principled Emperor Hiuen-tsung caused the Prince of Ning and others, five princes in all, personally to visit the felicitous edifice; he established the place of worship; he restored the consecrated timbers which had been temporarily thrown down; and re-erected the sacred stones which for a time had been desecrated.

In A.D. 742 orders were given to the great general Kau Lih-sz', to send the five sacred portraits and have them placed in the church, and a gift of a

hundred pieces of silk accompanied these pictures of intelligence. Although the dragon's beard was then remote, their bows and swords were still within reach; while the solar horns sent forth their rays, and celestial visages seemed close at hand. In A.D. 744 the priest Kih-ho, in the kingdom of Syria, looking toward the star [of China], was attracted by its transforming influence, and observing the sun [i.e., the Emperor], came to pay court to the most honorable. The Emperor commanded the priest Lo-han, the priest Pu-lun, and others, seven in all, together with the greatly virtuous Kih-ho, to perform a service of merit in the Hing-king palace. Thereupon the Emperor composed mottoes for the sides of the church, and the tablets were graced with the royal inscriptions; the accumulated gems emitted their effulgence, while their sparkling brightness vied with the ruby clouds; the transcripts of intelligence suspended in the void shot forth their rays as reflected by the sun; the bountiful gifts exceeded the height of the southern hills; the bedewing favors were deep as the eastern sea. Nothing is beyond the range of the right principle, and what is permissible may be identified; nothing is beyond the power of the holy man, and that which is practicable may be related.

The accomplished and enlightened Emperor Suh-tsung rebuilt the Illustrious churches in Ling-wu and four other places; great benefits were conferred, and felicity began to increase; great munificence was displayed, and the imperial State became established. The accomplished and military Emperor Tai-tsung magnified the sacred succession, and honored the latent principle of nature; always, on the incarnation-day, he bestowed celestial incense, and ordered the performance of a service of merit; he distributed of the imperial viands, in order to shed a glory on the Illustrious Congregation. Heaven is munificent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blessings, whereby the benefits of life are extended; the holy man embodies the original principle of virtue, whence he is able to counteract noxious influences.

Our sacred and sage-like, accomplished and military Emperor Kien-chung appointed the eight branches of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which he advanced or degraded the intelligent and dull; he opened up the nine categories, by means of which he renovated the Illustrious decrees; his transforming influence pervaded the most abstruse principles, while openness of heart distinguished his devotions.

Thus, by correct and enlarged purity of principle, and undeviating consistency in sympathy with others; by extended commiseration rescuing multitudes from misery, while disseminating blessings on all around, the cultivation of our doctrine gained a grand basis, and by gradual advances its influence was diffused. If the winds and rains are seasonable, the world will be at rest; men will be guided by principle, inferior objects will be pure; the living will be at ease, and the dead will rejoice; the thoughts will produce their appropriate response, the affections will be free, and the eyes will be sincere; such is the laudable condition which we of the Illustrious Religion are laboring to attain.

Our great benefactor, the Imperially conferred purple-gown priest, I-sz', titular Great Statesman of the Banqueting-house, Associated Secondary Military Commissioner for the Northern Region, and Examination-palace Overseer, was naturally mild and graciously disposed; his mind susceptible of sound doctrine, he was diligent in the performance; from the distant city of Rajagriha, he came to visit China; his principles more lofty than those of the three dynasties, his practise was perfect in every department; at first he applied himself to duties pertaining to the palace, eventually his name was inscribed on the military roll. When the Duke Koh Tsz'-i, Secondary Minister of State and Prince of Fan-yang, at first conducted the military in the northern region, the Emperor Suhtsung made him (I-sz') his attendant on his travels; although he was a private chamberlain, he assumed no distinction on the march; he was as claws and teeth to the duke, and in rousing the military he was as ears and eyes; he distributed the wealth conferred upon him, not accumulating treasure for his private use; he made offerings of the jewelry which had been given by imperial favor, he spread out a golden carpet for devotion; now he repaired the old churches, anon he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religious establishments; he honored and decorated the various edifices, till they resembled the plumage of the pheasant in its flight; moreover, practising the discipline of the Illustrious Religion, he distributed his riches in deeds of benevolence; every year he assembled those in the sacred office from four churches, and respectfully engaged them for fifty days in purification and preparation; the naked came and were clothed; the sick were attended to and restored; the dead were buried in repose; even among the most

pure and self-denying of the Buddhists, such excellence was never heard of; the white-clad members of the Illustrious Congregation, now considering these men, have desired to engrave a broad tablet, in order to set forth a eulogy of their magnanimous deeds.

ODE

The true Lord is without origin,
 Profound, invisible, and unchangeable;
 With power and capacity to perfect and transform,
 He raised up the earth and established the heavens.
 Divided in nature, he entered the world,
 To save and to help without bounds;
 The sun arose, and darkness was dispelled,
 All bearing witness to his true original.
 The glorious and resplendent, accomplished Emperor,
 Whose principles embraced those of preceding monarchs,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occasion, suppressed turbulence;
 Heaven was spread out and the earth was enlarged.
 When the pure, bright Illustrious Religion
 Was introduced to our Tang Dynasty,
 The Scriptures were translated, and churches built,
 And the vessel set in motion for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Every kind of blessing was then obtained,
 And all the kingdoms enjoyed a state of peace.
 When Kau-tsung succeeded to his ancestral estate,
 He rebuilt the edifices of purity;
 Palaces of concord, large and light,
 Covered 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 the land.
 The true doctrine was clearly announced,
 Overseers of the church were appointed in due form;
 The people enjoyed happiness and peace,

While all creatures were exempt from calamity and distress.
When Hiuen-tsung commenced his sacred career,
He applied himself to the cultivation of truth and rectitude;
His imperial tablets shot forth their effulgence,
And the celestial writings mutually reflected their splendors.
The imperial domain was rich and luxuriant,
While the whole land rendered exalted homage;
Every business was flourishing throughout,
And the people all enjoyed prosperity.
Then came Suh-tsung, who commenced anew,
And celestial dignity marked the Imperial movements.
Sacred as the moon's unsullied expanse,
While felicity was wafted like nocturnal gales.
Happiness reverted to the Imperial household,
The autumnal influences were long removed;
Ebullitions were allayed, and risings suppressed,
And thus our dynasty was firmly built up.
Tai-tsung the filial and just
Combined in virtue with heaven and earth;
By his liberal bequests the living were satisfied,
And property formed the channel of imparting succor.
By fragrant mementoes he rewarded the meritorious,
With benevolence he dispensed his donations;
The solar concave appeared in dignity,
And the lunar retreat was decorated to extreme.
When Kien-chung succeeded to the throne,
He began the cultivation of intelligent virtue;
His military vigilance extended to the four seas,
And his accomplished purity influenced all lands.
His light penetrated the secrecies of men,
And to him the diversities of objects were seen as in a mirror;
He shed a vivifying influence through the whole realm of nature,

And all outer nations took him for example.
 The true doctrine, how expansive!
 Its responses are minute;
 How difficult to name it!
 To elucidate the three in one.
 The sovereign has the power to act!
 While the ministers record;
 We raise this noble monument!
 To the praise of great felicity.

This was erected in the 2nd year of Kien-chung, of the Tang Dynasty [A.D. 781], on the 7th day of the 1st month, being Sunday.

Written by Lu Siu-yen, Secretary to Council, formerly Military Superintendent for Tai-chau; while the Bishop Ning-shu had the charge of the congregations of the Illustrious in the East.

[The Following are written in Syriac, running down the right and left sides of the Chinese inscription above].

“Adam, Deacon, Vicar-episcopal and Pope of China. In the time of the Father of Fathers, the Lord John Joshua, the Universal Patriarch.”

[The Following is in Syriac at the foot of the stone].

“In the year of the Greeks one thousand and ninety-two, the Lord Jazedbuzid, Priest and Vicar-episcopal of Cumdan the royal city, son of the enlightened Mailas, Priest of Balkh a city of Turkestan, set up this tablet, whereon is inscribed the Dispensation of our Redeemer, and the preaching of the apostolic missionaries to the King of China.”

[After this, in Chinese characters, follows:]

“The Priest Lingpau.”

[Then follows in Syriac:]

“Adam the Deacon, son of Jazedbuzid, Vicar-episcopal.

The Lord Sergius, Priest and Vicar-episcopal.

Sabar Jesus, Priest.

Gabriel, Priest, Archdeacon, and Ecclesiarch of Cumdan and Sarag.”

[The following subscription is appended in Chinese:]

“Assistant Examiner: the High Statesman of the Sacred rites, the Imperially conferred purple-gown Chief Presbyter and Priest Yi-li.”

[On the left-hand edge are the Syriac names of sixty-seven priests, and sixty-one are given in Chinese.]

Source:

Horne, Charles F. ed., *The Sacred Books and Early Literature of the East*. New York: Parke, Austin, & Lipscomb, 1917. Vol. XII, Medieval China, pp. 381-392.

Scanned by Jerome S. Arkenberg, Cal. State Fullerton.

The text has been modernized by Prof. Arkenberg.

附录二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

尺寸：高26cm 宽104.8 cm

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以下简称“景教赞”）是1908年伯希和窃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P.3847。1910年我国学者罗振玉先生在伯希和处获得照片，刊登在《敦煌石室遗书》第3册45-47页；陈垣先生早年也关注过这份文书，并有过精辟的批注（《陈垣先生遗墨》，2006年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录文收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版《陈垣全集》第七册第十六种“杂著”类）；此后国内外、教内外学者著述甚丰。日本学者佐伯好郎氏认为诗题中的“威蒙度”是古叙利亚文Imuda（浸水礼），因此这篇诗作是“景教徒受洗礼时所诵朝拜圣三经”，此说现已无人附和；英国学者莫尔认为是教会唱诵的《荣归主颂》，为大多数学者所赞同；1986年旅法学者吴其昱博士发表他的《景教三威蒙度研究》，通过汉文和叙利亚文荣归主颂逐句对照，证实了这个观点。2000年林悟殊先生在全面总结以往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深入的再研究。

景教赞实为景教徒敬拜时颂念之《荣福经》、《赞美经》，公元635年由景教高僧阿罗本边同其它景教经文一并带入唐朝；有记载说

在公元760年就由来自波斯的传教士景净汉译，并收录于《新编赞美诗》385首。

景教三威蒙度赞

无上诸天深敬叹，大地重念普安和；
 人元真性蒙依止，三才慈父阿罗河。
 一切善众至诚礼，一切慧性称赞歌；
 一切含真尽归仰，蒙圣慈光救离魔。
 难寻无及正真常，慈父明子净风王；
 于诸帝中为帝师，于诸世尊为法皇。
 常居妙明无畔界，光威尽察有界疆；
 自始无人尝得见，复以色见不可相。
 惟独绝凝清净德，惟独神威无等力；
 惟独不转俨然存，众善根本复无极。
 我今一切念慈恩，叹彼妙乐照此国；
 弥施诃普尊大圣子，广度苦界救无亿。
 常活命王慈喜羔，大普耽苦不辞劳；
 愿赦群生积重罪，善护真性得无繇。
 圣子端在父右座，其座复超无量高；
 大师愿彼乞众请，降筏使免火江漂。
 大师是我等慈父，大师是我等圣主；
 大师是我等法王，大师能为普救度。
 大师慧力助诸羸，诸目瞻仰不暂移；
 复与枯焦降甘露，所有蒙润善根滋。
 大圣普尊弥施诃，我叹慈父海藏慈；
 大圣谦及净风性，清凝法耳不思议。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一卷

（中空）

尊经



敬礼妙身皇父阿罗诃 应身皇子弥施诃 证身卢诃宁俱沙 已上
三身同归一体

瑜罕难法王 卢伽法王 摩矩辞法王 明泰法王 牟世法王 多
惠法王 景通法王 宝路法王 千眼法王 那宁逸法王 珉艷法王 摩
萨吉思法王 宜和吉思法王 摩没吉思法王 岑稳僧法王 二十四圣法
王 寃难耶法王 贺萨耶法王 弥沙曳法王 娑罗法王 瞿卢法王 报
信法王

敬礼常明皇乐经 宣元至本经 志玄安乐经 天宝藏经 多惠圣
王经 阿思瞿利容经

浑元经 通真经 宝明经 传化经 罄遗经 原灵经 述略经
三际经 征诘经 宁思经 宣义经 师利海经 宝路法王经 删河律经
艺利月思经 宁耶颀经 仪则律经 昆遏启经 三威赞经 牟世法王
经 伊利耶经 遏拂林经 报信法王经 弥施诃自在天地经 四门经
启真经 摩萨吉斯经 慈利波经 乌沙那经

谨案诸经目录。《大秦本教经》都五百卅部，并是贝叶梵音。唐太宗皇帝贞观九年，西域太德僧阿罗本届于中夏，并奏上本音，房玄龄魏征宣译奏言；后召本教大德僧景净，译得已上卅部卷。余大数具在贝皮夹，犹未翻译。

现代文翻译：



无上诸天深敬叹，至高的诸天恭敬深摯地赞美你，

大地重念普安和， 普天下人都重新得到和平和善意，
人元真性蒙依止， 人的本源和真性得到了倚靠和归宿，
三才慈父阿罗诃。 你是宇宙万物的慈父耶和華。

一切善众至诚礼； 所有属神的良善子民虔诚敬拜你，
一切慧性称赞歌， 所有得蒙光照的信徒歌诗赞美你，
一切含真尽归仰， 但愿整个人类都归向仰望你，
蒙圣慈光救离魔。 得到慈悲的光照， 脱离那恶者。

难寻无及正真常， 你的正义、真理和永恒，
人类无法测度， 无法达到，
慈父、明子、净风王， 你是慈爱的父亲，
光明的圣子， 使人成圣的圣灵，
于诸帝中为帝师， 在地上的君王中， 你是万王之王，
于诸世尊为法皇。 在宇宙的主宰中， 你是万主之主。

常居妙明无畔界， 从永远到永远， 你的住所无限无边，
光威尽察有界疆， 你的光辉威严洞察一切有限疆界，
自始无人尝得见， 从来没有人见过你，
复以色列不可相。 却从有形的物质得知你无形的存在。

惟独绝凝清净德， 唯独你是纯洁完全， 尊严无量，
惟独神威无等力， 唯独你的神威无可伦比，
惟独不转俨然存， 唯独你永远不变， 永远长存，
众善根本复无极。 众善的根本啊， 你是永远达不到的高峰。

我今一切念慈恩， 我们现在赞美你的慈恩，
叹彼妙乐照此国； 感谢你将福音光照了中国；
弥施可普尊大圣子， 弥赛亚是普世尊敬的圣子，
广度苦界救无亿。 你拯救无数信徒脱了痛苦的境地。

常活命 王慈喜羔， 永远常活的上帝的羔羊，

大普耽苦不辞劳，为背负世人罪孽不辞辛劳，
原赦群生积重罪，为赦免世人累积的罪恶，
善护真性得无繇。为恢复人类的真性，你付出了赎罪的代价。

圣子端在父右座，坐在上帝圣父右边的圣子，
其座复超无量高，宝座庄严超过了万有，
大师愿彼乞众请，敬求垂允大众的祈求，
降筏使免火江漂。差派慈航来救渡群众，免在火潮里漂泊。

大师是我等慈父，主啊，你是我们慈爱的父亲，
大师是我等圣主，主啊，你是我们圣洁的救主，
大师是我等法王，主啊，你是我们崇高的君王，
大师能为普救度。主啊，你能够拯救普天下的人。

大师慧力助诸羸，主啊，你的神力能帮助我们的软弱，
诸目瞻仰不暂移，万民的眼目都定睛仰望着你，
复与枯蕉降甘露，你又降甘霖，浇灌枯干的心灵，
所有蒙润善根滋。使得到滋润的善根，都生长复苏。

大圣普尊弥施诃，主基督，你是世人尊崇的弥赛亚，
我叹慈父海藏慈，我赞美主圣父，慈爱像海洋，
大圣谦及净风性，只有基督与圣灵，
清疑法耳不思议。（在上主圣父荣耀里）同样尊严、圣洁不可测度。

（译者不详）

卷二 道成肉身

清末民初：教会建立、社会影响、文化冲突



第一部分

流向中国的生命河：教会建立

杨格非（Griffith John）和他的一个伙伴乘坐“赫赫勒斯邦”号汽船，逆着中国第一条大河浩荡水流，开始向中国腹地开去。杨格非记述当时的感触：“我们在伟大的扬子江上逆流而上……似乎像一个新奇的世界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们俩是多么感谢上帝，这一条美丽而宏伟的河流已成为十字架使者们的道路。”——杨格非，1908

历史架构

基督教教会建立和发展的历史包括三个时期：拓荒时期、撒种时期、扎根时期。

1807年、1942年、1900年，是三个划时代的年份。

1807年，拓荒时期。第一位新教宣教士马礼逊来华，以广州和澳门为基地，开创了许多第一：第一本中文《圣经》、第一本《华英字典》、第一位中国信徒、第一个本土传道人、第一座基督教堂，第一间西式学堂、第一所医院、第一份报刊。

1842年，撒种时期。随着鸦片战争，西方的炮火和条约的签订，为福音打开了大门。西方宣教士涌入沿海通商口岸，进而深入内地，在

各地扎根，遍地结果。宣教士与中国大众一同经历太平天国、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社会大动荡。

1900年，扎根时期。庚子教难后，教会渐渐本土化，进入“黄金时代”。在辛亥革命、国共内战、抗日战争期间，教士、信徒、教堂倍增。直至1952年，新中国建立后，西方宣教士全线撤离。

时代背景

西方：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有超过二十万名来自英语国家的年轻人，带着《圣经》和上帝的使命，前往世界各地传福音。¹

中国：因礼仪之争，康熙于1720年开始禁教，1723年雍正实施严禁，至1807年马礼逊入华，清朝已关闭87年。

晚清宣教士来华时的情形与唐朝、元朝、明朝大不相同。

丁韪良日记，1850年，广州：当我们上岸时，一大群人围着我们喊：“番鬼，番鬼！杀头，杀头！”我当时心里想：这就是中国人喜欢夸耀的文明？难道我们离乡背井就是为这样一些人？我反省，假如他们不是异教徒的话，我为什么还要来呢？

晚清来华宣教士面临的中国，地大辽阔、交通不便、保守落后、奇风异俗、人力操作、生活艰辛、战争频繁、危难不安。

宣教士面对的是社会下层人，生活在社会基层，接触到不少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黑暗面：庙宇、偶像、鸦片、缠足、杀婴、蓄婢、贫穷、文盲、科举等等。

战乱频频：鸦片战争（1840—1842）、太平天国（1851—1864）、英法联军（1854—1860）、甲午战争（1894年中日战争）、庚子教难（1900年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1900）、孙中山革命战争（1894—1911）、抗日战争（1937—1945）、国共内战（1927—1937和1945—1949）。

1 梁家麟，《基督教会史略——改变教会的十人十事》。宗教出版社，1996年，p. 343。

天灾人祸：干旱水祸，民不聊生、盗贼蜂起、掳掠抢劫。1876—1879年“丁戊奇荒”，直隶(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持续四年遭受大面积干旱，因饥荒及疫病致死的人共约1300万。

教案四起：从1840年到1900年，全中国共发生大大小小的教案计400多起。1860—1900年之间，殉道人数达24000人。1900年“庚子教难”，即“义和团运动”中，宣教士被称为“大毛子”，基督徒为“二毛子”，格杀勿论。被杀基督教新教宣教士189人，教友5000。天主教殉道者，主教5人，教士48人，教友18000人。

拓荒时期（1807—1842）马礼逊入华至《南京条约》签订

宣教士拓荒者们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持续不断地寻求上帝的旨意和帮助。

马礼逊日记，1807年，广州：“这许许多多无知的，但是精明的、堂堂的中国人，我能为他们做什么呢？”

马礼逊两件大事：中文圣经、华英字典

神的话语：经过12年零3个月，第一本中文圣经《神天圣书》于1819年翻译完毕，于1823年出版。

马礼逊日记：“为了完成这个大任务，我不仅长期工作及谢绝社交，保持耐心、毅力、镇静及不偏颇的判断……惟希望以正确的思想，恭敬的态度，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以免误传上帝的圣言……希望……可以使一个较为快乐的时代快些在这些地方出现。”

人的工具：第一部中英字典《华英字典》于1815至1823年陆续出版，为后来的西方宣教士学习中文提供了必须的工具书。

马礼逊日记：“这是一项非常吃力和费时的工程。我心里空虚，思想贫乏。我的天父上帝啊，求你支持我，不要把圣灵从我处取走，神

圣的救主，求你不要让我的心灵与生命离开你。”

马礼逊及拓荒者们首创

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1815年，米怜，马六甲）

第一所西式学校：英华书院（1818年，米怜，马六甲）

第一间基督教堂：马礼逊教堂（1821年，澳门）

第一张英文报纸：《广州记录报》（*The Canton Register*，1827年，伍德编辑）

第一本活版铅字杂志：《天下新闻》（1828年，麦都思编辑，马六甲）

第一家西式医院：“新豆栏医局”，后发展成博济医院（1835年，伯驾，广州）

最初的牧者

1814年，马礼逊来华七年后，才得一位中国信徒，蔡高。1823年，16年后，按立第一位本土宣教士，梁发。

1832年9月4日，马逊来华25年后，儿子马儒翰印制了第一份印刷品“在华传教二十五周年报告书”，报告了八名来华拓荒者和三位当地同工，共得十人施洗。

拓荒者名单——

马礼逊神学博士，伦敦传教会，中国

麦都思，伦敦传教会，爪哇

撒母耳吉德，伦敦传教会，病重，英国

亚伯汤姆林，伦敦传教会，马六甲英华书院

戴尔，伦敦传教会，槟榔岛

郭实腊，荷兰传教会，旅行

裨治文，美国公理会，广州

雅裨理，美国归正会，暹罗

梁发，中国人，被按立为传道人，伦敦传教会，中国

丘安，中国人，伦敦传教会，印刷工人，中国

李兴，中国人，梁发助手，中国

初熟的果子

1835年，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和裨治文牧师发表通函，提到广州一间小的华人基督教会，并列出12名教友名单：

梁发，48岁，传道人。

屈昂，50岁，传道助理。

黎氏，31岁，梁发妻。

梁进德，15岁，梁发子。

梁亚沾，11岁，梁发女。

李新，31岁，砖匠。

周亚生，25岁，制笔匠。

吴亚清，31岁，印刷助手。

梁亚道（译音），28岁，制笔匠。

梁亚新（译音），梁发助手。

刘庶泉（译音），38岁，秀才。

赵清（译音），秀才。

马礼逊1834年1月去世。逝世前，已有23位牧师受他影响来华传教，其中包括女传道人。

据《中国丛报》统计，1807年到1942年开拓期，共有59位男性宣教士向华人传福音。其中驻澳门和广州的有18人，其余41位驻中国本土以外。平均每位只得两个华人信奉基督教。²

2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pp. 131-133。

马礼逊来华时，有人问他：“你真相信你能够改变这个古老的、迷信的、传统的中国吗？马礼逊答：“我不能，但是我相信，神能。”

1807年到1842年是一个艰难、缓慢、痛苦的开拓期。35年间，信徒不到100人，其中包括社会下层贫苦无依的“吃教者”。³

撒种时期（1842—1900）鸦片战争至义和团事件

门户洞开、后援充足

门户洞开：两次鸦片战争（1840—1842、1856—1860），清廷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南京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允许宣教士进入通商口岸，并进入内地，建立教堂、学校、医院。

后援充足：欧美经济腾飞、商人参与、平信徒传教活动、宗教复兴运动、基督教青年会、学生自愿海外传教组织大发展。

六大宗派，圣公宗、浸礼宗、公理宗、信义宗、长老宗、监理宗所属差会，以及不分宗派的内地会，派遣大量海外宣教士。

自1886年到1919年，共有8140名学生志愿者被派往国外宣教，其中2524人前往中国。当时的口号是：“使世界在我们这一代福音化”。

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艾迪·舍伍德回忆：“在那些日子里，中国就是目标，是指路星辰，就是吸引我们所有人的巨大磁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885年，剑桥大学7名学生一起来华，称作剑桥七杰。他们深入山西、四川、甘肃、西藏等地，办教育、传福音，将青春献给了中国。

他们是：

施达德，著名板球手。

司米德，圣三一学院划船队长。

3 同上，pp. 131—132。

何斯德，皇家军事学院将军之子。

章必成，男爵之子、划船选手。

盖士立，圣公会牧师。

杜明德，上校之子。

杜西德，杜明德兄弟。

遍地撒种

第一阶段：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割让香港，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五个通商口岸。宣教士得以进入通商口岸传教。最先进入通商口岸的有：

1842年 香港 罗孝全 1802—1871，美国人，美南浸信会

1842年 福建厦门 雅裨理 1804—1846，美国人，归正会

1843年 上海 麦都思 1796—1857，英国人，伦敦会

1843年 浙江宁波 玛高温 1814—1893，美国人，美北浸礼会

1845年 江苏 文惠廉 1811—1864，美国人，圣公会

第二阶段：1856年签订《望厦条约》、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宣教士得以进入内地，建立教会、学校、医院。拓荒者包括：

1861年 北京 雒魏林 1811—1896，英国人，伦敦会

1861年 湖北汉口 杨格非 1831—1912，英国人，伦敦会

1861年 山东 倪维思 1829—1893，美国人，美北长老会

1863年 湖南湘潭 郭修礼 1828—1906，英国人，英国循道会

第三阶段：1865年戴德生建立中国内地会，以将福音传入未得省份为宗旨，福音遍传内地。

1867年 江西 V. C. Hart and Elbert S. Todd，美国人，美以美会

1867年 辽宁牛庄 宾惠廉 1815—1868，苏格兰，英国长老会

1868年 四川	杨格非 1831—1912, 英国人, 伦敦会
1869年 河北	谢卫楼 1841—1913, 美国, 公理会传
1869年 山西	韦廉臣 1829—1890, 苏格兰人, 伦敦会
1869年 安徽	密道生 1835—1914, 英国人, 内地会
1872年 天津	明恩溥 1845—1932, 美国人, 公理会
1872年 内蒙古	吉尔默 1842—1891, 苏格兰人, 卫理公会
1875年 河南	戴亨利, 内地会
1876年 西藏	康慕伦 1799—1875, 内地会
1876年 陕西	鲍康宁 1852—1922, 英国人; 金铺仁 1857—, 内地会
1876年 山西	秀耀春 1851—1900, 英国人, 内地会; 德治安, 内地会
1877年 甘肃	义世敦 1853—1938; 巴格道 —1931, 内地会
1877年 广西	费舍尔, 内地会
1877年 重庆	麦卡悌 1840—1911, 爱尔兰人, 内地会
1877年 云南	麦卡悌 1840—1911, 爱尔兰人, 内地会
1877年 贵州	祝杨名 1842—1919, 英国人; 巴子成 1850—1910, 内地会

深入内地

戴德生于1865年所建立的内地会是沿海宣教和内地宣教的分水岭。内地会派遣了八百多名宣教士, 建立了一百二十五间学校, 并在中国带领一万八千人归信基督, 在十八省成立了三百多所由五百多位本地助理参与的传教站。

当多数差会把工作集中在东部沿海各省时, 内地会深入到中国西部边远地区传教, 如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

圣经广传

继1823年马礼逊译本，1840年“郭实腊译本”，1854年“委办译本”，1857年以南京官话为基础的白话文译本出版，1862年裨治文和克陛存翻译的浅文理《圣经》，1889年杨格非译成官话《圣经》，后来陆续出现苗文、蒙文、满文、西藏文、和盲人用的凸字圣经。1840年以前，在中国分发的圣经和布道书估计约两万册。

今天仍被华人广泛使用的《圣经和合本》，由十几个西方宣教士翻译，新约花了16年，旧约花了12年，从1890年到1918年，共28年才译成。由美国宣教士狄考文担任官话和合本圣经委员会主席，1908年狄考文去世后，由美国宣教士富善接任委员会主席，他是唯一从头到尾参与翻译的。《圣经和合本》是第一本包括各种文体的白话文书籍，成为的白话文运动的开路先锋。

太平天国

这段时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插曲：清朝后期，洪秀全发起农民起义，从1851年起到1864年，坚持了14年，势力扩展到17省，并在天津建都，是19世纪中叶中国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洪秀全自称为“皇上帝之子，耶稣之弟”。罗孝全、裨治文等宣教士到天京访问，得出结论：太平军不仅无知，而且渎神。

历史小结

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到，上帝借着苦难、战争、炮火，将福音带入中华。苦难更加激励了使徒们的心志：他们不畏艰险，前赴后继，将爱带入中华。

宣教士的爱心来自耶稣基督，与政府无关。宣教运动是民众自发的运动，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所说，“美国海外传教从任何意义来说，乃是人民的运动。”

扎根时期（1900—1949）庚子事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血的浇灌

教父特土良说过：“殉道者的血是教会兴旺的种子。”

1900年庚子教案中，新教189名宣教士及其家人殉道。在137名成人中，77位为女性，79位为内地会同工。被杀害的西方人中，四分之一是小孩。二万多名中国信徒被杀害。

殉道血激起了更大的宣教热潮，大批宣教士来华，由20世纪始不足3000人，急增至1920年7000人。⁴

庚子教难使西方宣教士更加意识到本土教会的关键性。1907年，西方各宗派在上海召开第三届宣教士大会，取得一个共识，中国必须建立自治、自传、自养的本土教会，外国人应该逐渐淡出教会事务。

世纪大事

20世纪初，中国社会风起云涌，宣教士与中国人一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1915年和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产生了思想革命。1921年，共产党成立。接着，中国人民在战争中度过了四分之一一个世纪：国民大革命（1924—1927）、国共内战（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解放战争（1946—1949）。

4 梁家麟，《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香港：天道书楼，1979年，pp. 128。

教会增长

教会社会动荡中大幅度增长着。

宣教士的身影到处可见：小礼堂、农村集市、帐篷、奋兴会、家庭布道、福音船、人力车夫、理发店、茶馆、邮电、穆斯林中、军队、监狱、会社等等。传福音的人们“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1919年，6636名宣教士，居住在693个传教点，开设了1036个布道机关。在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福州、长沙、成都、济南等八个中心城市里，每个城市都有平均100名以上的宣教士。教堂6391座，并拥有8886个巡回布道中心。传教团体从1900年61个发展到1920年130个。⁵

20世纪初，各种圣经翻译告一段落。1914年，中国的三个圣经会，“大美圣经会”、“苏格兰圣经会”和“大英圣经会”售出的圣经总数为18,027,816本。到1936年，三会总数近一万万本。

本土教会建立起来了。倪柝声建立“基督徒聚会处”，又称“小群教会”，强调感情投入，反学术、反神学、非历史化，追求行为改变，遍及全国及海外，1949年已有7百间教会，擘饼信徒超过7万人。王明道建立“基督教会堂”，认为重生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不再受肉体死亡威胁；活着人有具体的改变，因有圣灵的帮助，可以达到从前达不到的道德标准。灵粮堂赵世光、耶稣家庭敬奠瀛、中华归主赵君影、布道家宋尚节、王载、计志文、杨绍唐、神学家贾玉铭等本土教会领袖兴起，带领多人信主，教会进入黄金时期。

马礼逊去世时，基督徒只有10人。

1906年，马礼逊入华100年后，信徒增长到178,251人。⁶

5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p. 279。

6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中、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85年，p. 101。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基督徒人数发展到150万左右。⁷

非基运动

继1900年义和团事件后，1922年，中国爆发了另一次蔓延全国、且规模更大的反教事件，即非基督教运动（简称非基运动）。

李文森总结，“19世纪中国人反对基督教，是因为她与传统中国相违背（anti-traditional），但20世纪中国人反教却是与现代科学相冲突（anti-modern）。”

五四事件后，社会思潮产生巨大的变化，思想主流信奉理性、民主、自由、博爱、科学等。

1922年4月1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借用清华大学召开第11届年会。3月8日一群上海学生以“非基督教同盟”为名，反对借用中国大学为会址，攻击基督教为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先导，奴役中国人民。中国各大城市学生及知识分子纷纷成立反基督教运动组织，反教情绪高涨。北大五位教授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四、沈士远及马裕藻于3月31日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精神，攻击基督教。1924年，国民党左翼与共产党不断鼓吹反帝思想，非基运动卷土重来，蔓延全国。学校锐减，教堂关门，信徒流失，教士大减。

1922年来华教士最多的一年达8300人，1928年急降至3150人。

抗日战争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报复美国限制日裔美籍人士在美国本土活动，于1942年3月，设立潍县集中营，关押了2008名欧美侨民。

7 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台北：中国福音会，1997年，p. 16。

1945年抗日胜利时，在华外国宣教士只剩下600余人，全国新教教徒只剩下77万人。⁸

撤离中国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第三年，西方宣教士全部撤离中国。

二、中国教会的本土化

自从1907年西方各宗派在上海召开第三届宣教大会，取得自治、自传、自养的本土教会共识后，外国人逐渐淡出中国教会事物。此后二三十年之间，中国本土教会和教会领袖渐渐浮出水面，本土教会成长壮大。

自立教会

中国人较早的自立教会为1862年厦门的“闽南大会”，1881年席胜魔在山西邓村所设的“福音堂”，1906年俞宗周在上海的“中国自立会”。

二十世纪初具有代表性的自立教会有：

真耶稣教会：1917年成立于北京，初期由魏保罗、王彼得、张灵生等领导。1926年在南京建立总部，次年发行《圣灵报》。抗战胜利后，教会约有一千，信徒八万。教义接近灵恩派五旬节会，代表性出版品为《神的奥秘》。

中华基督教会：1918年，刘寿山在山东组“中华基督教会”，以

⁸ 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p. 337。

医疗传道为主。

耶稣家庭：敬奠瀛于1921年在山东省济南马庄设立“圣徒信用储蓄社”，1927年改称“耶稣家庭”，1930年正式成立。1949年近二百处，遍布全国，会友约一万人。被称为“最有共产制度色彩的基督教团体”。今日在济南马庄仍有20几家。

教会聚会所：1922年从家庭聚会开始，初期负责人为王载、倪柝声、李渊如。在上海编印《小群诗歌》，遂以“小群”被称。初期口号为“走出教派，回归圣经”，聚会所早期之文字工作为《复兴报》及福音书房。1949年有七百间教会，信徒超过七万人。

基督徒会堂：王明道设立，1937年在北京建新堂，自传、自理、自养。对受浸的要求严格，从1933年至1949年，受浸入会的只有570多人。⁹

布道团

二十世纪初至抗战期间，是中国教会的布道团时期。具代表性的布道团包括1910年由山东潍县广文学校发起的“中华学生立志布道团”。丁立美为干事，唤起了基督徒学生立志终身传道的心志，团员有1170人，决志传道的有530人。

1911年“湖南逐家布道团”由长沙内地会的葛荫华和萧慕光两位牧师发起，共有团员28人，游行布道，携带单张、小本圣经，逐家分送；五年间，曾进十万七千余家布道。此外，其他地方性的布道团也在各地组成，如1912年广东珠江以南的“河南布道团”，1913年“上海车夫听道处”及“福州旗族布道”，“上海基督徒布道团”，“回民布道”等。

1918年，联合全国基督徒力量的“中华国内布道会”，是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个布道会由云南开始，1922年推广到黑龙江，1923年进到蒙古，将事工由沿海拓展至边陲地区。

9 参考：苏文峰，《中国教会史》讲章，第九课，抗战前后的中国教会，中国自立教会的设立（1931-1949年）。

广为人知的“伯特利环游布道团”，由伯特利教会在1930年组成，计志文任团长，宋尚节、聂子瑛、林景康、李道荣为团员。通常计志文带领团员灵修、查经及白天聚会，宋尚节在晚上及大聚会讲道，其余三人按恩赐负责财务、通讯、记录、领唱、乐器和翻译。1931—1933年三年内足迹达13省，聚会千次以上，听道四十万人，决志信主约一万八千余人。

本土传道人领袖

石美玉（1873—1954）：江西省九江县人，1896年与女同学康成在美国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获医学博士后回国，成为著名女医生、教育家、布道家。1918年，她与蔡苏娟等人创立了由中国基督徒自立的宣教机构——中华国内布道会。1920年，与美国女宣教士胡遵理（Miss Jennie Hughs）在上海组织了伯特利宣教会（Bethel Mission）。1921—1925年，在上海设医院、妇产科护士学校、中学、圣经学院、孤儿院等。她还与著名布道家计志文和宋尚节等人同工，发起并支持伯特利环游布道团。

丁立美（1875—1936）：山东省胶州人，在登州美国长老会中学及大学毕业后，并至滕县华北神学院读神学。1908—1923年间是极杰出的奋兴布道家，对青年学生影响极深，尤其教会学校中因他讲道而决志献身宣教者不知凡几。中国近代著名人物的传记中，常提到他的影响力。简又文说他宣道时“讲辞动人，声泪俱下，感我至深”。谢扶雅说“他的祈祷，词句和声音真是美丽，‘立美’名不虚传。”曾任“学生立志布道团”首任巡行干事，及“云南布道会”的拓荒牧师。1923年起在华北神学院任教八年。最后两年卧病时，以祷告为事工，有三本祷告名册，五千个名字。

贾玉铭（1880—1964）：山东人，民国时代杰出神学家，解经家，出任过多所神学院、灵修院的教授和院长，以1936年创立的“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付出的心力最大。著作等身，1921年的《神道学》，是中国教会第一本系统神学。后来出版《圣经要义》和主编《灵光报》。他与丁立美是齐鲁大学前身“登州文会馆”的同学，两人同工多年。

刘廷芳（1891—1947）：浙江省永嘉县人，集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文学家、神学家、教会音乐家、牧师于一身的教会领袖。他曾任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并组织生命社，1920—1924年出版《生命杂志》，1924—1926年出版《真理周刊》（后合并，称为《真理与生命》月刊），并自办一份《紫晶》的基督教文艺季刊。他一生致力“使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纳入基督真理之中”。1922年在上海首次“中国基督教全国大会”中演讲时，以两句话结束“我们同意见解相歧，但决心彼此相爱。”（She shall teach her members to agree to differ, but resolve to love.）

王载（1898—1975）：福建省福州市人，1921年由海军退伍献身传道，为“自由传道人”、“走方宣教者”第一人。初期常露天布道，随走随传。在大树林或路边，手拿摇铃，身背木箱，发单张，唱诗，说故事，作见证，讲福音。后来与倪柝声、王峙、缪绍训、陆忠信、王连俊等同工配搭，点起了福州复兴的火炬。他在1925年主领复兴聚会，深深影响了后来被神重用的计志文、赵世光、石美玉、周志禹、蓝加溪、胡美琳等，他们成为中国宣教火炬的传递者。1928年后王载常到中国各地及南洋布道，此后四十多年任中国第一个差会“中国国外布道团”负责人。他讲道不超过三十分钟，甚有趣，极感人。他出版了《复兴布道诗》。1975年其弟王峙在他的葬礼上说：“主拯救他、主选召他、主使用他、主保守他”可说是他一生的写照。

宋尚节（1901—1944）：福建省莆田县人，是三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奋兴布道家。他父亲宋学连是美以美会牧师，宋尚节少年时期已协助教务，甚至主领晚间礼拜。1926年在美国Ohio State University得化学博士学位。1927年2月10日在纽约协和神学院读书时，经历圣灵浇灌，成为他“灵性的生日”。1927年11月回国，次年开始在闽南传教，并渐到各地讲道，以“十字架、重生、宝血”等为主题。1931年起专讲“罪”的问题，满有圣灵能力。1931—1933年加入伯特利环游布道团。1934年起独自传道，足迹达全国及海外南洋、台湾。他为主竭尽心力，被形容为“一个两头烧的蜡烛”，被神所重用。

倪柝声（1903—1972）：福建省福州市人，既长于讲道、解经、祷告，又有建立教会，领导和培训同工的恩赐，且文笔流畅。1920年在女布道家余慈度的聚会中悔改认罪，终生奉献。1922年与同工们从家庭

聚会所开始，建立了日后的“基督徒聚会所”。他的信息注重灵命的建造，如“基督的奥秘”、“人的破碎”、“灵的充满”、“基督的得胜”……等。在教会路线上，强调：走出宗派，“一地一教会”，长老治会，福音移民，“交出来”（工人、工作、财物）。重要著作有《属灵人》、《工作的再思》、《信徒造就》、《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等十余种。他的信息和教会路线，对中国教会有极大的冲击，也造成不少争议。1952年4月被捕。1972年6月1日去世。

王明道（1900—1991）：北京人，是近代中国教会基要派神学的发言人和敬虔神学的代表，口讲笔述，抨击教会和社会中的败坏现象，嫉恶如仇，注重信徒圣洁生活。他主张信徒除了读经外，也应“读书、读事、读人”。1925年在家中开始聚会，渐到各地讲道，他以耶利米先知为己任，斥责罪恶和“不信派”。1928年办《灵食季刊》。1937年“基督徒会堂”建成，自传、自理、自养。在教会路线上，强调教会是“重生的团契”，必须真正重生得救，有生活改变的证据。获准认可，方可行浸礼。教会不设诗班，不称“牧师”，不募捐，不传奉献袋，不庆祝圣诞节，不轻易请外人讲道，不参与社会关怀，不赞成教会合一运动，分别为圣，坚持政教分离。五十年代三自爱国运动成立，他因不妥协于1955年及1958年两次被捕，坐牢达23年。1980年获释，1991年7月28日去世。¹⁰

教派合一运动

由于本色化运动及非基同盟的刺激，许多教派在华的组织联合，统一名称。全国信义宗成立“中华信义会”，浸礼宗成立“中华浸信联会”，圣公会成立“中国圣公会”，而监理会、美以美会、循理会、循道会、美道会等合并称为“中华卫理公会”。

10 同上。

校园事工

中国的学生工作，早在1885年已有青年会组织，1896年有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10年山东有中华学生立志布道团。抗战至大陆政权改变前数年，则是中国学生工作发展的黄金时期。

1938年冬，赵君影到昆明，向西南联大的学生作见证。中国内地会宣教士孔保罗夫妇也同时作学生工作，于力工与他们配搭。1944年，赵君影在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布道带起了灵性复兴。

学联会

1945年7月，在重庆南山举办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第一届夏令灵修会，会员来自42个大专院校，169人，以国立大学学生为主。7月22日夏令会闭幕前夕，成立了“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会”），赵君影任总干事。事工迅速发展，各院校的分会有的每主日聚会多至二百人。

1946年1月，学联会在重庆举行第一届冬令会。之后参加的学生很快在华东各大学成立小组，并在校际之间有联合会，如“北平基督徒学联会等”。

1946年6月，内地会艾得理（David Adeney）加入学联会。内地会其他宣教士也受邀到大学工作。

1947年7月，学联会在总会所在地的南京，举办第二届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夏令会，约三百位参加，杨绍唐、赵君影、计志文、贾玉铭和内地会的华福兰会督担任讲员。

学联会的事工，带动许多大学生灵命复兴，委身事奉，约在一百多所大院校有福音工作，也远至内地边疆布道。这些大学生后来成为国内家庭教会的中流砥柱和海外华人教会的领袖。

1951年各大学学生仍可聚会，但仅限在教堂内。后来因不许参加在注册教会以外的任何活动，学联会的团契转为不公开小组聚会。他们是家庭教会的先驱之一。

北京学联会因未正式加入全国学联会组织，所以到1955年还有每

年一次的“学生福音祈祷大会”，直到王明道及一些基督徒学生被捕，学联合会的事工才告一个段落。¹¹

国外宣教

中华国外布道团：中国人第一个向国外宣教的差会，于1929年开创。1928年夏天，来自加拿大在广西宣教多年的宣道会牧师翟辅民（R. A. Jaffray）与中国布道家王载恳谈，建议他去南洋旅行布道。次年王载返国后与翟辅民成立“南洋布道团”，去南洋群岛宣教。1929年9月设总部在广西梧州，后改名为“中华国外布道团”，派林证耶和练光临等牧师去宣教。成立八年后，平均在工场上的宣教士有廿一位之多。到了1955年，该团已有三十余位同工，在南洋各国设立教会，带领极多人信主。

遍传福音团：1941年2月中国内地会、循理会及一些华人教会合作，在西安西凤翔成立西北圣经学院，目的是往回教地区宣教，院长是戴德生的孙子戴永冕。1942年11月15日，副院长马可牧师在祷告中看见中国人“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异象。1943年复活节清晨，西北圣经学院的70多位师生中，有8位蒙召去新疆宣教。5月23日成立了“遍传福音团”（The Chinese 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stic Band），马可任团长并主编《遍传福音团报》，宗旨是开拓西北七省及西北七国，从西北开始，沿丝路经阿富汗、伊朗、阿拉伯、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巴勒斯坦等回教国家，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1944年起福音团的几位同学先后差派去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西藏、新疆，建立教会或协助当地教会。1948年因内战，马可及15位中西同工迁去重庆。1950年代新疆被中共统治后，事工便停滞了。¹²

西北灵工团：张谷泉（原名张式彭），于1945年山东滕县华北神学院毕业，在华北、西北作游行布道、培灵事工，并与李石瑛在山东潍

11 同上。

12 参考：王瑞珍，《神国侠侣—西域宣教传奇》，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3年。

县设立灵修院。1946年当灵修院全体禁食祷告时，圣灵说：“要为我分派某某两人去新疆，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于是差派这二人出去，抵达新疆哈密。1948年，全校禁食祷告时，圣灵感动张谷泉放下灵修院，带领全部师生及家属，离开家乡往新疆去，于是西北灵工团共115人到达新疆哈密。灵工团的刊物《西北灵工》第二卷第一期的卷头语中，曾写明“我们的道路在祖国的边疆——新疆和西藏。我们的道路也在祖国的西方——印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阿拉伯、巴勒斯坦。这些地方是神托付我们所要走的道路，是他划给我们工作的地界。”他们亲手盖建了八间礼拜堂，信主人数约三百人，其中大部份原是回教徒。1952年张谷泉等被捕，1956年9月23日死于乌鲁木齐狱中，刘德明、石新民、文沐灵等相继殉道。

西北灵工团主要同工赵西门于1951年4月9日在疏勒被捕前夕写了《十字架归路》。这首诗歌，代表了许多本土教会领袖和殉道者的心志：“认定十架的血路，这是我唯一归途……我愿流血秦国道，不愿偷生在斯土。”

第二部分

大光普照在人间：社会影响

西学东渐：千年一觉，中国醒来！

千年一觉，鸦片战争的炮火，将中国人从与世隔绝的沉睡中惊醒，古老的中华民族进入数千年未曾有过的变局。

清末，随着条约的签订，西方人得以入华传教。千万名宣教士带着十字架，进入沿海，深入内地。他们在文字、科技、教育、医疗、体育、慈惠、制度和风俗等各个社会领域，引入西学，启蒙大众，在近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其实，几个世纪前，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西方宣教士已经带来西学，明朝重臣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欣然接纳。明末，西学东渐已经初见成效。

开眼看世界。中国，从固步自封的千年陈规中走出，在一道天光下，踏入一个崭新的天地。

西学范畴

林乐知把西学归结为“一是神理之学，即天地、万物本质之谓也；人生当然之理，即诚、正、修、齐、治、平之谓也；一曰物理之

学，即致知格物之谓也。”

然而，当时的中国人对西学的理解非常狭隘。在洋务派看来，西学不过是可以富国强兵的坚船利炮。在早期改良主义者眼里，西学也仅仅是“形下之器”，即“西艺”。张之洞称西学为“应世”之学。直到梁启超把西学分为“政”、“教”、“学”，即社会科学、神学和自然科学三部分，神学才被包括在内。

东渐过程

明末清初，天主教神父们曾经极力推介西学，介绍天文历算、地图学说、钟表等科技新知，以博得居留中国的权利，争取好感，以利传教。

鸦片战争后，中国大门初开，中西文化的接触最初表现为基督教传入，因此神学及与神学有关的哲学知识最早传入。

60年代后，洋务派把西方兵工技术视为自强的良方，于是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成为宣教士进入洋务机构的敲门砖。

80至90年代，社会改良和维新思想兴起，改良派鼓吹改革中国经济、教育和政治制度，并向西方寻求可以借鉴的资源，宣教士开始译介西政、西法以满足这种需要。

世纪之交，变法失败，部分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政改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社会文化心理基础，必须改造国民，改变国民精神和价值观念。

到清末民初，大量留学生回国，中西文化交流渠道日益增多，宣教士开始丧失作为西学主要传播者的地位。于是，大多数宣教士回到福音布道这一出发点上。

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宣教士对西学传播经历了从神学和哲学，到科技、经济、法律、政治、社会学说，最后回到神学的历史过程。

历史帷幕

16世纪，欧洲风云变幻，政教之争，疆土之争，宗教之争，西方社会的发展在新旧交替中交织进行。

1517年马丁·路德宗教革命后，基督教形成新的布局。欧洲南部以天主教为主，北部以新教为主。

1539年耶稣会建立，显现空前的活力和纪律性，耶稣会士如同士兵，随时准备应召到世界各地传教。

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航海大发现在客观上使大批西方宣教士东来成为可能。

经过文艺复兴三个世纪的洗礼，到19世纪末，新加尔文主义（By Dutchman Abraham Kuyper, 1837—1920）神学思想崛起，坚信上帝的作为无所不在，人得救的标志包括现实事业的成功。新神学的宽容精神、对理性的尊重、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强调、对世俗成功的追求，自由和平等观念成为现代化的一部分。神学理论的变化导致传教政策和方法的改变，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同时，新教与现代科学趋于调和。1897年《广学会年报》称：科学没有宗教会导致人的自私和道德败坏；而宗教没有科学也常常会导致人心胸狭窄和迷信。真正的宗教与真正的科学是互不排斥的，他们就像一对孪生子——从天堂里来的两个天使，充满光明、生命和欢乐来祝福人类。

同年，著名宣教士神学家詹姆斯·丹尼斯发表《基督教传教事业与社会进步：海外传教运动的社会学研究》，提出传教运动的目标是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及消除传统社会的罪恶和传播西方社会的新理想。

19世纪末，学生志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崛起，大批年轻人投身传教，海外宣教的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20世纪初，传教运动的目标从单纯的拯救个人灵魂转而强调建立“基督教化”的社会秩序，用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

半个多世纪的传教经历使宣教士深刻意识到，基督教社会与非基督教社会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方面的差异是传教运动的障碍。因此，改造中国社会，以建立有利于福音传播的社会与文化环境成为宣教士努力的新焦点。教育、出版、医疗、慈善等间接布道方式基本上获得传教团体的认可。

19世纪90年代后，晚清接受并鼓吹西化，特别是以美国为榜样进行改革，对晚清政局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西学载体

受过良好教育、具有牺牲精神、长期居住在民间的西方来华宣教士成为西学东渐的渠道。

宣教士作为文化载体，在欧洲有深远的传统。中世纪时代，教育几乎成为神职人员的专利。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神职人员享有无尚的尊敬与权威。

直到近代，在西方各国，牧师等神职人员仍是民众在精神和道德生活方面的导师。神职人员必须受过与其身份相符的教育。根据美国宣教士卫三畏1855年7月统计，此前来华的110名美国宣教士中，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23人，占总数的20%多。在1895—1905年美部会派来的103名宣教士中，男性宣教士中只有2人未上过大学，有9人是医学博士。当时美国大学毕业生比例只占男性人口的1%。这些人来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不仅在教育水平上比同等家庭背景出身的年轻人高得多，而且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良好的道德修养。

1865年戴德生建立内地会后，各种教育层次的宣教士加入，女传道大量参与。

1850—1880年，英、法、德、美等国实现女子高等教育平等权。来华的教会西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女性。1903年，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报道，耶稣教东方传道者男女共2950人，男1233人，妻868人，单身女士849人（妇女共1717人）。1876年，来华女宣教士占49.8%，1905年达58%，1920年则达63.3%。¹³

据1920年统计，共有7000多宣教士在华，扎根民间，大激情、大规模、大果效，传福音、办教育、建医院。¹⁴

宣教士的道德标准、极大热情、文化素质和活动能力，成为西学传播活动的重要前提。

13 郑永福、吕美姬，《近代中国妇女生活》。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p. 218、209。

14 梁家麟，《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香港：天道书楼，1979年，p. 128。

西学先驱

中外历史长河几经惊涛骇浪，个人荣辱随之沉浮。

天主教先驱意大利人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于1582年来华，在华28年，与徐光启、李之藻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同文指算》等科学著作，开始将西学摊开在中国人眼前。明朝科学家李之藻叹：西方人传入的历算、仪像、日轨、医学、格物穷理之类的书，是我国一向所没有的，这些书“有资实学，有裨世用。其道使人心归实，虚骄之气潜消。”

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于明万历38年（1610年）初次来华。4年后，到罗马募集7000册图书运抵中国，并为中国传教招兵买马。他还用中文写了《西儒耳目资》（音韵学）。

1618年4月16日，金尼阁携同22名神父登上“善心耶稣”号远航船前往中国。这艘船上，有一位利玛窦强有力的后继者——德意志耶稣会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汤若望在华40年，制炮，修历，掌执钦天监，用西学作为传教先导，为传播其信仰开道，一生未再返故土。

明史记载：崇祯中，议用西洋新法，命阁臣徐光启、光禄卿李天经，先后经办其事，成《历书》一百三十余卷，多发古人所未发。汤若望著《崇祯历书》（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西洋新法历书》、《望远说》。《主制群征》提供人体解剖学知识，是有关西方医学的最早信息之一。

与汤若望同船的德国耶稣会士邓玉函（Johann Schreck, 1576—1630）是伽利略的朋友，精于天历、医学、生物、著述。1629年，经徐光启推荐在历局任职，与中国官吏学者王征共同完成《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他是第一个把天文望远镜带进中国的人。

比利时耶稣会传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于1659年抵达澳门。他在鲁汶大学期间，系统地接触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尤其是逻辑学和哲学体系，并通过宇宙论的学习，掌握了天文学、数学、历法计算、地理等多方面的知识。1660年受召前往北京协助汤若望

神父，后接替汤若望，被授以钦天监监副，曾铸造红夷炮助清帝国。

明朝奉教之士有瞿太素、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李天经、王征、瞿式柅等著名人物。耶稣会士在明廷备受礼遇，建堂传教，广布福音，跻身儒林，与中国儒士共译西方经典，此乃是西学东渐的肇始。

调整初衷

19世纪初，25岁的首位新教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于1807年踏上中国国土，开启了福临中华的新纪元。

基督教士来华的初衷是传播基督教，使异教徒皈依上帝，并不负有传播西学的使命。他们的真正使命是改变中国人的异教信仰，以及与信仰相关联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即整个生活方式。

然而，不少宣教士来华后才发现，直接布道效果甚微。马礼逊在华27年间，才得十个信徒。自1807年马礼逊来华后90年间，才得55093信徒。他们觉察到，中国传统信仰、伦理和价值观是阻扰基督教传播的巨大力量，欲改造中国人的信仰，必先改造中国文化，必须深入知识阶层，通过文化和教育活动，创造一个有利于基督教传播的社会环境，改变士大夫对基督教的看法。

同时，中国社会对西学的渴求，以西学塑造中国未来走向的前景，使部分宣教士决心选择通过传播西学，来改造中国文化和社会，并最终实现“中华归主”的目标。从事社会文化与教育活动既是他们影响中国社会的手段，也是顺应中国社会潮流而作出的明智选择。

美国宣教士林乐知于1864年加入上海广方言馆担任西学教习，后来成为重要的西学启蒙者。李提摩太于1870年因华北五省旱灾救灾工作，结识了政府官员，决定通过协助中国西化来改良福音土壤。丁韪良、花之安等人皆是在中国一段日子后，才改变他们的传教方向的。

不少宣教士直接加入中国政府的洋务机构。丁韪良任同文馆京师大学总教习前后共29年，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任职28年。一些协助宣教士的中国人，都成为第一批近代科学家，如徐寿、徐建寅、华恒芳、应祖锡等。

晚清倡导西化改革最得力的宣教士，来华之初都是投身于布道工

作，他们的转变与其说是受欧美思潮的影响，不如说是受中国经验引导反省的结果。

西学动力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提出，近代中国历史就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而推动中国走向现代的力量来自西方。

考察宣教士在华活动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不难看到，宣教士从事的文化教育活动传播了近代西方文化，触发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基督教和宣教士的活动唤醒了沉睡和停滞的中国，是促使她迈向现代化社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认为，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伟大而重要的作用，他把宣教士称作“现代化的前驱”，他们对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英法联军战败中国以后，深感西方船坚炮利，势不可挡，朝廷重臣奕訢、文祥、封疆大吏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宣教士的影响及实质帮助下，力主展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模仿西法运动，追求船坚炮利。这是中国人吸收西学的内部动力。

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在宣教士主持出版的《万国公报》等不断开导启蒙之下，中国终于逐渐明白，只凭船坚炮利不能成事，尚需在制度层次、思想层次上有所改变，才能清除沉疴、步向康庄。从而，爆发了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戊戌维新变法，企图改变政体；以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希望从根本上改变国体。在制度层次上的现代化努力中，李提摩太、丁韪良等宣教士扮演了重要的媒介角色。

西学层面

宣教士在文字、教育、医疗、体育、慈善等各个社会领域，引入西学，启蒙大众。

利玛窦称文字为“沉默的福音”。李提摩太主持的广学会出版

物，包括林乐知编辑的《万国公报》、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以及傅兰雅等人翻译的科学译著等，成了唤醒民智的号角。

自1820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开办第一所西式学堂以来，教育与传教并肩而行，成为传教的有效辅助工具。基督教更带来西洋教育制度，介绍给中国一种新的道德和精神气候，成为造就新中国领袖的肥沃土壤。

医疗方面，自首位基督教医生伯驾在广州设立第一所医院开始，宣教士效法耶稣基督，在拯救灵魂的同时医治病患，建立了无数医院和诊所，治病救人。十字架至今仍然竖立在每一座中国医院，成为救恩的印记。

在社会改良方面，宣教士更是一马当先，举办社会赈灾、禁止鸦片贩卖、主张一夫一妻、扫除纳妾蓄婢、提倡妇女解放、推广天足运动、引进体育项目、设置盲人院、聋哑学校、孤儿院等，将基督的爱生活化，赋予基督教以一种社会意义。

西方现代社会的知识、观念、规范和制度传入中国，诱发了近代中国人寻求变革的意识；教会学校和传播媒介，有助于科学、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的推广和形成，刺激了改革派的崛起；输入初具规模的西学体系，为近代中国现代化提供具有示范意义的参照模式。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每一个步骤，近代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和心理等方面不断摆脱传统势力影响，不断追求变革，为拯救民族危亡和争取国家富强的进程中做出选择。部分宣教士直接参与改革运动，并参与了某些具体改革方案的筹划、制定和实施。

西学目的

花之安的《自西徂东》“欲有惊醒中国人”。然而，他感叹：中国人却“失其要，徒得西学之皮毛，而不得西学精深之理，虽学亦无甚益耳”，中国“未得西国至善之道也。”

冲突回应

为了解除顽固派士大夫的心理障碍，丁韪良提出“西学中源说”：“所谓西学者……其本源出于东方……算学本于埃及，天文本于巴比伦，皆有希腊人而西传焉。”

宣教士对中国传统制度、价值体系和政治权威作出挑战，中国民众和士绅对这些挑战作出了正负两面的回应。

宣教士看到，科举制度不仅缺乏以求知为本位的学术传统，而且不鼓励创新。特别是宋明之后，芸芸学子皓首穷经，所做不过是体会和诠释圣贤的微言大义。思想稍有别于圣学经义，即被认为离经叛道，受到严惩。其结果是，传统经学成为没有丝毫创新的僵尸式学术。宣教士屡屡声言，科学发展的关键不在博览群书，而在于即物求理，不从古说。

近代科技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科学理论。特别是，科学方法论走在技术进步前面，指导着技术发明。中国在技术上始终停留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实验工艺水平上，原因是缺少西方那种独立的、系统的、完备的自然科学理论体系。而洋务派却恰恰无视西方科学理论，对工艺技术孜孜以求。

宣教士带着西方文明来到中国，直接触犯了绅士阶层对文化的统治；宣教士自居教师身份，打破了儒生对知识和文化的垄断；宣教士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对政府官员的声望和权威提出挑战；宣教士反对祖先崇拜和民间偶像崇拜，不仅冒犯了上层社会，而且冒犯了所有中国人。如此种种，加上西方的炮火和不平等条约，引起了中国人强烈的排外情绪。

宣教士深入中国乡村和基层，不仅试图改变中国文化，而且试图改变中国人的灵魂和信仰，从而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构成最直接、最深层的冲击，激起了中国人最强烈的反应。

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因着宣教士的来临，中国终于睁开了眼睛，开始走入一片从天而降的光明之中。

光照中华：清末民初宣教士在教育、文字、医疗、
慈善方面的贡献

你们是世界的光。——马太福音5：14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度，前景无比美好。我很庆幸能有机会为她迈向辉煌做了我所能做的事情。信奉上帝的基督教会注定会在这个地方经历无数次的磨难后取得最终的胜利。”——1906年11月27日，中国山东，登州，狄考文博士写给詹姆斯穆尼（James Mooney）的信¹⁵

1807年，第一位基督教宣教士，25岁的英国青年马礼逊踏上中国，翻译第一本中文圣经，编纂第一本英华字典，建立第一座教堂、开办第一间学校、设立第一所医院，印刷第一份刊物，为第一位中国人施洗，按立第一位中国传道人。

大光，终于照临这片古老而坚硬的土地，遍满全地，光辉烈烈。

十九世纪中叶，随着鸦片战争的炮火，大批西方宣教士踏着马礼逊的足迹涌入中国。至1949年，千万名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带来十字架的同时，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参与者和同道者，他们在中国各地建教会、办学校、设医院、启民智，兴改革，播撒爱的种子。如同道道金光，射进黑暗，身后，留下一片光明。

15 丹尼尔·W.费舍（Daniel W. Fisher），关志远等译，《狄考文传：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p. 197。

兴办教育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燕京大学校训

100年的翻转

21世纪初，全中国13亿人口中，接受大学教育的近五千万人。全国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今天，中国留学人数近40万，为全球第一。

谁能想到，仅100年前，美国宣教士李提摩太于1891年上任同文会时所做的调查显示，近四万万人口的大清帝国，有阅读能力的人仅得四万四千名，不到中国人万分之一。¹⁶

今天，全中国高等院校达2000多所。国家教育部发文欢呼：“高等教育：走入寻常百姓家”。

仅100年间，何以产生如此巨大的翻转呢？

从3个穷学生开始

1817年，马礼逊来华10年后，与同工米怜在马六甲开办了第一所华人学校“英华书院”。开始，只有三个穷学生。

十年后，1828年，马礼逊按牧的第一位中国宣教士梁发与少年古天青在本乡办了一个私塾，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更正教的教育机构。

又过了十年，1839年，德国宣教士郭实腊夫人，英国人温施蒂（Wanstall）同应邀前来的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包留云（布朗，Samual Robbins Brown），在澳门创办“马礼逊学堂”，包留云担任校长。这是中国本土第一所西式学堂，仅6个男生，其中就有第一批留学美国的容闳、黄宽、黄胜。

16 顾长声，《欧风美雨袭中华：推动中国走出中世纪的十二个西洋人传略》。加拿大：长青文化公司，2001年，p. 152。

此后，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矗立起六千多座教堂，几乎每一座教堂附近，都有一所教会学校。据统计，到1918年，仅一百年间，基督教学校发展到7382所，学生达21万多名。¹⁷

刘少奇于1949年7月4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仅仅英、美两国，在中国设立的专门学校与大学校就有卅一所，神学院卅二所，图书馆廿九所，文化团体廿六个，中学校三百廿四所，小学校二千三百六十四所。”¹⁸

西方教育渊源

西方宣教士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创者和示范者决非偶然。自古以来，基督教就有传递文化种子的传统。西方教育的萌芽，是从古代修道院图书馆和抄经室开始的。到中世纪，大学在欧洲兴起，校园活动无一不与教会活动紧密相关。

著名的哲学家、改革家、科学家常常同时又是虔诚的基督徒，譬如，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哲学家培根、博思卡尔，科学家开普勒、伽利略、波义耳、牛顿等都是基督徒。

著名教育家、教师、教育改革家许多是宗教界人士，譬如，阿尔琴、卡西奥多鲁斯、伊西多尔、马丁·路德、夸美纽斯等。他们一方面将传经布道作为毕生奋斗目标，另一方面又长期孜孜不倦地从事教育活动。

起初，受教权只属于贵族以及神职人员。17世纪，捷克基督徒教育家夸美纽斯最早提出普及6年初等教育。因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极力提倡，强迫义务教育于17至18世纪在德国首先达成。到18世纪末，英国已具备小学、中学和大学完整现代教育体系。

17 王忠欣，《中国教会学校纵横：启蒙与造就》。加拿大：恩福协会，2000年，p. 126。

18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12页。参考：《新中国成立初期清除美国文化影响的经过》杨奎松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yangkuisong/detail_2012_04/14/13888680_0.shtml)

19世纪初，当大清帝国热衷于八股试帖、开科取士、读书做官的时候，英、美、法等国家已经相继实施公立学校制度。到19世纪中期，美国女子学院开始出现，高等教育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耶稣送来了精兵

1888年，戴德生在北美带领14位勇敢的宣教士到中国内地，八位女士和六位男士。启航时，一位与女儿离别的父亲含泪说：“我没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可以献给我的主耶稣。他要求我把最好的献上，我就全心把我最好的献给他。”

十九世纪末，著名美国宣教士穆迪发动学生志愿运动。本着“世界福音化在我们这一代实现”的信心，于1886年至1919年期间，向世界各国派出8140名宣教士，其中2524人去了中国。¹⁹

1895—1905年美部会派来的103名宣教士中，男性宣教士中只有二人未上过大学，有九人是医学博士。当时，美国大学生仅占当时同龄人的百分之一。

耶稣为中国送来了精兵。

胡适说，“当年来的宣教士至少必须有两种资格：第一，要有非常深挚的宗教信仰；第二，要有百折不回的牺牲精神。没有很强的宗教信仰，他不肯来；没有很坚决的牺牲精神，他不敢来。”

宣教士的道德标准，极大热情，文化素质和活动能力成为西学传播的重要前提。更重要的是，他们用爱，这一世界通用的言语，传递着来自上帝的光明。

恰逢其时，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清政府被迫允许宣教士进入内地建教堂，办学校。大批受益于现代西方教育的宣教士来到中国，遍布各地。他们在教育领域，成就了三件新鲜的大事：输入科学、兴办女学、建立学制。

19 王忠欣，《中国教会学校纵横：启蒙与造就》。加拿大：恩福协会，2000年，p. 97。

输入科学

宣教士很快发现，中国的科举制度“举而不用，用而不举”，儒术和八股与社会需要脱节。美国宣教士香便文大声呼吁：中国要重新回到世界先进民族的行列，就必须完成思想革命，而思想革命的完成，则有赖于宗教与科学真理的传播。

中国有识人士在西方船坚炮利和不平等条约的刺激下，不得不睁眼看世界。科学渐渐被输入中国的教育体系之中。

1866年，清末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京师同文馆（北京大学前身）增设了科学班。

1869年，美国宣教士丁韪良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职位，立刻加强科学课程。

1876年，英国科学著作翻译家傅兰雅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科技学校“格致书院”。²⁰

1888年，同文馆兴建物理实验室大厦，并建造观星台，上设仪器，且专设格物一席，逐渐奠定科学研究基础。

1904年，美国宣教士教育家狄考文编纂《笔算数学》、《代数备旨》等，成为当时中国初办学堂的数学教科书。

其实，西学东渐早在16世纪中叶明朝就已经开始。天主教神父利玛窦与皈依上帝的明朝大学士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理》，《同文指数》等现代西方科学著作，为后人留下了基础科学和一系列科学词汇：地球、北极、南极、赤道、地平线；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角、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面积、体积；复制、古典、仪器、推理……

今天，这些科学词汇对于中国人，如同米粒一般平常。

科学中有救恩。美国宣教士库思非说，“一个无知的、迷信的、偶像崇拜的、被践踏蹂躏的民族，几乎不能保证起码的生活舒适，以使它的灵与肉结合在一起。每一种能够改善他们境遇的力量，难道不应当

20 格致，即“格物致知”的简称，《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穷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

被看作是一种博爱吗？”

宣教士谢卫楼更加精炼：“教育就是传教。”

兴办女学

事实上，教育是中国妇女走向救恩的一条有效途径。

论及妇女，胡适曾经这样说：忽然从西方来了一些宣教士，他们传教以外，还带来了一点新风俗，几个新观点，不少新教训，其中最大的一点是，教我们把女人也当人看待。

圣经诗篇说：我们的女儿如同殿角石，是按建宫（殿）的样式凿成的。（诗篇144：12）

《万国公报》主编林乐知看到中国“不令妇女读书”，使“全中国大半之人（国中妇女居其半，益以小孩，是居大半也）”“尽成废物”。他痛心疾首地问道：“夫男，人也；女，亦人也”，“何致出此下策？”²¹

林乐知等认为，教化衰弱之源就是不释放女人，不提拔女人，不教养女人。凡不先将女人释放提拔而教养之以成才，决不能有振兴之盼望。变法必须从“兴女校、劝女学”开始。1903年，林乐知著《全球五大洲女俗通考》（*Women in All Land*），以妇女地位的高低为文明与兴衰的指针，作各国文化的比较研究，共10集，皇皇21册，为广学会40周年统计最畅销的九种书籍中名列第二。

改革家梁启超，曾任李提摩太私人秘书。他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教育，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

确实，兴办女学从宣教士踏足中国即已开始。

1825年，英国妇人Miss Grant 在新加坡设立首间华人女子学校，是为中国女子受新教育的起头。²²

21 林乐知，《论中国急需设置幼儿园》，《万国公报》。华文书局影印本，第38册，1905年10月。

22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59年，p. 271。

十年后，1834年，郭实腊妻子温施蒂（Mary Wanstall）在澳门开办了一所女子私塾。²³

又过了十年，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派遣艾迪绥小姐（Miss Mary Aldersey）在宁波创办第一所女塾，这是中国本土最早设立的教会女子学校。²⁴

美国圣公会宣教士裨治文夫人格兰德女士（Eliza Gillette）于1850年在上海设立“裨文女塾”（也称裨文女书院，后改称裨文女子中学，又称培文女子高中，今方斜路西林后路102号，现上海市第九中学）。有一天，这所学校迎来了一位罕见的大足女孩，名叫倪桂珍。这姑娘便是皈依基督的明朝大学士徐光启的后代，宋氏三姐妹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的母亲。她的丈夫，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嘉树，曾是一位牧师。

据宋美龄回忆，母亲常常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她的虔诚深深地影响了子女们，“在母亲看来，祷告上帝不仅仅是请求他祝福她的子女，乃是等候他的旨意。对与她，宗教不是单行道。她按照他的箴言生活，公正行事，爱慈悲，谦卑地与他同行。”²⁵

宋氏三姐妹就读林乐之于1882年在上海创办的中西学塾。必修课程除英语、算学、圣道外，还有动物、植物、天文、化学等格致课程，选修课则有西洋音乐等。每日早晚与礼拜日，学生必须敬拜天地主宰，以及咏读圣书。这所女校成为后来中国人自创学校的典范。1920年，由中国派赴美国留学的29名女学生中，有13人出于中西女塾。该校女校毕业生大多走上社会，从事文化和教育工作，成为医界、学界、著作界、慈善界的先行者。

与中西学塾齐名的有圣玛利亚女校（后改称“圣玛利亚女书院”），于1881年，由曾创办圣约翰书院的美国圣公会施约瑟主教将两所女校改组创立。首任校长是后来和圣约翰校长卜舛济结婚的中国牧师的女儿黄

23 金维新，《留美拓荒人》。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4年，p. 2。

24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p. 557。

25 宋美龄，《祈祷的力量》。台湾，《读者文摘》，1955年第7卷第4期。

素娥女士。早期办学目的是“使她成为贤妻良母”。其标准是：信仰基督，并能履行日常的宗教礼仪；学会必要的家事训练，如育儿、厨事和美化家庭；掌握基本西学知识，如笔算数学、西方史地知识，并熟知儒家经典。

教会女学创办半个世纪后，在梁启超、经元善等人的倡议和筹办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官立女子学校“上海女学堂”（又称经正女学）于1898年成立。女子受教育的权利迟至1907年才得清政府承认，只限于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

1905年，基督教宣教士在北京东城灯市口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大学——华北女子协和大学。这所大学的前身是贝满女塾，由裨治文夫人创办，最早的学生是穷人家的女孩和街头乞丐女孩。这些女孩后来成为杰出人才，包括著名作家冰心、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丁淑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李德全等。

另外两所女校也成绩斐然，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产生了首位中国女校长王世静。1915年建校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培养出中国教育史上首批获得学士学位的女大学生。

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司徒雷登创建的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学生的大学之一。五十年代初，燕京大学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

据《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记载，到1922年，在教会学校学习的女生，总计62970人。²⁶

女子学校的建立，打破了古老中国的千年禁忌，为女子开辟了新天地。

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在1906年的著作《古老帝国的觉醒和重生》中预言，“在不远的未来，中国青少年所受的教育将会从母亲的膝盖上开始。”

今天，无数年轻的母亲正在见证这个预言的实现。

26 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北京：教育出版社，1987，p. 15。

建立学制

李提摩太曾向李鸿章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每年拨出100万两银子，着手教育改革。对于这一建议，李鸿章回答：中国政府支付不起这么大的数目。李提摩太说：这是“种子钱”，将来会得到上百倍的回报。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看到回报？李提摩太答：需要20年的时间才能看到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李鸿章摇头：啊！我们可等不了那么久。

义和团排外失败，引来八国联军，慈禧太后终于醒悟，中国需要改革，改革要从教育开始。1901年太后上谕，命令改革考试制度。9月，命令全国所有书院都改为传授西学的现代学校，又派遣有才能的年轻人去外国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

20世纪初，传教运动的目标从单纯拯救个人的灵魂，转而强调建立基督化的社会秩序。通过文化教育，用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注入上帝之灵。

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说：我们的学校和大学是设立在中国的西点军校。我们的教育机关，正在训练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他们在将来要对中国同胞产生巨大和最有力的影响。

西方宣教士带着极大的热情办学，教会学校迅速增长：

1818年，1所学校（英华书院）

1842年，50所（鸦片战争前）

1877年，347所（第一届全国宣教会议）

1899年，2000所（义和团教案前）

1919年，5637所（五四运动/中华归主运动时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77年在华宣教士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大会中，决议成立教科书委员会，为教会学校编写并出版教材。由林乐知、傅兰雅、狄考文、丁韪良、韦廉臣，黎力基等人负责，编写出版了59种，约三万册教科书。教科书委员会后来发展成中华教育会，领导中国教会教育事业的发展。

20世纪头十年，各差会兴起联合办学的热潮，教会学校的规模和水平大幅提高，进入正规化和世俗化，形成小学、中学、大学完整的教育体系。

教育，让中国民众对宣教士和基督教另眼相看。广学会的报告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宣教士与各地知识阶层之间的友谊代替了传统的憎恨和敌对”，一时间，请宣教士帮助办学的人络绎不绝。

一位宣教士激动地描述道：一个新纪元的序曲奏响了。……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国立学校，学校里挤满了求学的少年。他们接触到西方思想的奥妙，与此同时，过去中国人从不了解的大陆，现在也开始呈现在他们面前，使他们吃惊地睁大眼睛。那些曾经容纳过一万考生的巨型科举考试大厅，现在已被遗弃，孤零零地呆在一旁。辉煌已过，大门在风中时开时关，巨大的蜘蛛已在房梁上安家织网了。

中西接轨

中国大学教育比西方晚了几个世纪。由于教会大学的出现，中国古老的教育有了转机，并逐渐与世界接轨。

狄考文于1877年在登州创办的小学蒙养学堂，发展成中学文会馆，于1882年发展成中国第一所大学，就是后来的齐鲁大学。

在南方，最早的基督教大学是圣约翰书院，由美国圣公会的施若瑟（Samuel I. J. Schereschewsky）于1879年开建，1890年在美国注册。

教会在中国所办的最早的五所大学是：

1882年，山东登州文会馆

1888年，北京汇文书院

1889年，北京潞河书院

1890年，上海圣约翰书院

1897年，杭州长老会学院

基督教创办的著名大学有：

北京 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主园——燕园）

上海 圣约翰大学（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 沪江大学（上海理工大学）

南京 金陵大学（南京大学）

南京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南京师范大学）
济南 齐鲁大学（山东大学西郊区）
江苏 东吴大学（江苏大学）
杭州 之江大学（浙江大学西溪校区）
成都 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武昌 华中大学（湖北中医学院）
长沙 湘雅医科大学（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广州 岭南大学（中山大学）
福州 福建协和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
福州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

天主教创办的大学有三所：

上海 震旦大学（合并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
北京 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学院辅仁校区）
天津 津沽大学（河北大学）

每一所学校的开始都是那么的卑微。北京汇文书院于1870年开办时，只有三个男孩入学，作为他们上学的代价，每天付给他们一碗米。

教会大学的办学经费多由西方宣教士从他们自己家乡教会里一元一元筹集而来。当时，他们自己家乡的孩子们也不见得上得起大学，可是虔诚的子民们顺服了上帝的召唤，爱邻人胜过爱自己，为了将上帝的救恩带给远方不认识上帝的人们，他们不仅献上自己的儿女，献上虔诚的祷告，而且献上自己的金钱。

出钱，出人，出力。狄考文一家四个兄弟都在中国宣教。

庚子赔款

义和团运动后，英国宣教士李提摩太用庚子赔款创立了山西大学堂，即今日山西大学。各国亦多效法，均将赔款退还，用于教育、医疗、图书馆、留学等方面。

在美国宣教士明恩溥等人的推动下，罗斯福总统给国会提交了一

个谕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谕文，将偿付美国庚子赔款所得的半数，共计1160余万美元，退还给中国，作为遣送留学生赴美之用，每年派100名学生赴美留学，直到赔款退清为止。美国退还的赔款创办了清华学堂，亦名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改名清华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原纽约州巴塔维亚市的一个图书馆馆长，美国人韦隶华（Mary E. Wood），于1924年，用庚子赔款使她在武昌创办的公用图书馆“文华公书林”，成为中国最早的美式公共图书馆，图书由几百本发展到几十万册，藏书由一间房扩大成一座楼房。1920年，发展成著名的文华图书专科学校，是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培养了中国最早的图书馆人才。

平民教育

教会除兴办大、中、小学，进行正规教育外，还致力于扫盲。

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于1943年5月，与爱因斯坦等被膺选为当代十位拓荒科学家。

身为基督徒的晏阳初，是四川巴中人，少年时在内地会创办的教会学校读书，毕业后到香港圣保罗书院（香港大学前身）就读，后转往美国耶鲁大学。

1920年，晏阳初回到中国，立志不做官，不发财，将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他首先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他和农民共同生活，共同学习，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编写《平民千字课》，筹资组建了200所平民学校，先后招生2500余人，在长沙实验的全国识字运动，使400—500万农民脱盲，是平民教育理论的第一次大规模实验。

文字启蒙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开篇，Word和道是同一个字。文字，被马礼逊称为“沉默的福音”。

圣经翻译

1807年，马礼逊带着在大英博物馆里手抄的一份中文圣经（原题为Quartuor Evangelia Sinice，即《中文四福音》）来到中国。这本中文福音书是早在1737年有人在广州抄得，并赠与皇家学会会长史隆爵士的（Hans Sloane, Royal Society）的稿件，包括四卷福音书、使徒行传及保罗书信的中文译本。在此基础上，马礼逊花了12年零三个月，于1823年出版了与同工米怜一同翻译的《新旧约全书》，取名《神天圣书》。

从此，基督教教义开始完整地在中国流传。

种子已经播下，星火已经燎原，上帝的祝福通过话语临到了中国。

刊物出版

宣教士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开始出版刊物，运用文字启发民智。

1815年，英国宣教士米怜在马六甲刊印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

1823年，英国宣教士麦都思在巴达维亚创办第一份活版铅字中文月刊《各国消息》。

1832年，美国宣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第一份英文期刊《中国丛报》。

1833年，德国宣教士郭实腊在广州创办第一份中文报纸《东西洋

考每月统纪传》。

1834年，英国宣教士台约尔（戴德生岳父）在新加坡创制华文活版铅字改进木刻雕版。

看来是机缘巧合，却有上帝的美意，一些基督教领袖因着环境的变迁，开始在文字上大显身手。美国宣教士林乐知于1860年来华，南部监理会因美国南北战争无力支持宣教士，一家生活陷入困境，不得已，于1864年加入上海广方言馆，担任西学教习，后来加入广学会，成为《万国公报》主编。他24岁来华，在华47年，成为重要的文化启蒙者。

1870年，美国宣教士李提摩太25岁来华。因华北五省旱灾救灾工作而结识了政府官员，他认定协助中国社会的改革是福音救中国的重要途径，在华46年期间，主领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广学会，成为西学东渐的领军人物，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变法维新。

香港《中国邮报》编辑问康有为从哪里得到关于西方的知识和变法的启发，康有为回答：“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宣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

《万国公报》就是广学会的出版物之一，为19世纪由宣教士主持、以传播西学为目的、影响力最大的的刊物。

康有为不但是《万国公报》的读者，还曾经参加了该报在一八九四年举办的征文。

梁启超在其所撰的“西学书目表”中，选录广学会出版的书籍共二十二种，认为最佳者为李提摩太之《泰西新史揽要》与林乐之主编的《万国公报》。

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交由《万国公报》公开发表，可见他对这份报刊的影响力深具信心。

林语堂自称透过《万国公报》，林乐知成为他童年时私淑的对象，是“在我生命中，影响最大、决定命运的人物。”²⁷

于右任在“一个牧羊儿的自述”中称：“适莫安仁、敦崇礼两名牧在（陕西）三原传教，先严向之借读万国公报、万国通鉴等书，我亦藉之略知世界大势。”

文字和教育如同一扇天窗，让中国人看到窗外天光明媚，风景美好。

27 林语堂，《无所不谈合集》。台湾：开明书店，1974年，p. 273。

汉学研究

西学东渐的同时，西方宣教士也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加深西方人对东方思想的了解。

苏格兰牧师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于1843年，28岁，到香港，任英华书院校长。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经的人，从1861年到1886年25年间，他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共计28卷。理雅各与法国学者顾赛芬、德国学者卫礼贤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

理雅各的学生苏惠廉到温州传教25年后，到山西大学任校长，退休后回到牛津大学任教，将《论语》译成现代英文，将之普及。

生长在中国农村的的宣教士之女赛珍珠写《大地》三步曲，声情并茂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风土人情，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

医疗保健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林前6：19

今昔反差

2008年北京奥运会金牌榜：中国51，美国36，俄罗斯23，英国19，德国16，澳大利亚14，韩国13，日本9.....

1807年，马礼逊看到的中国：男人抽大烟，女人裹小脚。天花、霍乱、伤寒、痢疾、肺病等瘟疫广泛流行，使人惊恐战栗。

1800年，西方宣教士到中国之前，中国人均寿命只有32岁。据2016—2017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中国人均寿命达到了76岁。

传教与医疗，拯救灵魂与医治身体，自耶稣开始，从来就是并肩而行。

李提摩太曾经问一位中国绅士对《新约》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那位绅士考虑了几分钟后，说：“也许其中最美妙的思想是——一个人可以成为圣灵的殿宇。”²⁸

西方医院和护理起源

325年，尼西亚大公会议，不但正式认定圣经所教导的三位一体的教义，并且宣布了一项规定，凡是建立教会者必须同时建立医院。这条规定对整个医院历史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那时各教会的主教都受指示要走出去，到基督教国度有教堂的每一个城市中建立医院。

该撒利亚的主教圣巴西流（Saint Basil of Caesaria，约公元329—379年）被尊为是第一个建立基督教医院向病患者传福音的人。至今仍在运作的最古老的医院，由圣兰德理（St. Landry）于大约公元600年建于巴黎，称为“上帝旅馆”。

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洲，第一批医院大部分是基督徒建立的。

现代护士的鼻祖，英国基督徒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就是从耶稣基督的榜样得到灵感的。她对自己虔诚的事奉总结说：“天国就在我们心中，但我们必须让它外显出来。”南丁格尔培养了大批护士，在1854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她带领护士们在战场上救死扶伤，开护理之先河，被称作“提着灯笼的女士”。

伯驾：第一所西式医院

最早来到中国的基督教医疗宣教士是美国医生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他于1835年，来华第二年，就在广州新豆栏开

28 苏慧廉著，关志远等译，《李提摩太在中国》。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p. 48。

办了“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设有接待室、诊断室、配药室、手术室、观察室，能容纳200人候诊。由于医术先进，免费为穷人治病，求医者日益增多，1842年成为综合性医院，1859年正式定名为博济医院。

来中国以前，伯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常感觉到我的灵魂在不断向前，渴望使整个世界都皈依上帝。我将拥有一项特权，那就是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前，我能够在寒冷而黑暗的精神海岸上，点燃一把福音之火。在我死后，这把福音之火继续燃烧，为许多无知的人照亮通往荣耀的道路，而我也将通过这种方式而得到上帝的宽恕。”（伯驾日记，1831年10月12日）

美部会给伯驾的指示中这样说：“你将有机会运用你所掌握的医学和外科学知识，来为那里的人民解除身体的病苦。你也要随时准备，尽你所能向他们提供我们的技术与科学，以便帮助他们。医生或者科学家的身份将使你获得尊敬，并有助于在中国传播福音，但这绝不能取代或者妨碍你作为宣教士的身份。……以上帝的名义和力量去投入战斗吧，亲爱的弟兄。要至死保持虔诚，而当你接受不朽的荣誉之时，我们又将把我们的忠诚与你融合在一起。”²⁹

来到中国后，伯驾给妹妹的信上说，“我的心为希望而碎……我真希望我能够活到那一天，到那时运用我所掌握的语言技能，不仅为患病的躯体谋求健康，更能为灵魂的永恒作贡献。若这一愿望得以实现，我相信你们将会在上帝的我身边找到我，我会在那里听候他的调遣。”——伯驾写给妹妹凯瑟琳的信1839年7月27日³⁰

焦点：十字架的故事

随着伯驾医生的脚步，来到中国的医疗宣教士中，有一位美国女宣教士名叫道济（Deborah Matilda Douw）。1863年，道济受美国长老

29 爱德华·V. 吉利克（Edward V. Gulick），董少新译，《伯驾与中国的开放》。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pp.250-251、271。

30 同上，271。

会派遣来到北京。当时，中国的女人不但裹脚遭罪，生孩子更遭罪，死亡率极高，有的难产而死，有的生下来不知道护理就夭折了。孩子生下来，接生婆随手从炕席上抽根席篾将孩子的脐带割断；为了止血，在脐带断口处撒一把土灰。因为那根肮脏的席篾和那把土灰中的破伤风病菌，20%的孩子在出生第四天到第六天死去，这就是千百年之久中国人生育史上的“四六风”。母亲生育时流出的血色的液体被视为不洁之物，身下坐个土坯吸净。正是这块土坯和接生婆长而黑的指甲，导致很多母亲死于“产褥热”。

当这位女宣教士看到这种场景之后，回到家里大哭了一场！她发现问题极其严重，她耳闻目睹了老式接生婆的种种愚昧无知和不讲卫生，认为旧法接生给产妇和婴儿带来的是一场灾难。尤其是迷信活动使妇女儿童受害最重。她曾见一个产妇因为难产，接生婆在孩子露出来的脚上穿上一只鞋，认为这样孩子就可以自己走出来了，结果母子二人都失去了生命。她也曾见到一个婴儿耳垂上穿着一条红线，其父认为，孩子只要有一个耳环，病魔将不会认出他。但是不消毒扎耳眼引起了局部化脓，哺乳接触又使母亲患了乳腺炎。

其实，新式接生法相当简单，一把用沸水煮过的剪刀和接生婆剪短指甲并用肥皂反复洗干净的双手；把母亲身下的土坯换成消过毒的布片或草纸。仅仅是这一点点改变，上亿人的生命就被挽救了。而过去出生及出生后感染细菌的死亡率就达70%。令今天的人们毛骨悚然的旧式接生法，以前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习以为常，没有人感到那样做有什么不对。

有感于此，道济返回美国，向长老会募集财物，用了整整八年时间，募捐筹备资金，于1885年再到北京，在安定门交道口北二条建平房12间，成立第一所女子医院，这就是道济医院的前身。

据《中华医史杂志》1998年第7期《北京道济医院考略》，道济医院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北京市区最早建立的一家西医医院（解放后改称北京市第六医院）。不但如此，道济还引进其他西医，随后又在全国发展了500多家。当时，每一天在医院里就有好几百人信主，因为教会就是医院，你想得医治吗？先信耶稣！我就医治你，很多没钱的人都说我愿意信耶稣，于是他们就白白得了医治。不但是身体上得了医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灵魂也得到了医治！

道济把一个十字架挂在每一座医院门口。十字架，本来是一个残酷的杀人刑具，因着爱成为救恩。1949年后，时代变迁，政治运动，即使文革浩劫，也没有挪去这些遍布中国城乡的十字标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神迹！将来必有一天，当中国人听闻了福音，知道了十字架的含义，神州大地上数以百万计的大小十字架，都会发出耀眼的光辉来。

医疗传教广泛展开

据1936年统计，宣教士在中国建立了260所医院。³¹ 其中，福建35所，江苏28所，广东27所，山东25所，河北23所，四川21所，湖北21所，湖南16所，浙江15所。陕西、广西、山西、安徽、云南、河南、贵州、江西、新疆、甘肃都有教会医院。到1949年，发展到340所。

著名教会医院有：

北京 协和医院
上海 同济医院
成都 华西医院
济南 齐鲁医院
上海 仁济医院
广州 博济医院
上海 同仁医院
上海 广慈医院
青州 广德医院
苏州 博习医院
北京 协和医院
长沙 雅礼医院
杭州 广济医院
天津 马根济医院

31 参考：《基督教年鉴》第13期。

福建 永春医馆
江苏 慈仁医院
台湾 马偕医院

著名医学院有：

博济医院附属医学校
北京协和医学院
苏州医院医学院
上海圣约翰学院医学系
广东女子医学校
齐鲁大学医学院
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
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
福州协和医学院
青岛德国医学校
长沙湘雅医学院

一条通往心灵的途径

英国宣教士雒魏林，建立上海第一家西式医院中国医馆，以及北京著名的协和医院前身，他回忆道：1838年，我作为伦敦会第一位医疗宣教士被派到中国。我将一座房屋用作医务室和医院，并告诉人们，他们可以获得免费医疗。前来看病的人非常多，以至于几周以来这座房屋都很拥挤，而且每天街上都挤满了前来看病的人们；通过这样的工作，我们很快找到了一条通往他们情感的心灵途径，而获得治疗的人们将会凝思祈祷中的话语，看到这一切我们非常高兴。我相信，真理因此发现了一条通往很多人心灵途径，而若没有这座医院，他们都将永远不会知道让人愉快的福音……这就是医疗传教的宏伟目标。我们努力争取人们对我们的信心，让他们来到我们的周围，并通过友善让他们向《圣

经》敞开胸怀……³²

除了医疗方面，宣教士在戒烟、放足、体育运动方面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阻止鸦片泛滥

美丽的毒品罂粟花，又名鸦片花、大烟花、英雄花，花色艳丽，花香浓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朵之一。然而，由于罂粟是制造毒品的原料，也被视为邪恶之花。

1624年，明熹宗年间，荷兰人把鸦片和烟草混合吸食的方法传入中国内地，鸦片从此传播开来。

到了19世纪，鸦片成为中国社会的癌症，蔓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清朝名臣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叹息道：“悲哉！洋烟之为害，乃今日之洪水猛兽也！”据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约略估计，中国每年因鸦片而失去四千多万两银子，吸食鸦片的人数，有四千四百万人之多，相当于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民间吸食鸦片的风气极为普遍，吸食者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上至官宦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鸦片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招待客人的“佳肴”，甚至有人戏称，大烟已经是除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外的开门第八大件。

由于宣教士生活在民间，亲眼目睹鸦片烟毒危害巨深。自第一批入华宣教士马礼逊、麦都思起，就坚决反烟拒毒，力主禁烟。经过西方宣教士和他们本国的基督徒坚持不懈的长期抗争，最终使英国政府从1907年开始，逐步采取了限制鸦片生产和贸易的措施。

首位来华医疗宣教士伯驾，于1840年给林则徐写信，把鸦片称作“令人忧虑的罪恶”：我常常目睹鸦片造成的悲惨后果，这使我感到痛苦。为此，我常问自己，从哪里可以找到力量，来阻止鸦片的泛滥呢？也许力量需要从西方国家来，所以我曾写了事实经过，发表了声明，向西方国家的大人物和善良的人们发出呼吁，要他们大声疾呼反对

32 《伯驾与中国的开放》，p. 263。

鸦片。

美国宣教士丁魁良，早在1856年就出版过一部专著，论述了鸦片的危害，以及与鸦片贸易有关的法律问题。

著名汉学家理雅各毕生反对鸦片贸易，认为“这是一种罪恶的交易。”告诫英国政府：“停止作恶，学习行善。”

英国伦敦会著名宣教士杨格非历数鸦片给中国带来的危害：“鸦片在中国，无形中破坏了宪法，摧毁了健康，缩短了吸食者的寿命，瓦解了每一个家庭的和睦与兴盛，并且正逐步地促使整个民族身心以及道德的堕落。”他于1882年写《关于鸦片贸易的简明回答》一书，指出：“这项贸易是不道德的，是英国的一种污点。”他号召西方人“立即放弃这种贸易，并尽我们的力量同情他们、帮助他们，再加上他们自身的努力，将鸦片的灾难从他们的国土上彻底清除。”

为了更好地动员中外基督徒和各界人士积极参予反对鸦片的行动，在华西方宣教士于1874年成立了“英华禁止鸦片贸易协会”（The Anglo-Oriental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首届会长为英国贵格会的爱德华·皮斯（Edward Peace）。该协会向所有在华宣教士发出号召，要求他们在发回国内的报告和信函中，把烟毒祸害中国人民，妨碍中西交往和福音传播的事实作为重要内容，也要求他们在回国休假时，继续向教会肢体和社会各界呼吁。有条件有机会时，也力争亲自向本国政界人士面陈利害，促请他们推动禁止鸦片贸易的政治行动。

宣教士们利用和本国教会通信的机会，向各自的母会报告鸦片在中国肆行所造成的种种恶果，请求他们为中国禁除鸦片而祷告，并利用各种机会唤起舆论，向政府施压，要求停止鸦片生产和贸易。回国休假的宣教士，更是常常在巡回演讲中，介绍自己耳闻目睹的实际事例，向听众解释烟害的实情。

1888年，在伦敦举行一场大型的国际宣教会议，有128个宣教差会的1579位代表参加。戴德生在会上指出：“英国的鸦片贸易在一个星期里对中国人所干的坏事，抵消了西方在华宣教士用整整一年的时间所干的善事而绰绰有余。”他提出动议，呼吁联合英王国及北爱尔兰的基督徒，切切不停地祷告，直到这个从身体上、道德上和社会上为中国人造成无穷祸害，并使中国人民对西方宣教士产生成见的邪恶贸易彻底消除

为止。

这次大会结束后，戴德生的妹夫海班明与马雅各成立一个新的反鸦片组织“基督徒反鸦片贸易联盟”，发行《国家公义》杂志，刊名出自圣经箴言14：34：“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马雅各出任总干事，为这个组织注入活力，也对中英政府形成更大的压力。

1891年4月10日，约瑟·皮斯在英国国会上提出了禁止鸦片贸易的动议，主张英国政府不应该通过开放这种令人厌恶的贸易，而继续助长撒但的邪恶王国。他严正指出，在道义上，英国无法为鸦片贸易辩护。他的动议在下议院以160对130的多数票获得通过。

在苏州传教的美国宣教士杜步西（Hampden Coit DuBose）与柏乐文（William Hector Park）等多位医疗宣教士建立最早的禁烟会，征集1000名在华宣教士签名请愿，上书光绪皇帝。1895年，上书英美政府要求停止向中国销售鸦片。1899年，禁烟会出版了影响深远的*Opinions of Over 100 Physicians on the Use of Opium in China*《100多位医师对中国的吸食鸦片问题之看法》，终于获得美国总统罗斯福、美国国会、万国禁烟会的支持。至今，苏州基督教使徒堂院内还矗立着1910年立的“杜步西先生纪念碑”，上面记录着当年禁烟事迹和众多宣教士的名字。

1906年，英国自由党在大选中获胜，反对鸦片贸易的力量终于赢得政治上的优势。同年5月，英国国会通过禁运的议案。中国政府也立即行动，要求英国政府将该项议案付诸行动。第二年8月，中英两国达成协议，英国承诺逐年递减鸦片输入十分之一，中国政府也相应地承担了逐年减少国内的鸦片生产，禁止鸦片消费的义务。两国商定用十年时间，逐步达到完全禁止鸦片贸易和消费的目标。

在宣教士影响下，中美《望厦条约》明确规定鸦片为违禁品。美国驻菲律宾主教布兰特（Bishop Charles Henry Brant）于1909年在上海召开万国禁烟会议，会议对中国政府禁烟的行为表示支持并呼吁各国禁止鸦片贸易，反毒运动终于获得国际认同。

宣教士一边在英国大声疾呼，反对鸦片贸易；一边在中国采取实际的行动，从事禁烟运动。1871年，宣教士在杭州设立第一家戒烟所，到20世纪初，全国已发展到百余所。

看到吸鸦片的人，英国宣教士李修善（David Hill）说：“我愿意此地有一位医生，能开一个戒烟所，因为他们有些人虽然像从火中抽出

来的木柴一般，却仍然可以得救的。”³³

李修善带领山西儒生席子直戒毒。因战胜烟瘾恶魔，席子直改名席胜魔，成为第一个建立本土教会的牧师，他在山西各地成立天招局，帮助许多人成功戒毒，成为历史佳话。

放足

缠足和天足不仅仅是一种流行文化，而是一场价值观的角斗，是神造与人造，神权与人权的较量，体现什么是善，什么是美。

中国妇女缠足起源于五代，唐末宋初时期，盛行于元朝和明朝。满清帝国建立后，曾一度严禁妇女缠足，但缠足在民间根深蒂固，禁令被迫取消。

目睹“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人间惨剧，在广州传教的嘉约翰医生指责，缠足的做法是一种反对上帝和人类的罪恶。上帝创造人类，本来即赋予人类灵魂与肉体的完整，缠足“坏上帝所造之形器，将善足戕贼而变为逆性之施”，“实僭上帝之权，犯罪非轻”，“我教会切宜速除此弊焉”。

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大声疾呼：呜呼！残忍若是。缠足致生成之善，变为残跛之废人，毕生艰难，令妇女忍受终身之苦厄。林乐知从遗传学角度说明缠足势必造成妇女身体衰退，性情怯弱，影响血脉，遗害后代。引起中国开明人士共鸣。

中国有识之士渐渐认识到，妇女缠足是国势弱的原因之一。作为国民之母，妇女的柔弱成为民族症结，导致中国民贫国弱。强国必先强种，金天翻著《女界钟》，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书一时风靡全国。知识精英众口一词，视缠足为恶俗野蛮之举，与文明对立。胡适说缠足使女人成为“废物中的废物”³⁴，康有为认为缠足败坏国族形象，

33 林辅华、鲍康宁，《向毒品宣战的先锋：李修善和席胜魔》。台北：财团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2006年，p. 85。

34 《敬告中国的女子》（1906），《胡适文集》卷9。北京：北京大学，1998，p. 421。

成为“野蛮之讥”。³⁵梁启超更指出缠足为“渐灭之厄”。

1874年，厦门的英国伦敦会教士麦嘉温（John Macgowan）倡议成立厦门戒缠足会，第一次集会时签名加入的中国妇女就有40多名，到1891年则超过了1000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反缠足组织。

康有为于1883年在家乡南海县创立“不缠足会”，梁启超在上海也成立了“不缠足会”。

1895年，在宣教士的赞助下，李提摩太师母及十位西国妇女在上海发起“天足会”，推举立德夫人（Mrs. Archibald Little）为会长。

立德夫人身体力行，深入民间体察疾苦，面对受缠足煎熬的女孩，她发出由衷的哀叹，她详细地描述其备受折磨的情状：“在这束脚的三年里，中国女孩的童年是最悲惨的。她们没有欢笑，失去了像英国小女孩一样的玫瑰色脸颊。可怜啊！这些小女孩重重地靠在一根比她们自己还高的拐棍上，或是趴在大人的背上，或者坐着，悲伤地哭泣。她们的眼睛下面有几道深深的黑线，脸庞上有一种特别奇怪的只有与束脚联系起来才能看到的惨白。她们的母亲通常在床边放着一根长竹竿，用这竹竿帮助站立起来，并用来抽打日夜哭叫使家人烦恼的女儿，……女儿得到的唯一解脱要么吸食鸦片，要么把双脚吊在小木床边上以停止血液循环。”

天足会出版书刊、聚会演讲，号召中国妇女戒除缠足陋习，得到张之洞、袁世凯等大员的支持。

教会女校为天足的实施者。19世纪70至80年代，教会女校相继开始禁止缠足女子入学。例如北京贝满女学要求女生不准缠足，各地的教会女校也竞相效尤。

1901年，慈禧太后正式下令禁止缠足。1912年，阎锡山强行放足。国家甚至不惜用警力，实施禁止缠足。

到1905年，女教员、女学生和读圣经的妇女已没有一个缠足者。有一首成都竹枝词写道：“女生三五结香俦，天足尚佯极自由。小树胶鞋新买得，归途更续踏青游。”形象地表达了教会女生放足后所体验的快乐和欢娱。

35 《请禁妇女裹足折》（1898），《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上册，p. 510。

到民国30年代左右，中国妇女基本上不再有人缠足。延续千年的恶习在宣教士和中国有识之士数十年之不懈努力下终于绝迹。

不仅如此，宣教士反对童婚、纳妾、奴婢制度、包办婚姻、贩卖妇女等中国传统陋习，特别是推动健身体育方面，不遗余力，开风气之先河，功不可抹。

体育

科举时代，读书人从来就不知道“体育”为何物。洋务运动开展后，近代西方体育的一些内容就在新式军队和学堂中出现了。据郭沫若回忆“那时的洋操真有趣，做洋操的时候，差不多一街的人都要围拢来参观”。

清朝每个男人的脑后都留着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运动员也不例外。运动场上，人们仍然身着长袍马褂，脚穿高统长靴，头上盘着辫子，每每到兴高采烈的时候，就脱掉长袍马褂，头上的辫子也会由于激烈的奔跑从头上滑了下来拖在脖子后，可谓“袍者套也，豚尾垂垂”。

1910年，孙宝信第一次走出天津，参加在南京举行的首届“全国学界运动会”，幸运地夺得学校组的跳高冠军，还闯入了高级组跳高最后两人的决赛。孙宝信心百倍，满以为自己能再拿一个第一名。充分助跑后，他奋力一越，全场人都为之激动，但是令人沮丧的事情随之发生了：过杆后，因辫子扫掉横杆，孙宝信只好屈居亚军，气得他当晚将辫子剪掉，成为新闻。当时剪辫子可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幸亏旁人从中周旋，才使孙宝信躲过一场杀身之祸。但是旧俗之影响却让人深恶痛绝，也无怪辛亥革命一声号召，大批青年剪了辫子。

基督教青年会于1844年在英国成立，于1876年进入中国。发展体育事业是基督教青年会的重要日常工作，引进、推广、传播了西方近代体育运动项目，如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网球、棒球、垒球、手球、台球、马球、田径、游泳、跳水、体操等。

篮球和排球，在基督教青年会的传播下，成为了近代中国群众基础最为广泛的西方体育运动项目之一。1896年，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最早开展篮球运动，为篮球在中国发展之始。1908年，英国基督教青年

会派人来上海工作，带来了排球项目。基督教青年会还大力推广、传播体操、田径、足球、乒乓球等运动项目，使这些项目得到广泛传播和快速拓进。1903年，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大力撮合下，香港皇仁学院组队与英国海军进行了一场足球赛，这是中国人与外国人第一次举行足球赛。1916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已有乒乓球活动点，经常开展乒乓球娱乐活动。

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于1915年5月15-22日在上海虹口娱乐场（今鲁迅公园）举行。“此运动会开中国自古以来未有之奇观”，5月15日2时30分，开幕式在虹口娱乐场隆重举行，出席大会开幕式的有伍廷芳、杨小川、王正廷、钟文耀、虞洽卿以及工部局代表，杨小川和伍廷芳分别代表袁世凯、黎元洪宣读祝词，中外来宾3000余人出席。运动会期间，民众踊跃观摩。运动会最后一日，观众达二万余，“场地四周，几无隙地”。中国代表团选手共67人，获得田径、游泳、足球、排球四项第一和总锦标第一，开创了中国在远运会上新纪元，对于传播西方体育文化有着重大影响。

1932年，推动中国人第一次进入奥林匹克运动的，正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董事王正廷。

慈善救灾

圣罗伦斯的故事

圣罗伦斯是第三世纪基督教会里的一位执事，住在罗马帝国的阿拉贡（Aragon）。在一次大迫害中，有人命令他将“教会的珍宝”拿来，献给罗马官员。结果，他带来穷苦、被践踏和跛脚的人，他说：“这些人就是教会的珍宝。”因此，他被挂在铁格架上烤死。今天，在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有一间收容所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接纳那些无家可归的人。

耶稣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

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裡，你们来看我。”

儒家也讲“仁爱”，佛教也讲“慈悲”，道教也讲“积德”，墨家也讲“兼爱”，都有救人济世、福利为民，此乃人类共通的人道理念和道德准则。

中国早在西周就设有地关司，掌管荒政、安抚民众。隋唐有仓禀制度。两宋有居养院、安济坊和惠民药局。明清有养济院和普济堂。氏族内部，理想状态是，各人尽其所能，创造财富，老有所养，少有所托，孤寡残疾得到氏族的供养，童叟之辈都得到氏族的关爱。

在基督里，人类同根，四海之内都是弟兄姐妹，救济不是施舍，而是上帝的命令，是心甘情愿的付出，表达超血缘、超国家、超民族、超文化的爱。

以基督教为立国之本的国家，彰显神的荣耀，是每个人的义务，是全民的活动。

当时，教会是一个全欧洲大陆的慈善机构。英国国教教徒安德鲁斯（Lancelot Andrews）在1588年记载：“伦敦信奉加尔文教义的教会广设避难所，做得非常好，以致他们所照顾的穷人没有一个会在街上乞讨。”

十九世纪有无以计数帮助穷人的基督徒榜样。乔治·慕勒（George Mueller）和他在英国靠着信心所经营的孤儿院，帮助了千万个儿童，并推动了类似事工的发展。

基督教青年会（YMCA）成立于1844年，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成立于1855年。这些机构在今日全世界的都市里，服事了数百万人物质和属灵上的需要。

当人们履行新约所说的，尽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时，全世界各地，每个星期都发生无数奇妙的事情。他们去医院探望病人、提供衣食给穷苦的人、帮忙破碎家庭中的小孩，他们默默工作，不肆宣扬，将这一切都归到耶稣基督的教导和榜样上。每每在灾难过后，成千上万的义工，其中有许多是基督徒，立刻帮忙重建灾区。

李提摩太坚信，在现实生活中，真心实意的行动要比空洞的教义更伟大。他说：“我们来到中国，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拯救；不是

为了毁灭肉体，而是为了充实灵魂；不是为了使人悲伤，而是为了给人幸福。”

1876—1879年，华北五省发生空前严重的旱灾（丁戊奇荒），李提摩太在青州积极赈灾，收养孤儿，后来那里成为大英浸信会山东传教区的中心。他用救济金在不同传教中心建立了五个收容100名儿童的孤儿院。后来他把孤儿院改办成了工业学校，购进许多中国和外国机器，找来了技术娴熟的工人，教孩子们一技之长，以便日后维持生计。他还办了七所学校，让灾区的孩子们上学，令教师们有工作机会。他在山东至少救助了七万饥民，吸引了无数人来到教堂。同时，他也结交了许多山东省地方官吏和士绅。

寻找丧失的人而拯救之

李修善牧师给朋友的信说：“现今压在我心上的事就是，我能做什么去拯救这些中国社会里迷失的人？这些人正是耶稣所要寻找而拯救的……我所论及的人简直就是社会的废物，多半是吸鸦片的、赌博的人等，他们身上十分褴褛，衣不遮体，在寒风里颤栗着。为这些迷失的人有什么事可做的呢？给他们钱罢，他们拿去赌光；给他们衣服罢，他们拿去典当了。他们将名誉、金钱、颜面和自尊的心统统都丧失了。事实上，除了生命之外，一切都没有了。但是耶稣在这种人们中间寻出许多可救的来，比在那些热心宗教的人中间更多……”³⁶

英国宣教士梅藤更（David Duncan Main）说：“令中国人入教并非宣教士或教会的全部。治愈疾病、令其微笑、忘记自我、兴奋其思想，将之引导到更高层次的目标——在我脑海中，这些才是福音的真正目标。”

36 林辅华、鲍康宁，《向毒品宣战的先锋：李修善和席胜魔》。台北：财团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2006年，pp. 53-54。

因怜悯所建的诸多“第一”

第一间育婴堂：大概是主后1840年，由巴陵会（Berlin Missionary Society）在香港开办。据1914年统计，更正教孤儿院有37所，收养孤儿约有2500人。

第一间盲人院：英国宣教士莫莱士（William H. Murray），在1874年于北京成立，名为穆雷希尔瞽童院（Hill-Murray School for the Blind）。他设计出一套适用于中国普通话的盲文，供盲人使用。

第一间聋哑人学校：1898年，梅夫人（Annette E. Thopson）在烟台租房两间，用病夫逝世后所得的人寿保险及高利贷款购地建校，并请外甥女卡特（Anita E. Carter）来开女生部。1907烟台启暗学校女生部成立，成为近代中国启暗教育开创时期，学生40名。到1936年抗战以前，在全国发展了十数所启暗学校。

第一所疯人院：1898年，由嘉约翰医师（John G. Kerr）在广州创办，取名惠爱医院。

第一间麻风病院：英国宣教士梅藤更（David Duncan Main）于1892年创立“杭州广济麻风院”。1940年全国51处麻风院和麻风诊所中，与基督教和宣教士相关的有40余家。一位年轻的麻风病人临终时说：“医生，他们曾经称呼我为‘美人’，因我容貌出众。但病症令我变得肮脏不堪，我为我的脸感到羞愧。很快我就能够见到耶稣，所有的一切终将忘却，永远纯洁和洁净。”

第一个人力车夫棚：1907年，富善夫人（Sarah Boardman Clapp）来到北京，看见在天寒地冻的人力车夫拉完车，满身大汗，常常脱去上衣，露天休息，受凉，得了肺炎死的人不少，她就筹款，在一些人力车夫停车的地方盖起小房子，里面有煤炉子，热水供应，车夫可以在里面休息避寒，等候顾客。她筹办老人院，收留无依无靠，无儿无女的穷苦老人。

怜悯将通往主的门路打通了。“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的身上了。”（马太福音25：40）

戴德生说，我爱中国，乃是因为我爱基督。因此我因爱基督而为中国人所做的再多，也都微不足道了。

参考：

丹尼尔·W.费舍（Daniel W. Fisher），《狄考文传》。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郭卫东：《中国近代特殊教育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顾长声，《欧风美雨袭中华》。美国：长青文化公司，2001年。

爱德华·V. 吉利克（Edward V. Gulick），董少新译，《伯驾与中国的开放》。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Mrs. Archibald Little（立德夫人），*The Land of the Blue Gown*《穿蓝色长袍的国度》。London: T. Fisher Unwin, 1902.

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北京：教育出版社，1987。

林辅华、鲍康宁，《向毒品宣战的先锋：李修善与席胜魔》。台湾：宇宙光，2006。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

王忠欣，《中国教会学校纵横》。加拿大：恩福协会，2000年。

第三部分

回应冲突

基本认知

基督教入华从一开始就遇到三个最基本的认知问题：中国人真的需要基督吗？中国人能够接受基督吗？中国人可以容纳基督吗？

中国人到底需不需要基督？中国文化悠远绵长，举世无双。不少中国人认为，历代先哲们已经创立了一套完美无瑕的知识和生活准则，是天底下最完备的道理。基督教是洋教，华夷之辩，从来就是以华变夷，如何可以倒过来，用夷变华呢！

中国人能不能够接受基督教？中国文化中有正统和异端之分野，正统是儒家，唯我独尊，其他思想系统统统被视为异端而遭受打击。基督教当然属于“异端”之列。

中国社会现实可以容纳基督教吗？基督教教义与儒家传统在实际生活中有非常真实的冲突，譬如反对拜偶像与祭拜祖先、祀孔活动的冲突，纲常伦理与基督教平等观念的冲突，一夫一妻制与当时三妻四妾习俗的冲突。

宗教传统

历代中国的宗教传统是“神道设教”，宗教历来的功用是王化的工具。而中国民间，宗教也往往带有功利的特性，诸神为我所用，而非对真理的追求。“泛神论”，拜“百神”为了获“百福”。那么，如果拜“一神”有“莫大之福”，中国人也接受。

第一位基督教新教殉道者，美国宣教士娄理华说：“中国本身，可以自成一个‘世界’。每当我穿越它那美丽的平原和那拥挤的街道时，我都会不期然的发出这样的感叹：‘何等的一个对基督教一无所知的国家！’……即使我说这里的寺庙不比宾夕法尼亚的农舍少，这也不见得是夸张之语。我曾在宁波街头看见数以千计的人，聚集在一起敬拜一个被誉为‘一切神明’（All the gods）的偶像。除非这些拜假神的人有机会接受福音，否则他们的结局只会是永远的沉沦。”

由于宗教认知上的基本的问题，以及社会文化的差异，基督教入华面临极大的挑战，自唐朝开始，经过元朝、明朝、清朝，民初，直至今日，冲突未曾间断。

冲突概述：马礼逊前

唐朝：利益之争——最早记载的宗教迫害

635年，阿罗本来华。三年后唐太宗宣诏：“此教于社稷、世道和人心均有裨益，应该让它通行天下。”公元781年，唐德宗下令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当时景教在唐“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

武则天时期佛教盛行。当时外来宗教还有景教、祆教和摩尼教。

僧尼在唐代均田制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唐六典》中规定“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一如之。”僧尼不仅能从国家获得土地，同时还有不缴纳赋税的特权。唐代后期，这项宗教保护政策导致佛

教寺院经济过分扩张，损害了国库收入。

唐武宗崇信道教。会昌年间又因讨伐泽潞，财政急需，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李德裕的支持下，公元842（会昌二年）唐武宗宣召灭佛，会昌五年（845年）达到高潮，“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景教因依附佛教，唐武宗灭佛殃及景教，从此一蹶不振，几近灭绝。

元朝：皆为我用

起初，蒙古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一视同仁，皆为我用”的政策。元世祖忽必烈曾对马可·波罗说：“有人敬耶稣，有人拜佛，其他的人敬穆罕默德，我不晓得哪位最大，我便都敬他们，求他们庇佑我。”

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帝师，蒙古民族后改信藏传佛教。

1269年，八思巴将自己根据吐蕃文字而设计的一套蒙古新文字献给元世祖忽必烈，共有41个字母，1000多个字，同年忽必烈下诏以这套文字统一蒙古语文字。后世史学家称这套文字为八思巴字，或称方体字。

1270年，八思巴再次为忽必烈灌顶，元世祖为报答他的灌顶之恩和造字之功，将乌思藏地区十三万户指定为八思巴的供养地。还晋封他为帝师、大宝法王。百年之间，朝廷所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极。

罗马特使孟高维诺于1294年来华，在京都建立了第一个天主教区，也里可温教在元朝得到相当大的发展。然而1362年朱元璋率领明军攻入泉州，杀死了天主教的主教。几年后，景教和天主教随着元朝的灭亡几乎绝迹。

明朝：艰难前行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因海盗对沿海地区的骚扰，终明之世，都在执行严厉的海禁。同时，中国内地向西通往欧亚的丝绸之路也因战乱而阻塞。大明江山，关闭自守。

1553年，耶稣会士圣方济·沙勿略在上川岛（Island of Sancian）面向中国大陆抱憾而死，象征在宗教改革和环球航行背景下，全球福音化在中国遭遇到顽强的阻碍。

耶稣会东方视察员范礼安在澳门眺望北方呼喊：“顽石呀顽石！你何时才能为我主裂开？！”

1582年，耶稣会意大利籍宣教士罗明坚终于踏上中国国土。一年后，意大利神父利玛窦来华，渐渐在中国站稳脚跟，开辟了天主教在华发展的新纪元。

正如唐朝和元朝，明朝天主教在华发展也经历了重重挑战。

首起教案

1583年（明神宗万历十一年），耶稣会意大利籍神父利玛窦来华传教。1593阴历新年，韶州百姓以石头掷击宣教士，十余个年轻人深夜闯入教堂，用斧子砍伤了入华不久的宣教士石方西的头。这一教案成为宣教士在这个儒家统治的中国艰难前行的预兆。

南京教案：正邪之争——中国教会史上第一次大教难

利玛窦死后，南京礼部尚书沈惟允结内监魏忠贤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上疏，谓“夷闯入都门，暗伤王化”，引起南京教案，私逮王丰肃、谢务禄二神父，钟鸣仁、钟鸣礼二修士，及教友夏玉等二十三人下狱，史称“南京教难”。此为明朝末年西方宣教士在华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1637年，书生黄贞集反教文章为《圣朝破邪集》、《钟始者集》、《辟邪集》，斥天主教为邪教，指责汤若望的新历“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详”。

汤若望的弟子，钦天监官员中国教徒李祖白于1663年编《天学传概》，介绍天主教的发展并与中国的关系，说明中国上古之学即天学，有《尚书》、《诗经》、《论语》、《孟子》为证。

利玛窦早已在中国古儒里发现“上帝”的概念。西周神权观念是“以德配天”。利玛窦选择合儒、补儒、超儒，原因之一是看中儒家具有一神论因素。

明朝天主教的发展

宣教士在利益、纲常、祭祖、夫妻关系的冲突中前行，取得了长足的成果。

史家记载，明朝末期中国的天主教信众人数大幅增加，单是在明朝宫廷内就达到540人之众，其中包括后妃、皇族、宦官和王公大臣。

被称为明朝天主教的“三立柱”，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掌相权者）、李之藻、杨廷筠，对圣教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明朝天主教得以在全国十三个省份传播。

经过明末清初的发展，到康熙三年（1664），全国的大小教堂已发展到360座以上，全国教友的人数已超过25万人。仅在1651年至1664年，“全国领洗入教者，至少有十万零四千九百八十名。”

清朝：剧烈交锋

康熙历狱：华夷之争——中国教会史上第二次教难

康熙五年（1666），杨光先上书，斥汤若望西洋新历法十大罪状，条条致人死地。当时康熙帝年幼尚未亲政，执政的顾命大臣鳌拜不

满外邦人参议朝政。礼部、吏部传讯会审，列出三大罪状：大逆谋反；宣扬邪教；依西法改历。结果汤若望以及杜如预、杨宏量、李祖白、宋可成、宋发、硃光显、刘有泰等钦天监官员（天文学家）被判处斩。

然而，天空突然出现彗星，京城发生地震，皇宫起火，人们议论纷纷，说是上天的惩罚，若不及时更正，恐有大祸降临。最后，由“义女”皇太后孝庄亲自干预，改判汤若望、杜如预、杨宏量免死，但李祖白等五人依然被斩。早期中国天文学家李祖白曾协助汤若望写《远镜说》，将伽利略的现代远镜制作方法介绍给中国人，被杨光先斥为“背圣弃祖”的妖人。

《鲁迅全集》在《坟·看镜有感》论到杨光先：清顺治中，时宪书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痛哭流涕来劾洋人汤若望的偏是汉人杨光先。直到康熙初，争胜了，就叫他做钦天监正去，则又叩阍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辞。不准辞，则又痛哭流涕地来做《不得已》，说道“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中夏有西洋人。”然而终于连闰月都算错了，他大约以为好历法专属于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学不得，也学不好的。但他竟论了大辟，可是没有杀，放归，死于途中了。

民族愤青，凡洋货均视为妖孽：杨光先“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中夏有西洋人”，与晚清大学士倭仁反对洋务运动时叫喊“宁使中国无技艺，不使中国有西学”，以及后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同出一辙，反应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

礼仪之争：政教之争——中国教会史上第三次教难

利玛窦采取“道成肉身”的宣教策略，以及合儒、补儒、超儒的宣教步骤，对中国传统的礼仪和习俗采取宽容态度，核心非常明确，就是“这件事”：“你知道，我和我的同伴们日夜所想的，无非也就是这件事，我们离乡背井，如今住在这里，穿中国衣服，吃中国饭菜，住中国房子，说中国语言，无非也就是为了这件事。”（利玛窦 1599年8月14日从南京发往罗马的信“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然而，并非所有西方宣教士都明白“这件事”的核心意义，并非所有西方宣教士都认同利玛窦为“这件事”所制定的传教策略。神学见

解的不同，传教方法的差异，引发了“礼仪之争”，因而导致天主教在华发展料所不及的挫败。

什么是礼仪之争？

17世纪30年代，天主教各修会之间围绕“中国礼仪”是不是异端开始争论。主要争三件事：“神”的中文表达；祭祀孔子；祭祀祖先。³⁷

礼仪之争牵涉到当时在中国宣教的耶稣会、方济会和道明会；罗马教廷（教皇亚历山大7世、克雷芒11世和庇护11世）、中国皇帝（康熙、雍正、乾隆）；中国教内外士大夫、欧洲知识分子（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

礼仪之争前后持续了约一百年，据说有关的书籍有262部，没有出版的日记、文书还有好几百部。

这场最初为各修会之间的神学争论，演变成康熙皇帝与罗马教廷的政教抗争，最终导致中国“百年禁教”，耶稣会解散，葬送了“中华归主”的大好时机。

礼仪之争是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争论的苦果

礼仪之争时间之长、牵涉之广、影响之大、后果之严重大大超过当事人的预料。历狱后刚刚摆脱困境的中国天主教传教事业几乎陷入绝境。清初因耶稣会士的努力而已经取得的西学东渐就此中断。随禁教而来的是日趋严重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失去了融入世界的机会。与世界隔绝加固了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的心态，直到武力介入。

康熙开始的百年禁教，正是中国与西方进一步拉大差距的一百年，中国在禁止福音的同时，也禁止了科学和民主，整个国家处于全面危机之中。

37 详见卷一，明朝天主教，汤若望与康熙帝，礼仪之争。

从表面看，礼仪之争的苦果是因为修会之间的神学争论，沟通和运作上的固执愚拙，分析和判断上的无知武断所造成的。然而，任凭法老心硬的是耶和华，允许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泊40年的是耶和华，带领选民进入迦南的也是耶和华。

神做事有定时。一百年后，神为中国送来了首位基督教新教宣教士马礼逊，因着他，中国人有了自己的第一本圣经《神天圣书》。

冲突概述：马礼逊后

1807年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25岁的英国伦敦会牧师马礼逊入华，标志着基督教在华传播进入一个全新的局面。

清末，基督教新教在华发展有了重大的突破：神的话第一次通过中文圣经直接传播给中国人；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大门，传教在中国合法化、公开化；大批西方宣教士涌入中国内地，福音在民间遍地开花，在文字、教育、医疗、科学、慈善等社会各个领域改造中国，渗透社会生活各个层面。

神来了，道成肉身，背着十字架。

庚子教难中殉道的吴正兴教士说：“主走过的路，仆人岂可不步他的后尘呢？”外国宣教士和中国传道人常遭殴打、哄逐；信徒和家人被歧视，房屋、田产遭损失；有的甚至殉道。

自马礼逊来华二百年间，教案连连，殉道者血染中华。1840年到1900年间，全中国共发生大大小小的教案计四百多起。最主要集中在1860—1900年之间，殉道人数达24000人。被杀死宣教士最多的一年——1900年“庚子教难”，即义和团事件中，被杀基督教（新教）殉道的宣教士有189人，教友5000。天主教主教5人，教士48人，教友18000人。新教宣教士及家属中，四分之一是孩童和婴孩，137个成年人中，有77位是女性，占总数一半以上。她们有随丈夫来中国宣教，也有单身来华事奉。殉道者半数以上来自英国，内地会有79人。

基督教在冲突中发展壮大。

一、宣教准备时期（1807—1842）：逆流而上

清朝嘉庆十二年（1807），马礼逊抵达中国后，因为禁教，不得不供职于澳门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充当翻译，一边工作，一边翻译圣经，编写华英字典，编著宣教小册子，秘密传教。

四年后（1811），嘉庆皇帝重申传教、习教治罪条例，并对禁教不力的官员规定处罚条例。各地官员深恐受责，纷纷认真查办，结果发现全国各省都有潜入的宣教士。于是，驱逐宣教士，惩罚教徒的案件时有发生。

满清皇朝严惩华人教授外人中文，违者处以极刑。中文教师甚至带着毒药，以备自杀，免受酷刑。马礼逊叹息说：“这些精明的中国人真是荒谬绝伦、毫无理性，竟以外国人学习他们的语文和购藏他们的书籍为大罪。”

马礼逊居住在仓库，平常是寄存货物的地方，相当于欧洲人住宅的地窖，在那里秘密翻译圣经，编辑华英词典。他给伦敦会的书信中说：“古时上帝的仆人在幽暗牢狱中的种种工作，照亮了后代。我希望我在幽闭禁锢中的工作，对于传播上帝的真理，给中国数以亿计的人会有效用。一想到这里，心中就快乐了。”

第一本中文圣经《神天圣书》（《新旧约全书》）于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中国工人蔡氏三兄弟蔡高（中国第一位新教信徒）、蔡兴和蔡三，还有梁发（中国第一位按立牧师）冒死参与了《圣经》的刻版、印刷和出版。

1833年（清道光十三年），郭实腊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在广州创刊，为中国境内创办的最早的基督教中文期刊。1834年，郭实腊在广州发起成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出版书籍，介绍西方文艺、科技。《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成为该会的主要刊物，每期除刊载各国志略、地理、天文、新闻、贸易、物价、宗教等内容外，更有不少介绍西方科技的专论。晚清首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魏源撰写《海国图志》时，就多以此为参照。

基督教在华传播初期进展非常缓慢。至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在华新教宣教士总共20人，代表4个差会。30余年间，信徒不满百人。

这种局面随着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而改变。

二、教会创建时期（1842—1899）：改造土壤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英国向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口通商。随后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黄浦条约》，把通商口岸开放给美法等国，允许建堂传教。

1854年（清咸丰四年），英国福汉会宣教士戴德生抵达中国，意识到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基督教是“洋教”。戴德生不顾同侪反对，改穿中国服装，深入民间，行医传教。他说：“基督教必须带有洋人色彩吗？神的话并不需要洋风，人的理性亦然。我们不是要使他们变为别国人，乃是要他们归依基督。”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列强缔结《天津条约》；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条约规定允许宣教士进入内地各省，并要求官方保护宣教士乃至教民。

王权面对战争的炮火，不再不可一世。1859年7月8日，中英大沽炮台之役之后，美国驻华公使华若翰拒绝向皇帝时行叩头礼，“除上帝与女人，余决不下跪”。咸丰皇帝盛怒，要求驱逐美国公使。消息传到欧洲，英法大呼！

1865年（清同治四年），戴德生创立跨宗派的内地会。同年发表《中国的精神需要和要求》一书，呼吁宣教士来华传教。内地会宣教士除信守基要真理外，并不像其它宗派执着于某些观点，以自立、自传、自养为目标，不接受外来的津贴补助，深入内地传教。在短短的十多年里，宣教士踏上福音未到的19个省，并深入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直至新疆、西藏。

戴德生入乡随俗的态度有例可循。米怜在《开首十年之间回忆》中描写马礼逊初到中国时说：“最初他吃中国饭菜，与他的中文教师一同用膳。他的生活异常简朴。晚上所用的只是一盏瓦制的油灯。他留长指甲，一如中国人。他脑后垂辫，进食用筷子。他穿上中国式的长袍和厚底鞋，在洋行街道上行走。”

福音的代价

中国一向以天朝自居，具有强烈的优越感；不平等条约激发了官绅阶层、知识阶层、民众阶层强烈的仇外情绪。条款在执行过程中，中国人仇教情绪日盛，教案屡生。进入内地的宣教士历尽艰险，开荒宣教士在传教区平均只能存活七年。

中国基督教近代史上第一位在中国殉道的基督教新教宣教士是娄理华，美北长老会第一位派往中国的宣教士，新泽西州参议员之子，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842年23岁的娄理华抵达澳门。他是最年轻的“委办译本”代表。1847年8月19日，译经会议之后，从上海乘船返回宁波途中，不幸遭遇海盗劫持。当海盗们把娄理华抬起准备抛下大海之际，他奋力将自己手中拿着的最珍贵的一部希伯来文、希腊文和英文对照的圣经掷到船上，以免书随人亡。当时他年仅28岁。

娄理华殉道七年后，1854年，他的弟弟，27岁的娄理瑞（Reuben Lowrie）亦踏着哥哥的足迹，带着新婚的妻子和基督的爱，踏上了中国的土地，继承哥哥未竟的事业，到上海传扬基督福音。因过度劳累，积劳成疾，四年后于1860年病逝于上海。

天津教案——最具典型意义的教案

1870年（清同治九年），天津因谣宣教士诱拐杀死婴孩，挖眼剖心，制作各种迷魂药，又因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儿童患病而死，引起争殴。群众鸣锣聚众，焚毁法国领事馆，焚毁法国教堂二座、英美教堂三座，致死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及其随员三人，法国修士、修女十二人，误杀法国侨民二人、俄国侨民三人；中国教徒30至40人被杀。

法、英、美、俄等七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提出抗议，并派军舰进行武力恫吓。清政府先后派曾国藩、李鸿章办理此案，最后判处20人死刑，包括府县官员在内的25人充军，赔偿白银50万两，并派崇厚赴法国道歉，始得结案。

有史家评“天津教案”是由于“半个世纪的种族嫌恶，十年来的

民族怨恨，反基督教情绪的滋长，部分基于宗教偏见，部分基于迷信，部分基于轻信谣言”。官府与教方未能及时解释以疏导民情，而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仓猝激变事态，遂演成此一震惊中外的教案。

然而，教会在血泊中成长。

西方人早已意识到，了解中国文化是宣教不可缺少的一环。英国宣教士理雅各译《四书五经》，在1861—1871十年间陆续出版，当十九世纪欧美沉醉于“白人优秀论”的谬误，视中国为黑暗与野蛮的象征，汉学著作促进西人了解中国文化，化解冲突。影响较大的还有美国宣教士卫三畏（Samuel Williams）的著作《史前中国》，德国宣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的著作《自西徂东》等。

同时，宣教士希望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1869年（清同治八年），英国浸礼会宣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来华，次年抵达上海。1890年任天津《时报》主笔，宣传维新变法。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英美基督教新教宣教士在上海创立出版机构“广学会”，主要出版传教书刊，后来又“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为号召，出版西学书刊。该会发行的由林乐之主编的《万国公报》针砭时弊，宣传禁烟，提倡女权、女子教育等，风靡一时。甲午战争后，宣传中国维新变法，朝野人士，无不阅读，对清末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光绪皇帝等有很大的影响。

愚昧无知是教案发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教育成为宣教的一个重要部分和环节。1877年（清光绪三年），在华基督教宣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届全国宣教会议，狄考文在会议中发表关于中国教育的演说，成为宣教史上的里程碑。大会推举丁韪良、韦廉臣、狄考文、傅兰雅、林乐知等人组成“益智书会”，负责教科书，包括数学，天文，测量，地质，化学，动植物，历史，地理，语文，音乐等科目，成为近代中国教科书之开端。1890—1912年间共出版教科书20余万册，惠及全国各地。

据统计，1895年时，教会小学已达927所，中学114所，大学和培训班46个，总计在校学生21315人，其中小学生16079人，中学生3635人，大学生和培训生1640人。大、中、小三级学制的近代教育雏形已基本形成。

狄考文说，“教会到了哪里，那里就有大、中、小学。”中国近

代的教育改革，是晚清以来各项改革运动中最有成效的。宣教士的办学之举，尤得民心，而且由于科学新知的传播，官绅和民众智识大增，对西方事物和宗教逐渐有所认识，因此官绅士人逐渐退出反教的行列。

然而，民间仇教情绪依然炙热，于1900年达到高潮。

庚子教难——中国教会史上最大的教难

庚子教难又称“义和团运动”。1900年夏，拳民发起的暴乱打着“扶清灭洋”旗号，在清政府的支持下，蔓延至山东、陕西、直隶、内蒙等地。

在庚子教难中，241名宣教士及子女，共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殉道。这是中国教会最重大的教案。

义和团事件导致八国联军攻陷京城，造成10余万国人人遇害，并且在《辛丑条约》上，中国被迫赔偿4亿5千万两给八国，等于全国国库5年总收入。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在此期间，宣教士经历了希伯来书11章最后几节的景况：戏弄、鞭打、捆锁、监禁、磨练、打死、锯死、试探、刀杀、奔跑、穷乏、患难、苦害……妻离子散、毁家献身。宣教士留下了感天地的事迹（参见《殉道士遗言》）。³⁸

庚子教难的后果

义和团运动引发八国联军入侵，俄国占东北、日本在华驻军。

满清政府从此外失国体，内失民心。大清王朝命悬一线，保守派瓦解，革命此起彼伏。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应骙等自保，中国开始军阀化。

38 黄锡培编，《殉道血：1900年义和团事件殉道宣教士的生命故事》。美国加州：中信出版社，2010年。

李鸿章深知“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

1900年9月8日，慈禧以光绪名义颁发了“罪己诏”。李鸿章代表清政府议和谈判，6项条款：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并在《辛丑条约》议定上画押。

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军费、损失费4亿5000万两白银，是为“庚子赔款”。

拆毁为着重建——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经过庚子教难火的试炼，基督信仰得以去伪存真。此后，宣教士更侧重于教友的训练与教友全家归主的运动。同时，宣教士们开始觉悟，不再依靠条约的保护，在争讼中主持正义。教会开始联合。更重要的是，中国教会开始本色化，自立、自传、自养得到认真的贯彻，大力培养中国本地人才。

庚子教难后，中国教会产生了巨大改变，教会开始走向复兴。从1900年到1920年的20年中，教会迅速发展，并且本土化，进步之速，较十倍于庚子以前，堪称中国基督教会的“黄金时期”。

质与量的增长

1900年有来华差会61个，1906年增至67个，1919年猛增到130个，另外还有36个基督教团体独立经营的各种事业。其中首推内地会。1920年，宣教士在中国各地开设了693个传教点，1037个布道机构。

1900年有宣教士1500人，1905年增至3445人，1914年为5400人，1919年为6636人，20年间增加4倍多。传教活动呈现从沿海向内陆，中心城市向四周乡村辐射的形势。

从1900年到1920年，中国信徒增长了4.5倍：1900年为8万人，1906年增至17万，到1914年为25万，1918年为35万，1920年达36万。

中国神职人员队伍开始形成：1906年按立的中国牧师为345人，1919年增加到1065人，增长了3倍。1920年，有神学院13所，男子圣经学校48所，女子圣经学校52所。

教会学校高等化，贵族化。基督徒从政、从西医和法律居多，家族兴起，不再是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

庚子赔款用于教育

1902年，在山西的英国宣教士李提摩太积极筹划，利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建立了山西大学堂。

经美国宣教士明恩溥等人推动，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谕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

1908年10月28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1909年起，美国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学习基金，到1924年6月退回余款本利1250余万美元，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清华大学就是用庚子赔款所建成。

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庚款留学生”第一届四十七人之中，包括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第二批考取庚子赔款的

包括胡适、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1908年，善胜医院（Wilson Memorial Hospital）在平阳府落成，为纪念在义和团之乱中殉道的卫理森医生。他妻子芝婷和幼子亚历山大同时被杀。出资建这医院的，是殉道者的弟弟罗拔·卫理森。

善胜医院的基石上刻上了这节经文：“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非基督教运动——中国教会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教难

庚子教案后，中国教会和社会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土教会领袖出现

1921年，担任海军大副的王载在灵修时读到以赛亚书52章11—12节：“离开吧，……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抬耶和華器皿的人，务要自洁。”他深受感动，觉得这是上帝对他的呼召，于是离开海军，凭信心出来传道，成为中国“自由传道人”的第一人。

王载与福州三一书院的倪柝声、王峙、缪绍训、陆忠信、魏光禧组成团队，向福州居民传福音，并成立“基督徒聚会处”，成为国内教会走向自立、自传、自养的先锋。英国女宣教士和受恩（Miss M. E.

Barber) 给他们灵性上的帮助极大, 她是倪柝声接触西方神学思想的主要桥梁。倪柝声以“地方教会”运动闻名于世, 对此后数十年本土教会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

政教关系良好

基督徒积极参政。国民革命中, 基督徒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辛亥革命期间, 基督徒及传教学校学生积极支持或投身革命, 贡献甚大。如孙中山、陆皓东、区凤墀、尹文楷、王宠惠、郑士良、杨襄甫、陈少白、关景良、左斗山、王质甫、史坚如、毛文敏、刘锦州等人, 都是在兴中会时期的革命中坚。而实际参与革命的基督徒人数, 可能还要更多。据史扶邻(Harold Z. Schiffrin)统计, 单在惠州之役中, 基督徒就占30%。

民国初期的议会中, 基督徒的数量在60多人, 占25%左右, 包括农林总长陈振先、海军部次长李和、参议院次长王正廷、政事堂参议林长民、交通部会计司长王景春、外交司长曹复康等。1912年基督徒及传教学校毕业生占广东省各级政府官员的65%。广东的高级官员: 民政司长钱树芬、教育司长钟荣光、实业司长关景燊、卫生司长李树芬、交通司长容星桥、高等审判厅长伍藉磐等皆为基督徒。

由陆征祥(天主教)总长提议、大总统认可, 国务院通电全国基督教各会, 同于1913年4月27日特别为国祈祷。当时中西教士, 欧美各教会, 全世界也同日为中华民国祈祷。民国成立后, 有人鼓吹将孔教定为国教。经基督徒发起签名运动请愿, 司法司长徐谦(基督教)领导“信教自由会”。在1917年, 国会维持“人民有信仰宗教自由”的宪法。教会在民国初年, 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 都备受尊重。

当时, 基督教蓬勃发展, 被认为是救国出路之一。

新文化运动产生

然而, 20世纪早期, 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文化运动。中国文化界

中，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文化革新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四个提倡和四个反对：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独裁；提倡科学，反对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领袖包括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新青年》创办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首任总书记、主席陈独秀；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曾任经济、历史系教授，参编《新青年》，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李大钊。

思想土壤：民初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四种看法

否定论：全然否定宗教（主要指基督教），提倡科学和理性。全盘否定宗教的价值，认为宗教是理性服从信仰，是反科学反理性的，无法真正认识世界。科学在不断发展，宗教意味着倒退，认为宗教信仰是在开倒车，是迷信神权的产物。

取代论：蔡元培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提倡要以美育代替宗教；胡适提出三步修：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是有德行，要成为人的典范；立功，是要为国为民立大功；立言，是要写出不朽的著作，留存于世。

选取论：以陈独秀为代表，在基督教中选取对中国有益的部分接受，比如基督教的宽恕、博爱、服务、牺牲的精神，这是中国人所需要的，不要接受其它的教义、教规。主张要选这种崇高的情感“培植在中国人的血液里面”。超自然的部分是迷信的，不要基督教，只要基督精神。所以，陈独秀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中指出，“我以为基督教的问题，是中国社会上应该研究的重大问题，我盼望我们青年不要随着不懂事的老辈闭起眼睛瞎说！”“我以为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我们一天不学尼采反对人类相爱，便一天不能说基督教已经从根本崩坏了。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所以基督徒或是反对者，都别忽略了这根本教义。”

二元论：二元论主张宗教与科学不要互相侵犯，互相否认。宗教唯心，科学唯物。两者要和平共存。这种观念非常普及。认为宗教是主观体验的、神秘的、直觉的、超自然的境界；科学是客观分析、理性的、分析的、抽象的研究，所以宗教有宗教的价值，科学有科学的价

值。以梁漱溟、屠孝实、刘明伯为代表。

基于无神论思想，中国爆发了一场文化义和团运动——非基督教运动。

导火线：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

1922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发展到达顶峰，此时全国有市青年会40处，会员达53800余人；校青年会有200处，会员达24100余人，外籍干事95人，中国籍干事87人。

1922年出版的《中华归主》（*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一书出版，该书名暗示有基督教势力要征服中国的意思，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表达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

1922年4月4日，“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此为首次在中国地区召开的全球性会议。来自世界32个国家的基督徒学生领袖以及其它学者与作家共764名代表出席了会议，8日圆满闭幕。然而，这次大会引发了非基督教运动。

第一次高潮

“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即将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的消息传出，引起轩然大波。1922年3月9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宣言，称宗教与科学不能并存，基督教不但违反科学，更是资产阶级掠夺压迫无产阶级的恶魔。4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了一次反基督教的示威集会。随后，南京、广州、厦门、武汉、长沙、杭州、福州、芜湖、天津、保定等地先后成立反基督教组织，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非基督教运动。《生命》月刊转载了“非基督教同盟”的反教宣言，并指出该宣言“只凭意气，不讲道理”，不像是出自“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之手笔，其攻击无损于基督教。浸信会的《真光杂志》也较有份量地批驳了反教言论。

1923年，面对非基督教运动的挑战，吴雷川等组成“真理社”，并出版《真理周刊》，力倡有中国风格的基督教。

第二次高潮

1924年，非基督教运动第二次高潮：4月，广州圣三一学校开除学生领袖引起非教风潮；8月，在上海重新组织了“非基督教同盟”，其宪章把基督教当作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将矛头指向一切基督教的组织、人员及其事工，认为基督教在不平等条约的卵翼下已经发展成阻碍民族解放的特殊政治势力。1924年圣诞节前后，至少有13个城市发生了反基督教的游行示威。国家主义教育学派的代表人物余家菊等发起“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成为非基督教运动第二次高潮的主要方向。余家菊著文指斥教会教育的三大危害：教会教育是侵略的；基督教制造宗教阶级；教会教育妨害中国教育之统一。

鉴于非基督教运动的教训，中国天主教召开“中华全国公教会议”，会议建议尽快成立一个自立的教会，并划分了自立传教区。此后，中国天主教传教区陆续移交中国神职班管理。

第三次高潮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英国巡警开枪打死中国人的暴行。“五卅惨案”把全国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和反基督教运动推向高潮。6月，全国学生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非基督教运动决议案”，教会学校中学潮迭起，报刊上陆续出现激烈的反基督教的文章。非基督教同盟一方面努力推动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收回关税运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一方面在学校、工厂、农村中加强非基督教宣传活动。

各教会大学开始向政府注册。在教育界登记的学校被禁止教导圣经和宗教敬拜。从此70余年来，中国学校制度中便没有了宗教教育。

第四次高潮

当时，革命军挥师北伐，打倒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北伐途中发生了革命军强占教堂、赶走牧师、抢劫教会财物、焚烧宗教书籍等事件。1926年7月和12月的圣诞周，革命军在所占领的城市中举行反基督教示威。次年3月24日，北伐军袭击了南京教会，杀害6位宣教士。

有武装的仇外风潮导致了宣教士大撤退。在华宣教士约有5000名撤离中国，1000名转移到沿海城市，留在内地的约有500名；教权移交到中国教会领袖手中。

1927年4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年底，非基督教运动徐徐降下了帷幕。

非基后果

随着席卷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的普遍展开，宣教士们被逼在1920年代离开中国。

1900年，农民的疯狂愚昧、极端民族主义、暴力激进主义被清政府利用，产生了以农民为主导的义和团运动。正是这些批判农民义和团运动的知识分子，于20年之后，发起了这场目的大同小异的文化义和团运动，“非基运动”。

一位美国牧师说：当你贬低上帝时，你就是贬低了人类的生命。

这场运动为极权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它先使国民党在1928年背叛了孙中山的民主理想，转为军事独裁政党，后为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了文化道路。

然而，神是超越历史，主宰历史的。他席卷一切的爱透过殉道者的血，依然在中国浇灌出福音之花。

殉道者之歌：惧怕什么？

宣教士在中国遭遇的冲突，自从基督教一开始传入中国就未曾间断过。然而，基督的跟随者是有思想准备的。

1931年，美国宣教士闻声牧师（Rev. John W. Vinson）在苏北被土匪杀害。同工海侓登（E. H. Hamilton）牧师得知这个消息后，回到驻地徐州，百感交集，不到十五分钟就写下诗歌《惧怕什么》（AFRAID? OF WHAT? ），传诵至今。

惧怕什么？

惧怕什么？

灵魂释放觉着欢然，
脱离苦难进入平安，
今世忙乱已经过完，
有何可怕？

惧怕什么？

亲眼看见耶稣荣面，
并他伤痕满溢恩典，
救主欢迎亲耳听见，
有何可怕？

惧怕什么？

放枪轰轰身心受伤，
与主伤痕仿佛一样，
出入光明直升天堂，
有何可怕？

惧怕什么？
事奉救主在地缺憾，
一见主面忽变完全，
事奉在天直到永远，
有何可怕？

惧怕什么？
生所未成以死成全，
刚硬石地用血浇灌，
使灵生长如花千万，
有何可怕？

——海侓登（E. H. Hamilton）

教父特土良（150—230）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兴旺的种子。”
中国教会今天的复兴，离不开众多先辈的付出。他们或泪洒中国，或血滴神州，已浇灌出中国数千万神的儿女。

附录

各省开教宣教士名单

广州

1807年，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苏格兰，伦敦会

1830年，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美国，美部
会

1833年，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 美国，公理
会

1835年，伯驾 Peter Parker, 1804—1888, 美国，公理会

1839年，雒魏林 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 英国，伦敦会

1843年，合信 Benjamin Hobson, 1816—1873, 英国，伦敦会（马
礼逊女婿）

1853年，嘉约翰 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 美国，美北长老
会（1859年接受伯驾创办的博济医院，1866年开办博济医学堂，孙中山
曾在1886年就读于博济医学堂。）

1856年，纪好弼 Rosewell H. Graves, 1833—1912, 美国，美南浸
信会（神学教育）

福建

1841年，厦门，雅裨理 David Abeel, 1804—1846, 美国，公理会

1842年，厦门，文惠廉 William Jones Boone, 1811—1864, 美国，
圣公会

1851年，厦门，惠廉 William Chalmers Burns, 1815—1868, 英国，长老会

1856年，梧州，纪好弼 Rosewell H. Graves, 1833—1912, 美国，美南浸信会

1895年，福州，和受恩 Margaret E.Barber, 1866—1930, 英国，圣公会女宣教士（以影响倪柝声、王载等著称）

香港

1842年，罗孝全 Issachar Jacox Roberts, 1802—1871, 美国，美南浸信会

1843年，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苏格兰，伦敦传道会（香港英华书院首任校长）

1855年，郭实腊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 德国，路德会（1826年到巴达维亚，1828年到新加坡，1830年到暹罗，1831年到中国天津、辽宁、澳门、厦门、福州、舟山、宁波、牛庄等地，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的宣教士，参与及起草《南京条约》）

上海

1843年，麦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英国，伦敦会（1843年和美魏茶、慕维廉、艾约瑟等宣教士在上海创建墨海书馆，印刷出版中文书籍）

1844年，雒魏林 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 英国，伦敦会（在上海开设第一家西式医院中国医馆）

1845年，文惠廉 William Jones Boone, 1811—1864, 美国，圣公会（上海美国租界创始人）

1847年，晏马太 Matthew Tyson Yates, 1819—1888, 美国，美南浸信会（老北门外建第一浸会堂，上海第一座基督教新教会堂）

1860年，林乐知 Young John Allen, 1836年—1907, 美国，美南监理会（《万国公报》主编）

浙江

1843年，宁波，玛高温 Daniel Jerome Magowan, 1814—1893, 美

国，美北浸礼会

1850年，宁波，丁魁良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 美国，北美长老会（京师大学堂首任校长）

1854年，宁波，倪维思 John Livingstone Nevius, 1829—1893, 美国，美北长老会

1857年，宁波，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 英国，中国传教会（1865年建立内地会）

1857年，宁波，梅理士 Charles Rogers Mills, 1829—895, 美国，美北长老会

1867年，温州，曹雅直 George Stott, —1889, 苏格兰，内地会

1877年，温州，李华庆 Robert Inkerman Exley, 1855—1881, 英国，偕我会

1882年，温州，苏慧莲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1861—1935, 英国，偕我会

江苏

1859年，苏州，文惠廉 William Jones Boone, 1811—1864, 美国，圣公会

1866年，南京，童跟福 George Duncan, —1873, 英国，内地会

1868年，扬州，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 英国，内地会

北京

1861年，雒魏林 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 英国，伦敦会

1863年，丁魁良 William Alexander P. Martin, 1827—1916, 美国，北美长老会

1861年，富善 Chauncey Goodrich, 1836—1925, 美国，公理会

山东

1861年，登州，倪维思 John Livingstone Nevius, 1829—1893, 美国，美北长老会（夫人海伦首创女校，1867年烟台开教）

1862年，登州，梅理士 Charles Rogers Mills, 1829—895, 美国，

美北长老会

1863年，登州，韦廉臣 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 苏格兰，圣经会

1863年，登州，狄考文 Calvin Wilson Matteer, 1836-1908, 美国，美北长老会

1870年，烟台、青州，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 英国，浸信会

1880年，恩县庞庄，明恩溥 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 美国，公理会

1882年，济南，李佳白 Gilbert Reid, 1857-1927, 美国，美北长老会

1888年，烟台，古约翰 Jonathan Goforth, 1859-1936, 加拿大，长老会

湖北

1861年，杨格非 Griffith John, 1831-1912, 英国，伦敦会

1865年，李修善 David Hill, 1840-1896, 英国，循道公会

湖南

1862年，杨格非 Griffith John, 1831-1912, 英国，伦敦会

1863年，湘潭，郭修礼 Josiah Cox, 1828-1906, 英国，英国循道会

山西

1867年，V. C. Hart and Elbert S. Todd, 美国，美以美会

1869年，韦廉臣 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 苏格兰，伦敦会

1878年，太原，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 英国，浸信会

1902年，霍州，1923年，盖群英 Alice Mildred Cable, 1878-1952; 冯贵珠 Evangeline French, 1869-1960; 冯贵石 Francesca French, 1871-1960, 英国，内地会

辽宁

1867年，牛庄，宾惠廉 William Chalmers Burns, 1815—1868, 苏格兰，英国长老会

四川

1868年，杨格非 Griffith John, 1831—1912, 英国，伦敦会

1868年，伟烈亚力 Alexander Wylie, 1815—1887, 英国，伦敦传道会

1877年，重庆，麦卡悌 John McCarthy, 1840—1911, 爱尔兰，内地会

1906年，章必成 Montagu Harry Proctor Beauchamp, 1860—1939, 英国，内地会（剑桥七杰之一）

河北

1869年，通州，谢卫楼 Davelle Z. Sheffield, 1841—1913, 美国，公理会

安徽

1869年，密道生 James J. Meadows, 1835—1914, 英国，内地会

天津

1872年，明恩溥 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 美国，公理会

内蒙古

1870年，葛雅各 J. Gilmour, 1843—1891, 英国，伦敦会

1872年，吉尔默 James Gilmour, 1842—1891, 苏格兰，卫理公会

河南

1875年，戴亨利 Henry Taylor, 内地会

1934年，艾得理 David Howard Adeney, 1911—1994, 英国，内地会

西藏

1876年，康慕伦 James Cameron，1799—1875，内地会

陕西

1876年，鲍康宁 Frederick W. Baller，1852—1922，英国，内地会

1876年，金铺仁 George King，1857—，英国，内地会

1885年，章必成 Montagu Harry Proctor Beauchamp，1860—1939，英国，内地会（剑桥七杰之一）

山西

1876年，秀耀春 Francis James，1851—1900，英国，内地会

1876年，德治安 Joshua J. Turner，英国，内地会

甘肃

1877年，义世敦 George F Easton，1853—1938，英国，内地会

1877年，巴格道 George Parker，—1931，英国，内地会

1923年，盖群英 Alice Mildred Cable，1878—1952，英国，内地会

1923年，冯贵珠 Evangeline French，1869—1960，英国，内地会

1923年，冯贵石 Francesca French，1871—1960，英国，内地会

广西

1877年，Edward Fisher，英国，内地会

云南

1877年，麦卡悌 John McCarthy，1840—1911，爱尔兰，内地会

1887年，柏格理 Samuel Pollard，1864—1915，英国，卫理公会

1908年，富能仁 James Outram Fraser，1886—1938，英国，内地会

贵州

1877年，祝杨名 Charles Henry Judd，1842—1919，英国，内地会

1877年，巴子成 James F. Broumton, 1850—1910, 英国, 内地会

江西

1881年，九江，库思非 Carl F Kupfer, 1852—1925, 美国, 美以美会

新疆

1906年，胡进洁 George W. Hunter, 1862—1946, 苏格兰, 内地会

吉林、黑龙江

1908年，古约翰 Jonathan Goforth, 1859—1936, 加拿大, 长老会
(领导“满洲大复兴”)

宁夏

1917年，兹威默 Samuel Marinus Zwemer, 1867—1952, 美国, 归正教会

1936年，毕敬士 Claude L. Pickens, 1900—1985, 美国, 内地会
(向穆斯林回族人宣教)

青海

1915年，胡立礼 Henry French Ridley, 1862—, 英国, 内地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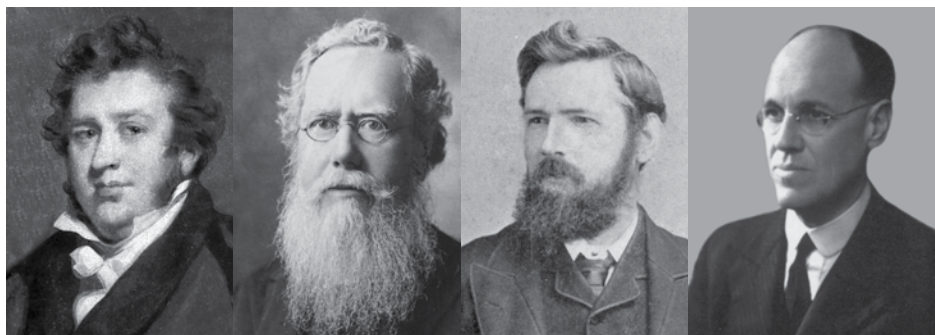
1921年，柏立美 Victor G. Plymire, 1881—1956, 美国, 神召会

卷三 英雄之歌

马礼逊、戴德生、李提摩太、

富能仁的故事

18位宣教士精彩片段





孤独的行者 ——马礼逊

“我们是何许人也？要去说服国家的君王，企图去解放异教徒的捆绑呢？我们没有获得国王的授权，没有外交家的辞令，不是雄辩家。我们只是普通的人，靠着上帝的存在，像摩西那样，凡上帝所吩咐的就去做了。我们虽然没有摩西的神杖，但我们有圣经，有上帝和我们同在，遵照他的吩咐，进入异教徒中间去，将福音传给众人听。这就是我们前往异教国家去的宗旨和希望。你们可以看出，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膀臂，而是依靠活的上帝。”

——马礼逊在霍克斯顿神学院母校大会堂演讲1826年

“藉上帝的帮助，您已经做了一件大事，是中国所有的帝王、官吏、祭司、文人与人民所永不能达到、毁灭及终止的，而且必会扫荡他们的庙宇，毁坏他们的偶像，改变他们的生命及拯救许多人的灵魂……亲爱的朋友啊！切勿灰心失意啊！……愿上帝的臂膀呵护您。”

——1822年，同工米怜去世前写给马礼逊的信

先驱总是孤独的。回顾第一位踏足中国的基督教更正教传教士马礼逊，人们常常为他在孤独中的煎熬而饮泣。然而，马礼逊的泪水浇灌了美丽的福音之花：因着他，中国出现了第一本中文圣经，第一部华英字典，第一所现代学校，第一份报刊杂志，第一座西式医院，第一位中

国基督徒，第一个本土传道人。

因着这位孤独的行者，上帝的爱不再遥远，中国不再一样。

英雄的诞生

远方，英国北部诺森伯兰的一座教堂里，传出浑厚低沉的歌声：

透过马其顿午夜的黑夜，
无数的人齐声哭喊。
在庄严的祈祷中，
可怕的绝望之缄默意味深长。
灵魂苦涩的呼号，
从远方传来，
帮帮我们，否则我们死亡！

1782年1月5日，马礼逊出生在英国北部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的一个简朴农家。诺森伯兰位处罗马旧址，是个英雄辈出的地方。父亲雅各·马礼逊后来到纽开索（Newcastle），改行以制鞋胚为业，并在教堂担任多年长老。马礼逊是八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成长在虔诚基督徒之家，从小就养成勤奋不息，坚韧不拔的个性。

幼年的马礼逊与后来以发明蒸汽机车而出名的施蒂芬孙是好朋友。马礼逊有极强的记忆力，12岁就能背诵诗篇第119篇。早年当过父亲的学徒、工匠，也曾加入一个旅行剧团。15岁时，马礼逊脱离了无神放荡的朋友，向上帝痛哭呼喊，经历生命的更新和变化。在默想和祷告中“饱尝美善和恩爱”。马礼逊从小就勤力学苦读，是一个坚定、真诚的人。他做工时随身带着圣经和书籍，甚至将床搬到工场大门口，以便开工前能读一个小时，这个地方后来被命名为“马礼逊场”。

早在17岁，因读到《海外传教杂志》（*The Evangelical Magazine*）大受感动，马礼逊开始对传教事业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接受语言、医学、天文、数学、神学等方面的教育。

母亲去世后，马礼逊决定献身传教。在21岁生日的第二天，到伦敦鹤士顿学院接受神学训练，并在伦敦播道会统筹下常到郊外村落传道。

当父亲病重，家人劝他放弃神学院，回家继承父业时，他说“我不想回去，我已手扶着犁在耕耘，不会再回头看了。”

1804年5月27日，他向伦敦传道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申请成为外国传教士，很快得到了批准。22岁的马礼逊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父亲啊！我既已经舍弃自己为主的仆人，就应当热诚从事任何工作——甚至最危险的亦不畏避。希望你能同意我这句话吧……我不怕什么，只怕我对主叛变的心而已。”

马礼逊随即被送到高士坡传教学院接受专门训练，由该院院长蒲固博士（Bogue）亲自指导。

马克尼牧师在《从中国传来的声音》中回忆他的同学马礼逊：“当时在校内，没有哪个同学能够比得上马礼逊所表现的三项最伟大的道德品质，那就是：对上帝最炽热的虔诚、坚持不懈的勤奋精神和对各项事情献上最大的热情。”

另一个同学回忆说：“在学院时，他是一个杰出的人，读书比其他他人勤奋，态度严肃，近乎忧郁，时作玄想遐思，但显然是在沉思一个大目标，越趋近它，越觉得这目标伟大和庄严。”

当时，马礼逊的传教目标是非洲或亚洲。

有一天，马礼逊的牧师朋友，极力推崇将福音传到中国的莫士理博士，在路上遇见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国人。据他所记：“我不能任他走，我的心充满了中国啊！”他情不自禁上前与他攀谈，邀请他一同用膳。此人就是后来在中国教马礼逊学中文的荣三德。有人说，他是第一位中国留美学生容闳博士的祖先。

马礼逊希望他的同学克罗尼与他一同前往中国，他写信给克罗尼：“试想想：中国有三亿五千万灵魂无法认识耶稣基督为救主……弟兄啊！这项使命是艰巨的，我请求你认真计算其代价……如果我们两人能同赴中国，我们必须首先宣判自己的死刑，不要信任我们自己，而是完完全全地相信并依靠我们的活的上帝。”

因为找不到伴侣相随，马礼逊只好独自前往中国。又因为东印度公司拒绝任何传教士乘他们的船只到印度或中国，马礼逊不得不先取道美国，再转乘中立国船只前往广州。

1807年1月2日，他在离开英国前在日记上写道：“上帝啊，求你与我同在，今生今世一直带领我。愿全能的上帝的恩惠跟随着我，愿天使一直在我前面带路。我盼望我能永远依附在上帝的臂膀里，因为没有任何人能把我扶起。”

1807年1月8日，刚满25岁的马礼逊与前往印度的两位传教士一同被按立为牧师。他在当天的日记中祈祷：“求主使我能舍弃一切，背上我的十字架，全心全意跟随耶稣基督。”

告别的时候到了。1月28日，马礼逊在格雷夫等船时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今天上午是我最难过的一次，与我伦敦的亲爱的朋友们告别……只有我一个人，将独自前往。啊！但愿我不是一人，上帝慈爱之手会搀扶着我，天使会出现在我的前面……我问我自己，要离开朋友们和我的国家的目的是什么？……要代表荣耀的上帝，前往中国拯救可怜的罪人，这是我向上帝许的愿，也是我向我年迈的父亲和姐姐们许的愿。”

马礼逊于1807年1月31日终于在盖里港乘“汇款号”启航，前往美国。

临行前，伦敦会给马礼逊授权书，指示他根据智、灵及见识，随机应变处理一切。

年轻的马礼逊只身孤影，离乡背井，前往异国他乡，前途可畏，不禁悲从中来，痛哭不已。

冒死前往——我不能，上帝能

船，在泰晤士河上航行。马礼逊写道：我离开了亲爱的家人、朋友和祖国，从这里出发，去从事一项巨大的工作，我对此在思想上感到无所依托。于是我读圣经和仰望上帝，以寻求支持。昨晚我哭得很厉害。我更加觉得我所要去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当我在船舱里散步时，我的心突然喊出，啊，耶和華，万军之上帝啊，你就是我的力量和我的支柱！啊，上帝，我的救主，求你与我同行！

风雪交加，浪高如山，船锚断了，帆也裂开，船在海上漂泊。马礼逊带领同行者朗诵诗篇107篇：“……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但愿人因耶和華的

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

4月12日，在海上109天后，“汇款号”终于在纽约抛锚。

马礼逊在美国居留了三周，等候由美国转航去中国。

小女孩的问题

在纽约的第一晚，马礼逊住在一位朋友家。友人的小女儿清晨醒来时跟平常一样，与母亲说话，突然见有陌生人卧在父母的大床上而不见父母，便大吃一惊。

小女孩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位陌生人，问道：“先生！你向上帝祈祷吗？”

马礼逊即刻答道，“是啊，亲爱的小姑娘，我天天祈祷。上帝是我的好朋友呀。”

商人的冷笑

启程去中国前，马礼逊的朋友陪他到船主的会计室办理出国手续。朋友事后记载：我总不能忘记那商人调侃马礼逊的面孔、言语、与神态，可怜马礼逊错用热心，而心中却不能不佩服其克己、忠诚、勇敢与进取精神。

各种事物上的手续办妥之后，那个人由办公桌转过头来，冷笑着对马礼逊先生说：“好吧，马礼逊先生，你真的期望能够使中华大帝国改变崇拜偶像的观念吗？”

马礼逊以非同一般的坚定信仰答道：“先生，我不能，但我认为，上帝必定能。”

记者的报道

《纽约观察报》记者西格麦先生在“马礼逊博士访美纪事”一文

中作了报道：我对马礼逊的印象是……他外表风度翩翩，有着一一种自然的坚定和高贵气质。他的举止文雅、严肃、富有思想，有虔敬和献身的精神……马礼逊话不多，也不激动，他像屹立在码头的一尊庄严的雕像，看来他脑中充满思考，只是无法全盘托出。他心中唯一所想的事是与上帝在一起，对他周围送行的人视若无睹。

国务卿的信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马礼逊对华传教的辉煌前景，被一位美国政治家所预见，这就是杰斐逊政府任国务卿的詹姆斯·麦迪逊。麦迪逊写信给美国驻广州领事卡林顿，令其协助马礼逊，使他得以实现中国之行。到广州后，马礼逊不仅受到卡林顿接见，而且被介绍到美国商馆隐居。

天使的帮助

在开抵广州之前三天，马礼逊先到了澳门。在澳门，他遇见了上帝派来的天使，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员史丹顿爵士（George Staunton）。史丹顿成为他终生的朋友，屡次在危难中给予他巨大的帮助。

1807年9月7日马礼逊乘坐的美国货船“三叉戟号”，经过113天的风浪，进入广州。此时，正是清朝嘉庆12年。

石头开花——中国拓荒

马礼逊的双脚终于触摸到沙勿略和范礼安当年无法登临的巨石，实行主耶稣最后的命令：“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马礼逊是第一个到中国的更正教传教士，他说，“我立定宗旨，将自己献给中国人。”

明末清初，当天主教努力在华开展传教工作时，更正教也曾注意到这个东方大国。据说17世纪中叶，英国贵格会的创始人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曾经叹息道：“唉！能不能唤起几位热心的教徒，把真理宣布到中国去？”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在1661年，有三位教友，名叫施丹白（John Stubbs），考司曲路（Richard Costroppe），福尔（Henry F. Fell），他们很勇敢地开始到中国传教，经历了不少困难。”

1801年，伦敦传道会曾讨论派送传教士到中国，却没有办法进行，因为中国政府自“礼仪之争”后不与外夷往来，屡次颁布防范外夷章程实行海禁。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东方贸易，该公司从商业利益出发，严禁下属船只送载传教士前往印度和中国传教。

马礼逊来华时，正值嘉庆十二年，中国闭关自守。唯一的通商口岸是广州，只有商人才经东印度公司，以澳门为据点，在交易季节，短暂进入广州，且只可住在商馆之内，不得任意出入。其时，澳门已被奉行天主教的葡萄牙人占领管理，对基督教士一律禁止拒绝。

在广州，外国人只限于城外珠江北岸一小片地方，称“十三行”，飘着英、美、荷兰三国的国旗。清政府对外国人限制重重，不准窝藏妇女和军火、不准雇佣中国仆人、不准学中文、不准乘轿、不准进城、不准带家眷到广州等等，诸多不便。

马礼逊对广州的第一印象：上帝慈爱之手终于带领我到达指派要我工作的地方。我是在昨夜8时到达广州的。那集结在岸边的多艘货船的喧闹声，河上数百艘民船来往穿梭时上千船民大喊大叫声，都令我情绪极度亢奋……千万块小木片像火柴那样在他们的船头闪闪发光，向他们的神明表示着崇敬。我对自己说：“这许许多多无知的，但是精明的、堂堂的中国人，我能为他们做什么呢？”

马礼逊曾经说过：“中国人有许多是文化高优，学问丰富的，不但不亚于我们，反而比我们更优胜。”

在与清朝官员接触的过程中，他叹息道：中国官员们极其傲慢、专横和喧嚣，他们有时三四人同时讲话，声音之大，像是在骂大街。缺乏忠诚是他们的主要特征，由此产生互不信任、低级的狡诈和欺骗行为。他悲痛地发现，中国虽然拥有自己的文明，但中国人普遍特性却充满妒忌、欺诈和撒谎。缺乏神的荣光，他们心中充满了自私、吝惜、精

明、冷酷、形而上的无情。

他自问：中国人对欧洲究竟需要的是什么呢？他们不需要欧洲文学作品，不需要一般的教育，也不需要欧洲某些慈善家唠唠叨叨鼓吹的文明。中国需要的乃是耶稣基督……不管中国人拥有怎样丰富的文学艺术，他们仍然是昏头昏脑的偶像崇拜者。他们是在崇拜受造之物，不是在崇拜造物主。他们憎恨真神上帝，心中充满对偶像的执迷。

儒家传统熔铸而成的中国，儒家思想自汉以来即成为思想主流，根深蒂固，历代以来任何外来文化鲜有能挡。马礼逊在华27年，只得极少数志同道合者。

他明白，只有神的话语能够凿开这块巨石，为这个古老的文明注入新的生命。他的使命是将神的话语播撒在中国人心中。首先，将圣经翻译成中文，这就是伦敦会给他的任务。

勇往直前——冒死学中文

毒药和地窖

马礼逊到中国后就开始穿汉衣，吃中餐，蓄长辫，留指甲，学中文。米怜的《开首十年之间回忆》中描写道：“最初他吃中国饭菜，与他的中文教师一同用膳。他的生活异常简朴。晚上所用的只是一盏瓦制的油灯。他留长指甲，一如中国人。他脑后垂辫，进食用筷子。他穿上中国式的长袍和厚底鞋，在洋行街道上行走。”

他聘请了两位教师，都是天主教徒。一位是本地人，秀才出身。另一位是教授官话的山西人。当时，满清严惩华人教授外国人中文，违者处以极刑。他的中文教师甚至带着毒药，以备自杀，免受酷刑。

马礼逊悲叹：“这些精明的中国人真是荒谬绝伦、毫无理性，竟以外国人学习他们的语文和购藏他们的书籍为大罪。”

他居住在仓库，平常是寄存货物的地方，等于欧洲住宅的地窖。他给伦敦会的书信中说：“古时上帝的仆人在幽暗牢狱中的种种工作，

照亮了后代。我希望我在幽闭禁锢中的工作，对于传播上帝的真理，给中国数以亿计的人会有效用。一想到这里，心中就快乐了。”

马礼逊称中文为“这世界上最难的文字”。米怜以幽默的口吻说：“人要学会中文，身体需铜造，肺腑需铁制，樾木为头，钢簧为手，有鹰的眼，使徒的心，马土撒拉的长寿。”¹

白蚁和书籍

1823年《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出版，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中英大字典，共6册，4595页，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按部首排列的中文《字典》，第二部分是按声韵排列的《五车韵府》，第三部分为英文字母排列的英汉字典。同时，他还印行出版了《中文文法》与其他多种小书。

马礼逊日记记录了编辑过程的艰难：“这是一项非常吃力和费时的工程。我心里空虚，思想贫乏。我的天父上帝啊，求你支持我，不要把圣灵从我处取走，神圣的救主，求你不要让我的心灵与生命离开你。”

马礼逊十分克己节约，可是对于一切有助于完成任务的物品，会不惜金钱来购置。很快，他的图书馆就有四五百本书了，都是有关语文、宗教、哲学、医药、法律及历史的书籍。不久，他藏书的数目增至一千二百十九册。

他印刷的书籍被广东总督没收，白蚁又蛀蚀了寄存在当地人家的大半印刷品，真是骚扰不断。

一片丹心——决死译圣经

马礼逊“以决死之心，不依靠自己，只依靠永生的上帝”投入圣

1 马土撒拉是圣经记载活到969岁最长寿的人。

经翻译，这是一桩前人未能成就的伟大事业。

据考证，早在唐代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圣经部分经文就曾传入中国，但其译本早已失传。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们虽然在中国传教长达一个多世纪，但并未翻译一部完整的圣经。

早在马礼逊来华前，热心中国事工的莫士理牧师（William Moseley）发现大英博物馆里的一份中国圣经文稿，原题为 *Quatuor Evangelia Sinice*，即《中文四福音》，是早在1737年有人在广州抄得，并赠与皇家学会会长史隆爵士的（Hans Sloane, Royal Society）的稿件，包括四卷福音书、使徒行传及保罗书信的中文译本。马礼逊到中国之前抄录了这些文稿。

1810年，马礼逊来华第三个年头，译成中文版《使徒行传》，印行1000册。

1812年，马礼逊《新约》出版前一年，刑部曾奉上谕颁布一道命令：“自此以后，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关，希图惑众，及有满汉人等，受洋人委派传扬其教，及改称名字，扰乱治安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立斩……”

“丁道尔（Tyndale），英国早期因翻译圣经而受害者，被绑在石柱上，快要死时，曾高声大呼：主啊！张开英皇的眼睛啊！……他的祈祷已经达于上天，一一得到应允了。如今让我们以热情作同样的恳求，使中国的皇帝睁开眼睛吧。”（马礼逊信 1815年11月25日）

1819年11月25日，马礼逊和米怜报告，已经完成了全部圣经译本，这是12年零3个月辛苦工作的成果。1923年《新旧约全书》出版，取名《神天圣书》。从此，基督教教义才开始完整地在中国流传。

“为了完成这个大任务，我不仅长期工作及谢绝社交，保持耐心、毅力、镇静及不偏颇的判断……惟希望以正确的思想，恭敬的态度，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以免误传上帝的圣言……希望……可以使一个较为快乐的时代快些在这些地方出现。”

1824年，马礼逊亲自在圣书公会年会上，献上译本，并阐明自己所持守的原则：翻译圣经当用浅白及容易的文字为至高原则。他说：不管人家怎样诽谤，他在主前凭着良心，已尽力为之，心安意得。

几乎与马礼逊同时，在印度锡兰浦，教士马士曼翻译的中文《圣经》在1822年用活字木刻印刷。

坚立于寒冬——孤独的橡树

自1807年入华宣教后，马礼逊面对绝对的孤独与深沉的寂寞，既不被中国人所接受，也得不到西方人士的支持，宣教生涯极度艰难。为求能在澳门居住，马礼逊几经挣扎，只好加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受聘为翻译员。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任职25年期间，马礼逊一面担任翻译，一面传道，矛盾挣扎，遭人误会攻击，其痛苦孤寂可以想见。然而，他却忠于呼召，善用恩赐，坚持到底。27年在华宣教的生涯中，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工作。浇灌光荣成果的，是孤独痛苦的眼泪。

一信难求

最令他精神痛苦的是收不到祖国的来信。自他到了广州后，四个多月，一封信也收不到。再过八个月后，他致友人的信说，“昨日收到你的来信，欣慰无比。我迄今曾发出书札不下二百封，但所收到的这是第二封。”

“我竟成为一个离群索居，孤苦伶仃的人了……过了一星期又一星期，我的食物餐餐一律——牛腩煲藕，用筷子吃……每天写作由早晨九时至入夜九、十时。”（马礼逊日记）

喜结良缘

因为省吃俭用、勤奋苦读，马礼逊健康出了问题，不仅头痛加剧，全身无力，甚至连在房间里走动都没有力气。在皮尔逊医生建议下，马礼逊到澳门修养。可是，他没有一刻忘记自己背井离乡的使命，度假期间，他仍带着中国助手，每天投入《华英字典》的编辑工作。

田野散步和海风对他的健康大有益处。

1808年11月9日，一个爱尔兰年轻人威廉来敲马礼逊住处的门，帮

他父亲莫顿（Morton）医生送来友人自印度写给他的信。从此马礼逊与莫顿一家亲密往来，马礼逊请莫顿一家到他的住处作礼拜，后来接受莫顿医生的邀请搬去同住。

马礼逊与威廉的妹妹玛丽恋爱了。他这才明白，原来这段澳门旅程，藏着上帝美妙的心意和祝福。

1809年2月20日，马礼逊和17岁的玛丽（Mary Morton）在澳门结婚。同一天，他收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聘书，聘请他成为东印度公司的中文译员。这份聘书解决了他的居留和生计问题。马礼逊不再是独自一人面对上帝的事业了，有玛丽与他分享一切苦与乐！

痛失同工

1813年7月4日，礼拜日，马礼逊孤独奋战了七年后，终于迎来了第一对同工米怜夫妇。马礼逊和玛丽既兴奋、欢乐，又恐惧、担忧。他们多么盼望同伴的到来，打破寂寞，共度忠诚的生活。

米怜比马礼逊小两三岁，1785年生于甘宁蒙（Kennethmont）。六岁丧父，母亲独立教养孩子。他一手拿着泥灰供女教师生火，另一只手夹着圣经，口里不断念着老师所教的经句。他年幼时必须出外牧羊，惯说粗言秽语。在当地牧师影响下，他成为敬虔的青年。隆冬日，他与羊群为伍，在铺了草根的泥巴地上即跪下祈祷，不顾他人的非议或讥诮。

到伦敦会应召时，他穿上“礼拜衣服”，大多数在座的人恐怕他不胜任，有人竟然献议他不如去做机械工人，他随即高声回答：“无论什么事，只要是有关传教工作的，我都愿意。我愿意伐木、挑水、为上帝的神殿服务。”他的即时祈祷感动了在场的审批委员，终于差遣他到中国，成为马礼逊的得力同工。

正如马礼逊所料，米怜不得居留澳门。1815年，赴马六甲另起炉灶，开创传教基地。

1817年，米怜夫人连续失去两个女婴后，生下一个男孩，产后不久即患热病而亡，死时才35岁。

生离死别

马夫人体质羸弱，因工作需要，马礼逊必须每年离开澳门6个月，又不能携带眷属同去广州。玛丽独自留居澳门，病痛孤苦，马礼逊日夜担忧，幸而有李文斯顿（Livingstone）医生照顾。

长子出世后即夭折了，可幸又得一女一子，使玛丽有所寄托。可是爱妻健康渐差，如果想活下去，非长期离开中国不可。1815年1月，玛丽带着两岁半的女儿Rebecca和九个月儿子John回英国，一别就是六年。1820年，马夫人返回澳门，不料，忽然染霍乱而死。

马礼逊给岳父的信中表达了痛失爱妻的悲痛：“玛丽对宗教有强烈的感受，热爱救主耶稣基督，认为世间的喜乐是无常和不足的。我俩常提起对世事不宜过分操心，因我们已经知足……就这样，我亲爱的玛丽结束了她短暂而又苦恼的生命！……去年她带孩子到我身边后，上帝至少给了我们一段时间共享天伦之乐，玛丽也获得了健康、平安和安慰，她的身心获得了愉快，这是我要感谢上帝的……我决不说‘莫伤心’决不！我为玛丽已流过许许多多的眼泪。”

马礼逊对亲人说：“我在这里真正是举目无亲……我并不埋怨……我仍要感谢上帝，我虽忘记他的恩典，但他仍拯救我。”

玛丽去世后，马礼逊与小儿女相依为命。可是，离别的时候终于到了。九岁的小女儿丽碧问他是否如常依期回到广州去，她自知不能同行。马礼逊迫于公司职责不得不回答：“是的”，然而，为父的心碎了。日记中万分悲凉之情，不堪细读。幸而李文斯顿夫妇答应于冬季照顾他的小女儿，马礼逊带着七岁的幼儿儒翰一同去广州。伤心离别，不可言喻。

爱妻死后两年，死神又夺走了唯一的同工，年仅37岁的米怜。马礼逊悲痛地写道：“九年前的今日，我和玛丽欢迎米怜夫妇到达澳门。如今呢，我们四人中之三人——皆在40岁以下——作古，只留下我孤苦伶仃一人独存。然而主的旨意是美的，他们都是在福音的应许和盼望中去世，而且都是在岗位上死去。他们留下忠骸在战场上。他们尽忠于救主的大业，直到最后一天。他们没有一个临阵逃亡，这令我满心快乐。”

“我并不因此而退缩、而怨天，我只为自己的孤苦独存而痛哭，

也为我个人的罪而哭。我愿多一点把心思放在天上的事。我愿努力从事于专职，静候我主的莅临.....我来华至今15年了，期间一半岁月是独自工作的，然而上帝容忍我的软弱，赐福我一手所做的工作.....我以前所播的种，现在已有嫩芽可见了.....我希望那一双失去慈母而父亲远离的小儿女在英国都得安康。如果你们看见他们，请善待他们——为我爱妻之故，为我之故，又为主之故——因为玛丽是为主而死的。我希望将来也死在岗位上。”（1822年10月13日致友人信）

马礼逊有如他故乡强硬的橡树，挺然屹立，历尽狂风暴雨而不动摇。对于至亲的人，他有丰富的爱情，缠绵眷恋，但一到不能不离别之际，又不怨天尤人，安心忍受。

孤寂恐慌

清政府逮捕通缉马礼逊多名《英华字典》刻字工匠，烧毁他的《新约》袖珍本，闯进印刷所，搜去稿件及铅字粒。

因当年英美内河冲突事件交涉，身任秘书及发言人而大大触怒当局，马礼逊战战兢兢地避免受逮捕之苦。

同时，马礼逊的布道工作引起东印度公司的不满，董事会决议免除马礼逊的职务。幸好得其好友史丹顿（Sir George Staunton）力保，才被留职。

“我的勇气与耐心，差不多是消丧尽了.....这是一处极其孤寂的场所.....我希望我能到那自由的宗教社会，可以享乐的地方去。我是在不断的恐怖之下，逼迫者的手臂临着我，并且还不止于此，凡是帮助我的本地人，被人到处搜索，有时竟被逮捕了.....我的手久执着笔，已经厌倦了，有时能改执锄头，我的身体或许会好些。”

他在1817年2月给Waugh博士的信中说：这是一个非常讨厌的地方，令人常在孤寂与恐慌之中。我希望上帝一向呵护的臂膀，今后仍保佑我不致受害。

大火烧不烂

1822年11月1日，星期五晚九时，广州西关一处起火，在十三行之北约半英里。马礼逊与四个人整夜在一只雇来的小舟中避难，只救出少许物品。第二天上午火焰直吞十三行。星期日早上，整个十三行已成焦土，人人无家可归了。

这次火灾不亚于1666年伦敦大火。与洋行交易的华商认识洋商多年，但无人肯让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的外国人留宿一夜，并给予一餐温饱。仆人们倒是例外，他们努力抢救财产，忠心耿耿。

马礼逊的一百镑纸张，原打算寄去马六甲印行新约版本的，都付之一炬了。

火灾后12日，马礼逊坐在一个中国货仓里，在他的临时寓所，写出“中国传教事业的开首十五年”一文。总结了拓荒15年的工作，列举翻译圣经、马六甲开设的英华书院、澳门印刷所印行的中国新闻、每逢安息日的礼拜仪式、米怜的播道小册子《两友相论》、中文圣经和其他福音文字的印行和传播等等。

著名汉学家马其博士（Montucci）称赞说：“我敢断言，马礼逊在这十年间印行的多种书籍，他对于欧洲学人的影响，远胜于传教士在上一世纪内印行的书本或未刊行的全部稿本。”

初熟的果子

中国硬土上开始出现第一本中文《圣经》、第一位中国信徒、第一个中国传教士、第一所西式学堂、第一座医院、第一份报刊、第一处聚会所。虽然，进展缓慢，困难重重。

马礼逊来华七年后，才得一位中国信徒，蔡高。

蔡高于1812年决志。经过两年考验后，他自己和他写的志愿书被马礼逊认为合格。领洗地在澳门东望洋海滨一个幽静的小山侧。关于蔡高受洗，马礼逊记载说：“1814年7月16日，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蔡高施洗。……施洗之地在濒海高山之麓，有泉汩汩流出。其地

幽僻，人所不见。恳求我主以耶稣之宝血洗涤其罪恶，以圣灵之感力洁其心灵。祝其成为将来大收获之初果，成为归信得救将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之一。”多年之后，澳门的伦敦会志道堂教友捐资建“蔡高堂”以纪念第一位中国基督徒。

1817年，米怜为中国印刷工人梁发在马六甲施洗。梁发问米怜肯否为他施洗，米怜答，他若肯悔改信主，并遵行主道，他答应。于是米怜乃读经讲解，一同跪下，求主施恩，就洒水于他头上。领洗毕，他问米先生，信耶稣有何记号。米答，专心行善，就是信耶稣的记号。梁发就自取名为学善者或善居士。

1818年，在马六甲成立第一所华人学校，英华书院，米怜为第一任校长，马氏为终身董事。

马礼逊知道，印刷是能够突破中国对外封锁的利器，不断印刷、不断分发，福音总可以找到传进中国的机会。书院内设有印刷所，印行《中音拾遗季刊》。中国第一份月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就是在此印刷的。

1820年秋天，梁发的妻子信主，她是中国第一位女信徒。儿子于11月20日领洗。马礼逊为这家人祈祷说：“愿这个中国小家庭可以在这片土地上成为向人民传播真理的器皿。”

1820年马礼逊在澳门与李文斯顿医生合作开设了一间诊所，专为中国人治病，为贫穷的中国人施以药物和指导。

1823年，马礼逊来华16年后，回国度假前按立梁发为传教师。梁发，中国第一位基督教传道人，是马礼逊采取“在职训练”方法所结的果子。梁发热心地撰写了一本布道小册子，叫《救世录搓要略解》（《劝世良言》），末了附了几段经文、三首圣诗和十诫。这本37页的小册子是第一本中国人自著的中文布道书。印刷200本分发亲友，梁发因此被捕下监，被鞭30大板。

1828年，梁发在故乡与一少年古天青在本乡办了一个私塾，是中国内地第一个更正教的教育机构。马礼逊向伦敦传教会报告说：梁先生在主办学塾和向其乡人传道外，还著大批布道小丛书，此类小丛书共有12种。其中一种是为儿童而作的基督徒问答书，其他都为回答他的非基督教友人所发的反对基督教的问题而作的。首位美国来华传教士裨治文和雅裨理遇见梁发时说，“梁发很像耶稣”，“梁发的祷文，与一般形

式主义的老生常谈不同，乃适合于当前的环境，使听者觉得是出于真心的。”

1827年马礼逊帮助麦迪逊创办《广州记录报》（*The Canton Register*）。此报成为中国出版的第一张英文报纸。

同年马礼逊写公开信，请求美国派遣传道士来中国。1830年美国第一批传教士裨治文和雅裨理两人抵达广州。

1832年9月4日，马礼逊来华25年后，在儿子马儒翰协助成立的马家印刷所印制了第一份出品物，“在华传教二十五周年报告书”，由马礼逊和裨治文联署，报告了八名来华宣教士和三位当地同工，共得十人施洗。同年，梁发给伦敦传道会的报告中这样说：在此数年中，已有数人信从救主，加入教会。此地差不多十人，一心一志，继续事主。这时在广州有一个小小的教会团体，这是一个初期的教会，常常在马礼逊家中聚集礼拜。

这份报告一一列出11名拓荒者的名字和地点：

马礼逊神学博士，伦敦传教会，中国
 麦都思，伦敦传教会，爪哇
 撒母耳吉德，伦敦传教会，病重啊，英国
 亚伯汤姆林，伦敦传教会，马六甲英华书院
 戴尔，伦敦传教会，槟榔岛
 郭实腊，荷兰传教会，旅行
 裨治文，美国公理会，广州
 雅裨理，美国归正会，暹罗
 梁发，中国人，被按立为传道人，伦敦传教会，中国
 丘安，中国人，伦敦传教会，印刷工人，中国
 李兴，中国人，梁发助手，中国

报告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在中国的传教会的神仆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隶属不同的教会，却能彼此相爱、互相帮助，联合在一

起，推动在中国的福音事工。”²

初期信徒

马礼逊去世后，其子马儒翰和裨治文牧师与1835年发表通函，其中提到广州一间小的华人基督教会，并列出版友名单：

- 梁发，48岁，传道人。
- 屈昂，50岁，传道助理。
- 黎氏，31岁，梁发妻。
- 梁进德，15岁，梁发子。
- 梁亚沾，11岁，梁发女。
- 李新，31岁，砖匠。
- 周亚生，25岁，制笔匠。
- 吴亚清，31岁，印刷助手。
- 梁亚道（译音），28岁，制笔匠。
- 梁亚新（译音），梁发助手。
- 刘庶泉（译音），38岁，秀才。
- 赵清（译音），秀才。

芬芳四溢的葡萄园

初到中国的几年内，由于中国环境的障碍，马礼逊将宣教目标转移到南洋，以华人为对象，在马来半岛的马六甲，组织恒河外方差会计划（Ultra-Ganges Mission），训练欧洲人及本土传教士，兼作训练恒河外各国传教士之用，并开设一间印刷所，作为有力的传教工具。这是一个亚洲传教的中心总站，提供传教士一个组织合作的基地。1818年，恒

2 游紫玲，《平民阶级中的英雄马礼逊》。台湾：宇宙光，2006年，p. 152。

河外方传教差会成立。他鼓励伦敦传道会先后差派17位教士，开展南洋各地的工作，成为日后中国基督教的奠基者。

马礼逊不断地呼吁西方各国派遣宣教士来华。继马礼逊和米怜后，英国伦敦会连接派出了许多宣教士，他们勤恳开展工作，在东方各国华人中，奠定了一个影响广泛的基督教会基础。来自伦敦会的许多宣教士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中国福音传教史册上：慕维廉牧师（W. Muirhead 1847来华），艾约瑟牧师（J. Edkins 1848年来华），湛约翰牧师（J. Chalmers 1852年来华），杨格非（Griffith John 1855年来华）等等。他们在香港、广州、汉口、上海、天津和其他中国城市做出了切实而有益的贡献。

1822年，马礼逊来华16年后第一次回国。他带了万卷中国书到英国。觐见了英皇乔治四世，又呈上了一本他翻译的中文圣经和一张北京地图。他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

他设立了东方语言学校，开设了妇女中文研究班，提倡组织妇女传教工作促进会，并提倡牛津、剑桥两所大学设立中文讲座等等。第一位女宣教士艾迪绥就是马礼逊宣召来华的，她在中国宁波创建了中国本土第一间女校。

1824年11月，马礼逊在英国休假期间，续弦娶艾思庄（Armstrong）小姐为妻，在利物浦结婚。一家四口于1826年5月登船回中国，继续未完成的事业。

紧随伦敦会之后，进入中国的是荷兰传道会（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1827年派遣德国人郭实腊牧师（Karl Gutzlaff）作为随军教士，肩负荷兰政府的使命前往中国。马礼逊对郭实腊所作的工作深感兴趣。郭实腊多才多艺，于1831年开始在中国沿海一带航行，沿途分派圣经及基督教书籍。他一连三次航行内陆的报告，引起英美两国政治、商业、及宗教各界人士极大的热心，由此引发中国传道会的成立（China Evangelization Society）。中国传道会第一个派来的传教士就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戴德生称郭实腊为“内地会之父”。马礼逊在马六甲的印刷品就曾通过郭实腊，传到中国人手中。

马礼逊的呼吁也得到了美国的响应。1829年，美部会（The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代表美国公理会派遣雅裨理和裨治

文首次来华。两位在马六甲海峡定居的马来人和华人中辛勤工作。美部会随后很快派遣了杜里时牧师（I. Tracy）和卫三畏牧师（S. W. Williams）前往新加坡和澳门。伯驾医生于1834年从耶鲁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随后来华，成为的第一位在华专职医疗传教士。

美国同孚洋行老板奥利芬对美国在华传教事业有着开拓性的贡献，被誉为“美国对华传教之父”。不仅马礼逊得到奥利芬的捐助，裨治文、卫三畏等美国来华宣教先驱均得到奥利芬的支持。卫三畏回忆说，“1829年美国对华传教的兴起，应归功于奥利芬先生的建议。”传教士来华后，在清政府严厉禁教政策下举步维艰，他们不敢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而只能以商馆雇员的身份活动，在华商人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合法的身份和栖身之所，而且还对传教士各项活动给予经济支持。当差会开支过大而成功的希望渺茫时，奥利芬给予资助和鼓励；他和他的合伙人在广州为传教士免费提供一座房子达13年之久；他在纽约所属的教会应他之请，于1832年把一个完整的印刷所运抵中国；当《中国丛报》开办时，他提出若报社亏损，他会承担全部出版亏损；他在广州为报社建了一个办公室，该办公室在广州存在达24年之久；他公司的商船为51位传教士及其家眷免费提供来往中国的船票。

1833年马礼逊夫人偕同五个儿女回英。大儿子儒翰与马礼逊一同送别，挥手惜别之际，马礼逊不禁黯然神伤，老泪纵横。没想到，这一别竟成生死离别。

此时，他感觉到毕生的工作快结束了。他在给爱妻的日记中说：“这真是可喜的事！上帝已在传教事业中，培植了有动力的同工了。我现在感觉自己在这里对于这大业不是十分重要的了。纵使没有我，这大事业仍能继续向前发展。”

1834月1日晚间，马礼逊安息在救主怀中，葬于澳门原配与孩子的坟旁，享年52岁。马礼逊遗下六个儿女，两人原配所生，四人继室所生。独女后来嫁给著名传教士合信医生（Dr. Benjamin Hobson）。长子马儒翰，长于中文，马氏死后，担任其父所遗下的译员工作，与麦都思、郭实腊、裨治文共事，完成圣经新译本。马礼逊生平和工作一书是续弦艾思庄写的。

马礼逊逝世前，已有23位牧师受他影响来华传教，其中包括女传教人。

英雄的靈魂

曾担任晚清海关税务司整整半个世纪的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曾经称赞马礼逊是“平民阶级中的英雄”。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马礼逊庄严的风度正是中国人所喜爱的，中国人称他为“马老师”。

马礼逊毁誉不惊，宠辱不动，具有刚毅的独立性，使人折服的谦虚，高雅又彬彬有礼，待人处事非常得体。他为人笃实，不慕浮名，不与人争，不爱宣传，酷爱工作和读书。他所看重的并非世俗的虚名，而是天上的嘉许。

1817年，即马礼逊在中国传教十周年时，爱丁堡大学承认他的中文工作饶有价值，特别赠予神学博士学位。东印度公司前大班马志平在国会中就中国问题演说时，提到马礼逊的名字，全场欢呼。

曾参加“圣书公会”的葛林晓牧师回忆说，伯沃斯先生一次在大会上发言：“多年以前，我到伦敦大英博物馆访问时，常看到一位青年坐在博物馆里面在非常用功地看书。他所读的一本书，我只字不识，这就引起了我的好奇。我就前去问他看的是哪一个国家的文字，你怎么会聚精会神地阅读？那青年谦虚地答，念的是中国文字。我问他读得懂吗？他说他在努力明白这种文字。他又加了一句话，因为这是非常难懂的文字。我就问他念中文有什么目的？他答道，现在很难说有什么动机，但是似乎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推动力强烈地促使他研究中文。他说他的意思是要做一下试验，看看用他的热情和毅力坚持下去，是否能克服困难而掌握这种极难懂得的文字。至于结果如何，要看发展情况。他现在并没有一定的打算，要看学习得怎样之后再行决定。17年以后，今天，我又亲眼看到这位上帝所培养的光荣的器皿站在我们面前，把上帝的荣光照耀在有最多人口的中国，把福音的伟大真理，将圣经赐给他们，使之能够接受真神上帝的统治。”

澳门墓碑上刻着马礼逊生前三大伟业：译圣经、编字典、办学校。为了福音在中国的传播，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没有虚度。

他的同工米怜说他有“不容征服的耐心，从不疲倦的勤奋，战战

兢兢的谨慎，及自自然然的要求隐居独处的读书习惯。”他虽被紧闭在一个小地方，与世隔绝，但常怀传福音予普天下的眼光和理想。

马礼逊认为传教士必须具有真正的敬虔，谦虚的德性，专门的技术或教育，丰富的常识，良好的脾气，对救主的真爱及在人类的救恩中彰显上帝荣耀的志愿，而且从事耶稣基督的大事业，而视个人与家庭的利益为次要。

他说：“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基督徒，不单是关心他个人的福利，也要着眼于关心他人的困难……如果环境需要，基督徒必须牺牲个人的和家庭的幸福，有时是偶然的，有时是经常的，有时是终身的幸福。他们有时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亲属或自己的国家，去关心别的民族或别的国家人民的福利。”

马礼逊有一封长信给伦敦会的斯库兼书记，申论工场所需人员，认为极需未婚的女同工，这是当时的伟论卓见。第一位前往中国内地宁波的未婚女子艾迪绥（Mary Ann Aldersey），就是马礼逊在英国述职期间，在家办的妇女中文研究班的一员。

马礼逊不喜欢狭隘的国家主义，也不喜欢狭隘的宗派主义。他说“我们是不分宗派的。我们承认只分善恶两等人，即善人是敬畏上帝的，恶人是不敬畏上帝的。愿凡真诚爱主耶稣基督的，均沐神恩。”

伟大的马礼逊，出身平微之家，第一位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是中国基督教奠基者。他顺从主所托付的使命，不惜牺牲一切。他说：我奉召受痛苦……因我家人与我分离这么长久，有时我痛心。差会说，我应当回家。但我不能在这段时期离开岗位。我很想回欧洲，快去抚慰我受苦的妻子和幼小孩子，但心愿和次要责任，必须让位给更大的心愿和责任。

马礼逊的成果，被公认为基督徒对上帝的虔敬与坚韧不拔的精神所刻成的非凡的纪念碑。

1836年为纪念马氏，成立了“马礼逊教育协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1839年包留云（Samuel Robins Brown）从美国抵澳门开办马礼逊学校。至今在香港还有马礼逊纪念馆存在。

更正教在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拓荒时期（1807-1842）、广传时期（1842-1900）和本土教会时期（1900-1949）。鸦片战争前为拓荒时期（1807-1842），从马礼逊入华至《南京条约》的签订。期间，传

教活动被清政府禁止。早期来华传教士多在南洋和澳门的华人中布道，同时学习汉语、翻译圣经，为日后布道工作的全面展开做准备。南洋地区的马六甲、巴达维亚、新加坡、曼谷成为对华传教的前哨基地。

马礼逊之后，各国基督教传教士前赴后继，纷纷来华，建立教会，传授西学，改良风俗。总括来说，中国门户未开放以前，1842年鸦片战争前，共有24名传教士，从伦敦传教会、荷兰传道会、美部会，代表义宗、长老宗、安立甘宗、公理宗、浸礼宗，从英国、欧陆、美国各地来中国传教。³ 他们不为名不为利、抱着牺牲、冒死的精神，来传扬基督福音，使人得救，并创办学校，医院及各种社会事业，造福中国人民。

马礼逊和早期来华拓荒的宣教士，根据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形，建立了一个文字、教育、医疗配套的宣教格局，这个格局大体上沿用至1952年西方传教士撤离中国。

“我照上帝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哥林多前书3：11）

马礼逊的伟大，就是在了一块坚硬的巨石上，撒下了一颗具有生命的种子，使基督之花，终于开遍了整个中国。

马礼逊说，“现在所成就的一切善工，皆当归功于上帝，并要加以颂赞他。”

参考：

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海恩波著，简又文译，《传教伟人马礼逊》。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0年。

游紫玲，《平民阶级中的英雄马礼逊》。台湾：宇宙光，2006年。

3 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p138-139。

汤森，《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河南：大象出版社，2002年。

查时杰，《马礼逊与广州十三夷馆》。台湾：宇宙光，2006年。

马礼逊——克里斯多夫·汉考可专访

2014年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

根据英文采访整理

汉考可（牛津大学教授，马礼逊传记作者）：我叫克里斯多夫·汉考可Christopher Hancock，我是牛津大学的学者。近年来我的研究专注于中国基督教。我很庆幸能写《马礼逊传记》。

陈上宇：在这么多来华宣教士中，你为什么选择写马礼逊？

汉考可：他是第一位住在中国大陆的西方新教徒。可以说，他是新教传统有系统地在中国建立的始祖。许多爱主的中国信徒跟随他的脚踪。他最先参与现代宣教活动，学习中文，把圣经翻译成中文，并寻求解释中国文化，传导给西方世界。这些都是马礼逊在宣教事业上的显著贡献。

陈上宇：你提到马礼逊是新教徒的始祖，是宣教工场的一个里程碑。那么，可否请你谈谈马礼逊与先他而来的宣教士的关联？

汉考可：马礼逊对先他而来的天主教宣教士非常尊重。在他之后来的一些宗教人士对此有些诧异。如果有时间，你可以到牛津女皇图书馆看看。在一本书里，马礼逊刻意赞许这些人，欣赏他们尽职的建基工作。当他开始学中文的时候，他是站在他们所建立的基础上的。

陈上宇：是的，马礼逊当然并非独自一人工作。请你解释在马礼逊时代，是怎样的社会或个人动力，引发英国人差派第一位新教宣教士来中国的。

汉考可：马礼逊的出现有多种原因。一方面，他是从十八世纪英国的福音复兴中出现的。另一方面，也是英伦时代培养出来的。那时，马礼逊受到一种新精神的影响，他意识到他生命的召唤。当时在英国有一个基督教的苏醒，把福音带出去的使命感逐渐增长。同时，旅行开启，航海变得容易了，铁路也正在兴建。马礼逊正好处在这个文化和创业的契机，恰恰是英国社会的一个转折点。正如现今世代的一些国家，

马礼逊正是出生在那个时代。

他十几岁就蒙召。他不但被圣工，也被差传吸引。那时候，差传工作备受尊敬。像马礼逊这样，一个出身于劳工阶层，务农背景，生长在纽开索平常区域的人，一个新的城市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是开始一个新生命的机会，他可以作一个新人。许多早期的宣教士不但寻求属灵的，也寻求社会上的转变，那是一个发展和冒险的途径。所以经过了许多祷告，考虑了许多因素之后，他向伦敦传道会委身，而他们也接受了他。所以，刚过二十一岁生日，他就开始受训，开始学中文。

事实上，看看在他同时代的人也很有意思。英国正在进行一些很重要的工作。马礼逊的两位赞助人是威廉·韦伯夫斯和查理·西面。威廉·韦伯夫斯不但在国会里推翻奴隶交易，也是上层社会人士之间福音运动的核心人物。查理·西面在剑桥五十四年，是英伦教会福音传统的创始人。事实上，虽然当时看不出来，但韦伯夫斯、西面和马礼逊这三位杰出人士，都作了意想不到的大事：韦伯夫斯推翻了奴隶制度，西面改变了英伦教会，马礼逊作了当时最艰难的工作，先是学中文，再是把圣经翻译成中文。

起先，马礼逊曾想和一位伟大的非洲探险家一起出去，可是没有成功。所以他被送到最早的中国差传队。当然有许多人怀疑，在圣经协会的讨论中，伦敦传道会有人嘲笑他，怎么可能学会中文来翻译圣经呢？可是马礼逊决意要做这件事。

当时，宣教士不许乘坐东印度公司的船。所以他只能绕道纽约，在纽约乘上一艘船。六个月后，终于辗转到达澳门和广州。

陈上宇：那是1807年。

汉考可：这一年，也是韦伯夫斯开始得到多数票，反对多年的奴隶制度。那是非常重要的一年，真奇妙。

陈上宇：马礼逊从伦敦到中国，一定遇到很大的文化冲击。他初到中国时经历了什么？

汉考可：来华之前，他在伦敦跟一位很难相处的中国人荣三德上过中文课，他已经历了和不同文化的人交往的困难。那是一个很好的预备，因为他们两人一定有摩擦。就像到了月球或火星一样，让人震惊。当然，中国人对他并不友善，东印度公司也同样不友善。

当他到达的时候，他必须和美国人一起住，因为英国人不欢迎

他，他必须隐藏身份，非常困难，这是我们应当记住的。

五十年后到达的人，他们的起点和早期去的人非常不同。后来的人周围的支持比较多。马礼逊特别孤独，只有史丹顿，东印度公司唯一的公务人员，愿意给他一些掩护，保护他。

文化方面，他尝试模仿中国人的穿着，留辫子等，可是后来又改过来，不适应。他需要中文老师，他需要日用物品。在澳门和广州，他每天都需要别人的帮助。加上气候和身体的不适，真是令人惊讶地困难。然而，他渐渐开始与当地人建立融洽的关系。你只要在水坝上钻一个小洞，水就可以开始流淌。

马礼逊并不是随时都有生命威胁，但是，他也可能被疾病、风暴或者谁知道怎样的灾难缠住。他希望后来者无需经他所经历的艰难。早期宣教士是穿上衣服带着棺材出发的，他们不预计回家。

陈上宇：那时候从政府的立场来讲，学中文是不合法的。

汉考可：对，确实如此。你不能信奉其他的宗教，也不能学中文，这是与皇室的命令相反的。马礼逊知道他在犯法，帮助他的人也都知道，那就是一个挑战。

但是，当政者也发现，中国贸易的潜力很大，传译人员就变得非常重要。

对马礼逊来说，最困难的一个决定，终于在他结婚那天作了，就是要作东印度公司正式的传译人员，领取薪资。虽然学中文是违法的，交易却是被鼓励的。所以，两边都象是捏着鼻子说，我们需要一位传译人员，马礼逊就是那位传译人员。所以，虽然我们知道他是一位特殊的基督教开荒宣教士，他也是一个政府官员。在这个位置上，他终于安顿下来。几年以后，也是在这个位置上，他迟疑地被中国和英国所接受。他们需要他，他对双方赚钱有利。

陈上宇：让我们谈谈个人的压力。他单身去了中国，后来结婚，有了孩子。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汉考可：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决定对一个人内心的平安产生多大的影响。有些马礼逊写给差传协会和他的朋友的信令人感动。他觉得，伦敦传道会在多方面几乎与他断绝了，更甚者，他们的作法不负责任，没有财务上的资助，也没有与差传保持联系，宣教的训练是即兴的，工人一面作工一面受训，他们的计划都没有经过仔细考量。

因此马礼逊受了苦，他的钱很少。他的身体很强壮，这是他唯一的恩赐。可是在理智上，感情上，心理和灵性上，压力很大。

他和一位拜访澳门的医生的女儿结了婚，是一个典型的宣教士的故事。她有了一个孩子，她死了，他的儿子也死了，这样的压力使后来马礼逊和他女儿疏远。他再度结婚，又有了孩子。我们能感觉到他的压力，一个妻子死去，另一个回英国去了。他长期与妻子分离。他们写信，信要六个月才能到达对方。她接到信，写回来。一个来回，就是一年！不像今天，我们可以上飞机，六小时后就到上海了。

加上他不是生活在英国的基督徒中间，不是在那些对他的工作有兴趣的人中间作工。一年中，有六个月在珠江，另六个月在澳门。多半时间，他一定觉得像一条出水之鱼，可是他适应了。

当他回到英国的时候，是他在中国十几年之后。第一次休假是在1825年。十八个月后他回到中国。这一趟回来，他知道，他不会再看看到英国了。

陈上宇：在华期间，马礼逊终于盼到了帮助他的人，帮助他一同翻译圣经。完成后，他的同工也死了。

汉考可：是的，他死了。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是一个年轻人，他景仰他，就像查理·西面（Charles Simeon）景仰亨利·马丁（Henry Martyn）一样。马礼逊受到了这一位委身并且有能力的年轻人的激励。不过，这也是一个悲剧，米怜年纪轻轻就被主接去。可是，他翻译了圣经里很重要的一部分。

帮助他的当然还有中国同工。像我早先说过的，他们也一样重要，因为马礼逊是一个英国人，英文是他的自然语言。人们赞许初期宣教者所作的贡献，因为他们把基督教的精神融入中国文化。

陈上宇：当然，如果没有中国同工的帮助，圣经的翻译大概不可能完成。

汉考可：绝对的，马礼逊会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必须有人教他，他是个非常勤奋的学生。他购买并参考了许多书。只要在本地书店看到一本书，他就买来。他是个一流的学者。1817年爱丁堡大学颁给他一个博士学位，祝贺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他也参与创办欧洲的汉学，欧洲学者认同马礼逊的重大贡献。马礼逊说：我的圣经翻译不完美，有待改进。在它完成之后，他的儿子马儒翰几乎立刻着手改进。我想，虽然

马礼逊是一个独特而有能力的人，他却必须与其他人合作，而其他也需要与他合作。

陈上宇：不仅是圣经，也包括第一部华英字典，为后来的宣教士奠定了学中文的基础。

汉考可：对的，我们2007年在布莱德雷图书馆有一个关于马礼逊的展览。真是不可思议，有多集的字典和早先他翻译的东西，那时是没有先例可循的。他按照耶稣会和加尔文派，以及英伦的传统，作了一些祷告词，并发表了。他为后人预备资源，最原始的资源是那本字典，也有如何学中文的基础书籍。他还写了一个关于一个中国人在欧洲旅游的故事。

1825年，当他乘船回家去探望他的儿女，他预备了一本小书，帮助他们在默默的语言中了解中国。当他在伦敦休假的时候，他开办了一个语言学院。他说，我们不能把宣教士送到世界各地而不让他们先学当地的语言。但是这件事没有像他想像的那么成功，因为这个观念是超前的。不像现在，人们很自然地期待，如果要了解并在另一个文化之中工作，就必须先了解这个文化，最好熟悉那里的语言。

陈上宇：其中一位十九岁的女士，艾德绥小姐在他的课堂里。后来，她到中国去建立了第一所女子学校。

汉考可：这些是你知道的开荒人物。

陈上宇：马礼逊有许多第一，可以谈一谈其他第一吗？

汉考可：1820年，在广州发生了一场大火。对于马礼逊，那是一个转折性的经验。那场火很可怕，很有破坏力，可是他看到了两面，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坏的一面是，他看见他的中国邻舍完全不顾住在周围的人。在伦敦，如果有一场这样的火灾，每个人都会为了社区去扑灭这场火，可是这里的人不顾他的邻舍。基督的爱，在中国社会是缺失的。

这场火激励了他，他开始思考如何将实际的爱带给中国人，用一种中国人能够了解的方法，传递基督之爱。1828年休假回来后，他就开始鼓励照顾孤儿，他向彼得·派克求情，开办医疗差传，那是第一个医疗差传。他说：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话变为行动，中国人不了解我们的观念，我们必须让他们看见，必须展示给他们看。福音不仅仅要说出来，而且要行出来。这就开创了一个传统，一个马礼逊传统。

马礼逊讲了许多动人的道，你可以听到一个清楚的信息：神爱世人，不只是爱教会。神不偏待人，他不区分文化、语言和肤色。他爱世界，他爱世人。这是马礼逊带来的伟大信息。他说，我们不应该设法去改变文化，我们不应该说，我们比中国好，我们要去爱中国。那是一个挑战性的观念。马礼逊非常有同情心，福音要活出来。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美事。

陈上宇：马礼逊带到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教育，他开创了第一所现代学校。你可以谈谈这件事吗？

汉考可：英华书院办得很不错，他把西方最好的标准带到那里去。香港大学最初的源头就在那里。香港的英华书院是当时一座最伟大的图书馆。

可能印刷更重要。他印刷了很多圣经和字典。他设计了一套新的方法印刷中文字。他与新的活字印刷也有关联，这是他的另一个第一。他在广东和澳门创办了许多期刊，这也许有更长远的影响

陈上宇：工作了多年之后，他终于得到了第一个信徒，可以谈谈这件事儿吗？

汉考可：是的，他期望人们来到信仰之中，他组织了小小的查经小组，帮助他的人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坐在一起，一起研读经句。是的，最后蔡高终于受洗了。

他们如此来到中国，很少的果子有长久的生命改变，很少。我想，这是许多开荒宣教者的情形。马礼逊在他一篇讲章的开头有一句话：开荒者已被遗忘。他很了解，他是一个桥头堡，当他扑倒之后，许多后来的军队会来参加战役，可是他必须在那儿。他的工作果效甚微，可那不表示他的影响不是巨大的。2007年，在香港有美好的聚会，庆祝马礼逊来华一百周年。

他对中国的制度是一个威胁，因为他进入底层。我在中国大学教学的时候说：马礼逊认识中国像中国人认识自己一样，这是为什么他是具有威胁性的。他们不能说，他只是个无知的外国鬼子，他知道事实真相，从一个超越的立场看中国，那就是力量。

陈上宇：当我们研究中国差传史，发现一些记载，传说在汉朝就有人把福音带到了中国。许多年后，在唐朝、元朝、明朝和清朝，都像天上一闪而过的彗星，一会儿就消失了。可是，马礼逊带来的却似乎不

同，它生了根。现在，你看到他的果子极其丰富，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为什么？

汉考可：许多人说，十八世纪一直到现在，基督教在中国有了大复兴。也许这件事被高估了。许多我的学者朋友们在研究基督徒来到中国，进入中国的历史。

新的研究说，门徒多马到了中国。所以说，基督教在中国可能比在香港更久。多马到了印度，也可能一路到了中国。这么说，基督教在中国已经很长时间了，估计大约两千年，这不是新事儿。

我要向中国新教徒说的是，不要把你自己与以往的故事切断。以往，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做了信心的工作。他们进入中国传统，这是神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里要成就的奇迹。

以一个人类社会学家的立场来说，我不低估在中国发生的传奇。你如果到四川或其他的地方，你会看到那些出色的天主教家庭，你甚至会找到天主教村庄。他们没有受1949事件的影响，他们的信仰继续下去。你如果仔细观察那些出土文物，你会说，这不是中国文化，而是基督教的影响。我们可以做个比喻，就如商人在他们的袋子里带着种子，进入了中国。

陈上宇：人们对马礼逊能够在中国文化里运作感到好奇，基督教和中国文化必然能调和起来，让福音的种子生长。他如何在中国文化中运作？

汉考可：这就是耶稣教徒在十七到十八世纪努力要解决的问题，请想像，福音在这个文化里是如何被阐述的，这个文化的反应如何？我们如何以中国人所了解的，讲述并翻译神的道，而不让福音失去精义？

我猜，马礼逊知道，一个好的译者不但了解词汇的意义，而且了解当地文化。当他翻译圣经的时候，他需要做清楚的选择，我要翻译给什么程度的人？我是要翻译给儒家学者吗？或者选择用一般人的语言？这是个经典问题，因为不仅有知识区分，也有阶层区分。马礼逊必须作决定，最后，他选择翻译给中间的人，因而把两种人拉在一起。有人说他没有成功，不过这是他的选择。

有一段时间他有挣扎，因为他意识到，他被引到高级知识分子那里去，他推拒这个倾向，他说，我来不只是为了知识分子，我来是为了平常人，每一个人。因此他必须斟酌他的译文，我想，这是个真正的问

题，不只是在中国。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我希望鼓励人避免中国特异论，每一个文化都用文字接受基督教，即使在英国这个后基督教时代，基督徒见证者都面对很大的文化挑战，我们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阐述基督教，所以我不愿意陷入一个陷阱里说，在中国比在印度困难，或者在印度比在英国困难。

就算后启蒙时期的北欧，我们也必须作那个功课，像任何一个好的沟通者，我们建立桥梁。我们也许了解经节的意义，我们也许了解福音的真理，可是我们要建立桥梁，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沟通。马礼逊在这方面有最细腻的想法。后来，尤其是十九世纪末期的宣教者，有人指责他们要把中国变成西方的一块地。悲惨的鸦片战争，让马礼逊非常烦恼，他看见战争的邪恶。后来有些西方人要把西方文化强加给中国，然而中国自身要现代化。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中国有一个现代化的运动。

陈上宇：马礼逊显然是一个国学学者，他一定对老子、孔子很熟悉。有些中国人会说，我们有老子，我们有孔子，我们有美好的中国经典，我们有五千年历史，我们很好，我们不需要福音。然而，马礼逊来了，他说你们需要另外一些什么，你怎么看呢？

汉考可：他知道有孔子学，知道有老子学，他更直接地受佛教的挑战，全国各地的佛寺，他也明白民间的宗教挣扎，那些招魂术等。孔学是一个文化气氛，他很了解。可是在灵界方面，多是佛教，多是民间宗教和中国的迷信，这是他努力抗争的。人们问马礼逊，为什么需要基督教。有时候因为他讨论到罪，就引起更大的争议。他谈到人与全全能的神的分离。他明确地说，孔学世界观不完全，孔子只提到可能有灵，有天，孔学并不是超越的。

马礼逊是一个新教徒，他很辛辣，很真实，随时都愿意谈论一个没有接受基督为主的人的光景。他相信他是带着光到中国，到黑暗的世界。有些后来的人觉得那样是恼人的，他们觉得那是文化上的虐待，可是这是马礼逊到中国的动机。他在光中看到自由，在光中有爱，他看到可以破除传统孔学里的控制性关系。

爱那你不认识的邻舍，确实关心每一个人，破除一般文化所强加的约束，你有真正的自由，像我们看见在中国前四十年的美好景象。在福音之中，我们找到医治生命的新关系，一个新的开始。

陈上宇：我对你自己有兴趣，是什么让你对中国感兴趣？你为什么研究跟中国有关的事务？

汉考可：我想我只是动用了一点点脑筋。我年轻的时候，对世界上还不清楚的神秘文化感到惊异，到了七十年代，我开始看电视上那些摇着小红旗的人。有关毛主席的事件，让我这个牛津的年轻人变成了中国的观察者。

我有了跟从主的意念，所以我停止在领先的大学里教课，我觉得，这是灵里很满足的一件事，所以在七十年代末期，我研究基督教在中国，开始对它有兴趣。但是我花了五十年才真正有些了解。

陈上宇：作为一个中国观察家，你看中国的前途如何？宗教方面，社会方面，或者个人方面。比较一下马礼逊所看到的中国人和你现在看到的中国人。你看出什么差别吗？这么多年后，有希望吗？福音到了中国，许多人接受了基督，你觉得有希望吗？

汉考可：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充满希望，即使新闻黯淡，我想我们是有重生盼望的人。如果基督能从死里复活，没有事是不可能的。我们要一直带着希望看中国，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只能简单回答。

现今事情又变得困难了，在八十和九十年代末期曾有过真正开放的希望，中国在宗教方面又变得严一些了。我想，中国正面对一个很关键的选择，要往哪儿去？

这是在这个困难时刻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我要说，以后十年会更困难。长期来讲，中国和罗马会有一个正常的关系。我想，恢复正常关系对两个大势力都有益处。我们会看到，中国青年人不断地世界化，那会让中国越来越远离天安门，整个世界已经由不同的结构组成，这会产生一些新的事，使那些想要继续控制的人，更严格地控制那些无法控制的事。

中国有巨大的经济潜力。我对中国如何产生大批中产阶级特别感兴趣。中国需要明确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我相信中国是一个和平大国。我从来都希望如此，我不是一个攻击中国的人，世界不需要惧怕中国。

中国期待从孔家思想里找到所有道义和灵魂上的支点，然而这是不可能的。目前在中国有很深刻很真实的基督教经验，就像我们在新约约翰一书中所看到的景象。中国人自己在经历基督。

中国看见了光，可是我不愿意认为中国是特殊的，中国只是另一个国家。看看巴西，看看印度，看看俄罗斯，都在发生不平常的事儿。二十年前人们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我不这样看。神没有特别的子民，他爱世人，他会成就大事。我们喜乐地看到世界各地灵魂的苏醒。中国是神所作的整个工作的一部分。

陈上宇：回到马礼逊。你一定读了许多马礼逊的著作，有没有一件事，当你读到的时候，让你充满泪水？你记得有这样的一刻吗？

汉考可：有许多动人的事，他的故事感人肺腑，你不能不为他的一心一意，他的专注而惊讶。我看到一些未发表的，他写给家属的信，他提醒家人存有盼望，也让我看到希望。

有一封马礼逊的手书，用“爸爸”或“爹爹”给他的孩子们作结尾。我们看到这一位卓越专注的人，内心却是如此柔软。也让我们看到他和孩子们为福音所付出的代价和牺牲。他与孩子分离，明知或许再也见不到他的孩子。真是感人。

陈上宇：还有什么我没有问到的，你愿意分享的吗？譬如鸦片的销售？他对鸦片销售的意见如何？

汉考可：我找到一些马礼逊和鸦片销售的资料。从我们找得到的资料看，他显然内心有挣扎，他在一封信里说，这是一件邪恶的事。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帝国主义者，蹂躏文化的宣教者，绝对不是。

1825年和1826年他在英国休假，到处讲道，他确实成了一个名人，群众出来欢迎他，他被国王招待，他是个明星。可是他做了什么？他转而抨击英国文化。他不是线内的人，在英国没有地位，这给了他批评英国的自由，他确实找到英国对中国的关系里可批评的事实，他觉得很难作他的英国主人要他作的事。他不仅对中国，对英国也持客观态度。



戴德生： 流血流泪的巨人

假如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

——戴德生给妹夫的信1859年

这个人让人落泪！

他一语中的，说出了来华宣教士的心声。

他何止拥有千镑英金！他何止拥有千条性命！这位“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凭着信心，激励了多少西方宣教士来华，将福音从沿海推进内地，使基督之光遍洒中国。

如同亚伯拉罕，戴德生被称作“信心之父”。他的信心，带着血，带着泪。

如果赐下一儿

戴德生的父亲戴雅各（James Taylor, 1807-1881）出生时，正是第一位基督教更正教宣教士马礼逊启程去中国宣教那一年，1807年。

有一天，新婚不久的戴雅各和妻子贺美雅祷告说：“亲爱的神，如果你赐给我们一个儿子，愿他将来为你到中国工作。”

1832年5月21日，贺美雅24岁时，她的儿子出生了。他们为他取名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

与神立约去中国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未满16岁的戴德生，俯卧在地，伸开四肢，静静地俯伏在上帝面前，心中有一股不可言喻的敬畏和喜乐。他恳求基督给他一点工作。此时，他深深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属于他自己。

在祷告中，他确切地知道神对他余生的旨意。他说：“我觉得自己好像与至高无上的主宰立下了盟约，纵然我想毁约，也不能够……从那时开始，我对于为主到中国去的信念从未动摇过。”

也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为中国而活。

像刀一样刺透

21岁的戴德生于1853年9月19日，星期一，在利物浦乘坐“敦费士号”（Dumfries）启航前往中国。这是一艘货船，船上共23个船员，还有猪、鸡、鸭和狗，以及两只猫。

启程前，在船尾，母亲、一位叫戴安生的传教士以及一位老牧师给戴德生送行。他们唱着约翰·牛顿的圣诗，戴德生拿起手风琴，边弹边唱：

耶稣圣名，何等甜美，
属主圣徒爱听；
医治病伤，安慰悲苦，
消除心中忧惊。

母亲用慈爱的手整理他的小床，然后坐在他的身边，同唱最后一首诗歌。他们跪下，母亲祷告。

船快开了，与母亲道别，母子心里不敢奢望在世上能再相见。

戴德生单独伫立在甲板上，船开向水闸，母亲也跟着向前走。穿过水闸，与母亲真的要分别了。

戴德生后来回忆说：“猝然间一道哭声从母亲绞痛的心中决堤而出，像刀一样刺透了我，使我永远也不能忘怀。这一刻我才完全明白‘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的意义。我也相信，我挚爱的母亲此际对上帝毫无保留的爱的了解，比她终身所体会的更深。”

船，直到次年3月1日的春天，156天后，才安抵上海。

中国的第一个早晨

抵达码头，远远看到飘扬的英国国旗。朝着它，戴德生来到上海英国领事馆，可是，邮物处办公时间已过。他于是带着推荐信到上海的“伦敦会”见麦都思博士。麦都思将戴德生介绍给雒魏林医生（Dr. William Lockhart）。戴德生在中国的第一个晚上，就在雒魏林医生家中度过。

从房间往窗外看，可以见到城外清兵与城内小刀会对峙之局。右面是满清军队的营帐，左边是上海县城的城墙，还看见巡逻的守卒。

黎明时一阵隆隆炮声，把窗户震得格格响，但炮声过后，却是一阵晨鸟的清歌。戴德生走到窗沿，凭窗远眺，清晨的玉米在田中起舞，园中，草木吐着新芽，树木放着清香，花香扑面而来，这是他在中国的第一个早晨啊！

第一次中国装束

1855年2月，清军收复上海。

麦都思向戴德生建议，他到内地和乡间传教时，最好改穿中国式的服装。麦都思在1845年到种茶的山区时，就换了中国衣服。

7月27日，戴德生毅然做了一项重大决定，他要到乡间租一座房子，开始他的医疗及传教工作，并且穿中国式的服装。他找来一个中国理发师随船南下，花了五六个小时，剃头、染发、结辫子，痛苦的大工程方才告成。

第二日，戴德生换上新装，粗布棉袜，宽松汗裤，棉纱衫，又重又鲜艳的宽袖丝袍，棉布鞋。同工巴格尔上下打量他，最后眼睛停在他的裤子上，微笑着说：“你可以把两个星期的干粮都藏在裤管内。”

基督的香气

1856年3月6日，戴德生与宾惠廉两人离开上海直赴汕头。

汕头村落，没有王法，拳头就是一切。有一晚，戴德生听到不远处传来妇女尖叫声，有人告诉他，那是被迫为娼的妇女发出的。

大榕树下，三四十个人以及孩子围拢过来，聚精会神听戴德生讲话。“如果你们不吸鸦片，你们的生活绝对不会弄得如此倒霉……有一位是你们应该敬拜的，他就是造天地、造男女和万物的父神……”

炎夏，戴德生将大扇子吊在梁上，用绳子拉着纳凉。

一位汕头的外国基督徒医生回忆当日和戴德生相会的情形，说：“他整天在外工作，回到家里，腿酸痛，身体疲乏，炎阳把他的脸烫伤，长出满面水泡。他坐下来，好像精疲力竭似的。数小时后，又起来迎接另一天的劳苦和熬炼。我知道他很受中国人的尊敬，在他们中间做了很多美好的工作。他们在他们中间散发着基督的香气。”

见死不救

有一天，戴德生送同工祝恩赐父子回上海，船上，同行的中国人彼得不小心掉在运河里。戴德生跳入水中，却找不到他。他看到一艘有拖网和鱼钩的捕鱼艇。

“快来，”他大声喊着。“在这个地方打捞一下，有人要淹死了。”

“你给多少钱？”他们见死不救。

戴德生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给你们五块。”

“我们才不捞呢！给我们二十块吧！”

“我只有十四块。”

最后，渔夫才慢慢摇橹过来，可是，彼得被捞上来已经没气了。

戴德生后来追述这件事：“对我而言，这是极其悲惨的事，但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它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令人悲哀的事实。那些渔夫有拯救他人的工具，可是他们不用！先知拿单说：你就是那人！不愿去拯救人的身体是否就是硬心和恶毒呢？那么，不顾灵魂的灭亡，罪岂不更大？凡像该隐般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么？’他将受极重的刑罚。耶稣基督命令你，命令我，去到地极，把福音传给万民听。”

她是我的珍宝

酷暑天，暴雨，妇女祈祷会在祝恩赐和戴德生家举行。戴德生与玛丽亚终于得以会晤，祝恩赐夫人也在场，三人一同跪下祈祷。

戴德生因照顾染天花的郭达门（John Guarterman）感染病毒，开始发烧。“凌晨三点，手表跳动的声音使我不能入睡，起来读圣经，心跳如惊弓之鸟，兴奋得难以入睡。突然间，好像玛丽亚无声无息来到，平安和宁静悄然临到。我好像被魔术定住，闭眼伸出手来，她用柔软的手轻轻握着我的手，我不禁睁开眼来，感激地望着她。她示意我不要作声，又将另一只手放在我的额上。我觉得头痛正在消减，热也退去，好像沉到枕头下。‘不要害怕，不用不安。我是你的玛丽亚，你是我的戴

郎。保持平静，好好安睡吧。’她微声说。就这样，我便睡着了。第二天醒来，烧全退了。”

在劳尔顿（Knowlton）夫妇家，戴德生与玛丽亚第一次单独相会。他们并肩坐在沙发上，戴德生轻轻抱着玛丽亚，另一只手紧握着她的玉手。“她给我一个香吻……她是那么可爱、尊贵、纯洁和虔诚的一位女孩子。”戴德生给他妹妹的信中说，“我尽可能让她补偿我过去数月来应得的吻！”

1858年1月20日，刚满二十一岁的玛丽亚身穿灰色丝裙，头上披着婚纱，极其美丽动人；戴德生身穿中式长袍，背上挂着长长的辫子。高富牧师主持婚礼，全众齐唱“远离偶像”。之后，他俩在英国领事馆举行结婚仪式，美国领事借出私人轿子，是当时宁波最有气派的轿子，供他们乘坐。共有二十四位朋友参加婚礼。

戴德生给妈妈的信：“我们真快乐……他答允了我们的祈求，排除一切障碍和反对，坚固我们对他的信心……她是主赐给我的珍宝，是世上最好的礼物。”

以便以设耳



传道会在负债，差会不能如期发薪水。戴德生二十五岁生日过后，向中国传道会请辞，开始独立传道。

戴德生在楼下会堂悬挂了一幅中文对联：“以便以设耳”（到如今耶和華都帮助我们）和“耶和華以勒”（主耶和華必预备）。

1757年11月18日：“在许多人心目中，我是非常贫穷的。从某一角度来说，不错，这是一个事实，但我感谢上帝，因为我‘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上帝供应我的一切，愿所有的荣耀都归于他。假如换了别的处境，我便不会完全倚靠主，也不会利用他的供应来帮助别人。”

有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们清缴了一切开支，又购买了明天的食用之后，手上已不名一文。我们不晓得上帝如何供应星期一的需用。正如我们的壁炉上挂着的一副中文对联所说的，上帝会供应我们，帮助我

们。

就在那一天，支票来了，而且正好星期一就可兑换成中国货币。啊！直接靠主而生活，是何等甜蜜，他永不误事！

1858年1月6日：我和祝先生总共只有一文钱。面对试炼，我们再次来到上帝面前，向他求救助，他会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供应我们一切所需。

祝先生和我在柜橱里找到一小包可可粉，用热水冲了喝，总算有点东西下肚……在我们跪下祷告的时候，从英国寄来一封信，内中附有一份捐款。按时的供应不但解决了燃眉之急，并且叫完全依靠上帝，又愿意侍奉他的人不至于羞愧。

为什么不早来？

在宁波桥头街听戴德生讲道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名叫倪永发，是个棉花商人，是一派改革佛教的领袖。

他说：“我父亲和我多年来不断追寻真理，并四处游历，仍无法获致。在儒教、佛教和道教之中，我未能找到安息，但今晚我却找到了！从此以后，我要相信耶稣。”

倪永发问：“英国人认识福音多久了？”

“大概几百年吧！”

“什么？”倪永发大声叹息道：“为何你直到现在才把它告诉我们！先父寻求真理二十多年，可惜志未酬身先殒；为何君不早来？”

假如我有千条性命

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后，外国人可自由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并得到官府的保护。

8月，玛丽亚的姐姐宝丽娜患霍乱死亡。玛丽亚早产，婴儿夭折。

巴格尔夫人患上霍乱，戴德生担负起管理医院及诊所的责任。36小时之后，巴格尔夫人去世，留下巴格尔医生和五个孩子。巴格尔别无选择，带五个孩子回英国。

自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始，已有二百多位传教士步其后尘。其中四十人丧生，五十一人的妻子去世。然而，祝恩赐却如此说：“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还是选择这个地方做同样的工作！”

9月中旬，戴德生正式接替巴格尔的工作。

“为了应付这工作的庞大开支，我必须仰望主。”终于有一天，戴德生的老朋友兼厨师来对他说：“我们只有最后一袋米了。”戴德生回答说：“那么主的供应也必然近了。”就在此时，他收到布迦（William Berger）先生的一封信，“我承受了父亲的遗产，信中附上50镑。”哈利路亚！

1859年新年，戴德生在病榻上度过。他给父亲写信：此地人民不断沉沦，神却不断祝福我们的工作，只是我们已筋疲力尽，需要人来帮忙……父亲啊！您既然已奉献了您的儿子，请您再奉献您的影响力！”

同一天，他写信给新婚的大妹和妹夫，说道：“假如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

到1860年3月，桥头街的教会已经有二十一名会友。可是，戴德生健康受损，怀疑能否活过夏季，6月，终于决定返回英国。此去可能永不重回。

走向灭亡的人龙

1865年，戴德生在英国期间，完成了一部小册子《中国——属灵的需求与呼求》，产生很大的影响。

戴德生在房中踱着方步，玛丽亚手录成书。

他们用了—个很好的比喻：“如果中国人排队经过你面前，以每日走30哩的速度计算，他们不断地走，日复—日，年复—年，也需走上

十七年又三个月，这条人龙才走得完！”

这部小书使很多读者难过不已，销路极佳，到1887年已经印刷了七版。他在研究和思考中得着更深一层的异象，他意识到，要到中国内地传教，必需有一个特别的组织。它将是一个海外布道团，由不同宗派背景，但对宣教、植堂和教会培训很有负担的男女信徒组成。他们需要藉着祈祷，单单依靠神的引导和供给，进入中国内地，向十一个省的未得之民传道。这个组织至少需要二十二名传教士。

“沉沦中的中国令我忧心如焚，日间难以安宁，夜里不得休息，以致健康日坏。”

十镑加神所有的应许

6月24日，好友皮尔士（George Pearse）邀请戴德生到布莱顿（Brighton）度周末。

主日，“看到一千多基督徒在那里喜乐地聚会，千万中国人却因不知道福音而丧失，我不能再忍受了。我在沙滩上漫步，灵里极其痛苦。这时，救主征服了我的不信，我完全降服在他的面前，献上自己，为他所用。我把一切困难和后果交托给他，我和我的同工只能作他的仆人，服从他，跟随他，由他引导，由他看顾，由他带领。不用说，平安立刻涌进我烦恼的心里。在此时此处，我要求他派遣二十四位同工到中国去，十一省每省二人，另加两人往蒙古。我把这个请求写在圣经页边。”

戴德生题字的那本圣经至今尚在。在约伯记第十八章上面：“为二十四名甘心而能干的工人祈祷。——布莱顿，1865年6月25日”再往后看，又见几行字：“争战已经结束——只有平安、喜乐。仿佛要立刻振翅高飞，越过车站旁的高山，直朝皮尔士家飞去……”

他把握时机，立刻和皮尔士到伦敦郡立银行，用“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名义，开了一个户头，存入十镑，虽然数目不多，但正如戴德生后来所说，它是“十镑加神所有的应许”。

内地会有六个特色：不论宗派、无固定薪金、不募捐、当地工场人员管理、系统切合实际的活动、中国装束。

猪尾布道团

戴德生带着同工回到上海的时候，上海报章拿他们作笑柄，称他们为“猪尾布道团”（Pigtail Mission）。

1866年“兰茂号”抵达中国时，他们没有希望可以进入内陆传福音。但凭着信心和祷告，以杭州和宁波作为基地，他们慢慢把工作向南推展，直至沿海浙江。经验渐丰，他们把福音伸展到江苏、安徽和广西。这样工作大约花了十年时间，当中饱经病苦、死亡，以及群众激烈的反对。每到一地，想要住下来宣讲福音的时候，便往往被赶走。

除了上述的几个省份，中国内地大部分地方仍然没有基督徒为上帝作见证；一直要到1876年，中国内陆的大门才一一开启。在短短两年内，拓荒者深入西南面的缅甸边界，西北面则远及蒙古和中亚细亚，甚至西藏一带。

在杭州教会发展的同时，曹雅直（George Stott）于1867年12月从宁波来到温州。由于只有一条腿，当地人以“独脚番人”称他，他对神大有信心。1868年为温州第一个基督徒、鞋匠叶钟杰施洗，同年设立一所男校（崇真小学），1870年曹夫人兴办女校（育德女学），1880年开设了温州最早的一家西医院。如今，温州是全国基督徒最多的地区。

只要念及中国广大的人口及辽阔的地域，不得不承认，这是近代宣教士中无可比拟的成就。有赖工场中的同工恒切祷告和牺牲，并得力于他们的家人和弟兄姐妹的支持。

1898年至1900年间，内地会工人的人数不断加增，分别来自英伦三岛、北美、澳大利亚、斯堪的内维亚、德国、瑞士、以及其他地方。不计较彼此国籍，宗派的分野，一致效忠于主耶稣基督，以圣经所启示的福音为真理的核心。他们所关心的，乃是为基督徒抢救灵魂，并且替他们建立有活泼生命的教会，荣耀主名。

摘取的玫瑰

戴德生一直想要一个“小玛丽亚”，所以1859年他的女儿戴恩惠在宁波出生时，他是多么高兴。

8月，戴德生疼爱的女儿得了脑膜炎，开始神智不清，戴德生刚巧不在家。童根福把她抱进屋子放在玛丽亚床上。福珍妮写道：“我永远不能忘记她的样子……安详地躺在他的臂弯里，美丽的长发不经意地洒落在肩上。真是漂亮极了！”

接到消息，戴德生立刻赶回新巷。他心碎至极，整天哭泣。他对八岁的女儿说：“我想耶稣会来接你到他那里去的，你把自己交托给他，不会害怕吧？”“不会的，爸爸！”女儿微声回答。

第二天，戴德生给布迦先生写信：

亲爱的兄弟：

我不知道怎样下笔，也不知怎样控制自己。我好像是在万王之王的内室给你写信——这是神圣之地。此刻我坐在长椅旁边，竭力想给你写几句，而椅子上躺着我爱的小恩惠，她正在死亡的边缘……亲爱的弟兄，我的心灵和肉体都软弱不堪，但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永远的山寨。到中国宣教不是枉然，也不是不智的行为。纵然知道这里的环境、人事和气候，我还是把我挚爱的妻子、亲爱的儿女和我自己，奉献在祭坛上，为神工作。

小恩惠停止呼吸了。照顾她的包马利这样写道：“我从未见过像小恩惠刚去世时那样美丽的脸庞，世上绝难看到如此甜蜜可爱的神情。”

戴德生写道：“她不能再回来了。但又不是真的‘失去’她……只是园主来，把玫瑰摘取了。”

1887年，戴德生在北美带领十四位勇敢的宣教士到中国内地，在多伦多欢送八位女士和六位男士启航的时候，一位父亲说：“我没有那么宝贵的东西，可以献给我的主耶稣。他要求我把最好的献上，我就全心把我最好的献给他。”

这位父亲的话让人落泪！福音就是这样在中国传开的。

比宝石还珍贵

四十岁的戴德生翻山越岭徒步前往泰州。神经性头痛厉害，焦虑和过劳，此时内地会的组织和人数已接近当时中国最大的差会——伦敦会。

戴德生写信给布迦先生，有关招收内地会成员，他说：“如果他们是真心的、忠心的内地会会员，他们将会受到嘲笑和讥讽，甚至敬神的人也起来反对他们……要中华归主，我们不能靠那些安静、温柔和可爱的男女……我们需要的是任何时间，都把耶稣、中国和灵魂放在首位的人……他们甚至认为生命也是次要的……这样的弟兄姐妹，尽量差来，愈多愈好，他们比宝石还珍贵！”

我向他呼求

曾任戴德生私人秘书的传教士白安美带着戴德生四个较大的孩子返回英国。

1870年2月，森姆感染了肠结核，不到六岁就去世了。玛丽亚也感染了同样的病。她的婴孩于7月出生，取名诺尔（Noel）意平安，7月20日夭折，只活了十三天。此时，恩惠、森姆、诺尔，戴德生的三个孩子相继去世了。

玛丽亚说，“我的头烫得很。”

戴德生给她剃了头发。她伸出柔弱的手抱着他亲吻。

曙光初露，玛丽亚到了弥留之际，那是7月23日。

“亲爱的，”戴德生说：“你快要离开我了，你知道吗？”

“要离开你？”她回答说：“你这样想吗？什么令你这样想呢？”

“是我看出来的，亲爱的。你已支持不住了。”

“是吗？我不觉得痛苦，只是感到疲倦。”

“是的，你要回天家了，你很快便可与主耶稣在一起。”

“亲爱的，我很难过。”

“亲爱的，你与耶稣同在，不会感到难过吧？”戴德生问。

他永远不会忘记她回答时的眼神，她说，“啊，不，不是的。亲爱的，你知道过去十年中，主与我的灵魂没有隔阂。我决不会因往他那里去而难过；只是在这时离开你，留下你刁然一身，我才觉得难过。然而，他会与你同在，供给你一切的需要。”

她给戴德生几个亲吻，要他分给英国的儿子和女儿，也给每个人留下几句话。之后，她一只手抱着戴德生的颈，另一只手摸着他的头，示意他仰望天家。他看到她脸上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爱和依靠”。她的唇在动，但发不出声音来。之后，她便睡着了。

戴德生跪在床前祷告：“亲爱的神，谢谢你将玛丽亚赐给我；谢谢你给了我们十二年半在一起的时光；谢谢你把她接到你的身边。我在此重新将自己献上，为你工作。阿们。”

他把玛丽亚的一缕柔软浅棕色几乎金色的头发寄给她的父母，也给每个孩子一缕。

在镇江长江边，韦特家，戴德生写道：“几个月前，我的房子是多么热闹，所有人都在我身边。但现在何其孤寂——森姆、诺尔和我宝贝的玛丽亚都回到主耶稣那里；年纪较大的孩子又离我这么远，连小查理也在扬州。从前，我也曾离家出外工作；但每次回家时，总是受到热烈欢迎。但现在只有我独自一人……但我有回家团聚的盼望，而这次团聚后，便再也不分离……”

戴德生给母亲的信：“他——亦只有他——知道我的爱妻对我是何等重要。他知道我眼里的光彩和心中的喜乐，都在乎她。但他认为把她召回是好的；我也相信这对她确实是好的……她在神的慈爱中安然离去，没有痛苦；对于独自劳苦的我来说，亦未尝不好——我与神比从前更加亲近，所以也不觉孤单。”

日后他回忆说：“当我独处房中，久不见爱妻身影、不闻小子女之脚步声，恐怖的空虚之感向我袭来，自此我方明白为什么主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恐怕一天有二十次，不分昼夜，当我心一再渴了，我向他呼求，他就火速来到，安慰我……”

与猪同寝

高大、强壮的划船选手，男爵之子，“剑桥七杰”之一章必成（Montague Beauchamp）把戴德生的信息编辑成书，称为《蒙福的日子》（*Days of Blessing*）。书中记载：

1886年，去汉中的路上，戴德生骑着骡子，另一匹骡子驮着行李，章必成徒步，黑暗中迷路。章必成累极睡着，醒来时，发现戴德生为他弄了一个蚊帐，使苍蝇不能骚扰他。好几次，高大健壮的章必成，把戴德生背在肩上过河。

暴雨中前行，村内没有客店，只好找到一处猪舍，借了一些长凳，把门卸下来放在凳子上作床，用毛毡包着。但过不久，那些猪怒气冲冲奔进来，冲破篱笆，躺在地上，与一位庞大差会的会长，以及日后继承父亲爵位的绅士，一同分享那间简陋的猪舍。

章必成听见戴德生唱歌，部分歌词是：“主啊，感谢你赐食物。”

“食物在哪里呢？”章必成问。

“不远了，”戴德生微笑回答。“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饥饿，不久会送早餐来。不过，你要等食物到了才谢恩用饭；我却马上开始感恩了。”

真的，一两分钟后，他们就遇见一个售卖饭食的人。

章必成每天清早喂骡子的时候，总看见戴德生在烛光中读圣经。

但是我能依靠

在宣教史上的拓荒期，宣教效果并不显著，大部分归信基督的人，都是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乡民。宣教士并不受中国的知识分子欢迎，甚至受到怀疑和鄙视。1900年，这个哺育中的教会和成长中的宣教组织，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义和团之乱中，内地会损失了五十八位传教士，还有二十一名传

教士子女丧生。内地会许多弟兄姐妹在逃亡途中，忍受了极大的苦难。

当时戴德生在瑞士养病，获悉这惨痛的消息后，他说：“我不能看书，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不能祷告，但是我能信靠。”

到了十月，他身体略微好转，开始阅读中国事件的详细报告。一天早晨，外面一片大雪，满山白雪皑皑，儿媳金乐婷跟他一起阅读。

他读到韦姑娘和史姑娘的信。含着眼泪说：“现在，他们在那里也不会感到遗憾，因为他们得到永不褪色的冠冕，主说，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的。”

七杰之一何斯德（Dixon Hoste）来帮助。戴德生直觉他是神安排来接替他的。所以在1900年8月，认为自己离世的日子近了，就发电报到上海，委派何斯德任内地会署理总主任。

再也不离开

1905年春天，戴德生第十一次探访中国。在镇江，他独自在河边墓地散步，那儿埋葬着玛丽亚和他的四个孩子。

在汉口，三位宣教老兵杨格非（73岁）、丁魁良（78岁）和戴德生（72岁）相会，一起唱赞美诗，合影。

5月26日中国基督徒为他庆祝七十三岁生日。他脸上洋溢着单纯的喜悦。那时，内地会传教士有八百名。

长沙，儿媳金乐婷从阳台上下来看望戴德生，见他躺在床上，侧身挨着一张椅子，点着一盏油灯，放着一堆信。突然，他转过头来，抽搐了一下，便不醒人事了。这位中国人的挚友就像小孩般安详地睡着了。

何斯德主持葬礼。葬礼前，一位年轻的中国传道人和他十八岁的新娘子来到戴德生床边，问“我可以摸摸他的手吗？”

戴德生与玛丽亚和四个孩子埋在镇江的墓地。

戴家后代

从1865年内地会建立，扎根时期（1865-1875），36名宣教士，56个福音站，28座教堂开始，经过拓荒期（1875-1885）和国际化时期（1885-1895），至世纪交替时期（1895-1905），宣教士已发展到825名，福音站721个，会堂703处，教堂418座，学校150所，中国同工1152个，受洗人数18625人。

自1854年戴德生渡海来华起，戴家及亲属世世代代奔向动荡不安、苦难深重的中国。戴德生后人，戴存仁、戴永冕、戴绍曾、戴继宗陆续到中国宣教。如今，第五世孙戴继宗牧师，戴贺美的后人海杰姆夫妇，仍在华人中事奉。内地会演变成“海外基督使团”。

1988年，戴德生曾孙戴绍曾和妻子及江苏镇江教会的胡士辉牧师，在镇江昔日英领馆遗址发现戴德生墓碑，该址现已成为一所博物馆，碑文完整无缺，写着：“恭敬纪念令人尊敬的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牧师。生于1832年5月21日，死于1905年6月3日。在基督里的人。”

参考：

戴德生，《带着爱来中国》。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年。

蒲乐克著，严彩绣译，《戴德生与玛丽亚》。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77年。

史蒂亚著，梁元生译，《戴德生：挚爱中华》。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90年。

徐欣娴，《全然奉献为中国的戴家：从戴德生到戴继宗》。台北：宇宙光，2006年。

张陈一萍、戴绍曾、戴继宗等编，《唯独基督：戴德生生平与事工图片纪念集》。香港：海外基督史团，2005年。



出使天国： 李提摩太

我们来到中国，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拯救；不是为了毁灭肉体，而是为了充实灵魂；不是为了使人悲伤，而是为了给人幸福。

——李提摩太日记1879年

中国名著《西游记》有一个译本叫《出使天国》（*A Mission to Heaven*），是英国宣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的作品。⁴

1869年，李提摩太东到中国时，正逢一个惊心动魄的时代。在清朝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李提摩太无疑是一个领军人物。带着天国的使命，他在中国人中间服事长达45年之久，下至灾民，上达朝廷，深刻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改良。所到之处，留下一片光明。

4 Timothy Richard,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李提摩太《西游记》英译本，出使天国，圣僧天国之行）。Shanghai: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s Depot（上海广学会），1913。（此译共100回，前7回为全译文，第8至100回为选译。）

骏马待飞

驾驭奔马的少年

1845年10月10日，李提摩太出生在英国卡马登郡（Camarthenshire）的一个名叫弗迪布兰宁（Faldybrenin）的小村子。这个村子又叫国王谷（King's Fold），传说威尔士末代王子卢埃林（Lewellyn）曾藏身于此，以躲避爱德华国王的追捕。

父亲提摩太·理查德（Timothy Richard），铁匠兼农民，并在两处浸信会教堂担任秘书兼执事。提摩太是九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母亲性情温和和蔼，做得一手无人匹敌的好煎饼，“即使是马利亚和马大加在一起也望尘莫及”（Rev. Kilsby Jones 《威尔士名人录》）。这样一个务实而敬虔的家庭，培育了李提摩太简朴的生活作风、正直的秉性、强健的体魄和坚毅的性格。

李提摩太在农场长大，童年的日子有不少惊险趣事。四岁时，有一天他因好奇犁地，马儿掀起一块石头，正砸到他的额头，留下一个丁形疤痕，恰是他名字的首个字母T。12岁，他驾御着三匹马，拉煤飞奔下山，马儿失控，却在惊险关头奇迹般地转危为安。⁵ 上帝似乎已经在这个特殊的孩子头上，画上了惊险、蒙福的印记。

15岁时，李提摩太在1859-1860年宗教复兴运动中重生。他在乡下小河里接受洗礼，成为英国浸礼会的教徒。从Salem Chapel回家的路上，他告诉比他大四岁的哥哥，“做礼拜时，我感觉到好像有个声音命令我到国外去当宣教士。”

李提摩太16岁开始自立。在一所矿山小学当老师，白天教孩子念书，晚上给矿工们开办夜校。同时，在莱尼巴塞的文法学校念

5 苏慧廉著，关志远等译，《李提摩太在中国》。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p. 8, 15。

书，在校长不在时，担负管理该校的职责。不久之后，他担任了新店（New Inn）小学的校长。接着考入了温斯西师范学院（Swansea Normal School）。18岁，他便当上了康威尔埃沃特（Conwil Elvet）捐助学校的校长，该校人数达120人。少年李提摩太已经显露出非凡的领导能力。

期待神作大事

李提摩太所属的差会浸信传道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差派了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的教会。威廉·克理有一句名言：期待神作大事，竭力为神作大事（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1865年，20岁的李提摩太考入盆布鲁克郡（Pembrokeshire）的哈弗福特韦脱身学院（Haverfordwest）。在那里，学生们要求跟上时代的步伐，用现代语代替希腊语和拉丁语教授欧洲史和世界史，并要求学习科学知识。神学院院长Dr. Davies是“威尔士最出色的神学家”，罗斯博士（Rouse）曾在印度做过宣教士，获得过伦敦大学的金质奖章，也是一流教授。在神学院，李提摩太受到了良好的神学教育，并赢得希伯来奖。

还在神学院时，李提摩太就已经决意去中国。他选修了埃及、印度和中国历史课程。毕业当天，他就被浸礼会批准去中国。1869年被按立为牧师，被派往中国山东传教，当年24岁。差会问他为什么到中国，他回答说，中国是非基督教国家中最文明的一个，只要中国人皈依了基督，他们就可以帮助将福音传到不发达的国家中去。

1869年11月17日，李提摩太在利物浦登上了英国蓝烟囱轮船公司的“阿基里斯”号出航，于1870年2月12日抵达上海，2月27日到达烟台。

一、山东八年（1870-1877）

初到烟台

最初接待李提摩太的是已在烟台第七个年头的Laughton牧师。原来在烟台的八个英国浸礼会宣教士已先后病故，四个月後，Laughton牧师也被伤寒夺去性命，留下只学过四个月中文的李提摩太，形单影只，单独负责浸礼会在烟台的教务。

在Laughton牧师的葬礼上，冲出一个持枪的暴徒。回租界后，宣教士们得知，法国领事及21位修女被杀害。显然，向年轻的李提摩太袭来的，不是文明，而是动荡。

可幸的是，当时在烟台有一群充满了激情的宣教士同仁，包括广学会创办人韦廉臣，李提摩太称他为“一个伟大的、实际的、理性的、高尚的人”。还有倪维思、狄考文、郭显德，以及优秀的中国助手程先生。

贩书之行

李提摩太一边苦学中文，一边开始传道。来华第一年，李提摩太与罗伯特·李利牧师（Robert Lilley）在山东半岛行150英里，售卖圣经和书册。次年，又与李利牧师五次在烟台转悠，并穿越了满洲，到达朝鲜边界鸭绿江边。这是一次冒险之旅，满目苍痍，看到的是痛苦、废墟、死伤。途中，为了避免中暑，李提摩太把一个枕头绑在了头上。李利戴着一个头盔。居民们喊道：“看那，那家伙头上戴着一个洗脸盆！”

当时，宣教士的交通工具多种多样。陆地，有轿子、马、驴、骡子、骆驼、手推车，两轮马车、乘子等。水路，中国也许是世界上人力船种最多的国家，让人印象最深的可能要数脚踏船了，船夫用手掌舵，用脚划船。

“洋鬼子小贩”的消息传开了

因强盗横行，宣教士们必须把钱分开来携带。可是当时中国的银子是按“锭”流通的，每锭有拳头那么大，5镑重。李提摩太就把银疙瘩拿到银匠那里，加热发红，敲成薄片，切割成重1-2盎司的方块，缝进衣服的不同地方，以防强盗。

路上遇到人常带着武器，肩上斜挂着一杆长矛或旧式的火绳枪.....有人喊“有土匪！”李提摩太回忆道：在前面河流对岸，有一帐篷，11个骑马的人正向我们住宿的旅馆跑去。我们赶紧调转马头，向一个刚刚路过的农家奔去。在门口遇见一个60开外的老太太，我们问她可否能让我们把马赶进院子，等土匪走了再上路。她立刻说，“我有一些庄客在地里干活，我这就派我女儿去把他们叫回来保护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能说我们的话，不然，刚才你路过时，我就会请你们进来的。”

北方景色，数千平方英里的高粱摇摆着沉甸甸的头。在数英里之外，一队骑马而来的人是根本看不到的，只听到嗒嗒的马蹄声。土匪突然看到两个欧洲人站在前面，大喊起来，哎呀，不得了了！仿佛看到两个魔鬼一样，立刻转头跑开，同时向天放了一枪，给同伙发个信号。

为了自卫，李提摩太他们每人配备了一把左轮手枪。但是拿着枪去射击他们想要拯救的人确实有违初衷，于是，他们把手枪插进草房中的干草堆里，赤手空拳来到门外。

很快，土匪头子又骑马回来。问李提摩太要到哪里去，去干什么？他们说，卖书的。什么书？劝人为善的书。送书给他们，被谢绝了，因为看不懂，都是文盲。土匪说，从来没见过外国人，来见识见识。然后调转马头，放了三枪就离开了。

后来一传十，十传百，“洋鬼子小贩”的消息就这样传开了。

沿途死城和睡着37个人的土炕

经过辽宁省抚顺市东浑河南岸的萨尔浒，吃惊，整座村子就像一

座死城，所有门窗都用土砖封起来，每隔不远就有一个哨兵，手里拿着武器，子弹飞过身边。他们轮流警戒，李提摩太整夜没睡，凭记忆温习欧几里德几何学第一册来保持头脑警觉。

第二天，到达凌开，找不到旅馆。一个客人把他们领进自己的房间，屋子外面很冷，屋中炕洞火焰熊熊，温暖如春。

下一站是老城，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附近，在一座曾经是监狱的旅馆住宿。来了一个凶神恶煞的家伙，手拿马鞭。李提摩太发现，边上站着政府官员。第二天，六名卫兵被派来，护送他们走完整个旅程，士兵还帮他们卖书。

鸭绿江边是满洲肥沃的土地。可是，30英里外，韩国境内正发生一场严重的饥荒，母亲们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孩子以换取食物。

李提摩太意识到，所有这些灾难都源于人们对交通缺乏管理和对通讯意义的无知。

取道牛庄返回山东途中，他们和另外37个人挤在一张大炕上，其中一个女的。李提摩太想，这块许多方面都可以说是“流着奶与蜜”的土地，应当能被妥当地加以管理，让这里的人民过上幸福昌盛的生活。

福音的追述

中国人对外来文化有很大的包容，中国曾经是开放的。

汉朝，外国商人和僧人均被接受。

唐朝，朝廷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景教徒、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摩尼教徒和日本人。唐太宗接待大秦主教阿罗本，景教盛行。直至唐武宗灭佛殃及景教。

元朝，朝廷鼓励外交。马可·波罗曾在元世祖忽必烈与罗马教廷之间搭桥。教皇派孟高维诺出使中国，也里可温教盛行。

明朝，因日本海盗，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对中国人大规模屠杀，荷兰人的侵略，蒙古人对北方的侵扰，迫使朝廷采取闭关锁国政策，所有外国人被鄙称为“夷人”。

清朝，康熙帝曾欢迎天主教士在朝廷修历，康熙帝本人几乎踏入信仰之门，后因与罗马教廷发生礼仪之争而禁教。雍正后，中国进入关

闭锁国的阶段。

意大利神父利玛窦于1583年来华，并进入明廷，为天主教入华奠定基础。英国宣教士马礼逊于1807年来华，传入基督教更正教。鸦片战争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五口通商，宣教士在炮火中涌入中国。1856中法战争，1858年《天津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宣教士得以进入内陆建立教会、学校、医院，传教事业得到了实质性的进展。

从“说书的洋人”到寻找“好土”

开始，李提摩太也像其他宣教士一样，每天去街头小教堂布道，或坐在茶棚或露天，讲述故事，穿插些幽默和俏皮话，分发福音书册和单张。因收效甚微，他感到十分沮丧。很快，他开始寻找更为有效的途径。

主耶稣播种的比喻给了李提摩太很大的启示，他在新约中发现极好的传教方法和教义。从那以后，他开始实施寻找“好土”、“寻找上等人”的计划。因为李提摩太意识到，“他们形成的土壤最适合于我们播种福音的种子。”

有一次，李提摩太到烟台的庙会和集市，龙山脚下宋村没有一家旅店接待他。他走到街中央一块大石头旁，坐在石头上，手里拿着马缰绳。一会儿，四周聚集了一大群人。

“你打算喂喂你的马吗？”

“当然！但是到哪里去喂呢？”

一会儿，一个厨师系着一条油腻腻的围裙走来，说，主人听说旅馆因为害怕而拒绝让李提摩太住宿，就派人来请他到家里来。他有两个儿子正在读书考秀才，他们如饥似渴地了解外面的情况。他把邻村的校长们也请来了。他们与李提摩太就外国文明和宗教进行了多次交谈。

又有一次，在庙会开始前，李提摩太礼貌地征得和尚同意，参观了寺庙，并与人们说话。在那里，他找到一个制高点，庙会的情形尽收眼底：音乐、彩旗、锣鼓、行人、焚香、鞠躬。李提摩太发表了一个演讲，演讲完毕，有人邀请他去参观访问。“这是我面向大群听众所作的

最有纪念意义的布道尝试。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还不是最有效的传道方式。”

在宁海州（今山东牟平县），李提摩太因救房东而受侮辱。于是，他决定遵从主的教诲：“如果在一个地方有人迫害你，就躲开他们，到另一个地方去。”他没有留下一句话就离开了这个城市。

“道”与上帝

在莱阳，李提摩太拜访一位刘姓男子，他家的桌上摆着三本书，儒家经典，道家著作、佛教的书。桌上的《易经》给了李提摩太一个启示，他应该开设一些简单的讲座，帮助人们认识真正的科学，启蒙当地的学者。李提摩太相信，在中国儒释道的文化土壤里，基督教能够开花。

经过一番努力，一些中国儒生渐渐开始将“道”与上帝联系起来。

1872年，一份上海的基督教报纸征文题目“汝等说我是谁”，一位秀才投稿，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那些被分裂、赋形、杀死的都是具体之物，但我是唯一的整体，渗透一切，却没有形状；你抬起头来，向高处找我，却忘了我也在下面；你在前面找我，紧紧追逐我的踪迹，却忘了我也会在你身后……我是物，物是我。我存在，又不同于物。我既是道，道既是我……那些热爱永生上帝的人将成为永生的灵魂，那些不信奉我的人只是行尸走肉。”

治病：道成肉身的福音

霍乱、天花、痢疾、伤寒、瘟疫等传染病在中国肆意蔓延、传播。李提摩太认识到，中国死亡率高并不是因为生命力低下，而是源于卫生环境恶劣和迷信。

李提摩太与布朗医生以及一名助手开始了在山东半岛行医布道的旅行。布朗医生对病人的悉心服务赢得了人们的信任，所到之处当地人

无不友好相待。

一次，一位旅店的主人拒绝收费。说：“你们来到这里，免费向大家发放药品，倘若我收你们的住宿费，那就太不对了。况且，你不认识我了？”原来几年前店主和李提摩太进行过长时间的谈话，并从李提摩太那里学到有关宗教和外面世界的许多知识。

当时，天花是一大杀手，这位中国绅士到北京找雒魏林医生，学习种牛痘的方法，回家后立刻给朋友和邻居们接种疫苗。

为了感谢，同乡们送给他一块匾。可是听说他竟支持外国人，就威胁要把那块匾取下来。绅士愤怒地说：“我给你们接种牛痘不是为了那块匾！你们要取下来就请便吧！但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误解了外国人。在预防天花这件事上，我所作的善事都是从一位叫雒魏林的好心的宣教士那里学到的。而且我知道，这位宣教士除了行善之外并无其他意图。我必须尽我所能帮助他。”

考场上福音萌芽

1873年秋，李提摩太与其他宣教士结伴，第一次前往山东济南府。正逢三年一度的举人考试。他们到考棚外设摊，散发福音书，并即席表演了一些简单的物理和化学实验，并用生硬的山东话传福音。

每3000人中一人可以中科秀才。参加考试的差不多有12000人，有些不是考生，有些是老师、亲戚和朋友。几千考生中，只有95名能够中举。

李提摩太留在当地，度过了整个严冬。最后，李提摩太为一个下级军官在湖水中洗礼，大群人围观。军官上岸后，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向围观的人解释洗礼仪式的含义。

行善：一块不倒的磐石

韦廉臣和夫人带来一个中国人李先生，是医学宣教士明恩溥（Authur Henderson Smith）多年的助手，他传染了恶性斑疹伤寒，发

起了高烧。李提摩太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悉心照顾这个病人，一个月中，每隔一个小时就喂他鸡汤，不论白天还是黑夜。病人奇迹般地转危为安。病愈后，李提摩太亲自送他上了回家的路。

等他回到旅馆，自己也病倒了。文碧（Japer McIlvaine）先生得到消息后立刻赶来照顾他，直到他恢复健康。

文碧曾经因传福音所受的挫折而绝望，李提摩太与他长谈：“不论我们关于生活、宗教和差会的看法如何，总有一条路绝对适合于我们，它的价值永远也不会改变，那就是行善。”他握着同伴的手说：“这是一块盘石。站在上面，你的麻烦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青州府换装

1875年1月隆冬，李提摩太带着一个14岁的英国青年学生，上路去青州，途中遇上罕见的风雪，马车迷失了方向，见有路人冻死。最后，他们好不容易到达青州府，却无人愿意租房子给他，只能找一家旅馆住下。

青州是历史古城，山脚下，肥沃的平原，锯齿形城墙，居民四万，是山东境内保存最为完善的一个城市。

因为他们穿着欧洲人的服装，无论出现在哪里都成为当地人眼中的奇景。过了一段时间，李提摩太换上了当地人的服装，还带了一条假辫子。这个举动马上让人们改变了对他的态度。他听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啊！他现在看起来像个人了！”他走到哪里，人们纷纷跑出来亲眼看看他的打扮。

换成中国装束后，李提摩太第一次接到邀请去一户人家喝茶，那时，他才明白为什么以前没人邀请他。

结识李鸿章

1875年，霍乱蔓延，他用两种药救活了好多人，名声大震，被人称为“神医”。这些人当中包括巡检司的妻子。每隔5分钟，李提摩太

就给她滴几滴掺在糖水里的樟脑油。过不多久，她就醒了过来，回到丈夫身边。

1876年9月，李鸿章被派往烟台准备签署《烟台条约》，解决“马嘉理事件”。当李提摩太发现李鸿章的随从患上了疟疾和痢疾后，就将一些奎宁丸和止痛药作为礼物送给他。李鸿章发现这两种药具有特效，派人送来了一封信表示感谢。

终于住进自己的房子

由于李提摩太一直行医救人，后来青州府的府库专门来到他住的旅店来拜访他。府库为了戒掉鸦片，请求每天10点左右来到李提摩太这里，与李提摩太谈话。府库很惊讶外国人知道这么多奇妙的东西。

有一天，府库问：你为什么 not 找一座房子呢？

李提摩太答：“有一座自己的房子那可太好了，但如果没有人为我担保，证明我是一个诚实的、爱好和平的人，就不可能租到房子。我是个外国人，没有谁了解我。人们认为所有外国人都不是好东西。”

“啊？这就是唯一的原因吗？”

第二天，他带李提摩太去一处房子，愿意做担保人。三天后，李提摩太便兴高采烈地住进了自己的房子——一个小四合院，铺着石头，有烟火道，可以生火取暖，院子里还有一颗桑树。

仆人从外面买来四个粽子作午餐，晚餐有小馒头。终于，有家的感觉了！

用中国词汇表达基督思想

为了更有效地与中国人接触，李提摩太研究了理雅各翻译的四书五经，还研究了《近思录》和《金刚经》等中国经典。他用中文写了教义问答，尽可能避免用外国术语，而是采用中国词汇去表达基督教思想。使中国人认识到真理的权威而信奉基督教，而不是靠外部的权威让人们接受信仰。

寻找“上等人”

《爱德华·欧文文集》第一部分“播种的比喻”给了李提摩太很大的启示：“这样，英国的第一批使者出发了，去寻找最纯洁、最慈善、最上等的人民，并且走到了他们身边，用那些博爱、慈仁的善民们最喜欢的方式与之接近，因为给予要比接受更受到上帝的保佑。”

翻译爱德华·欧文的过程中，李提摩太认识到拜访思想和文化领军人物的重要性。1887年，他将这段布道印刷了很多份，给远东的每个宣教士寄去一份。

序页道：“敬爱的读者，——没有痛苦就没有伟大的成就。没有反复的实践就不会产生完美的艺术。没有明智的指导，就会导致更多的浪费和失败。”

李提摩太决定将有限的资源做最有效地运用。

上帝之灵派遣我

青州府是重要的伊斯兰教中心，城里有一所伊斯兰教教师的神学院和两座清真寺。有一次，李提摩太去拜访神学院，来到毛拉和教授中间。

“我意识到，我原来准备为基督教辩护的证据，摆在伊斯兰教徒面前毫无用处，因为凡我所能引用的预言，他们都能举出相似的例子来针锋相对；而针对我提到的每一项奇迹，他们都能够举出一百条来分庭抗礼。”

他开始细心研究伊斯兰教典籍，考虑用事实作为见证去说服他们，而不是应用那些先知们说过的权威的话了。

后来李提摩太在神学院发表自己的演讲，学生们表示赞赏。他称这次拜访为生命中的一个新纪元。

李提摩太与毛拉的一段对话

毛拉：“他们是在上帝之灵的指导下写作的，那是不会有错的。”

李提摩太：“我是以追求上帝为快乐的虔诚的信徒之一。眼下，我没有必要非到中国来，是上帝之灵派遣我来的。上帝是离我们最近的教师，比伊斯兰教的任何神明都离得近。”

沉默。

毛拉站起来，鞠躬，说：“苦恼的是，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上帝的指令。”

农夫们的回报

天热得让人受不了，李提摩太坐在一棵大树下乘凉。路上走过一群回家吃饭的的农夫，他就挨个儿跟他们打招呼。其中一个问他去哪儿，还告诉他，水涨了不能渡河，并邀请他和他们一起回村子，等水退了再渡河。

在村里，李提摩太到校长那里吃午饭，直到下午五点，后来有六七个村民来帮他渡河。100码宽的河面，没有桥，水流很急。村民们告诉李提摩太，他们去青州府拜佛时，他曾经很客气地接待他们，回答他们的问题，并请他们喝茶。

扇子上的赞美诗

太阳落山前，李提摩太到达另一个村子。那里住着一个有学问的读书人，曾经在青州和李提摩太见过几面。善良的老者大约有20个学生，都在准备考试。他们一起吃饭。饭后，学生们把他围了起来，每个人拿着一把扇子，请他在上面写点什么。于是，他在每一把扇子上题了一首赞美诗。

李提摩太大胆地使用当地一些宗教小册子，删去其中与基督教对立的部分，加入一些基督信仰的内容。他将这本小册子送给了当地一个虔诚的织匠。结果，织匠和妻子，以及他的老师，成为李提摩太到中国传教工作中第一批入教的信徒。

李提摩太在青州10个月。到1876年初，有15人接受了洗礼。李提摩太请来他的老朋友青州府库，出席在他家院子里举行的洗礼仪式。

丁戌奇荒

1876年至1879年，山东、直隶、山西、陕西和河南五省发生特大旱灾，饿死的老百姓高达一千万人，土地龟裂，寸草不长，树皮被剥光，门窗被拆下来烧，甚至发展到抢吃人肉的地步。大批饥民向东北或南方各省逃荒，成为乞丐，多数在路上饿死，真是哀鸿遍野。

青州府一地村镇百姓已饿死十分之九。青州知府在脖子、手腕、脚腕上带着锁链，无数百姓跟在后头，头上戴着柳条和柳条编成的帽子，到庙里求雨。

李提摩太骑马走访了11个青州县城，每到一个县城就粘贴海报，呼吁人们抛弃死的偶像，追求活的上帝。当地老人组成民众代表来到旅馆，跪下来哀求他指点如何向活的神明祷告。小脚女人跋涉20里山路来青州找他。

李提摩太亲眼看到卖孩子的悲惨事件：一个20几岁的妇女坐在衙门对面，孩子身边放着一束稻草。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坐在李提摩太门前，请他的房东帮他从旁边的树上采下一把叶子，她吃了以后说：“我感觉好受多了。”

闹饥荒期间，没有任何肉类或蔬菜，饭馆里，李提摩太只有面粉合橘子皮一道饭。

李提摩太向在烟台和其他城市的西洋侨民募款，把募款交给青州府地方官，请他们发放给饥民。后来，他向地方官请求让他直接将钱发放给最困难的饥民并得到了许可。

用主耶稣的方法分粮

“早祷时，我看到一篇文章，是关于我们的主向饥饿的民众施于食物的过程。他让饥民们坐在地上。这真像一道闪电划过我的脑海，我一下子领会了它的妙处：坐着的人群是不会发生拥挤的。”

这个启示救了李提摩太的命，同时也救了无数饥民的命。他让饥民们坐在打谷场上，发给他们救济金。“人们是那样安静，就像参加一场宗教仪式。街道对面是衙门，官员们看到这安静的场面感到不可思议。数千受饥饿之苦的人感激地接受这些小小的捐助。从此以后，只要知道有祈祷上帝的活动，他们都会来参加。”

因为坚持不懈地帮助灾民，使得很多人开始对他所信的神感兴趣。慢慢地，一些地区开始形成教会的核心。他便把杰里米·泰勒所著有关圣洁生活的规则的书送给他们，引导他们直接面对上帝，而不是依赖外国宣教士的指导和劝告。

他还专门为女性领导者举行聚会。每个教会中心成立成人主日学校，一起学习、一起祷告。一年之内，对基督教感兴趣的人就超过2000位。一些六七十岁的老妇人，以前从来没有读过一个字，却要背诵福音书。

从孤儿院到技术学校

李提摩太不断收到一些来自烟台的外国人的救济金和青州府银行家的资助。他在不同传教中心建立了五个收容100名儿童的孤儿院。后来他把孤儿院改办成了工业学校，购进许多中国和外国机器，找来了技术娴熟的人教孩子们一技之长，以便以后维持生计。

“因为我在灾民中发放赈款，对于广大的百姓是一个可以使他们信服的证据，证明我所传的宗教是灵的。”1877年底，他在山东至少救助了七万饥民，吸引了无数人来到教堂，同时结交了许多山东省地方官吏和士绅。

这段时间，山东建立了20多个教堂，有140个基督徒。李提摩太的方法是先给属灵书册，再给新约，最后给旧约。后来发展成700信

徒，1000名热心者。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李提摩太看到，中国同事程牧师大有能力。

预防灾难

为了预防同样的灾难，李提摩太向济南巡抚丁宝祯提议开挖矿产，修筑铁路。

1876年12月，中国修筑了第一条铁路，12英里长，从上海到吴淞线，顺利通车。然而，中国政府担心会引起社会动荡，便在1877年10月出资将这条铁路买下，把铁轨拆掉，连同车皮运到台湾弃置在海滩上。

同年，李鸿章让一位英国工程师修筑了一条从唐山煤矿通往胥各庄的铁路，并且制造了中国第一辆机车“火箭号”，现在保存在邮传部博物馆里。

二、山西九年（1877-1883）

哀鸿遍野

1877年，山西连续两年滴雨未下，灾情比山东更甚。由两个中国助手陪同，李提摩太骑着骡子从太原出发，到山西省南部实地考察灾情，并记了日记，绘制了地图。

1878年1月28日，日记：“随处见肥胖的野鸡、野兔、狐狸和豺狼，但人们却找不到食物维持生命。”一天清早他到了一个城门后，“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

2月1日，日记：“南行半天就看到六具尸体。遇见两个少年，拄着棒头在行走，好像已是九十岁的老人。又见一青年背着他的母亲，看

来她已奄奄一息。”

可怕的场面使两个伙伴身心崩溃，李提摩太好心心地让他们回去了。后来他们因愧疚，又回到山西太原加入李提摩太的工作。

漫漫长途，两边的树是一片白色，因为10到20英尺以下的树皮都被剥去吃掉了……每天他都碰到载满妇女去外地贩卖的大车，这样既能保住她们的性命又能给她们的家人换一点食物。

山西的山路之难行简直超出人的想象。那年冬天也是历年来最冷的。黄河结了冰，马车可以从冰上走过，这是30年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李提摩太脚后跟冻伤了，走进窑洞旅馆简直就像到了天堂。

1876-1879年，中国18个省中，有1500万到2000万人在饥荒中死去。

2月4日的日记：“我已南行六百三十华里。今晚在客栈里，听到老百姓讲易孩而食的事，因他们不忍心吃掉自己的孩子。我已经走了这么远，亲眼看到这样骇人听闻的凄惨景象，我决定回到太原府去，因我已有足够的证据说明灾情的恐怖，即使是铁石心肠也会受到感动。我沿着原路回去，每天所见同样是鬼一般可怕的景象，有时我甚至诧异，这些惨像是否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的幻觉。”

“鬼子大人”赈灾

李提摩太赶到太原后，见到山西巡抚曾国荃，请他批准向灾民发放赈款。曾国荃指定他到阳曲县，向灾民发五百文救济金。于是，他开始了在山西省的赈灾活动。李修善牧师、德治安牧师和怀廷牧师在太原与李提摩太初次会合，为灾区发放救济金。

上海的西侨获得李提摩太的报告后，1878年1月26日组成中国赈灾基金会，开始向欧美各国劝捐，赈济千万灾民。该委员会在发给外国的呼吁书中说道：“骇人的灾荒席卷整个华北地区，据称约有九百万中国人民陷于困境。市场上天天有人为了换取一点粮食卖儿卖女。本委员会向英美各界呼吁援救，请组织伦敦或美国援华委员会，将募集的捐款汇寄到香港汇丰银行收转。”

李提摩太的日记和报告也到达了伦敦，为富世德牧师在伦敦呼吁

赈灾增加了极大的分量。伦敦运来的银锭50两一块，每1000两或2000两装为一箱送往天津。直隶总督李鸿章派遣一队士兵押送到太原交给李提摩太。负责押送银两的官员一直称李提摩太为“鬼子大人”。

在英国国内筹资的款项一共有20万两，约六万英镑。政府此时已经认识到他们的价值，不断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

由于长期劳累，李提摩太终于染上痢疾病倒了，不得被人们用担架抬到平阳城。人们要送李提摩太一顶“万民伞”作为礼物，上面写着一万个心存感激的灾民的名字。但他坚决不同意。李鸿章要授予李提摩太爵位，他很委婉地拒绝了。

一位山西的宣教士回忆道：“无论宣教士到山西什么地方，那里的人民都会充满感情地问到李提摩太”，因为“他在身后留下一片光明”。

“我有家了！”

玛丽·马丁（Mary Martin, 1843-1903）来自苏格兰的宣教士，是烟台联合长老会的成员，于1876年来华，与韦廉臣博士一同工作。玛丽是一位有教养、聪颖、温柔而勇敢、理想主义却又很实际的女士，又是一位出色的教师，而且有一副能歌唱的好嗓子。

1878年10月，李提摩太与玛丽穿过灾区，来到他们在山西太原的新家。婚宴是为当地最贫穷的40位乡民提供一顿饭食。李提摩太给他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婚宴不贵，但是为寡妇们带来了快乐，希望这顿喜宴在上帝眼中是可喜悦的。⁶

6 Timothy Richard to his mother, 12 February 1879, trans. Thomas Evans, 29 March 1965, BMS Archives Box CH/4A.

Andrew T. Kaiser, “Deconstructing the Missionary Wife: Mary Martin Richard (1843–1903), Conference: Yale Edingburgh Group Meeting, At Edinburg, April 12, 2016.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01221954_Deconstructing_the_Missionary_Wife_Mary_Martin_Richard_1843-1903

李提摩太给他妻子的哥哥的一封信中说：现在，我想告诉你让我高兴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有家了。我亲爱的妻子在我回家时会欢迎我；不仅如此，她还会支持我的工作，为了相同的目的一起工作、祈祷。

为了提高中国教会的圣乐，1885年她与李提摩太为中国人和西方同工编写了《小诗谱》。

玛丽是里提摩太生命中一首美妙的歌。

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拯救

李提摩太不赞成武断和过激的行为。在他来中国的第一年，有一次一位宣教士朋友拿了一位当地信徒家的祖先牌位来烧。李提摩太对他的朋友说：“当你烧掉他家祖宗牌位时，我想你也应该同时把你父母的照片烧掉吧？”

李提摩太说，“虽然他们采取的方法常常是错误的，但充满感恩、祈祷、慈仁的行为在每一代人中都是被上帝保佑的……只要登山宝训存在，他的每一个孩子就都会得到足够的安慰，即使人们把他们称为无神论者。”

他敏锐地感觉到，由于宗派之间的纷争而造成的浪费，严重地阻碍了实现基督教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伟大事业。他说：“我们来到中国，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拯救；不是为了毁灭肉体，而是为了充实灵魂；不是为了使人悲伤，而是为了给人幸福。”

李提摩太坚信，在现实生活中，真心实意的行动要比空洞的教义更伟大。

平阳府：景教徒郭子仪的家乡

在平阳府发救济金时，李提摩太发现，一千多年前，基督教就已经在这个城市建立了立足之地。唐代将军郭子仪曾领兵平定了安史之乱。他是一名景教徒。七世纪，唐太宗时期，至少有三千个外国宣教士居住在中国，并在唐朝建立了许多教堂。

太原：为圣餐礼自酿葡萄酒

1879年11月，李夫人写道：“这儿阳光明媚，气候宜人，不特别冷。我们现在在屋里写作，没有生火。当然我们得穿着棉袄。”“无论是晚上睡觉，还是白天坐在炕上，都非常舒适。李提摩太就坐在炕上学习、研究。他现在已经是彻底的中国人了。”

当年，太原举办三年一度的乡试。他们选择了一些合适的小册子在考生中间发放，其中登载了一个以伦理道德为主题的优秀论文奖，目的是鼓励中国学生研究西方文明。

太原教堂渐渐发展起来，参加礼拜的人数越来越多。北方盛产葡萄，“你知道我们最后做了什么？”李夫人给哥哥的信中说：“你肯定猜不到。我们开始酿酒了！……从一些意大利天主教徒那里学到方法后，这种简单的葡萄酒就出现在每次圣餐礼的餐桌上了——我们确实酿造出口感上佳的葡萄酒。”

1879年，李修善牧师来到太原居住了一段时间。李提摩太说：“我们之间的友谊是亲密无间的、幸福的、美好而甜蜜的，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他去世。”李修善能用中文写作，“是宣教士中少见的睿智之士。”

在山西七年，大概有50名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宣教士。因为李提摩太与官府关系良好，他的一封介绍信给新来的宣教士许多保护和帮助。七年来，没有一处发生过暴乱事件。

为什么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一个基督徒？

1880年8月李提摩太到北京上书请愿，要求和平解决中俄之间的矛盾，以避免战争。李提摩太和乔纳森·李斯先生（Jonathan Lees）被邀请到天津府会见总督李鸿章。

李鸿章对李提摩太说：“在全国，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一个基督徒。”这句话使李提摩太决定尽最大的努力对中国领导阶层施加影

响。他相信，水往低处流比往高处流要容易得多。

于是，他在官员和学者中间开展了旨在传播宗教的学术讲座。为了缩减开支，他和妻子每天只吃米饭，以便省下钱来买仪器和书本。从1880到1884，他花了将近1000英镑购买书籍和仪器，其中包括一位亲戚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他购买了《东方圣书集》，《不列颠百科全书》，科学和医学书籍，还有望远镜、显微镜、分光镜、手动发电机、电感器、电压表、晴雨表等等。他还订购了一套照相器材，交给他的助手。不久，他的助手成了全省最早的摄影师。

李提摩太认为，西方文明在于“它热衷于在自然中探讨上帝的工作方式，并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这就是遵守上帝给予亚当的指令，去支配世间万事万物。”他希望通过开发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改善通讯状况而使人民受益，从而达到传播基督教的目的。

他定期给学者们做有关天文学、化学、机械、蒸汽机、电学、光学、医学、和外科学的演讲。1882年，他做了一次有关彗星的演讲。三年时间里，每个月都应官员和学者的邀请做一次演讲。中国官员们第一次知晓了西方科学。“在每一次演讲中，我都指出上帝是如何赋予人类无限的权利，以利用自然的伟大力量。倘若对此茫然无知，则只能像劳工和奴隶那样生活。”

他用电报作比喻：很多政府雇佣的邮差，以每天200英里的速度骑马送信，电报却能在几分钟内将信息传遍世界各地，而不会使任何人感到疲劳。我们应该研究自然中所有蕴含的上帝的律法，以便获取上帝赋予我们的福祉——他储备了所有这些力量供给人类使用，通过遵守他的精神的律法，对他给予我们的所有表示感激。

李提摩太的讲座使山西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大开眼界。

水往低处流

1880年，李提摩太得到一个机会会见了杰出的将军——左宗棠。李提摩太刚刚完成了一幅世界地图，就带上这幅图作为觐见礼。此后不久，左宗棠转任南京总督，他命令当地行政官员准许美以美会（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购买土地开办学校和医院。

1876年7月，山东旱灾再次趋于严重，李提摩太专程前往济南，拜会山东巡抚丁宝祜，向他报告目睹的灾情和所作的赈灾服务，指出旱灾的原因是经济问题，必须进行某些经济改革以防止可能再次发生的自然灾害。他建议在山东建设铁路和开采矿藏，加强运输能力，增加社会财富和扩大就业等。

1882年张之洞就任山西巡抚。他一到山西就积极寻求造福一方之良策。在太原府的衙门旧档案里，他发现了李提摩太给前任巡抚曾国荃一些有关修筑铁路、开采煤矿、开办工业和制造厂、建立现代教育的大学等方面的建议。他派了个三人代表团来问李提摩太能不能放弃传教工作，参与中国政务，将自己的观点付诸实施。对此，李提摩太回答说，不论物质上的进步多么急迫，宣教士所从事的工作仍然是更重要的。

不久，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建立了一座钢铁厂，开始修筑铁路，开办各种工业和现代学校。他再一次邀请李提摩太参与幕府，李再次拒绝。到1900年，基督教对张之洞有了相当深的影响，因此他拒绝与义和团同流合污。1903年，因张之洞那部著名的《劝学篇》，慈禧太后和清政府最终改革了整个教育体系。

风筝、飞行器、改良

风筝让李提摩太着迷。看着风筝，他就想，若有某个天才能发明一种飞行机器多好！所以他提供了一笔奖金，准备给第一个发明飞行器的人。

李提摩太认为，山东和山西的旱灾所造成的悲惨状况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交通和信息落后。黄土地沟壑上修筑铁路的困难使李提摩太想到飞行机器。他就开始花时间研究鸟和昆虫的飞行，并自己制作了各种各样的飞行模型。

1881年11月，李提摩太以“中西友”的笔名，在《万国公报》上连载他写的《近事要务》长篇论说，提出了大约一百条意见，建议清政府设法控制自然、改良农业、开矿设厂、开发交通、开办银行、促进贸易、广设西式学堂、容许传播基督教、同西方各国保持友好，等等。

对政府官员，他逐个提出建议：

对山东巡抚丁宝祜：建议在中国开采矿产，兴办棉纺织厂；

对山西巡抚曾国荃：建议修建铁路，以便控制饥荒；

对曾国荃、李鸿章、左宗棠巡抚，及外交部：建议引进现代教育，这是使中国免于战争和被勒索的途径；

对巡抚张之洞：建议在山西引进炼钢设施设备，为中国即将建设的铁路生产钢轨；并呼吁开采矿产；

对巴夏礼爵士和中国外交部的阎敬铭：提出宗教自由的基本原则，避免宗教紧张和冲突。

“正如上帝所愿”

李提摩太在教会之外的活动引起了宣教士同仁们的非难。1886年李提摩太从英国休假回到山西后，发觉自己成为批评的对象。山西的宣教士们联名写了一封信给英国浸礼会总部，批评他的神学观点和工作方法。

李提摩太的信念是：热爱上帝而不论他在哪里被发现，热爱真理而不管他来自谁的口，热爱上帝的实际恩典而不论它是“盟约的”还是“非盟约的”。

李提摩太说：“拒绝成长意味着停滞和死亡。所有真实的生命都意味着变化和成长。如果我们不对所有知识门类广收博采，我们的宗教将无法在未来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值得信仰的宗教，也无法与耶稣基督——天父明确的化身——所有美好的源泉相称。”

为了避免纷争给传教事业带来致命伤，李提摩太决定离开山西。1886年10月18日，李提摩太带着全家去了天津。11月14日抵达北京。

脱离了浸礼会后，他必须自己谋生。为了维持全家生计，他拜访了清朝兵部侍郎曾纪泽，请求让他妻子收留几个学生能够教授英语，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后来他妻子教授的四个日本学生都成了基督徒。

1890年7月，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的李鸿章邀请李提摩太出任天津《时报》主编。李提摩太大喜过望，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布道坛，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该报是中国北方最早的报纸之一。南京的张之洞

打电报来，要高官们订购每周特刊，皇宫每天都读该日报，在皇宫和总理衙门经常讨论报刊上的内容。他在报上撰写有关改革的课题，在任一年期间，他共写了200多篇政论性文章。后来结集《时事新论》，1895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该书12卷，分“国政篇”、“外国篇”、“新学篇”、“教务篇”四部分，风靡一时。

1891年5月，韦廉臣，中国同文会的创建者在上海辞世。同文书会委员认为李提摩太具有远见卓识，与该会目标一致，于是邀请他继任。浸礼会同意支持李提摩太三年。

李夫人看到受聘电报时，赞美神说：“正如上帝所愿”。

三、文字的号角

出任广学会督办

1891年10月，李提摩太移居上海就任同文会秘书长一职。广学会原名“同文书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多年后改名为“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of China）。

同文会是在“中国宗教书籍会”（China Book and Tract Society）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1887年11月1日在上海成立，由苏格兰联合会长，法学博士韦廉臣在上海创办，1888年组成董事会，推举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为董事长。

《发起书》中写道：“本会的目的归纳起来有两条：一为供应比较高档的书籍给中国士大夫阶层阅读，二为供应有彩色图片的书籍给一般中国家庭阅读。我们的目标是面向公众，包括知识界。如果我们要影响中国，就必须从他们着手，只有当我们愈是得到士大夫们的尊敬，我们在中国的事业才愈能顺理进行。”

广学会是外交官、商人和宣教士合作的典型。领事中有美、德驻上海总领事和英国驻上海副领事；商人有实力雄厚的怡和洋行、旗昌洋行、汇丰洋行等；宣教士则有新教在华几大差会的领袖，如美国监理会长林乐知、内地会副会长范明德、英国伦敦会领袖慕维廉、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美国长老会著名教士丁韪良、英国长老会著名宣教士韦廉臣。会长是对晚清中国政治颇有影响力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商人出钱、教士出力、外交官利用政治和外交的影响力，三方合作把中国人的思想开放起来。

通过这一组织，精神知识之光和物质科学之光逐渐深入中国人的思想之中，偏见和谬见渐渐消除，消除中国这个巨大国度开放和西方自由交往的障碍。

上任三件事

一、调查中国究竟有多少同文会出版物的读者。他对北京和各省文武官员，府学以上的礼部官员，举人以上的在职和在野士大夫，以及全国的秀才和应试书生等，还有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重庆和福建等地的中国商人和买办等做了统计，一共得四万四千名。由此而知，十九世纪末，近四万万名人口的大清帝国，有阅读高等能力的中国人不到万分之一，而他们的知识领域仅限于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章。

二、改“同文会”为“广学会”，意：“广西国之学于中国也”。

三、决定出版和发行一种或数种定期刊物，并陆续出版鼓吹改革的书籍。1889年原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由广学会复刊（一般熟知为《时代评论》），主笔仍是林乐知。1889年莫雷（Murray）在同文会支持下在上海出版了中国最早的儿童刊物《成童画报》（Boy's Own Paper）。⁷

7 顾长声，《欧风美雨袭中华：推动中国走出中世纪的十二个西洋人传略》。加拿大：长青文化公司，2001年，pp. 152-153。

广学会四元老

韦廉臣：伟岸的身躯、才智卓越。

林乐知：机智分析的头脑、敏捷的才思和技巧的表达，让人意识到中国要么前进，要么毁灭。

花之安：时任英华书院院长，是个幽默的大块头。有人问，“你的那篇被那么多人所期待的基督教解释在哪里？”他答：“在墨水瓶里。”问：“你正在从事什么工作？”答：“我正致力于转变中国人的思想。”

李提摩太：初到广学会任秘书长时，他是唯一的全时工作人员，全部资金数千美元。20年后辞去职位前，有六位西方同事，数位合作者，18位中文翻译和助手，资产价值接近25万美元。他自己推出的原著或翻译作品超过100种，他的名字和广学会广为人知。

难得的是，广学会得到了中国官员的支持。1894年，张之洞于1893年到1900年捐给广学会5000两白银。山东聂道台也寄来捐款，后来买了100本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分送给北京的高官们，1902年，又捐赠1000两白银。他的儿子后来成为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

献给慈禧60大寿的圣经

1892年，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在北京举行。广学会向各省考生分发了六万册各类出版物。

1892年，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成立，林乐知的女儿担任外语教习，李提摩太夫人应邀担任督学。李提摩太夫人曾任曾国藩儿子的英文老师。

1893年慈禧太后60大寿时，李提摩太夫人受邀与费启鸿夫人组成委员会，由万名基督徒妇女募捐，为太后生日准备了一本大型精美的新约圣经，李提摩太夫人准备了祝词，由李提摩太和他的中文助手蔡尔康先生翻译成精美的中文。

献礼的结果之一是太后本人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并派了一个太

监，到北京圣经会的书店索取整部《圣经》以及其他基督教书籍。

后来慈禧太后赠送了几匹丝绸给那些安排这次献礼的女士们，以表谢意。

向国外博采众长

1894年，李提摩太专程前往北京，同英国和驻华公使巴夏礼交换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意见，并向巴夏礼提出英国政府应多做一些促进清政府愿意改革的事。

他又拜访了中国总税务司赫德，对赫德爵士本人，建议如下：

组织一个代表团，由一位亲王率领，包括由李鸿章、曾国荃、左宗棠等高级官员组成，作一次环球旅行考察，了解一下其他国家的现状；

组织一个由中国最优秀的学者组成的代表团，走出去，考察各国的教育制度；

组织一个由最睿智、最虔诚的人组成的代表团，去国外研究各国的宗教状况；

派代表团考察其他国家工业发展情况；

派代表团考察各国交通与通讯方面的技术手段；

在北京成立专门机构，向各省全面介绍、推广考察的结果。

奇妙的是，李提摩太这些建议，在下一个世纪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被广泛采用。

为“天足会”代言

1895年，立德夫人（Archibald Little）来拜访李提摩太夫妇，就成立反缠足的协会征求他们的意见，取名“天足会”。

李提摩太同意利用广学会杂志拥护废除缠足运动，而且帮助印制必要的传单和小册子，唤起大众对这一罪行的反抗。立德夫人花了很多年在各省旅行，亲自劝导总督和政府官员们发表声明，反对缠足。

1902年2月初，慈禧太后终于颁布劝戒缠足懿旨上谕，并说：“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务当婉切劝导，以期渐除积习。”

直到1906年，广学会一直扮演“天足会”代言人的角色。

会见总理大臣翁同龢

1895年暴乱发生并向全国蔓延，古田教案中11名宣教士被杀。上书委员会授权李提摩太去北京采取行动。

1895年10月30日，根据李鸿章的建议，李提摩太会见总理大臣翁同龢，指出官方散布谣言，要求基督教不被干涉。李提摩太叙述欧洲、印度、日本，甚至中国对其他宗教所采取的宽容态度，翁同龢回答说：“我们应该采取同样的政策，不对基督教进行干涉。”

亲王离开后，皇帝的导师之一，总理衙门大臣李鸿藻进来，感谢他直率地和王爷说话。并对他以前赠送的《泰西新史揽要》表示感谢。

经过九次会谈，李提摩太使中国官员明了外国传教团的目的和价值。1896年2月24日，李提摩太离开北京前一天，翁同龢来拜访他，向他保证那些造谣中伤的宣传材料将被禁止，各地方政府将被告知，要以友好的态度对待宣教士。

四、介入维新

一个非同寻常的“甲子”

1898年，戊戌年，李提摩太经历了中国历史长河中一个最不寻常的甲子。

来华宣教士发现，中国的道德和精神力量是静态而非动态的，这种力量的存在使得中国很难接受一个新的信仰。

李提摩太带着对古老信仰的尊敬和对一切真理虚怀若谷的态度，坚信基督教信仰能够在中国播撒、发芽，能够唤起人们的活力、智慧、道德和心灵。

接触康有为、梁启超

过去，中国曾经有过天才的创造和值得称赞的强大表现，她曾为人类的进步与幸福做过巨大的贡献。然而，宣教士认为，她却从未有足够的道德力量，把生命之水传递给别人。直到鸦片战争，欧洲粗暴地敲开她的大门，她才允许其他人来从她的井里取水。

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似乎迎来了真正的觉醒，这个巨人静静地从沉睡中苏醒，与其他国家建立起恰当的关系，并加入到与他们共同前进的道路上来。

被当时的人看作圣人的广东学者康有为，几年前从香港途经广东去北京考取功名的路上，被沿途所见到的房屋、街道和所经之地的秩序井然所震撼，他相信那些被称作“夷人”的人根本不是什么野蛮人，他们来自有高度文明、有绅士风度的民族，和他们的交往令人愉快。于是，他开始研究西方著述。

广学会的工作对中国的政治家和学者的思想产生了非凡的影响。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激起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大批知识分子的愤慨。康有为参照广学会出版物上的建议，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请求皇上立刻采取措施，改革维新，提出自强雪耻四策，即富国、养民、教士、练兵。这份长达一万八千字的“公车上书”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知识分子为主，联合要求改革的请愿书，很快得到了万名学者的签名，十八省举人响应，包括1300多名举人。在清朝，举人赴京参加会试称为“坐公车”，举人上皇帝书为“公车上书”。

1895年10月17日，李提摩太在北京的寓所接待了康有为。会面后，李提摩太给妻子写信：“我吃惊地发现，我曾提出的各项建议几乎都被揉进了请愿书中，并被浓缩在一个绝妙的小小“指南针”中。无怪乎他来访问我时，我们有那么多共同之处。然而，请愿书中缺少了一样

东西，那就是宽容。这份请愿是民族的、地方性的，而不是国际的、普世性的。”⁸

李提摩太记载：“他（康有为）告诉我，他信仰我们的出版物中所教导的：上帝那父亲般的爱，和所有民族间兄弟般的情谊。他希望在复兴中国的工作中与我们合作。”

这次会晤，使李提摩太开始介入维新运动。他带了美国宣教士李佳白、白礼仁等，经常同维新人士一起吃饭，一起讨论进行改革的计划和办法。

听说李提摩太滞留北京期间希望找到一个临时秘书，康有为最杰出的弟子——梁启超，愿意担任此任，被愉快地接受了。梁启超受雇于李提摩太四个月之久。

其他维新社成员中还有翰林文廷式，湖北巡抚的儿子谭嗣同，江西的陈炽，袁世凯等。

广学会出版物风行

广学会的出版物中，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和林乐知编译的《中东战纪本末》最为畅销。

梁启超评道：“《泰西新史揽要》述近百年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书中最佳之书也。李提摩太在序言中说道：深知中国近年不体天心，不和异国，不敬善人，实有取败之理。”

甲午战争时期，《万国公报》大量登载甲午战争最新消息和评论，引起中国官方和士大夫们的重视，销量大增，甚至光绪帝都每期必读，还向广学会订购了八十九种图书认真阅读。

戊戌变法得到光绪帝的直接支持与广学会读物有直接关系。

8 苏慧廉著，关志远等译，《李提摩太在中国》。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p. 205。

给总理大臣的建议

总理大臣和皇帝的导师孙家鼎完全赞同维新派的主张。总理大臣请求李提摩太就改革的建议写一个简要的方案。

李提摩太说，上帝对任何民族都不会偏袒，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那些遵从天意的民族就繁荣昌盛，而那些不遵从天意的就衰亡。生死攸关的四项要求是：教育改革，经济改革、国内和国际和平，精神复兴。

1895年10月12日，李提摩太拜访了孙家鼎。孙家鼎邀请李提摩太就任京师大学堂校长，被李提摩太婉拒。

李提摩太离开北京前一天，总理大臣造访李提摩太，对没有能使皇帝颁布针对宣教士的上谕表示歉意。他送给李提摩太四匹丝绸，并给他八盒点心，路上吃。

戊戌变法的快车

1896年李提摩太第二次回英国休假，正巧与李鸿章同船。1897年回来时，中国正酝酿一场巨大的变革。

李提摩太相信，当维新运动由中国人自己发动，并且由知识分子发动时，这场运动才算展开了成长的翅膀。同样，只有当中国人自己开始认真追问宗教问题时，基督教的翅膀才能茁壮成长。

像冰河的解冻，维新的潮流终将巨大的、阻扰前进的冰块冲进海洋。

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报纸《时务报》，向全国知识分子鼓吹改革变法。

1897年11月，山东发生了巨野教案，因两名德国天主教士在张家庄遇害，德国侵占胶州湾，激起不满。1898年夏，康有为就维新变法措施向李提摩太咨询。康有为等再次上疏“统筹全局，提出变法”。

光绪帝完全接受康有为等的改革方案，1898年6月11日颁“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启用维新人士。从这天直到9月21日，共一百零三天，光绪帝颁布了不少变法谕旨，还批准了康有为的奏请，决定聘用李提摩太担任光绪皇帝的顾问。

李提摩太连忙乘坐火车从上海到北京，在他还未到北京之前，慈

禧太后已经发动宫廷政变。光绪帝密诏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

9月，赫德先生在北戴河看到变法诏书：“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活着看到这一天！”两周后，华善（Percy Walsham）来到北京，说，慈禧太后复辟了。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谭嗣同等六君子以“大逆不道”罪名，被杀死在北京菜市口，光绪被软禁。

改革的列车开得太快，结果以一种无法预料的方式爆炸，将列车、维新、乘客、光绪帝、康有为和其他维新者都炸到了空中。

谭嗣同被杀时说：但是，今天失去的每个人身后，都会有1000个后来者继起，继续我们的改革事业。

他的话很快就成为事实。

义和团运动

戊戌变法后，整个国家停滞不前。列强纷纷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的“瓜分豆剖”迫在眉睫。华北频繁发生教案、天灾仍频，宫廷权力争斗激化。

危机日趋紧迫。

1900年，李提摩太去纽约参加世界传教大会，敦促大会采取行动，避免令人恐惧的危险发生。波士顿20世纪俱乐部给李提摩太出介绍信，委派他向美国政府反映情况。李提摩太将文件交给国务卿，又拜访了纽约市商会会长，结果一无所成。

不出两周，中国杀劫开始。成千上万号称“义和团”的农民，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用私刑屠杀了大批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信徒，纵火烧毁了教堂和教徒房屋。山西被杀的宣教士最多。

同年6月，慈禧太后允许义和团进驻北京，义和团又先于清军进攻天津租界，最终引发八国联军远征。

慈禧的戊戌政变就如炸飞清王朝的炮弹，1898年戊戌政变孕育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成了导火线。

五、化危难为祝福

大学和铁路：梦想成真

义和团被镇压后，1901年，李提摩太应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和直隶总督李鸿章的邀请，北上协助处理山西教案的善后事宜。

新教传教会决定，宣教士生命的价值不能用金钱来计算。李提摩太建议，从赔款中拿出50万两白银，每年支付5万两，在伤害最大的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学，让山西最有能力的年轻人接受西方现代知识的教育。

这种以德报怨的方式迅速被全权大臣采纳，他们将教授的委任、课程的设置和校基金会的管理都交付给李提摩太，为期10年。10年后，学校的管理权将移交给山西省政府。

1902年，签署建造太原城内山西大学，包括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博物馆、招待所、教室和实验室。课程包括法律、语言、文学、历史、数学、物理、采矿、土木等学科。教授的对象都是各省选拔出来的青年才俊，包括秀才、举人。山西省府出资派优秀学生赴英国进行为期五年的深造，留洋总数达70个。

朝廷颁布诏令，要求每一个省会城市都兴建一所现代化的大学。一时间，兴办现代教育的热潮迅速蔓延全国。

这期间，山西巡抚开始修建一条铁路。李提摩太早期在山西的两个梦想最终都实现了：铁路运输可以避免可怕的灾荒再度降临，还能开发山西富饶的天然资源；办大学可以培养本地的人来开发自己的土地和人才。

维新并未凋零

光绪皇帝虽然被关押，维新派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有的被革职，义和团也被慈禧太后所掌控，但是，维新并未就此凋零。事实

上，在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两年期间，慈禧太后颁布了与1898年类似的改革诏令，诏令的内容被人们普遍接受。

1901年，慈禧颁发上谕，命令改革科举制度。9月，下令全国所有书院都改为传授西学的现代学校，又派遣有才能的年轻人去外国学习各种知识。

1902年，慈禧谕令废除缠足习俗。

六、南方旅程

南方：拥有宗教潜质的沃土

李提摩太来华后，先在山东、山西传教赈灾，后到天津、北京参与文字工作，此后在上海主领广学会，又到北京参与维新改良，义和团后再次返回山西创办大学。晚年，他的脚步开始踏向南方。

在南方，李提摩太沿途看到令人惊讶的迷信：街头买死人用品的商店，道场和法事盛行。他意识到，在人们心中，无形的东西非常真实，这是一片很有宗教潜质的沃土。

沿途，他发现杭州弥陀寺和天台国清寺供着三尊神像。佛教徒哪里知道，阿弥陀佛，是波斯语“上帝”的名称Amitabha；观音，拥有圣灵的许多品格；大势至，意思是“强大的弥撒亚”。

据《李提摩太在中国》一书，李提摩太在日记中记载，在天台山，遇见一个剃度修行的人盘腿读《金刚经》。李提摩太问他是否明白第六章的预言：“在我之后500年，将有一位众佛的源泉出现，当那人出现，请信他。”修隐士说，他虽已经诵读了30年《金刚经》，但之前从来没有理解过这段话的真正含义。

那天，正逢战神关帝的生日，大批妇女来“求梦”，她们合衣躺在地上，早上四五点起床背诵祈祷文。李提摩太在一张黄纸上，用最大的汉字写了一句话，放在走廊的桌子上，教师们走来围看，并用当地话解释：让上帝拣选的子民有机会了解这位无与伦比的、伟大的救主——

借此，妇女们也许会把某些信息带回家。

旅馆墙上的处方

天台山回程经过一个小旅馆，李提摩太看到墙壁上写着一幅处方，名曰清心丸，配方是：

阴阳 全部
 行善 足量
 慎言 调味
 正直 三钱
 责任 酌量
 爱与正义 多多益善
 诚实 一片
 好心 一片
 谨慎 一点
 赌博 全部洗掉
 信仰 小心
 和解 一块
 快乐 大量
 仁慈心肠 全长
 耐心 万分
 敬天地 按需而定
 静心 按需而定
 日月 按需而定

以上共二十味，制成药丸“智慧果”，每服一百零八丸，包治百病，宜温汤服下。

禁忌：挖苦讽刺、暗箭中伤、污言秽语。

该处方流传自灵山革心殿，专治男女各种心病，如不忠、不孝、缺少爱心、缺乏正义感等类病症，凡服用此方者，无不药到病除。

是谁派你到中国来的？

李提摩太拜访了一位方丈，是个60多岁慈祥而充满智慧的人。

方丈问：“谁派你到中国来的？是你们的国王吗？”（这是民众普遍的看法，宣教士被看作是政治的代言人。）

李提摩太：“不是。如果我没有感觉到上帝的差遣，我是不会来中国的。”

方丈：“你怎么知道上帝的意愿是什么？”

这次与方丈的对谈，使李提摩太意识到：在批评佛教的时候，不应仅仅看到一般僧侣的愚昧无知，更应看到佛教哲学思想对中国拥有伟大心灵的人们产生的影响。

对不朽的追求

在《会说话的石头》一书中，戈登夫人揭示了基督教仪式与日本佛教仪式的相似性。虽然没有进一步的证据，却可推断，景教可能由弘法和另一位传教大师传入日本，因为这两位著名的大师在公元9世纪，曾经作为使者出使中国，很可能受到了景教的影响。这本书由著名梵文学者高楠顺次郎（Takakusu）译成日文，在日本佛教界激起了很大的反响，改变了佛教界对基督教的看法。

大乘佛教是佛教和基督教的融合，很可能是通过景教传入的。它强调因信得救，而不是积功德；追求精神超脱，而不是物质满足；不仅追求个人救赎，而且主张普渡众生。

1909年，李提摩太在日本期间，参观了古都奈良附近的法隆寺，走进一座寺庙，他感到震惊：有的画像就是《启示录》描述的“禽兽围绕着宝座”的生动体现；在另一座庙里，佛陀作为最伟大的医生现身，治疗一切疾病；还有一座庙里，释迦摩尼被12个全副武装的将军（他的徒弟）护卫着，每一个都有名有姓。他站在琉璃海中间，日月在他身上栖息。庙里的和尚们在举行仪式时，在空中画着十字。

对李提摩太而言，人类的宗教全部都是对上帝和不朽的追求，它

们之间只有好、更好和最好的区别。

对于佛教，李提摩太是一个勤奋而有同情心的学生。他的一个同事说：李提摩太研究佛教的动机，是想以这种方式说服佛教徒，即佛教实际上借用了基督教的一部分，他们应当愉快地接受基督教整体。

《西游记》英译

李提摩太节译《西游记》，取名《出使天国》（*A Mission to Heaven*）。这部讲述唐僧西行取经奇异经历的作品，其中某些术语，让李提摩太想起在中国消失很久的景教教堂。他对这部书的寓言解释得宽容而有趣。

1913年，李提摩太特地参观了山东崂山，目的是看看生活在12世纪的《西游记》作者所住的道观。

李提摩太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他无拘无束的想象力，将他带到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七、和平使者



成立红十字会

一位在山西大学成立时在太原府协助李提摩太的开明道台沈敦和，请求李提摩太协助筹募资金，救助中国难民。于是，他们成立了中国首个国际红十字会组织，沈敦和任中国秘书，李提摩太任外方秘书。

中国向红十字会捐助的资金达四十五万多两银子，其中慈禧太后一个人就捐了十万两。⁹

9 《李提摩太在中国》，p. 264。

基督教青年会

1885年（清光绪11年），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最早在福州成立。1895年发展到天津。1912年，在上海成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组合”（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Y.M.C.A. in China），并已在25处成立分会。

1901年，李提摩太遇见穆德（John R. Mott），美国基督教青年会部长，学生自愿者运动理事。在穆德的管理下，基督教青年会发展成为促进中国国家进步的最强有力的组织机构之一。他强调青年德、智、体全人发展，以基督教理念为宗旨，在生活、身体和精神方面为社会提供服务。

穆德凭着激情、强有力的演讲、磁铁般的性格，神奇地打动了欧洲、美洲和亚洲学子的心灵，被李提摩太形容为“中国宣教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新星”。

夫人去世

1903年3月，李提摩太夫人得癌症，手术无效，7月10日与世长辞。

苏慧廉，《李提摩太在中国》的作者，阅读了李提摩太夫妇的往来书信后，说，“她是李提摩太思想潮水的守护天使，她的观点对李提摩太有重大的影响……今后，他不得不面对生命中再也没有既是灵感又是把关者的人了。”

玛丽·马丁于1843年出生在爱丁堡，父亲是爱丁堡的宣教士。她受过良好的教育，翻译了很多英文著作，最重要的成果是《杰出基督徒传记》十卷。她开办音乐原理讲座，照料各个学校，培训和管理妇女读经班，在上海编辑《教会通讯》（*The Messenger*）来协助丈夫，合作编辑《远东女子工作》和《远东》杂志，担任中国高级女子中学校长，协助天足会的工作，等等。

她说：“在我们的考虑中，上帝和上帝的事业必须放在第一位。”

她与李提摩太的书信中透露，他们的爱是多么深沉、多么神圣、多么美丽。

青州基督教大会

1904年8月，李提摩太参加了山东青州府的宗教大会。山东学政——孔子第73世孙和另外四位官员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30多位政府官员身穿官服出席会议。除了基督教代表外，与会的还有大约100位中国各宗教派别的领袖。其中一人建议，以传播宗教为主旨的宣教士应该编辑一些宗教课本，供政府开办的学校使用。

会后，李提摩太带着四个女儿前往济南府，拜访山东巡抚周馥，参观他早年工作的地方。周馥问李提摩太要新约圣经，李提摩太给了他200本精装《新约》发放给山东官员。

四次基督教大会

回顾1807年马礼逊来华后四次基督教大会：

1877年，13,035个教友，两三名中国代表。

1890年，37,287个教友，两三名中国代表。

1907年，256,779个教友，不到20名中国代表，李提摩太为此次大会副主席。

1922年，400,000个教友，50%中国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1907年第三次基督教大会后，中国人参与并担任领导职位大幅度增加。¹⁰

“器物”背后的英国精神

19世纪下半叶，为了挽救江河日下的清政权，清政府内的改良派掀起了一股办“洋务”的热潮。一些清朝官员们开始小心谨慎地走出中

10 《李提摩太在中国》，p. 270。

国，去实地认识那些“不知礼义廉耻君臣上下”却又屡败“大清”于枪炮之下的西方“蛮夷之国”。清政府于1866年向欧洲派出了第一个“察访风俗”的“代表团”，由前任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父子率同文馆学生共五人，历时约四月，先后浮光掠影般走访了法、英、荷、德、俄、比等国。1868年，清政府派出第一个外交使团（即由外国人充当中国使团首领的“蒲安臣使团”）出访欧美，是年9月，该使团由美抵英，随之遍访欧洲各主要国家。

李提摩太诚恳地提醒：他们参观的地方不应该仅仅是陆军、海军、兵工厂和制造厂。大英帝国的“器物”不应该成为东方人感兴趣的方面。“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强大、对我们的机械制造感到好奇，却不明白背后所拥有的宗教、哲学和人文学科所生成的文化和精华、我们的能力所在、我们所受的制约。多次战争、火烧圆明园、赔偿、随后的国债、以及绵延2000英里海岸线的炮舰和蒸汽轮船，这些就是远东对西方“器物”的印象。它必须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英国精神。”

伟大的教训

1908年，李提摩太访问日本时，在宪法草拟之地，与宪法草拟者伊藤伯爵会面，并会见外务大臣大隈重信（Okuma）。在他的私立大学里，有700个中国留学生。

1913年李提摩太出访朝鲜。正在首尔为建立一个全新政体出谋划策的伊藤伯爵邀请李提摩太共进晚宴。在宴会上，伊藤伯爵说，在周游海外期间，他学到了三条伟大的教训：第一，如果一个民族不努力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条件，那么它就不能被看作是繁荣昌盛的；第二，没有精神上的支柱，任何物质上的繁荣都不会持久；第三，对于那些拥有精神支柱的民族而言，拥有宗教支持的国家是最强大的。

劝说孙中山

孙中山的父亲是伦敦传教会的宣教士。孙中山最初学医，师从嘉

约翰（John Glasgow Kerr）医生和香港西医书院的康德黎（James Cantlie）医生，是香港西医书院的首届毕业生。

因孙中山同少年中国学会有联系，清政府悬赏十万英镑捉拿他。1896年10月11日，他被骗进中国大使馆，关在一个小房间的顶层，伺机带出英国，解送北京斩首。但是，康德黎医生得到密报，立刻到外交部营救他。

获释不久，孙中山去李提摩太在伦敦居住的旅馆拜访。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牧师把孙中山的《上李傅相》一文推荐给李提摩太，登载在《万国公报》上，希望通过李鸿章说服清政府进行改革。

李提摩太劝孙中山不要进行激进的革命，革命就像一枚残破的硬币翻了一个面——它依然是一枚残破的硬币。中国需要的不是革命，而是改革。

1900年在日本横滨，李提摩太又一次见到孙中山。当时孙中山忙于制定推翻清政府的计划。最后，李告诉孙，他们不得不分道扬镳了，因为他坚信，中国需要的是开导政府，而不是推翻政府。

1903年2月18日给中国记者的信中，李提摩太说：“耶稣基督征服世界，靠的是精神和智慧，而不是武力，我们争取使用这种方法。另一种方法已经写过了——但是拔剑者必死于剑下。”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几乎同时逝世。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

天国将要降临

1914年6月17日，湖南省精英500人聚会，包括教育部长、国立学院院长等。李提摩太以“天国将要降临”作为题目发言。他提到1898年维新变法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让中国强大富强起来。他指出，各民族最优秀的人民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全世界幸福的共同理想。

大约一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最后的日子

1914年8月，李提摩太再婚，娶了在华工作了20多年的医疗宣教士，埃塞尔川博（Ethel Tribe）医生，他又有了一位能够分享生活与志向的伴侣。

1915年，李提摩太70岁，向广学会提交最后一份年度报告。他说：“多年以前，他们感到，中国需要外国人的帮助。这是因为，当他们阅读中国学校的教科书时，他们感到其中缺乏四种东西：一是缺乏真正的科学，二是缺乏真正的历史，三是缺乏真正的经济学，四是缺乏真正的宗教。……广学会来到中国，帮助她发现问题，使她与其他国家并肩发展。”

在年会上，协会主席、上海大法官苏墨立志（Haviland de Susmarez）先生在提到李提摩太时说：他是时代的英雄……他被所有人爱戴，每天都有中国人和外国人去他的办公室，向他寻求建议。他们总是能够得到帮助，获得鼓励……人们都知道，他是中国真正的朋友。从多重意义上来看，他是后无来者的。¹¹

李提摩太把自己图书馆的七千册书赠给了广学会。

70岁生日时，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明恩溥博士给李提摩太写了一封信。他写道：你的许多朋友今天都在感谢主，不仅感谢他把你的心带到了中国，而且要感谢你的诞生！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时代，你已经尽了你自己的努力……为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改良，以此来实现世界的改良。的确，这种努力有时候看起来就像轮船在海中航行，如同鹰在空中翱翔，又似蛇在岩石间行走，渺无踪迹。但是，尽管局势变化，在上帝的经济学中，什么都没有真正失去。你的坚信努力，为其他人的建设打下了基石。

同事们庆祝他来华40周年时，库寿龄（Samuel Couling）说：在中国的18个省中，我们可能找不出一个曾经被你伤害过的人。的确如此，知你最深的人，爱你也最深。

伯驾医生说李提摩太永远都表露出“始终如一的善良与谦恭”，“从来没有武断或专制”，而是“最大程度的尊重、善良和好意”。

11 《李提摩太在中国》，p. 304。

1895年，美国乔治亚大学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1900年，布朗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1916年，威尔士大学授予他法律和逻辑学博士学位。

在中国，1903年，他被授予头品顶戴。1907年，被授予双龙宝星勋章。

在英国，他的客人络绎不绝。有一天，曾任李提摩太秘书的梁启超来看他。梁启超说，他一到伦敦，第一件事就是打听李提摩太的住处，因为李提摩太为维新运动提供了无价的帮助。梁启超带来了自己的十卷著作，作为礼物送给李提摩太。梁启超的造访和礼物给李提摩太带来了莫大的快乐。

李提摩太的笑声

李提摩太带着出使天国的使命，踏着时代的脉搏，领人与时代俱进。

他有一个诀窍，就是从每个人身上找到善。他的同情心如此广阔，使那些信仰狭隘的人都感到震惊。他对人彬彬有礼，经常发出快乐的、音乐般的笑声。他善于大胆地表述自己思想的丰饶与美丽。他做事得体，天性宽宏大量，思虑周详、宁静、平和。

1919年，李提摩太夫妇订了初秋的船票决定返回中国。可是同年4月17日，李提摩太生病去世，享年73岁，为中国服务长达45年。

他未来得及回到中国，在伦敦郊区，生命走向了尽头。在他的躯体化为灰烬之前，几个朋友在小礼拜堂里聚集。“没有人怜悯，没有人尊敬，没有人传唱，”但斯人并未故去，他活在薪火相传的男男女女的记忆、生活和功绩中。

中国人不会忘记他。

一位山西的宣教士回忆：“无论宣教士到山西什么地方，那里的人民都会充满感情地问起李提摩太，”因为“他在身后留下一片光明”。

参考：

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

苏慧廉著，关志远等译，《李提摩太在中国》。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爱的焚烧： 富能仁与傣僳人的故事

没有信心的祷告，就像用一把钝刀子切东西，劳力多，效果小。借着祷告而成就的工作要靠我们的信心。“照着你们的信心，”而非劳力，“都给你们成就了。”

——富能仁给同工的信

我第一次听说富能仁这个名字是因为一本书。这本书正巧与我的博客同名，叫《山雨》。¹²

一天，远牧师来访，胸前抱着高高的一摞书，说，你不是纽约曼哈顿图书馆馆长吗？去搜集西方传教士的故事吧，让我们向世人述说西方传教士如何流血牺牲，如何把福音传到中国，如何改变中国、祝福中国。

这摞书的顶端，就是这本《山雨》。

打开，第一页第一句话是：献祭是什么？

献祭就是爱的焚烧。

富能仁，是一个将生命献在祭坛上，焚烧了一生的人。

12 Eileen Crossman著，冉超智译，《山雨：富能仁新传》。香港：福音文宣社，1989年。

果实累累的一生

1908年，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 1886—1938），一个22岁的风华少年，撇下英国伦敦的优渥生活，放弃工程师的锦绣前程，抛开音乐梦，千山万水，背井离乡，来到中国。

那年，正是第一位基督教新教宣教士马礼逊来华后的第100个年头。年轻的富能仁在内地会拓荒宿将麦卡悌（John McCarthy）的带领下，进入云南西南的丛林山岗。他在那里传教30年，不仅建立教会，还为傣傣人发明了文字，创办了学校、医院，最后葬身在傣傣人中间。

富能仁是第一个在傣傣族中传播福音的人。

二十世纪上半叶，一个孤单的身影，穿梭在云彩之间，传讲耶稣基督的故事。今天，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一带居住着70多万傣傣人，70%以上是基督徒，横断山脉的居民，几乎全民信耶稣。

一、傣傣人的渴望

为了拍摄富能仁的故事，摄制组来到横断山脉。第一次见到傣傣人的笑脸就情不自禁地喜欢他们。不禁想起富能仁第一次遇见傣傣人的情景：

一天，腾冲集市来了几个傣傣人，富能仁就把他们带到布道所。傣傣人比划着，要走六天的山路才能到达腾冲（当时叫腾越）。

不知为什么，富能仁看到他们就喜欢他们，并常常盼望见到他们。他在日记里说：“从一开始，我就全心全意地为他们祷告，似乎有一种东西吸引我到他们那里去。”

是什么吸引了富能仁？

傣傣人是氐羌人的后裔，唐人樊绰在《蛮书》里称傣傣人为“粟粟两姓蛮”。傣傣人刀耕火种，结绳记事，独居一隅，极度贫穷。

可是，他们单纯、敬虔、渴望。

在祖先留下的《创世纪》古歌里，他们唱道：

从古开天地，

就有人和神。

傜人世代祭天拜鬼，他们在日月星辰中寻找他们的神：

七个太阳出，祈求暖人心，

九个月亮升，祈求暖大地，

照射到峡谷，使谷能富饶，

求丰衣足食，过上幸福日。

然而，他们的日子却越越难过，连吃饱都难。他们在歌谣里唱道：

以为白天就会饿死，

想不到熬到了晚上，

以为晚上就会死去，

想不到又看见出太阳。

傜人认为，他们贫穷受欺压是因为丢失了自己的文字。他们哀伤地说：

刻下的木刻被火烧了，

写下的书本被水泡了，

从书本被泡烂那夜起，

我没有一天不生病，

我没有一天不疼痛……

傜人多么盼望有人来拯救，多么盼望有人带回他们自己的书！

二、傜王的传奇

一天，在德宏芒市的一个市集，一本《马可福音》被压在了车轮底下，正巧被一个六岁的孩子看到，就将这本书拾起，拿回家去。

五年后的一个冬天，点心师傅莫丁昌家里来了几个来自寒地的傜人。他们坐在炉火前，火光在他们褐色的脸庞上闪烁。莫丁昌说：“在你们的传说中，有一天你们中间会有一个王。我告诉你们，他来了！”

他的名字叫耶稣，他就是你们傣傣人称为王的人，你们是耶稣的人！”

莫丁昌正是那个五年前从儿子手中接过《马可福音》的人。读了又读，莫丁昌觉得书中的故事很希奇。他的心，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打动了。后来，在一次听富能仁讲道的时候，他站出来信了耶稣。

莫丁昌是整个龙陵县第一个信耶稣的人。

傣傣人听莫丁昌这么说，就问：“有个看不见的王有啥意思啊？我们传说中的王，像我们一样，是一个人！他会把我们自己的书替我们带回来的。”

傣傣人盯着火焰，一片沉寂。突然间，莫丁昌灵光一闪，转身走向门边暗角，从一堆纸里抽出了一张布满灰尘的照片，用长衫袖子将灰尘擦去，递给傣傣人，说：“看，这就是你们的王。”

傣傣人定睛一看，是一个高个子白人和他的朋友站在一起，这人穿着傣傣族人的衣服。

“他是三哥，叫富能仁。”莫丁昌说。

这下子，傣傣人开始对“王”产生了兴趣。他们带着好奇的心回去了。

几个星期后，他们又来到莫丁昌家，说：再给我们讲讲王的事吧，寒地人想知道更多呢。

三、远方来的“三哥”

这个一米九的大高个儿当然不是“王”，而是“万王之王”派来的，他的家乡在英国伦敦。在四兄弟中，他排行老三，所以人人都叫他“三哥”。

富能仁刚刚从英国伦敦皇家学院工程系毕业，就来到了中国。他热爱数学，酷爱弹琴。是上帝的灵感动了他，要他到中国去，把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好消息告诉中国人，于是，富能仁就来到了云南腾冲，在这个“边极第一城”落了脚。

迎接富能仁的是安选三夫妇（William and Ethel Embery），他们是内地会最早送到横断山脉的宣教士。因为需要，他们很快被调离。

头五年可真是艰难哪！好不容易翻过了中文山、文化山、习俗山，躲过国民革命的战火，还得过热病、伤寒、疟疾，掉到沼泽地里险些被活埋，被克钦人追杀，被土人绑在鬼树上差点送命。然而，这一切算不得什么，最使这个孤单的年轻人沮丧的是，居民们对福音异常冷漠！

历经千难万险，来到中国的第五个春天，富能仁终于为自己的厨子、挑水夫和教师施洗，结出了初熟的果子。

一天，厨子兴冲冲地从市场上带回一个傣傣向导，要带富能仁去一个叫快活谷的村庄，说，那里正举行一个订婚喜宴。

富能仁坐在傣傣人中间，一句傣傣话都不会说。受过音乐训练的他，就把傣傣人说话的音调记在纸上，共有400个音符。

没想到，傣傣人对着这张会说话的纸笑弯了腰。有人开玩笑说：“他把我们的话拿走了，我们就没有话可说了。”

傣傣人哪里知道，就在这张会说话的纸上，“三哥”萌发了傣傣人梦寐以求的文字雏形。傣傣人又何曾料到，仁慈的上帝，通过这位远方来客，向这个世代为奴的民族开口说话了！

一夜狂欢，一地醉汉。第二天早晨，一个傣傣人从醉倒在地的人群中走来，邀请富能仁到六哩外的尖刀山上去。他说，村子里的人想学中文。富能仁欣然接受了邀请。

尖刀山上，他用浅显的汉语向傣傣人讲道，并教他们唱歌。临走那夜，父亲和四个儿子把家里祭鬼的神坛拆了下来，将祭物丢到炉火中，表示要信这位他们刚刚认识的真神。

这家人姓郭，是第一个投靠耶稣的傣傣人家。

不久之后，富能仁与新来的美国同工卡尔·高漫（Carl Grant Gowman）来到六家湾，去参加一个婚礼。蔡家来了100多个客人，婚礼持续了两天两夜。

客人走后，山顶飘起了雪花，蔡妈妈和家人围坐在火旁，听三哥和他的同伴讲道，蔡妈妈显出对福音特别的专注和渴望。狗、鸡、猪等牲畜和婴儿小孩们进进出出，厨子在边上帮着解释。最后一天，蔡妈妈带领全家决志信主。

上帝在傣傣人的婚宴上，将迦南的美酒赐给了第二个傣傣人家。

可是，富能仁没料到，魔鬼的攻击接踵而来！

四、上帝的挽留

此后不久，郭家和蔡家的人病的病、疯的疯、死的死。傣傣人见状就害怕，又开始杀猪宰牛，回转去祭神送鬼。

富能仁发现自己深陷在忧郁之中，他不住地问自己：你的祷告兑现了吗？无人听你的信息，开头相信的几个人都回头了，不是吗？你看吧，没有用的。你根本不该留在这里。你自以为被呼召作宣教士，做梦罢了。最好走了算了，回去，承认这是一个大大的错误。

日日夜夜，富能仁在怀疑和绝望的边缘上挣扎。对着那一望无际的深渊，何不跳下去一死了之？

一天，邮包里寄来了一份《得胜者》（*The Overcomer*）杂志。这份杂志给富能仁很大的激励。撒但，退去吧！富能仁大声命令撒但退去。可怕的忧郁果然奇迹般地离他而去。

富能仁在日记中写道：神好像在对我说“你喊着要我在傣傣人中作大事，我却要在你身上作大事。”

富能仁写信给英国，请求母亲召集在英国的弟兄姐妹，定期为他和傣傣人的属灵征战祷告。

山头、树林、室内、路上、雾中……无论何时何地，富能仁都在求告神。他常常站在山顶，望着炊烟从千万个村落袅袅升起，为整座城向神祈祷。

滩岔是个地理要冲。富能仁到那里传道五个月来，不仅没有一个人信主，那里的汉人还散播谣言，说他来这里是要将这地方转卖给英国政府来赚钱。他们强迫傣傣人签订协议，不许成为基督徒，不许富能仁与他们来往，否则，就要抄他们的家，没收他们的财产。傣傣人大为恐慌，派人来找富能仁，请求他“离开他们的世界”。

富能仁想：如果神的时候尚未到来，我愿意去别处工作一两年。若是神的旨意，我甚至愿意在我有生之年，看不到神赐下的丰收。

再次上山的时候，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平静，他不要去游说，不要去申诉，相信有一天，会有许多傣傣人归向神……但是现在，他

要有一个农人的耐心，经过了耕作、播种、浇灌的劳苦，他必须等候收割。

最后一次讲道，富能仁与村民团聚在一起，傣傣人唱着笑着，拍手和节，唱他从前教他们的歌。黎明，当富能仁起身准备离开时，一个傣傣同伴赶来告诉他：“我们必须在这儿留一天，有一家人要作基督徒。”

他停留了几天，又有一家人要跟随基督，邻村也有一家人要信主。最后，不下七家人除去鬼坛，要求成为神的子民。

接着，大锅村不下10家人归主，柏树岗15家人归主，乌龟村24家等他去，彩色山有49家归向神……1916年10月，富能仁花了两个半月，到22个傣傣村寨访问布道，其中16个村庄，共有129家人归向神。

日记：这真是令人兴奋，不费吹灰之力，只是从头到尾安详地与神密交，他就像一个接生婆和护士，未曾出力，孩子就生下来了。

目睹神恩，如江河滔滔，在傣傣人中间流淌，富能仁忽然觉悟到，英国家乡的子民们正在为他代祷。虽然远在千山万水，但直接关系到傣傣人的工作，也使他充满圣灵的能力。富能仁坚信，是属神的人的祷告，带来了丰收。他知道，他和远方的信徒们为他自己生命的得胜和土人的救恩向神呼求，已经得到了垂听和应允。

富能仁来华12年后，彩色山上终于矗立起第一座基督教堂。

五、新生命：书声、歌声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傣傣人都在赞美！无论遇见哪个傣傣人，他们都在感恩。乡民们说，是富能仁教他们赞美主的，是富能仁替他们带来了自己的书。

1912年到1917年之间，富能仁与缅甸克伦族传教士宇巴梭商讨创造傣傣文字，决定各自创造不同的傣傣字母。经傣傣人试用后，发现富能仁的字母更加简洁易学，便采用了富能仁用大写拉丁字母及其颠倒正反形式创造的文字，史称“富氏文字”。1919年正式启用。

富能仁还将五线谱改写成简谱，教傣傣人唱圣诗。如今，傣傣人

的四部合唱响彻怒江大峡谷，传遍了天南地北。

富能仁又将《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译成傣傣文，并撰写了傣傣文《基本信仰问答》、《诗歌》合订本、《儿童祷告书》和一本小字典，拿到缅甸印刷。

他常常召集整个村庄，每个家庭的所有成员，一起来学习傣傣文圣经。无论他走到哪里，那里就有赞美的歌声和读经祷告的声音。

如沙漠里遇见了绿洲，傣傣人如饥似渴地学习，兴高采烈地歌唱。渐渐地，通过读经，唱诗，傣傣人学会了他们自己的文字。

傣傣族，这个世代文盲的民族，终于扑到上帝的怀抱，终于走向了文明的行列。

学校建起来了，医院建起来了，鸦片田种上了蔬果，酒徒变成了圣徒，敌人变成了朋友。家庭和睦，人心平安，傣傣人的生活焕然一新。

当地汉人县长曾惊奇地说：“这些少数民族，从前只能在山边种稻麦，其他一窍不通。怎么在数年之间，透过你们的工作，就变成了有教化的人呢？实在不可思议！我们汉人住在他们当中数百年之久，即使一代宗师孔夫子的教化，也无法同化、影响他们；但是一位活着的基督，却改变了他们一生。”

1928年底，富能仁升任云南内地会监督后，到大理巡视。他会见了八位宣教士，四位是新来的青年人，驻于滇西土著宣教区。东区由杨思慧教士（Allyn B. Cooke）夫妇主理，以福音山为据点。西区由高漫（Carl G. Gowman）夫妇主持，以守护山为中心。在腾越西部，中缅边界一带山区，自1919年以来，有800家信主，二千人受洗。李崇德（Francis J. Fitzwilliam）教士协助高漫教士在新池宣教；贾理胜（Bestram Carlson）教士则进入杨思慧教士的工场。

1934年，受富能仁感召来华的美国宣教士杨必贵灵（Isobel Kuhn）与丈夫杨志英（John Kuhn）来到傣傣人的中间。他们随身携带去一部傣傣文打字机，随时打印圣经和属灵资料，以备当地人认识圣经真理。1938年，他们开办了“雨季圣经学校”，有20多位傣傣人参加了培训，学员结业后被派往各地开拓福音工场，不仅向傣傣人，也向傣傣族等其他少数民族传福音。

六、共负一轭的美眷

富能仁心无旁骛地服侍僮僕人。直到中年，上帝为他预备了一位年轻美丽、娇小聪慧的天使。

尚未见面，富能仁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就把心交给了她，她的名字叫洛西·狄曼（Roxie Dymond）。洛西的父亲邵慕廉19岁就到中国宣教。洛西出生在中国，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历史系毕业。遇见富能仁时，洛西刚刚回到中国传道。

初次见面，洛西从天花板和蜘蛛网的缝隙里看着富能仁，如此温文儒雅，无视于物质舒适的一个人。她被他表现出来的力量和男子气概吸引住了。

1929年10月24日，在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42岁的富能仁和23岁的洛西在云南府一个花园里举行了婚礼。

与洛西结婚前，富能仁说：“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就是我的妻子骑一匹骡子，我骑另一匹，把我一切俗世的家当放到第三匹骡子上。”

婚后，新人开始了五个半月的旅程。他们在云南西部的各部落中走了1400里，巡回探访，了解各地情形。马店的草棚和星空下的山野，是他们的新房。他们常常在靠近溪边或其他水源之处露宿，躺卧在繁星之下。随行的僮僕人带着米，用弓箭猎飞鸟、猿猴、松鼠为肉食。

洛西发现，丈夫即使是住在比猪栏好不了多少的地方，仍然是个彬彬君子。无论任何地方，只要能召聚几个人，他会在晚上带着风灯向他们传道。回来后，总会有一段长时间的祷告。

他们很快就有了两个女儿，凯瑟琳（Catherine）和罗茜（Dorothy）。下雨了，孩子们在屋里读小飞侠（*Peter Pan*）和小胖熊（*Winnie the Pooh*）。家中的书快看完了，富能仁自己替女儿们编了一套叫南瓜女（*Pollynana Pumpkin*）的小女孩的故事，读给两个女儿听。他高兴地去河里洗衣服，将婴儿背在背上。两个小女儿，为喜爱孩子出了名的富能仁带来无比的欢心。

妻子有一副好嗓子，是个极有天赋的传道人，很容易引来一大群人。说到用汉语讲道，富能仁自叹不如洛西。

富能仁与妻子洛西这一对美眷，一起旅行，一起传道，共负一轭。

七、不朽：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富能仁是一个生龙活虎的人，他真的活出了自己的梦想。很少人能忘记他仰头大笑的神情。

在实践中，他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传教方法：他常常召集全村全家组织培训。他让傈僳族信徒自购书籍、建造教堂和供养传道人。当教会日后遭到迫害时，并不因为失去原有的外援而受挫。他将教会的管理权交给傈僳族长，很少在傈僳教会留下西方差会的烙印。

此外，他在英国家乡组织了阵容庞大的祷告团，以支持他在傈僳族中的传教工作。

去世前不久，富能仁对妻子说：“洛西，你知道，即使我走了，我不以为我在云南的工作就完了。”

1938年9月25日，年富力壮的富能仁在中国云南省西部的永昌府（今天的保山），因脑疟疾去世，遗下有孕在身的妻子和两名年幼的女儿。享年52岁。

傈僳人从萨尔温江流域来到保山，将富能仁的遗体送到宣道所旁边的小教堂里，为他举行了一次傈僳语的礼拜。祷告、唱诗、献词全用傈僳话，代表西部山区的千万信徒向他告别。安葬礼拜时，教堂中布满了鲜花，出殡的队伍排得很长，拿着丝织的旗帜，寂静无声地从街上走过。保山的皮匠，富能仁按立的石光斗牧师身穿白色丧服，扮亡人的孝子。

富能仁被安葬在山头，俯视保山。山的下侧，30年来，这个神的仆人以此地为家。松林间的孤坟，墓碑上用傈僳文、汉文和英文刻着：“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

子粒来。

富能仁说得没错，他的工作才开始。同工们在傣傣人的帮助下继续翻译圣经，经过整整半个世纪的努力，傣傣人终于拥有了整本傣傣文圣经。

至今，富能仁仍然是东亚最成功的传教士之一。他和同工们建立了一套恒切祷告、深入民间、圣经扎根、锲而不舍，自养自立自传的宣教模式，这套模式成为神用以建立并强壮各地教会的典范。

杨思惠夫妇（Allyn and Leila Cooke）将基督教义用新创的傣傣文编写成今日傣傣族教民手中的《新约全书》和《颂主歌曲集》。其妻能弹琴、能画画、能裁剪、能种地，还是个妇科幼科医生，并将文艺和体育活动带进了傣傣人的生活。傣傣人称他们叫“阿益打”（尊敬的大哥）、“阿子打”（尊敬的大姐）。

怒江地区有内地会、圣公会、循道会、中华基督教会、滇藏基督教会，及天主教派来的包括英、美、法、加拿大、瑞典等六个国家120多名宣教士，建立了200多个教堂。¹³

傣傣人在信主以前，只是互唱山歌，追逐异性。但信主之后，圣灵把新歌放在他们心里，他们“口唱新歌”，满有喜乐地赞美神。怒江大峡谷一带，成为一个福音谷。

“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诗篇 84：6）

傣傣人告诉我们，原先他们是酒徒，现在他们是基督的门徒。

代替酒杯的是一种果露，山涧的水，对上酸涩的橘汁，加上蜂蜜，这甘美是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换来的。

这一切，都因着一个人、一本书而起。

“他本来富足，却为他们成为贫穷；叫他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哥林多后书8：9）

13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傣傣族简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63年，p. 27。

参考：

Eileen Crossman著，冉超智译，《山雨：富能仁新传》。香港：福音文宣社，1989年。

多姿多姿的人生： 宣教士警句、趣闻、精彩片段

不，我是个基督徒

英国来华宣教士杜嘉德受霍乱袭击，临终时医生安慰他说：“不要太激动，你是个哲学家。”杜嘉德立刻打断他的话：“不，我是个基督徒。”然后，他重重地喘口气，接着说：“在这时刻，基督徒要比哲学家好得多。”

圣经的价值

来华宣教三巨头之一，被称为“华中使徒”的杨格非，在浅文理版的圣经序中，向中国人推荐圣经的价值，他如此说：“圣者所载之道，慰可释人之愁烦，有应许可起人之奋勉。深语之，虽贤哲莫能穷；浅语之，虽愚鲁亦可及。至于万有之原、生死之理、善恶之报、肉身灵魂之别、天堂地狱之分，并救灵魂之法，此书基纪之详明。”

但是我能信靠

1900年义和团事变中，内地会人员损失惨重，共58个成人与21个小孩死在刀下。已经68岁，正在瑞士养病的“中国内地会之父”戴德生得知噩耗后，精神几乎崩溃。他说：“我不能看书，不能思考，我甚至不能祷告，但是我能信靠。”

以膝代步

当戴德生获悉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准备到反教气氛浓厚的河南省去宣教的时候，特意写信叮咛说：弟兄，如果你想进入河南省传福音，一定要以膝代步啊 Go forward on your knees！古约翰后来带领东北大复兴，主题是：“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4：6）

永恆价值

在剑桥七杰来华前几年，已经有一位牛津医学院毕业的年轻传教士默默地在中国山西省行医布道，而且日复一日热切地为英国大学生能看重中国的需要而祷告。他的名字叫赐斐德。然而，年仅32岁，来华仅三年零一个月，因被一个白喉患者感染而殉职。上帝的旨意难测，一个由一千五百英镑奖学金栽培出来的年轻医生，却如此匆匆、卑微地结束了尘世的工作和生命，他的意义和价值，也许只有在永恆中才能说得明白。

缠足惨状

英国来华医生马士敦，在“宣教医生的工作”一文中，提及中国女孩被迫缠足的惨状，以及当地任意杀死女婴的恶风。他写道：孩子们，你们要为生在基督教世界中感谢上帝，因为只有基督教赋予女性应有的地位。

六位宫女换一位师母

胡美医生是第三代传教士，他的祖父和父亲在印度宣教，而他自己在印度出生的。他津津乐道祖母年轻时的一段奇遇：她与丈夫路过非洲时，接受一位非洲国王的款待，她看见大厅角落上有一部四脚朝天倒置于地上的钢琴（国王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请国王吩咐手下将它扶正，然后她开始为国王演奏一首又一首好听的乐曲。国王乐不可支，最后召来六位宫女，要求与祖父交换，一个换六个！

失之交臂

胡适听穆德在耶鲁讲道，1911年6月14日，他在日记中说：此君演说之能力真不可及。胡适在6月18日决志信主。可惜，后来他并未在这条路上继续追求，反倒成了无神论阵营中的一员健将。

“万能校长”

剑桥大学毕业的来华宣教士万荣华，任职台湾长老教会中学（即长荣中学）校长。他在1924年的年度报告中引用一段经文，来说明全人教育的精意：“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都要思念。”（腓4：8）他的学生在《黄武东回忆录》赞他为“万能校长”：“他是一位翩翩有礼的英国绅士，是牧师，也是数学家、是运动家、是教育家、是宗教家。”

世界不配的人

戴德生的儿子戴永冕，开办了开封圣经学校。担任副校长的马克牧师，曾是开封圣经学校的学生，后来成了“遍传福音团”的负责人。他们的意向是将福音从中国的西北，穿过被视作福音硬土的中亚各国，传回耶路撒冷去。团员们踏上征途，如西伯来书所形容的：他们“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希11：37-38）

明日世界

《有远见的勇者》一书称艾得理为“学生之光。他说：“赢得今日学生，就赢得明日世界”。

可喜的伴侣

宾惠廉的风采：他的声音非常宏亮，似乎不管多少人都能够听清听见……当圣灵的能力从他倾泻而出时，有时像是西乃山上令人颤惊的闪电，有时像是微风中温柔的呼吸。他自觉正站立在永生和永死之间，吹起救恩的号角，直到会众或者因为忧伤而哭泣，或者因为寻见救主而欢乐……他1947年到中国宣教，开始时，他在邻近乡村做不定时的巡回

布道。每到一个新地方，他就找一棵比较显眼的大树，站在树下大声朗诵圣经，不用多久，他的四周就会围立一群表情惊讶的村民，然后他就开始向他们解释所读的经文，以及说明自己来访的目的。宾惠廉较戴德生年长17岁，对戴氏有非常大的助益。《戴德生传》描述宾惠廉：他以祷告为呼吸，以神的言语为饮食，深深感觉神的同在。此外，他有丰富的学识、温和的性情及天赋的机智。他是一个可喜的伴侣。他的心灵是何等的高超！生活是何等的清苦！他的信仰终不动摇，对恶者的攻击永不止息。宾氏——他的友谊及一切，是神所赐给戴氏的奇妙恩惠……在他的感化中，戴氏的知识和灵命长大，以致认识自己及神所给他的使命，他后来的成绩因以完美。

儒释道轮廓

艾约瑟是伦敦传道会在华三杰之一。三杰对儒、释、道三教看法不同。艾被公认为对中国宗教了解最深的专家，是英国通儒。他的著作 *The Religious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1859) 一书被列为西方人认识中国的基本读物之一。书中在比较儒、释、道三教的异同时，常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说法。儒教追求道德性 (moral)，释教追求哲学性 (metaphysical)，道教追求物质 (material)，三者间有互补的关系。三个M起头的单字并列，既适切，又容易记得。又如儒教讲对与错 (the right and wrong)，释教讲真与假 (the true and the false)，道教讲清与浊 (the pure and the gross)。短短几句就勾画出三教的轮廓。

母亲的作用

伦敦传道会在华三杰之一慕维廉认为，中国的母亲在迷信与偶像传播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她们将子女从小就推进黑暗与错误之中仍不自知，因此加强女性宣教士的阵容，更有效地对中国妇女宣教，带领她们走出遮掩的捆绑和辖制，进入神光明的祝福里，才能扭转全局。

播种者

“教会报人”林乐知，是中国现代化的播种者。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都受其影响。通过《万国公报》，林乐知成为林语堂童年私淑的对象，“在我生命中，影响最大、决定命运的人物。”林乐知的

《全球五大洲女俗通考》（*Women in All Land*）一书，以妇女地位的高低为文明与兴衰的指针，作各国文化的比较研究。皇皇21册，为广学会40周年统计最畅销的九种书籍中名列第二。

我不是摩西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来自英国的“孤儿之母”艾伟德在日军无情的炮火下带着一百名左右的孤儿，长途跋涉，翻山越岭，从山西省南部的阳城县，度过黄河，安全抵达陕西省的西安。就像《出埃及记》充满神迹，艾伟德的出山西记也充满神迹。当他们来到黄河边，前有滚滚波涛，后有日军逼近，空等了三天都不见渡船踪影。一个女孩忍不住来问艾伟德：“如果神能分开红海，让以色列人通过，为什么他不能分开黄河让我们通过呢？”艾伟德推辞说，“我又不是摩西！”女孩子却逼着问：“你不是摩西，但神仍然是神，不是吗？”于是艾伟德带着孩子们向神祷告：“神啊！我们已经到了尽头，求你让我们过去吧！”祷告后，他们开始唱诗歌赞美神。不久后，一位国军军官出现了，问明他们的需要后，立刻调派一只船，分三次将它们全部运送过河。黄河没有分开，但神用其他方法为他们开路。

神迹千里

1900年义和团之乱爆发时，中国内地会在山西省有88名宣教士，其中殉道的有47名，生还的有41名。盖落洼是生还者之一。盖落洼于1904年在伦敦出版的《神迹千里》（*A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 in China*）里记载：在山西南界的拦车州，因为干旱，民情激愤，都认为“若不流洋鬼子的血，老天爷一定不肯降雨。”官吏会商的结果，决定杀死外国宣教士一行人。于是他们都跪在炕上，开口用中国话向上帝祷告，好让周围的人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神迹又出现了。就在他们结束祷告而站立起来的时候，原来万里无云的晴空突然降下倾盆大雨来，在几秒钟以内就驱散了屋外包围的群众。盖落洼说，他一生中不曾见过这样的豪雨，像天上的水库洩洪一样，足足下了一天。这场雨不但软化了坚硬如石的地面，也使控诉他们的罪名化为乌有。盖落洼真实地历到“上帝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不后悔

1900年夏，义和团之乱丧生山西汾州的艾德华师母临终前给家人的信：“我试着鼓起勇气再次写信给你们。这些日子以来的恐怖情景，叫我如何下笔呢？我宁可不让你们知道。寿阳的七个人，包括我们可爱的女儿在内，都被押往太原，并在巡抚命令下人头落地。加上太原的朋友们，一共是三十人……三个星期后，太股的教会遭到攻击，我们六位同工与几位勇敢的中国信徒也都遭害。目前我们都在等候回天家的时刻。我们曾计划逃往山地，可惜没有成功……亲爱的，我渴望再见到你们，但恐怕我们已经无法在世上见面了。我深爱你们，相信你们也不会忘记躺在中国土地上的我们。我正准备平静的面对死亡。主与我亲近，他不会令我失望……腹中的胎儿将与我同往，亲爱的母亲也将在天家欢迎我们。想到救主的亲自迎接，这些日子所受的一切磨难都得到补偿。亲爱的，多向主而活，少思念地上的事……我一点也不后悔来到中国，只是遗憾完成的工作太少。这两年的婚姻生活满有喜乐，亲爱的丈夫也将与我一同赴死。我一向都害怕离别。如果我们能够逃脱，那是一个神迹。我爱你们。” 丽莎 8月3日


卷四 前赴后继

105名来华宣教士简介



宣教士选介

东汉多马传说



65-68年

圣多马 Saint Thomas

印度马拉巴主教所著《迦勒底史》称：“天国福音，散遍各处，竟至中国……中国人……得信真理，皆出于圣多马之力。”在马拉巴教会迦尔底亚祈祷书中记载：“中国人和埃提阿伯人，因多马的劝勉，信仰真道。”“基督教借着多马的宣扬，犹如双翼之鸟，飞往中国。”

参考：

法国研究口头传播福音的专家皮埃尔·佩里那（Pierre Perrier）和中国问题专家沙威·瓦尔特（Xavier Walter）合著，《多默宗徒在华建立教会》（*Thomas fonde l' Eglise en Chine*）（法文）。巴黎：Hachette出版社，2008年。

唐朝景教

635年

阿罗本 Alopen Abraham

波斯人，是有历史记载最早到达中国的景教主教。阿罗本是亚述东方教会，基督教聂斯托里派，派往中国的使者。在那段时期，唐朝欢迎各种外国人，从阿拉伯的穆斯林、叙利亚的基督教教徒、突厥人，到萨珊王国的波斯人。唐代贞观九年（635），大德（主教）阿罗本率聂斯脱里派传教团，从波斯抵达唐朝首都长安。唐太宗命唐朝宰相房玄龄到长安西郊迎接，并亲自会见了阿罗本主教。唐贞观十二年（638），景教为唐朝所认可，唐朝政府资助其在长安义宁坊修建寺院（教堂）。唐高宗年间，阿罗本被奉为镇国大法主。

635年

景净 (Adam)

唐代著名景教传教士、主教和翻译家。叙利亚人或波斯人，其名意为“景教之净”，叙利亚文献称他为亚当（Adam）。唐代贞观九年（635），景净随着阿罗本率领的聂斯脱里派传教团从波斯抵达唐朝首都长安。其父伊斯是唐代著名景教领袖之一，在唐肃宗、代宗和德宗三朝效力朝廷，亦为景教之柱石。他曾担任名将郭子仪的副使，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战功卓著；而且在社会慈善和宗教文化事业方面，亦有相当的贡献。已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谦之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叙利亚文，认为景净是“真正中国景教的最高领袖，……他是司铎兼省主教并中国总监督”。景净居于唐朝都城长安（今西安），长期从事传教和翻译工作。他学识渊博，翻译了叙利亚经书32卷，以及祈祷书等有关礼拜的书籍，其中有几卷后来在敦煌石室中被发现。景教碑文末后，在“大秦寺僧景净”下面亦有叙利亚文一行，译文为“秦尼斯坦（Chinestan，即中国）教父（Papash或Papash）、区主教（或译省主教、乡主教）兼司铎亚当（Adam）”。他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撰写人。景教碑建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正月初七日（781年2月4日），概述景教的基本教义，解明“景教”名称之义及由

来，叙述景教自太宗贞观九年（635）到德宗建中二年（781）140多年的历史，并记述了伊斯辅佐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的战功及其个人的善行。文字简练，显示出景净的中国文学功底和深厚修养。

参考：

陈怀宇，《景风梵声》。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

川口一彦，《景教》（東回りの古代キリスト教）。日本：桑原制本有限公司，2002年。

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1966年。

李氏举，《景教探索与红学研究》。波士顿：中国基督教理学会，2011年。

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元朝也里可温教

也里可温教：陈垣于1917年作《元也里可温教考》，明确指出“也里可温”即“敬拜耶和華者”。陈垣当时亦凭此文章而得享盛名，享有“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开山祖”之誉，并与史学家陈寅恪被称为“史学二陈”。

1246年

柏郎嘉宾 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 1180-1252

意大利人，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教皇因纳森四世于1246年派柏郎嘉宾（66岁）使华，抵达蒙古上都哈拉和林，携带教宗写给蒙古大汗的亲笔信，晋见蒙古大汗贵由（窝阔台之子）。柏郎嘉宾未能说服贵由皈依天主教，于次年返回。此为罗马天主教第一次正式与华交往。著有《柏郎嘉宾蒙古行纪》，又译《鞑靼蒙古史》，是欧洲人对蒙古最古老的纪录。柏郎嘉宾也是第一位尝试以编年体撰写蒙古历史的欧洲人。

1271年

马可·波罗 Marco Polo 1254-1324

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世界著名旅行家和商人。1271年（17岁）随父亲和叔叔来中国，途经中东，历时四年多，到达蒙古帝国。在中国游历17年，曾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和东南地区。在狱中口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故事，其狱友鲁斯蒂谦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参考：

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

1291年

若望·孟高维诺 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1246-1328

意大利人，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人士及总主教。1289年，受罗马教廷派遣，出访元朝中国，于1291年（45岁）抵达泉州。1294年抵达元朝京城大都，受到元成宗铁穆尔礼遇。常居汗八里（北京）传播天主教。1299年和1305年分别在大都建成2个教堂，建立了最早的天主教中国教区。1307年7月23日被任命为汗八里总主教，1328年在大都去世。信徒3万。

明朝天主教

1549年

圣方济各·沙勿略 St. Francis of Xavier 1506-1552

西班牙籍天主教传教士，耶稣会创始人之一，首先将天主教信仰传播到印度、日本和马六甲，天主教会称之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

1534年8月15日，罗耀拉、沙勿略等七人在巴黎的蒙马特高地共同誓发神贫和贞洁的誓愿，创立耶稣会。1540年9月27日，教宗保禄三世正式批准成立耶稣会，命罗耀拉成为第一任会长，沙勿略受命成为耶稣会首批传教士。当时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欢迎耶稣会教士前往葡萄牙人开辟的东方地区去传教。1541年他和另外两个伙伴沿着葡萄牙人开辟的东方航海路线，前往印度、日本、中国等地传教。

1549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方济各·沙勿略携同两位耶稣会士经马六甲海峡，抵达日本南部九州的鹿儿岛，成为第一位踏上日本国土的天主教传教士。在日本，沙勿略发现，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很深，于是决心尽早访问中国。1552年，他组织了一个赴中国的葡萄牙使团，参见明朝皇帝。但5月底使团在马六甲被长官亚戴德扣留。于是他决心独自前往中国，1552年8月底，到达离中国广东海岸很近的上川岛，计划偷渡入境。但是，答应帮助偷渡的中国商人反悔。1552年12月3日晨，沙勿略因疟疾病逝于岛上，年仅46岁。

同年10月6日，利玛窦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三十年后，利玛窦成功地将天主教传入古老的中国。耶稣会于1847年至1853年建造在中国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名为圣方济各沙勿略堂（上海董家渡）。

1578年

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

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继沙勿略之后，又一位对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1539年出生于那不勒斯王国（今属意大利）基耶蒂（Chieti）。1566年就读帕多瓦大学期间加入耶稣会。1573年，被任命为耶稣会远东观察员视察澳门教会。1578年抵达澳门。在澳门，范礼安要求传教士们学习中国语言，采用中国风俗。1579年他从印度调来的传教士罗明坚抵达澳门。1582年再从印度调来一批传教士，利玛窦就在其中。1588年他带来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古腾堡印刷机，这是欧洲印刷术首次传入中国。1594年在澳门建立中国境内第一所西式大学——圣保禄学院。1606年1月20日在澳门逝世。

参考：

戚印平，《远东耶稣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1582年

罗明坚 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

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明朝以来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的西方传教士。罗明坚29岁入耶稣会。1578年离欧，1579年7月抵达澳门，1582年12月（39岁）抵达肇庆。1588年赴罗马，请求教宗派遣驻中国使节不果。1607年卒于意大利萨勒尔城。著有《天主圣教实录》，系欧洲人最早用汉文写成的天主教教义纲要。编撰了第一部《葡汉辞典》。还将中国典籍《四书》中的《大学》翻译成拉丁文。绘制了《中国地图集》——最早开始绘制中国地图并带回西方，将中国的文化和地理知识介绍到欧洲，对促进欧洲对中国的了解，具有深远影响。

1583年

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1610

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神父、传教士、学者，天主教在中国的奠基者。1582年抵达澳门，1583年（31岁）（明神宗万历十一年）随同罗明坚来到肇庆，获两广总督郭应聘制台和肇庆知府王泮的接待，建立“僊花寺”（僊即仙），为明代中国境内第一座正式的天主教堂，也是中国内陆第一座欧洲式天主教堂。

1584年（万历十二年），利玛窦制作并印行《坤輿万国全图》，令中国人首次接触到近代地理学知识。1594年，换僧服为儒服。次年，发表《交友论》，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被士大夫尊称为“泰西儒士”。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利玛窦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负责人，并指示进京觐见中国皇帝。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利玛窦与郭居静神父在北上任南京礼部尚书的王忠铭带领下，奔赴南京。在南京，通过瞿太素，结交了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思想家李贽等，并结识后来成为文渊阁大学士的徐光启。

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5月18日，利玛窦带着庞迪我神父和准备

好献给皇帝的礼物再度赴京，并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1月24日抵达北京，进呈自鸣钟、《圣经》、《坤輿万国全图》、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同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

利玛窦撰写了介绍天主教教义的《天主实录》。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其中有数名公卿大臣。利玛窦容许中国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祭孔。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拉丁文的Deus）；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并无分别。而祭祀祖先与孔子，只属追思先人的仪式，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所遵从，是为“利玛窦规矩”。

利玛窦与徐光启等人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等书，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而且创造许多中文科学词汇，例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等辞汇，沿用至今。

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5月11日利玛窦病逝于北京，享年58岁。赐葬于平则门外的二里沟滕公栅栏。

参考：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林华等编，《历史遗痕：利玛窦及明清西方传教士墓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1593年

郭居静 Lazaro Cattaneo 1560-1640

明末天主教耶稣会士，出生在意大利萨尔察纳的一个贵族家庭。先在印度工作五年，于1593年（33岁）抵达澳门，在华宣教历48载。先后在韶州、北京、南昌、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传教。是最早到上海、杭州开创天主教事业的耶稣会士。他和利玛窦合作编纂了《拉汉字典》，与徐光启、杨廷筠等科学家关系甚密，并亲自为杨廷筠施洗。1594年，郭居静进入韶州，协助利玛窦传教。当时徐光启在那里教书，认识了郭

居静，并从他接触到天主教及西方科学。1608年（明万历36年），在徐家宅第西侧，建立起上海第一座教堂，并亲自主持教务，从而成为耶稣会进入上海的第一位传教士。为了提高教友的信仰质量，郭居静建立了“天主之母善会”，以培训信徒。在两年时间内，他就为300多人施洗。郭居静80岁高龄辞世，死后葬于杭州大方井修士公墓。

1597年

龙华民 Nicholas Longobardi 1559-1654

意大利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597年（38岁）来华，接替利玛窦。他与利玛窦在对待中国礼仪的问题上观点不同，从而引发天主教廷与满清的中国礼仪之争，最终导致天主教被禁止传播。他于1654年在北京病逝，埋葬于滕公栅栏。

参考：

费赖之撰，梅乘骥译，《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
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年。

1610年

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

法兰西人，耶稣会士，汉学家。生于西班牙佛兰德斯杜埃城（现属法国），1594年11月9日加入耶稣会，1607年3月自修院毕业，被派遣至远东开展传教工作。金尼阁于1610年（32岁）抵达澳门，1611年到达南京。1611年4月，因李之藻之请，偕司铎郭居静、修士钟鸣仁赴杭州开教。1618年4月，金尼阁带着教宗的诏谕，以及在欧洲募集到的七千多部图书，率领20余名新招募的宣教士，由里斯本出发来华。后来成为著名传教士的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傅汎际与之同船赴华。1629年11月14日，金尼阁于杭州逝世，葬于杭州城外的耶稣会司铎公墓。金尼阁是第一个把五经翻译成拉丁文的人。同年，金尼阁将《西儒耳目资》付梓，它是第一部运用音素字母对汉字标音的字典。此外，金尼阁还是第一个系统地编写中国编年史的西方人。他还将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回忆录手稿翻译成拉丁文，以《利玛窦中国札记》为名刊行。

1620年

邓玉函 Johann Schreck 1576-1630

天主教耶稣会士，瑞士人。1620年（44岁）抵澳门，经徐光启推荐到朝廷，负责制定历法。著有《医说略》。1630年去世，在华九年。是伽利略的朋友，第一个把天文望远镜带进中国。在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其最大贡献要数他与在中国官吏学者王征共同完成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一书。

1620年

汤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出生于神圣罗马帝国科隆（今德国）的一个贵族家庭，在意大利学习数学、物理、神学和天文学。1611年加入耶稣会。1620年（29岁）抵达澳门，先后翻译《远镜说》、《坤舆格致》。1630年，由徐光启推荐，接替邓玉函，任职历局，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完成测算日食和月食的《交食说》。为阻止清军入关，他受朝廷命令制造火炮。清军入关后，被御封为钦天监监正，其“西洋新法历书”获得颁行，为《时宪历》。深得清朝摄政王多尔袞和顺治帝的信任，顺治十二年（1655）受封为通政使，晋一品，封赠三代。顺治皇帝死后，小皇帝康熙登基。辅政大臣鳌拜反对西洋学说，康熙三年（1664）发生“历狱”，汤若望被判凌迟死刑。康熙四年（1665），京师地震，免死羁狱，获孝庄太皇太后特旨释放。康熙五年七月十五（1666年8月15日）病死。康熙八年（1669），康熙给汤若望平反。

参考：

李兰琴，《汤若望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

《正教奉褒》（总铎区黄伯禄斐默神父所作）：共两册，有清光绪九年（1883）及光绪二十年（1894）两个版本（初版162页，二版167页），以及道光六年（1826）前，历代教会与教士所获各方彰扬文字，汇为一编，末附“教士姓名华洋合璧”。

《他与帝国同行》汤若望神父纪录片CCTV-10播放<http://video.sina.com.cn/v/b/19711314-1597043581.html>

清朝天主教

1659年

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比利时人，天主教耶稣会神父，精通天文学、数学、历法计算、地理等多方面的知识。清康熙年间随同卫匡国前往中国。1659年（36岁）抵达澳门，后来到山西传教。1660年，受召前往北京，协助汤若望神父。汤若望去世后，接替汤若望被授以钦天监副。撰写《历法不得已辨》，逐条驳斥杨光先、吴明炫在历法推算方面的错误。针对中国传统的观象占候、堪舆占卜等观念，撰写了《妄推吉凶之辨》、《妄占辨》和《妄择辨》。曾铸造红夷炮助清廷。1688年逝世于北京，康熙追赠工部右侍郎，谥为勤敏，名留《清史稿》。与利玛窦、汤若望埋在同一个墓园，滕公栅栏马尾沟教堂。奉教之士：瞿太素、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李天经、王征、瞿式耜等。

参考：

魏若望编，《南怀仁（1623-1688）：鲁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王冰，《勤敏之士：南怀仁》。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

余三乐，《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

1672年

徐日昇 Thomas Pereira 1645-1708

明末在华天主教耶稣会葡萄牙籍传教士、外交家、音乐家。于1672年（27岁），抵达中国澳门。由于康熙皇帝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强烈兴趣，南怀仁便向康熙皇帝举荐了徐日昇。徐日昇以其音乐、天文、数学等多方面渊博的知识，更以其对中国文化的尊重，赢得了康熙皇帝的

赞赏。康熙皇帝说徐日昇“实在是个杰出的天才”，命侍随左右，和南怀仁、闵明我（Dom Ingo Navarrete）轮流为康熙讲授科学知识。1688年南怀仁去世后，康熙皇帝任命徐日昇为钦天监监正。虽然徐日昇辞谢了此职，但实际上主持了钦天监的工作。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康熙皇帝派遣徐日昇和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作为中国使团的成员出使俄国，于1689年9月7日，正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的签订为中国东北边境换得了长期的安宁。徐日昇精通音乐，曾制作机械乐器，建造过多台管风琴，还制作了以悦耳的前奏曲和钟声报时的机械时钟。他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是其介绍西方音乐理论的著作：《律吕纂要》，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向中国介绍了五线谱、音阶、节拍、和声等西洋基本乐理知识；《律吕正义》，介绍有关声律节奏等方面的音乐知识。1692年，康熙因徐日昇、张诚在尼布楚谈判中立下的功劳，和天主教神父们为中国所做的贡献而颁布了容教令，为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打开了方便之门，标志着天主教在中国“黄金时代”的来临。容教令颁布不久，天主教在华传播取得到了迅速的进展。到1701年，“有130位传教士在中国传教：59位耶稣会士，29位方济各会士，18位道明会士，15位在俗神父，9位奥斯定会士。”1708年，徐日昇在北京病逝，享年63岁，被安葬在滕公栅栏天主教墓地，与利玛窦之墓为邻。在康熙皇帝为其所写的悼词中，称誉徐日昇“渊通律历，制造咸宜”的渊博学识，肯定他出使俄国时“扈从惟勤，任使尽职”的工作态度，还赞扬他“秉性贞朴，无间始终”的为人品格。这可以说是对徐日昇在华30多年活动的最高评价。

1687年

白晋 Joachim Bouvet 1656-1730

清朝康熙年间耶稣会法国传教士、汉学家。1687年（31岁）来华，从事宣教与科学文化事业历43载，担任康熙皇帝的侍讲；参与绘制了中国第一张地图《皇舆全览图》；将中国多部经典翻译成拉丁文，介绍到欧洲，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白晋和张诚等人于1688年2月7日抵达北京，遂应召进宫，进献了当时欧洲先进的天文仪器，包括四分象限仪、水平仪、天文钟，还有一些数学仪器。白晋将法王路易十四之子梅恩公爵送给他的测高望远镜转呈给康熙皇帝。康熙非

常喜欢，遂下令将进献之物置于宫内御室中，并传旨白晋、张诚学习满语和汉语。1690年，张诚、白晋等人开始系统地向康熙帝讲授几何学和数学，首先进讲的是《几何原理》。此后，向康熙皇帝讲授天文历法、医学、化学、药学等西洋科学知识。皇帝任命他为皇太子的辅导老师。据《张诚日记》记载，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1690年1月26日，康熙要求张诚介绍俄国使团的来华路线，张诚按照西方绘制的地图给他讲述，他发现地图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尤其是中国东北部分过于简略粗疏，由此他决定依靠传教士，用西方测量技术，绘制出一张全国地图。1718年，《皇舆全览图》及各省分图绘制成功，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如此辽阔的国土上完成的大地测量。作为一位杰出的汉学家，白晋著述、译著颇丰，包括《中国现状》、《古今敬天鉴》、《康熙帝传》、《中国皇帝历史画像》、《易经大意》等。

1687年

张诚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

天主教耶稣会法国籍神父、传教士、科学家。1687年（33岁）来华，先后担任过北京耶稣会会院院长、法国耶稣会在华传教团总会长等职。服务清廷19年之久，曾为康熙皇帝之帝师。1689年受康熙帝指派，随团出使沙皇俄国，与白晋一起，直接参与促成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他在数学方面的天赋尤为突出，曾先后被授予“国王数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等荣衔。从1688年到1707年计19个春秋，张诚作为康熙皇帝的御前教官，悉心传授数学、几何、天文、地理、哲学等西方知识，并借康熙生病养病之机，讲授西方病理学、解剖学等医学知识。满文译著《几何原本》就是在康熙皇帝的指示下，由张诚、白晋等人完成的。1689年，康熙皇帝召徐日昇、张诚等至内廷，为康熙讲授《欧几里德几何学》，即《几何原本》。应张诚等法国教士的请求和建议，康熙皇帝决意绘制全国及分省地图，于1707年12月开始测绘，先请张诚试测绘制出一幅北京及直隶省区地图，最后绘制出第一张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康熙罹患疟疾，高烧不退，太医束手无策，张诚和白晋献上金鸡纳霜，即奎宁，皇帝一服即愈，遂赐张诚住宅（前辅政大臣苏克隆哈旧府），并赐地建筑天主教堂一所，康熙皇帝亲题“万有真原”匾额。这座教堂就是当时北京仅有的

三座天主堂之一的北堂（即西什库天主堂）。张诚一生著述颇多，书信甚丰。1707年3月25日，张诚因病在京辞世，享年仅53岁，毕其生为中国的政治、外交、地理、天文、气象、数学等领域的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715年

郎世宁 Ginseppe Caseiglione 1688-1766

意大利人，天主教耶稣会教士，绘画大师。1715年（27岁）来华，一生历侍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计约50余年。初到中国时，被康熙帝以艺术家身份召进宫中，曾协助圆明园的规划设计。引进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开创的明暗写实画法，并改用胶状颜料在宣纸上作画，也就是今日的胶彩画作法。他曾试图要求康熙帝开办学习用西方透视原理来绘画的绘画学校，但不被采用。后来与中国学者年希尧一起出版了一本《视学》，是中国第一部透视学专著。

参考：

视频：《郎世宁在中国——谦卑服务的帝国画师》，光启社与江苏电视台合拍的四集纪录片，2014年。

郎世宁经典作品高清全集（110张）<http://art.ifeng.com/2015/1125/2619294.shtml>

清朝基督教

1807年

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苏格兰人，出生在大不列颠岛北部的小镇莫佩思（Bullers Green），鞋匠的儿子。1807年（清嘉庆十二）马礼逊（25岁）受伦敦传道会派遣来华传教，是西方来华的第一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东印度公司任翻译25年。第一个把《圣经》全文翻译成中文，予以出版，并在中国传

播。编撰了中国第一部《华英字典》，吸收了第一个华人基督徒蔡高，按立了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与米怜等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所现代学校英华书院，出版了第一本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与英文刊物《印度支那拾锦》，并邀请李文斯顿医生创办了第一个西式诊所。是基督教新教在华奠基人。

参考：

查时杰，《马礼逊与广州十三夷馆》。台北：宇宙光，2006年。

海恩波著，简又文译，《传教伟人马礼逊》。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0年。

孙尚扬，《利玛窦与徐光启》。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

汤森著，吴相译，《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

游紫琳，《平民阶级中的英雄马礼逊》。台北：宇宙光，2006年。

1813年

米怜 William Milne 1785-1822

苏格兰人，受伦敦传道会派遣，于1813年（28岁）携夫人来华，是继马礼逊之后第二位来华的基督教宣教士。米怜六岁丧父，作过牧童，当过木匠学徒。申请来华时，伦敦会认为他学识不够，但米怜说：“只要是关于宣教的事，无论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干。……我去洗衣服，去烧饭，我来服侍马礼逊博士，让他可以专心地传教，我愿意作任何仆人的工作。”十年间，米怜协助马礼逊，成功地在马六甲建立了宣教基地，创办了英华书院，为该校首任校长。他创办世界上第一个以华人为对象的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他还帮助马礼逊翻译旧约圣经。第一位被马礼逊按立的中国牧师梁发，就是在米怜带领下归信耶稣的。因其出色的成就与贡献，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名誉神学博士学位。

1816年

麦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英国传教士，自号墨海老人，汉学家。1816年（20岁）被英国伦敦会派往马六甲。创办第一份活版铅字杂志《各国消息》。1838年，在伦敦发表《中国的现状与传教展望》，向欧洲人深入介绍中国历史和文明。1843年，代表伦敦会到上海，是第一个到上海的外国传教士。他在山东路一带建立伦敦会分部，包括墨海书馆、天安堂和仁济医院，被人称为“麦家圈”。在墨海书馆得王韬协助，将圣经翻译成中文（深文理圣经）。1848年3月，麦都思至青浦传教，与当地漕运水手发生冲突，史称青浦教案。1904年，伦敦会为纪念麦都思，在上海虹口兆丰路（高阳路）设立麦伦书院（麦伦中学）。上海公共租界西区有一条马路以他命名（Medhurst Road 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麦都思的儿子麦华陀爵士（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曾任英国驻上海领事。

1827年

台约尔 Samuel Dyer 1804-1843

戴德生的岳父，英国人。1827年（23岁）被伦敦会派往南洋向华侨传教。在槟榔屿用大量时间研究和完善汉字的金属活字，设计和铸造三千个金属汉文活字。出版过一本汉字活字体型选编《作印集字》。1828年前往马六甲负责英华书院的印刷所事务，同时铸造中文活字阳文钢模、阴文铜模，以便铸造汉字金属活字。香港首份华文报章《遐迩贯珍》就是用英华书院的汉字印刷发行的。当时台约尔设计由英华书院铸造的中文活字世界闻名。俄国沙王钦差大臣、法国巴黎学会、新加坡、太平天国、两广总督、上海道台、清廷总理衙门等，都先后购买全套活字铜模，是为西人铸造的中文铅字之始。1843年7月18日，台约尔前往香港出席伦敦会的会议，并参加圣经翻译事宜大会，被任命为大会秘书。会后返回新加坡，不幸途中犯病，于10月24日在澳门不治逝世。他的遗言：“神圣的耶稣啊！慈爱的救世主啊！我去和为我而死的主同在！”他被葬在马礼逊的墓侧，两个在生活中亲密合作的伙伴长眠在一起了。

参考：

张陈一萍，戴绍曾著，《虽至于死：台约尔传》。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1830年

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美部会传教士，响应马礼逊的呼吁，于1830年（29岁）来华，是第一位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担任英文《中国丛报》的编辑，向西方介绍中国。担任过林则徐和美国公使顾盛的译员。参加订立了中美1844年《望厦条约》和1858年《天津条约》。裨治文文理圣经译本将“God”翻译为“神”而不是“上帝”。1854年5月，随美国驻华公使麦莲从上海进入太平天国辖区考察，发表《调查报告》，否定太平天国。1850年，和妻子创办了上海第一所女校裨文女塾（老西门外，后来的裨文女中）。

1830年

雅裨理 David Abeel 1804-1846

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皈依基督后开始学医。1826年，毕业于新不伦瑞克神学院，被按立为美国归正会牧师，在纽约州的雅典任职。1829年被传教的使命感所推动，加入美国水手公会（The Seamen's Friend Society）。10月，和裨治文同船前往中国，1830年（26岁）抵达广州。先在广州向外国水手宣教一年，同时学习福建话、马来话和暹罗话，同年成为公理会牧师。1833年由于健康原因回国，途经英国、瑞士、法国、德国和荷兰，在会议上代表中国差会演讲。1841年回到中国，1842年在新开辟的通商口岸厦门鼓浪屿创办差会，成为首先进入厦门的传教士。1845年由于严重的肺结核回到美国，次年在纽约州奥尔巴尼去世。

1831年

郭实腊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

德国基督教路德会传教士，是港英时期的高级官员，职称为抚华道。1831年（28岁），到中国沿海考察，同年到澳门。与马礼逊、米

怜、麦都思等，被视为基督教新教在华之始。在华办报、翻译、著述、办学，常领风气之先。翻译了圣经《新遗诏书》、《旧遗诏书》。1831、1832、1833年三次沿中国海岸的航行及其《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以荷兰文、德文、法文和英文在世界各地出版，三次航海是西方新教传教士最早做出的打开中国大门的试探，在西方引起了巨大轰动，引起欧美各国教会对中国宣教的极大兴趣。1834年，他的英国籍妻子温施娣（Mary Wanstall）在澳门开办了一所女子私塾，亦收养并教育多位盲女，堪称“中国盲人教育之母”。有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最早传入，是从1840年郭实腊编译的《贸易通志》开始的。1842年在《中国丛报》上撰文介绍《红楼梦》，是最早将这部中国经典小说介绍给西方读者的人。据伟烈亚历（Alexander Wylie），从1834年开始，郭实腊的著述陆续面世，共有85部之多，其中以中文写成的有61部，早期著述常以“爱汉者”（Lover of the Chinese）自称。鸦片战争后，他以翻译的身份参与了《南京条约》谈判和签订全过程，还做过定海、宁波的“民政长官”；之后又做了八年香港驻华商务总督的秘书，直至1851年病死于香港。1844年他在香港成立传教组织“福汉会”，为基督教在华最早由华人主事的组织。同时还创立中国传教会，在伦敦招募来华传教士。中国传教会把戴德生送到中国，后来戴德生成功地建立了中国内地会，称郭实腊为“内地会之父”。纵观其在华20年之生涯，虽有争议，但无论从事宣教布道、翻译圣经、著述出版，还是从政传译、协力外交等方面，均有重要贡献，为中外史学家所肯定。尤其在宣教理念与策略上，更具突破与创新意义。

参考：

Lutz, Jessie Gregory.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u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Cambridge, UK: Wm. B. F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8.

1833年

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

美国人，1833年（21岁）入华，是最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之一。在中国生活了40年，编过报纸《中国丛报》，当过美国驻华公使代办，

是美国第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也是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的先驱，被称为美国“汉学之父”。其名著《中国总论》标志着美国汉学的开端，该书与他所编《汉英拼音字典》过去一直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必备之书。1858年参与订立了《中美天津条约》，促成传教条款的订立。自1833年来华，直到1876年返美，历43年之久，是当时在华时日最长的西方人。集传教士、外交官与汉学家于一身，既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旁观者，也是中国历史的直接参与者，是早期中美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其中文名取自孔子语：“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参考：

卫斐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834年

伯驾 Peter Parker 1804-1888

基督教美部会传教士，第一位来到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医生。1834年（30岁）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获得牧师资格，同年到达广州。1835年，伯驾在广州十三行内新豆栏街，成立了广州眼科医局，被称为“新豆栏医局”，免费为病人治病。不久因扩大业务而更名为“仁济医院”（Hospital of Universal Love，今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1859年改名为“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 Pok Tsai）。1839年，在华宣教士中只有两位医疗宣教士。因着伯驾的推动，到了1842年有更多的医疗宣教士陆续来华。五十年后，已有61家医院、44家药房、100多位男医生和26位女医生在华从事医疗宣教，许多华人也因着他们的爱心医疗而接受基督教信仰。1844年，伯驾作为美国特使的助手和翻译，参与《望厦条约》的谈判，促使在华传教自由之条款的加入，对清政府采取弛禁基督教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845年，伯驾接受美国泰勒（John Tyler）总统的聘任，成为美国驻华外交代办。1855年，美国政府正式委任他为驻华全权公使。

参考：

爱德华·V·吉利克著，董少新译，《伯驾与中国的开放》。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1837年

艾迪绥 Mary Ann Aldersey 1797-1868

第一位来华基督教女传教士，在浙江宁波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教会女子学校。艾迪绥出生于英格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Chigwell Row）富裕的非国教家庭，父亲约瑟夫是当地文具批发商，母亲名叫伊丽莎白。当马礼逊在1824年到1826年回国休假时，艾迪绥向他学习中文，准备参加传教行列。她的朋友玛丽娅·纽厄尔（1827年作为伦敦会传教士前往马六甲，并嫁给传教士郭实腊）鼓励她加入传教行列。1837年，艾迪绥（40岁）作为独立传教士，前往爪哇苏腊巴亚，并开始向当地华侨传教。在那里为华人女孩开办了一所学校。1843年，她将学校迁往新开放的宁波，该校被称为“宁波女塾”。她在那里工作直到1861年。

1837年

罗孝全 Issachar Jacox Roberts 1802-1871

基督教美南浸信会传教士，创立浸信会于广州第一人。1837年罗孝全（35岁）自费来华，初在澳门向麻风病患者传教。1841年加入美国浸信会差会。1842年成为第一位长期居留香港的新教传教士。太平天国的创立者洪秀全在1847年来到罗孝全在广州的礼拜堂，在那里学习《圣经》，曾要求受洗，罗孝全不同意洪秀全对以前大病时所见“异象”的见解，拒绝为他施洗。洪秀全定都南京后，邀请罗孝全赴南京出任其国策顾问。罗孝全试图纠正洪秀全错误的基督教信仰观念，屡屡以忠言善道相劝，可惜洪秀全终不肯采纳他的忠告。罗孝全在华宣教二十多年，除担任粤东浸信会和第一浸信会牧职外，还主持福音船及文字布道工作。虽然工作非常忙碌，但他还时常去服务那些被社会所遗弃的麻风病人，传福音给他们。1871年，因早先在澳门感染的麻风病并发症而去世。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看轻万物，为要得着基督”。

1839年

包留云 Samuel Robbins Brown 1810-1880

又名布朗，美国宣教士。1838年，刚从耶鲁毕业的包留云接受“马礼逊教育会”的邀请，偕新婚妻子启程去中国。次年，1839年（29岁）入华。是第一位以教师身份来华的美国宣教士，为中国第一所西式学堂“马礼逊学堂”首任校长，开始只有六名学生。据1840年4月，包留云写给“马礼逊教育会”的书面报告称：“马礼逊学堂……目标是在德育、智育和体育三个方面给予学生全面的训练。”1846年，带容闳、黄宽、黄胜到美国马萨诸塞州芒松中学（Monson Academy）读高中，开启中国留学之门。1854年夏，容闳获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成为第一个受过完整美国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回国后通过曾国藩，促成第一批幼童留美，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黄宽成为中国西医第一人。黄胜是近代中文报业的先驱。容闳带出去的首批留学生不少人成为栋梁：如詹天佑成了中国铁路之父；唐绍仪，曾任民国第一任总理；唐国安，清华学校首任校长；梁敦彦，曾任清廷外务大臣；梁如浩，交通大学创始人。容闳回忆，包留云先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教师。他“性情沉静，处事灵活，彬彬有礼，为人随和，且多少带点乐观主义精神。”

参考：

钱刚、胡劲草，《大清留美幼童记》。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

容闳著，恽铁樵、徐凤石译，《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容闳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

1839年

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苏格兰人，伦敦布道会传教士，近代英国第一位著名汉学家。1839年（24岁）受伦敦宣道会派遣，携新婚妻子至马六甲，主持英华书院。1843年，英华书院迁往香港，由一所专门培养宣教士的书院，变为招收中国青少年入学的教会学校。1844年，英华书院更名为“英华神学院”。同年，理雅各在香港建立了伦敦会第一所华人礼拜堂“下

市场堂”。他先后建立四座教堂，经他受洗的人数达272人。他更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从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间，在中国学者王韬等协助下，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共计28卷。当他离开中国时，已是著作等身。他与法国学者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德国学者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1852-1853年间，理雅各的妻子和三个女儿病死在中国。1854年，理雅各帮助安排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去教书，洪仁玕后来成为伦敦会牧师，并作为理雅各的助理，四处讲经传道。1875年，理雅各正式应聘成为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他因翻译中国经书的成就而获得儒莲中国文学首届国际奖。

参考：

何寅，许光华编著，《国外汉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

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1839年

雒魏林 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

英国伦敦会首位进入北京的医疗传教士。1838年被伦敦会派驻中国，1839年（28岁）到达广州，加入中华医学传道会。1840年8月，到舟山为中国人开办一所医院。1844年在上海老城东门外开设上海第一家西式医院——中国医馆（仁济医院前身）。1848年3月，和麦都思等伦敦会宣教士到青浦传教，与当地漕运水手发生冲突，爆发青浦教案。1861年，在北京开创医疗事工，建立北京著名的协和医院的前身。治病的同时，也把福音传给患者。雒魏林说：“凡来医院就医者，一概先听道后看病。对于那些起不了床的重病人，传教士就去他们病房里讲道。”他在信中还说，每周三次由麦都思等传教士向病人集体布道，并“应他们的要求，发放福音书册，以让他们病愈回家时随身带上以赠给他们的亲友。”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多数病人都会“怀着崇敬之心诚心地”予以接受。到1864年1月2日，雒魏林报告说已经有10个布道机构进入北京工作了。1863年返回英国后，著有《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

1839年

合信 Benjamin Hobson 1816-1873

英国传教士、医生，是最早在中国翻译西医医药书籍的人。1835年，于伦敦大学医学院毕业。1839年（23岁），被伦敦会派往中国澳门，为驻澳门教会医院的传教医师。1843年，被派往广州，在广州西关外金利埠创办“惠爱医馆”，施医舍药。于1851年编译了《全体新论》（原名为《解剖学和生理学大纲》），是第一本传入中国的系统的西方医学著作，主要介绍西方解剖学和生理学。于19世纪50年代出版的还有《博物新编》、《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等，这五本被后人合编为《合信氏医术五种》。他用中文著的医学书在中国广泛流传，并被翻译为日文、韩文。1847年，与马礼逊的女儿结婚。合信来华行医20余年，1859年回国，两袖清风，“家居况味肃然，门可罗雀”（王韬）。1873年2月16日，合信病逝英国伦敦西顿哈姆区。

1842年

文惠廉 William Jones Boone 1811-1864

美国圣公会主教，该会在华传教的开创性人物。1837年先到爪哇的华人中间传教。1842年（31岁）进入厦门。1843年成为主教。1845年进入开埠不久的上海，开辟江苏教区。美国圣公会在武昌所办的大学也以他的姓氏命名为“Boone University”（文华大学）。文惠廉的长子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是传教医生。1880年创办了上海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次子小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 Jr.）于1846年生于上海，1884年接任美国圣公会江苏教区主教。

1842年

娄理华 Walter Macon Lowrie 1819-1847

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最早差派来华的宣教士之一，参议员之子。先后在澳门、宁波等地宣教五年多，后在杭州湾遭遇海盗，不幸遇害，成为基督教新教来华宣教士中第一位殉道者。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娄理华（23岁）前往中国。1843年，西方各基督教差会的代表在香港举

行宣教士译经大会，商讨出版一部“不仅为各差会共同认可，亦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圣经译本”，该译本被称为“委办译本”，由五个宣教区的宣教士分头进行翻译。娄理华是美国长老会宣教士中唯一参加这项合作计划的宁波宣教区代表，也是所有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1847年8月19日，参加译经会议之后，从上海乘船返回宁波途中，不幸遭遇海盗劫持。来华宣教仅仅五年零两个月，年仅28岁。娄理华殉道七年后，1854年，他的弟弟，27岁的娄理瑞（Reuben Lowrie）踏着哥哥的足迹，带着新婚的妻子踏上中国的土地，继承哥哥未竟的事业，到上海传扬基督福音。因积劳成疾，于1860年病逝于上海，葬在美国长老会上海墓园中。

1843年

艾约瑟 Joseph Edkins 1823-1905

伦敦传道会在华三杰之一，著名汉学家。1843年（20岁）在上海传教，与麦都思、美魏茶（米怜之子）、慕维廉等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创建墨海书馆。1863年到北京，负责伦敦会的北京事工，并创立了北京缸瓦市教会。1875年，获爱丁堡大学神学博士。1880年，被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聘为海关翻译。1905年，在上海逝世，享年82岁。艾约瑟和王韬合译《重学浅说》、《光学图说》、《格致新学提纲》、《西国天学源流》和《中西通书》等书。与李善兰、伟烈亚力、韦廉臣合译《谈天》、《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圆锥曲线说》、《奈瑞数理》、《重学》、《植物学》等书，由墨海书馆出版，在十九世纪的西学东渐上有重要贡献。1872年，在北京主编《中国见闻录》。还著有《中国的宗教》、《访问苏州太平军》等书和《诗人李太白》等论文。

1847年

慕维廉 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

十九世纪英国伦敦宣教道会宣教士，1847年来华，在上海从事宣教、文化与社会活动长达53年，有“上海使徒”之称。慕维廉和北京的艾约瑟（Joseph Edkins）、汉口的杨格非（Griffith John）共享“伦敦会在华三杰”之美誉，三位皆享高寿，在华宣教时间皆超过半个世纪，皆精通中国文化并著作等身，而且彼此保持长久而深厚的主内情谊。

慕维廉到上海之后第二年，就碰上了青浦教案，这是上海开埠后最早也是最大的一宗教案。起因是他和另外两位英美传教士到青浦宣教并散发福音书册而引起的。慕维廉协同麦都思创办墨海书馆（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他的著作《地理全志》，是第一部中文版的西方地理学百科全书，也是当时东传的西方地理学译著中最为杰出的代表。1856年由慕维廉编译的《大英国志》，为晚清中国人正确认识有关英国历史，提供了最新、最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他主笔的《六合丛谈》（Shanghai Serial），是上海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期刊。慕维廉的《儒释道回耶稣五教通考》（简称《五教通考》）用中文写成，最早将“五教”，即儒教、佛教、道教、回教和基督教并提，并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他还著有《中国与福音》（*China and the Gospel*）、《格致新法》，以及《新约圣经注解》等重要著作。在1876-1879年间，中国华北地区由于干旱发生大规模饥荒，慕维廉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中国赈灾委员会”，联合在华的外国宣教士、商人、外交官员等积极参与赈灾活动。在此期间，慕维廉实际负责了当时赈灾委员会的运作，救助了无数的中国百姓。因其在宣教、文化与著述等方面的巨大成就，1894年，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授予慕维廉神道学博士学位（Doctor of Divinity）。

1847年

伟烈亚力 Alexander Wylie 1815-1887

十九世纪英国伦敦宣道会传教士、汉学家、中国科学史研究之先驱。在华近30年，在宣教、传播西学，并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这几个方面均有重要贡献。在理雅各安排下，伟烈亚力于1847年（32岁）作为伦敦会传教士奉派到上海，协助麦都思管理墨海书馆。1857年初，伟烈亚力创办了上海第一份中文月刊《六合丛谈》，并自任主编，介绍宗教、科学、文化与新闻学，成为晚清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综合刊物之一。1868年，伟烈亚力与英国伦敦会华中区传教士杨格非一起，前往湖北、四川、陕西等地宣教，行程4000多公里，历时5个多月之久。回来后，伟烈亚力写了《湖北四川陕西三省行程记》考察报告，发表在《亚洲文会北华支会简报》上。在华期间，他宣教足迹遍及了当时清王朝18个省份中的14个，历经艰险。1863年作为圣公会代理人，推销圣经。在中

国30年间，前后共推销出一百万部新约圣经。同时，兼任上海《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编辑，发表了大量有关地理、历史与文化的文章。1864年，麦都思等创立格致书院，伟烈亚力被推选为四位西人董事之一；1874年2月，又被推为格致书院五位创议董事之一。1867年，伟烈亚力创办了英文季刊《远东释疑》，登载专论中国历史、宗教、语言和评论远东局势等文章。他最后的成果是，翻译部分的《汉书》及《后汉书》。伟烈亚力所编写的《中国文献记略》是当时有关汉语书目的一部全面系统的权威著作。伟烈亚力或赠送或出售，为牛津大学图书馆、皇家亚洲文会北华分会图书馆，以及圣书公会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中文文献，在19世纪英国汉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1847年

晏玛太 Matthew Tyson Yates 1819-1888

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1847年（28岁），受美南浸信会差遣来到中国上海，同年11月在老北门外建“第一浸会堂”，为上海第一座基督教新教会堂。1853年，小刀会占据上海县城，晏玛太坚守邻近战区的教堂，又曾戏剧性地营救驻扎上海的清朝最高官员——苏松太兵备道吴健彰，帮助其从城墙上逃脱。因此在1855年清朝恢复对上海的统治时，帮助他修复了教堂。1860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教会经济来源断绝，晏玛太被迫在工部局及美国领事馆任翻译，1866-1867年任公董局董事，1868-1869年任工部局董事，且一度任美国驻沪副领事，会审公廨陪审官。同时经营房地产买卖，使得浸信会在上海得以维持，并逐步扩展到江苏省一些地方。1888年3月17日，晏玛太在上海病逝，享年69岁，在华42年。美南浸信会在上海开办的“晏摩氏女中”、在苏州开办的“晏成中学”，校名都为纪念晏玛太对该会的贡献而起。晏玛太创办的“第一浸会堂”，旧址位于黄浦区民国路人民路706号，现为进德小学改办的黄浦区第一中心小学。

1850年

丁魁良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

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个牧师家庭，1850年（23岁）受美北长

老会派遣来到中国，集宣教士、教育家、翻译家、著作家和外交家于一身，有“基督教的利玛窦”之称。在华66载，历经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民国建政等重大历史变迁，对中国近代政治、教育和外交等领域影响甚大。在宁波宣教10年后，50多年都在北京。他主张发展教育以影响中国，意图通过教育向中国人传播基督信仰。1869年出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1898年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即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任期25年间，培养出一批翻译、外交官、洋务派要员。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谈判期间，担任美国公使列维廉的译员，参与谈判并起草了《天津条约》。他发现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法，于是翻译了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将当时最新、最通用的国际法介绍到中国，受到恭亲王奕诉的赏识，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出版，让中国人首次看到“权利、主权、人权、自由、民主”等观念。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该书成为日本法学教科书。他一生出版了中文译著42部，英文著述8部。1906年，完成英文版《中国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一书。1870年，纽约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885年（光绪十一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顶戴官衔。80岁生日那一天，美国总统威尔逊以及美国部分教育界人士约60余人，赠送给他一面锦旗，表彰他在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1916年12月17日，丁韪良在北京去世，终年89岁，葬于西直门外的一块墓地。

参考：

丁韪良著，沈弘译，《花甲忆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黄昭弘，《清末寓华西教士之政论及其影响》。台北：宇宙光，1993年。

曹刚华，“清末传教士丁韪良早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读《天道溯源》”，《智识学术网》：<http://www.zisi.net/html/xzyj/cghwj/2005-12-28-34682.htm>

丁韪良其他著作：《中国的觉醒》、《北京被围目击记》、《天道溯源》等。

1851年

宾惠廉 William Chalmers Burns 1815-1868

苏格兰英国长老会，1851年（36岁）来华。曾经在欧美两洲是一个很出名的布道家，声如洪钟，在英国和美国领导了属灵复兴运动。1851年，宾惠廉经香港到达福建厦门。1855年，宾惠廉抵达上海，在那里与戴德生相遇，成为戴德生的属灵之父。1863年，宾惠廉抵达北京，传教四年。1867年，他抵达东北境内牛庄（营口），1868年春天，在牛庄病逝。宾惠廉名言：“Always ready”（随时待命）。

1853年

嘉约翰 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

美国人，美北长老会最早至中国的著名传教士，为西医在中国的奠基人之一。1853年（29岁）抵达中国。1859年接手伯驾创办的博济医院，把当时先进的外科手术带到博济医院。1866年该医院开办博济医学堂，成为中国最早的教会医科学校，同时也成为中国培训女医师之始。根据嘉惠霖1935年《博济医院百年史》的统计，嘉约翰一生共培养了中国西医150名。孙中山先生曾在1886年就读于博济医学堂。1868年，嘉约翰编辑出版发行了中文的《广州新报》，向广大民众宣传医疗卫生知识。1880年改为《西医新报》季刊，为我国最早发行的中文西医刊物。1886年，任中华博医会第一任会长。1898年，在广州建立第一所精神病医院——惠爱医院。74岁的嘉约翰偕夫人，带着他的男学生进驻惠爱疯人医院，与病人同居一楼，以便照顾他们。嘉约翰的学生们评价：“他的爱人之心是如此伟大，是人们无法测度的。”1901年，在广州去世，终年77岁。据统计，他一生诊治病人74万人次，施行手术49000人次，培训西医150人，编译西医、西药书34种。从1871年开始编译教材，出版了多达34本书籍，如《内科全书》、《病症名目》、《西药略说》、《炎症》、《外科学》等。与赵元意合作翻译了《儒门医学》、《西药大成》、《医学法律》、《内科理法后编》等。1901年8月10日，嘉约翰在中国从事和传播西医学近半个世纪后，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77岁。所遗留下来的博济医院如今已成为广州岭南大学的附属医院。

1853年

包尔腾 John Shaw Burdon 1826-1907

苏格兰人，1853年（27岁），由大英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派往中国宣教，主要在江浙一带宣教，期间曾前往南京走访太平天国领袖们。从1858-1861年间，他先后在杭州、宁波和绍兴等地宣教并建立教会。1862年初，包尔腾奉调前往北京开辟宣教工场，成为首批进入北京的西方宣教士之一。包尔腾精通中文，在时任英国驻华公使参赞威妥玛（Sir Thomas Wade）的推荐下，担任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同文馆首任总教习，是中国第一位英语教师。1865年，他和首批入京的英美宣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丁韪良（William Parsons Martin）、施约瑟（Samuel Isaac Schereschewsky）、白汉理（Henry Blodget）等人组成“北京译经委员会”，着手翻译第一部北京官话本《新约圣经》，该译本于1872年出版发行，在中国教会流行使用40余年之久。1872年，包尔腾还与施约瑟合作，在北京编译出版了《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成为日后中国圣公会通用《公祷书》之蓝本。1873年10月，包尔腾返回英国，并于次年初从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接受了神学博士学位。1874年3月又在兰柏宫被祝圣为香港维多利亚主教（1874-1897），主理包括香港、广东、上海、浙江、福建在内的华南教区和日本教区事务。同年12月13日，包尔腾在香港圣约翰座堂正式就任，同时兼任圣保罗书院院长。包尔腾还致力于教会本土化，注重培训和任用本土传道人。包尔腾的第二任妻子宝丽娜是戴德生之妻玛丽亚的姐姐，因此包尔腾与戴德生成为连襟。

1854年

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

著名英国宣教士，十九世纪世界最伟大的宣教士之一，“中国内地会”创始人、会长，带领内地会在中国宣教达52年之久，抢救灵魂无数，直到力尽方休。戴德生于1854年（22岁）受“中国传道会”派遣入华，在上海开始传教。1857年在宁波建立教会。1865年创立内地会，随后差派了超过八百名传教士，建立了125间学校，在中国带领18000人信

主，在18个省成立了300多所由500多位本地助理参与的传教站。到1936年，教堂达1233所，支堂2261处，传教士1326名，中学10所，小学330间，医院16座，诊所17处，是在华基督教最大的差会。¹ 戴德生73岁在长沙去世，与妻子及4个孩子葬在镇江。他说：“我若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为中国，而是为基督。”继戴德生后，戴家四代子孙相继在中国传教，他们是：

长子戴存仁 Herbert Hudson Taylor

次子戴存义 Frederick Howard Taylor

孙子戴永冕 James Hudson Taylor II

曾孙戴绍曾 James Hudson Taylor III

玄孙戴继宗 James Hudson Taylor IV

内地会重要事件：

1865年内地会创立。

1866年5月26日，“兰茂密尔团队”（Lammermuir）号前往中国，9月30日抵达上海。

1887年，派出“一百名同工”来华。

1888年10月30日，第一批内地会美国传教士抵达中国上海。

1890年，虹口区吴淞路9号正式建立内地会第一个总部大楼，可供300多位传教士办公和居住。

1912年，内地会传道士超过1000人，成为在华最大的传教机构。

1927-1932年，何斯德发起200人专案活动，援助内地宣教运动，从1200名申请人中挑选了共计203名传教士分三批抵达中国。

参考：

蔡锦图，《戴德生与中国内地会》。香港：建道神学院，1998年。

戴德生著，陆中石译，《带着爱来中国》。北京：人民日报出版

1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P. 169。

社，2004年。

柯喜乐著，韦华林译，《圣爱的火焰：中国宣教史上的海家班》。台北：宇宙光，2006年。

林美玫，《信心行传：中国内地会在华差传探析（1865-1926）》。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史蒂亚著，梁元生译，《戴德生：挚爱中华》。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90年。

徐欣娴，《全然奉献为中国的戴家：从戴德生到戴继宗》。台北：宇宙光，2006年。

张陈一萍等编，《惟独基督：戴德生生平与事工图片纪念集》。香港：海外基督使徒团，2005年。

Benge, Janet and Geoff. *Hudson Taylor: Deep in the Heart of China*. WA: Youth with a Mission Publishing, 1998.

Pollock, John, 严彩秀译，《戴德生与玛利亚》。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77年。

Taylor, Hudson. *China's Millions*. London: Morgan and Scott, 1884.

1854年

倪维思 John Livingstone Nevius 1829-1893

美国北长老会宣教士，宣教学家、农学家、园艺家，被誉为“宣教学之父”和“山东苹果葡萄之父”。1854年（25岁）携新婚妻子抵达中国，在浙江宁波传教，与戴德生、丁韪良结为好友。1861年，前往登州（今蓬莱），将一所残破的观音庙作为住处和布道所，开始了在山东地区的宣教工作，不久就有三人受洗。最初几年的宣教实践使他意识到，基督教若想在中国生根发芽，必须尽快适应中国的本土环境。他逐渐形成了“倪维思计划”，最早提出中国教会“自治、自养、自传”三自原则。鉴于中国妇女饱受压迫、多不识字、缠足、思想封建、迷信等特点，倪氏夫妇把她们作为传福音的对象，帮助她们接受教育，学习技艺，在他们到达登州后的第二年，即收养了几个因父母双亡而被遗弃的女孩，创办起一所寄宿女子学堂，亲自教他们读书识字，这是山东第一所女子学校，具有开女子教育之先河的意义。1871年从登州移居烟台，此后在那里生活22年，直到去世。1877年，山东因连年干旱造成空前大

饥荒，倪维思同郭显德牧师等人投入赈灾活动。根据他给美国差会的报告，共捐助救济银7600余两，赈济了383个村的32593人。此后，他广泛搜罗美国以及欧洲各地适合于山东土壤气候的果树品类，将美国的苹果、梨、桃、李、欧美的葡萄和日本的草莓引进烟台，以嫁接、插枝、育苗等方法，与中国原产果树交配，繁育新种。他本人未曾想到，50年后，烟台会成为中国第一“水果之乡”。倪维思还进口了优种的荷兰乳牛，养在他的农场上，经交配育种，再介绍推广到各地。在他的《差会工作方法》（*Methods of Mission Work*）一书中，提出许多新的宣教方略，主张中国教会要本土化。在1890年在华宣教士第二届宣教会议上，倪维思是两位大会主席之一。在华40年间，先后写下《中国和中国人》、《差会工作方法》、《神学总论》、《祀天辨谬》、《被鬼附着及有关论述》和《天路指南》等多部书籍。他用英文所著的《中国与中国人》（*China and the Chinese*）一书，内容涵盖中国的史地、物产、制度、政府、宗教、民俗、文字、语言等，是一本妙趣横生的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有助于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亦为后来宣教士提供许多重要的信息。1893年在烟台逝世，享年64岁，安葬在他亲手种植的绿树之下，墓碑上刻着两句经文：“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12：3）；“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1：21）

1854年

赫德 Robert Hart 1835-1911

英国人，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司长整整半个世纪（1861-1911）。1854年5月（19岁）来华。恪尽职守，在任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新建了沿海港口的灯塔、气象站，为北京政府开辟了一个稳定的、有保障的、并逐渐增长的新的税收来源，有助于清除旧式衙门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著有《中国论集》等。赫德与各国来华宣教士密切交往，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帮助，影响巨大。

1855年

韦廉臣 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

十九世纪著名来华传教士、作家、翻译家、西学东渐的主要人物之一，其译述对近代中国的植物学、化学和科技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与贡献。出生于英国苏格兰，获法学和神学博士学位后，接受伦敦会之差派，偕夫人伊莉莎白一道来华宣教，于1855年抵达山东烟台，成为最早到达烟台的基督教传教士。韦廉臣和夫人在烟台建造了一座英式教堂和住所，除开荒布道外，还在烟台市和通伸村各建一所医院，并开办学校，成为烟台现代医疗与文化事业的开端。韦廉臣常常骑马到烟台附近城乡传道，因其满口胡须，人皆呼他为“韦大胡子”。韦廉臣夫人在烟台特为穷苦女孩子开办了一所女校，招女生30余人，由教会提供食宿。韦夫人待这些女孩爱如己出，她为人又极和善，每遇穷人，必行周济；每遇孤儿寡妇，必施以援手。故教会教友及其学生，皆视她如慈母一般。韦廉臣先后到华北、东北、外蒙古等地旅行、销售圣经，散发福音书册，并考察当地风土人情。1868年5月，韦廉臣到达黑龙江，是有史以来基督教进入黑龙江的最早记录。1869年8月，他的弟弟，伦敦会传教士James Williamson 在天津附近被杀。1876年《烟台条约》签订后，韦廉臣到济南销售圣书，成为第一位进入济南的基督教传教士。韦廉臣于1856-1857年间参加墨海书馆的译述工作，期间与中国著名学者李善兰合译了英国植物学家林德利（John Lindly）所著的《植物学基础》（*Elements of Botany*），此书为近代中国最早的植物学译著。韦廉臣是《六合丛谈》的撰稿人之一，介绍了化学元素的概念及其组成定律，论述了有机物的结构。韦廉臣于1877年在基督教入华70年来的第一次宣教大会上提议，在上海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即“益智书会”，一直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在1890年举行的全国基督教宣教大会上，决议将“益智书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将其影响扩大到教会之外，以囊括整个“中华教育”。韦廉臣提出以基督教信仰来吸引并塑造中国青年。1884年他在英国组织成立了“中华圣教会”，后称为“同文书会”（Society for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又于1887年11月更名为“广学会”。1876年上海美华书局出版了《格物探原》单行本；1889年，墨海书馆出版了六卷本的《格物探原》，介绍了天文、地理、地质、生物和人体构

造等多方面的知识，并附有大量精美的图片。他把《格物探原》中所介绍的科学知识最终归因于上帝的安排。

1855年

杨格非 Griffith John 1831-1912

英国伦敦会著名的来华传教士，华中地区基督教事业的开创者，有“中华使徒”之誉。1855年（24岁），携新婚妻子到达中国，在上海附近传教。1857年进入太平天国辖区考察，1860年到苏州会见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后又见干王洪仁玕，然后前往南京，获得在太平天国境内自由传教的权利。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规定中国内地（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向传教士开放。杨格非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省份的传教士之一。1861年来到汉口，成为第一个进入华中地区的基督教传教士，直到1912年离开，汉口一直是他的工作基地。在汉口创办学校、医院和训练中心。他和他的同事在湖北省建立了至少100个传教站，被称为“街头布道家”，他的讲道深受欢迎，吸引了大批群众来听道。杨格非以在广阔的中国内地旅行布道而知名，有时旅行距离远达3000英里以上。他是第一个进入湖北、湖南、四川三个省份的新教传教士。另一项主要贡献是写作和翻译。1876年，在汉口创办了华中圣教书会，专门编印布道单张与小册子。据1899年统计，全国基督教所用的街头布道文字材料80%以上为该会印刷。他还从事圣经翻译工作，将新约和部分旧约翻译成一种以上的中国方言，又将新约、诗篇和箴言翻译成中文官话（浅文理译本），于1885年出版。他在长江流域创办了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培养本地传道人的神学院。1899年，在汉口后花楼居巷（今交通巷）创办博学书院（Griffith John College 杨格非学院，武汉市第四中学的前身）。1905年，在主日讲道时中风。在中国服事55年。于1912年1月返回英国。

1856年

纪好弼 Rosewell H. Gaves 1833-1912

美国加州人，从小受到良好教育，15岁加入基督教会，18岁毕业于美国加州医学院。学生时代就立志要到中国行医传教，因而潜心多年广泛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以备赴华之用。1856年（23岁）

受美南浸信会派遣，从纽约出发首次来华，是年8月抵达香港，10月进入广州，在广州一家教会医院当医生。纪好弼在华宣教历56年之久（1856-1912），其贡献最为卓著的当推神学教育，是中国教会神学教育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两广浸信会的前辈名牧，多出自其门下，如黄梅、张文开（张亦镜）、陈梦南、杨海峰、曹法选、洗怀棠、欧阳进宽、刘粤声、梅国芳，以及张立才等牧师和教会领袖，都是他的学生。英文著作有《在华四十年》和《昆斯迦山的感想》等。中文著作有《醒世要言》、《真理问答》、《罗马人书注释》、《基督生平》、《救主之足迹》、《喻言之解释》，以及《保罗书信浅释》等。

1857年

梅理士 Charles Rogers Mills 1829-1895

美北长老会传教士，母系始祖罗杰斯（Thomas Rogers）为“五月花公约”第18位签名者。1857年（28岁）到上海，在华传教39年。1862年到登州（今蓬莱），建立一所男中，一所女中，一座医院。其子聋哑，1887年，与继室梅耐德（Mrs. C. K. Mills）共同创办了启喑学馆，为中国第一所聋哑人学校。1898年，启喑学馆迁往烟台。梅理士夫人到中国前，曾在纽约一所学校教聋哑学生。创办启喑学馆后，她采用训练聋哑人说话的标音法和手语进行教学。启喑学馆对中国的聋哑教育影响很大，梅理士夫人设计的手语字母表被中国聋哑学校采用，他们从美国图书中翻译的分级识字课本成为中国聋哑教育的最初教材。该校毕业的学生和他们的亲属或建立聋哑学校，或从事聋哑教育。梅理士还将美国大花生种运到登州，鼓励农民在海边沙地种植，日后花生、花生油成了山东省重要的输出商品，对该省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参考：

郭卫东，《中国近代特殊教育史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1859年 施约瑟

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 1831-1906

美国圣公会上海教区主教，上海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创办人，圣经翻译家，第一位把旧约圣经直接从希伯来原文翻译成北京官话（国语）的学者。出生在犹太人家庭，父母皆为敬虔的犹太人。1859年（28岁）抵达上海。仅仅几年时间，施约瑟就能熟练地使用上海话、北京官话和文言文等交流、书写。丁韪良如此评价：“当日说国语而能将其成语应用自如的，没有别的人可以与他相比。”《北京条约》签订后，北京开始向外国人开放。他在北京居留12年（1862-1874），除了宣教之外，还主导了北京官话译本圣经和《公祷书》的翻译工作。1864年，着手将圣经翻译成北京官话，于1872年译竣出版。1874年，施约瑟的旧约官话译本在美国圣经公会的资助下出版。1879年，建立圣约翰书院（St. John's College）。不久又创办了圣玛利亚书院（女中），任命中国人黄素娥女士为校长。1887年，开始着手修订其官话新旧约圣经，同时又开始将圣经翻译成浅文言，即“施约瑟浅文理译本”。他说：“我不是以教会传教士的身份去承担这职事，我感觉到上帝的呼召，并且是他特别地预备我去完成这工作。……我把这译本视为我宣教事业中最重要的成就。”他的官话旧约圣经和浅文理新旧约全书分别于1899年和1902年在东京印行，名为《施约瑟浅文理译本》。在《官话和合译本》出版前约二十年间，它是通行最广、最受中国信徒欢迎的译本。

1860年

林乐知 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

美南监理会来华传教士，1860年（24岁）来华，以办报、办学、译书、写书著称，对晚清维新运动影响很大。到上海后不久，美国爆发南北战争，因经费断绝而另辟蹊径，“每日上午在广方言馆教英文，午后赴江南制造局翻译外文书，夜间编辑报纸，主日则到处布道。十年间从未有片刻闲暇。”（傅兰雅语）。1868年，创办《教会新报》（*Church News*）。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A Review of the Times*），成为政治、经济、科学和宗教的综合性刊物，针砭时弊，如宣传禁烟，提倡女权和女子教育，介绍西学新知，受到知识分子的欣赏，为清季西洋教士在中国发行的中文报纸中为时最久、影响最大的刊物，成为甲午战争后，维新变法的重要基础。1882年，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培养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人才，校址建在虹口（今

昆山路景灵堂对面，景灵堂原名景林堂，意为“景仰林乐知之堂”。1900年，扩建为东吴大学，校址苏州天赐庄，林乐知为董事长、孙乐文（David L. Anderson）为校长，主楼命名为“林堂”。1892年，创办“中西女塾”（后来的中西女中），在慕尔堂（今西藏路沐恩堂）西侧开学，学生多来自上海的富有家庭。1907年5月31日在上海病逝，在华居留时间长达47年。著作《全球五大洲女俗通考》（*Women in All Lands*）；《中东战事本末》，1896年出版，披露甲午战争真相，批评中国存在的积习，震撼中国知识界。

《万国公报》的影响：

（一）康有为不但是《万国公报》的读者，还曾经参加了该报在1894年举办的征文。

（二）梁启超在其所撰的“西学书目表”中，选录广学会出版的书籍共22种，认为最佳者为李提摩太之《泰西新史揽要》与《万国公报》。

（三）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交由《万国公报》公开发表，可见他对这份报刊的影响力深具信心。

（四）林语堂自称透过《万国公报》，林乐知成为他童年时私淑的对象，是“在我生命中，影响最大、决定命运的人物。”（林语堂《无所不谈》）。

（五）于右任在“一个牧羊儿的自述”中称：“适莫安仁、敦崇礼两名牧在（陕西）三原传教，先严向之借读《万国公报》、《万国通鉴》等书，我亦藉知略知世界大势。”

参考：

Bennett, Adrian. *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Young J. Allen and His Magazines, 1860–1883*.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3.

1861年

傅兰雅 John Fryer 1839-1928

出生于英国肯特郡海斯镇一穷苦牧师家庭，1861年（22岁）来华，成为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编辑。1866年，北京同文馆因增设科学班，以恭亲王为首的改革派与保守派发生激烈论战，终因

慈禧支持改革而获胜。傅兰雅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中国终于迎来一个新开端。她已经运动起来，加入到国家之间的竞赛中来，恭亲王发表了一个奏折，承认外国科学技术的优越性！”1867年3月，他将恭亲王的奏折在《上海新报》上公开刊登，引起轰动。从1868年到1896年28年期间，在清政府的重要洋务机构，江南制造局任翻译馆的主管。与中国同事一起，翻译了大量科学与工程学读本，经手的翻译超过百种，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化工、矿业、机械工程、医学、农学、地图测绘、军事兵工等多个科技领域。1874年，参与创办中国第一所科学学校——格致书院；1875年主编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份科学杂志——《格致汇编》；1885年创办近代中国第一家科技书店——格致书室。清廷为表彰傅兰雅，特赐他三品头衔。其理想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清楚表达：“惟冀中国能广兴格致，至中西一辙尔。故平生专习此业而不他及。”傅兰雅在1928年为中国创办了一所盲女学校。90岁的傅兰雅在美国去世，在中国生活了35年。他的科学译著和《格致汇编》为封闭、落后的中国推开了近代化的一道门缝。在中国近代史上，传教士主导的科学输入，被称为“科学启蒙第一期”；而晚清洋务派官员领导下的西方科技引进运动，是第二期。

1863年

狄考文 Calvin Wilson Matteer 1836-1908

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来华传教士，教育家、翻译家、慈善家、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先驱。1881年，在他创办的文会馆点亮中国第一盏电灯，翻开了中国历史上电灯照明的新纪元。1863年（27岁）携新婚妻子邦就烈（Miss Julia A. Brown）来华，到达山东登州（蓬莱）。1864年开办蒙养学堂，第一批只招收到六名中国穷苦家庭的孩子来读书。该学堂1876年改称文会馆，由小学升为中学。1881年开设大学预科，成为中国境内第一所现代高等教育机构，是著名的齐鲁大学的前身。1890年基督教来华传教士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推选他为“中华教育会”首任会长。狄氏精数学，编有《笔算数学》、《代数备旨》等，成为当时中国初办学堂时的数学教科书。此外，还编有《官话课本》（*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是当时外国人学习汉语必备之书。狄考文在烟台等城市兴建教会博物馆，据1909年长老山东差会的报告，

通过这个博物馆，每年有12000人进入教堂听到福音。狄考文也是译经委员会主席，主持翻译了今天广为流传的圣经中文译本《圣经和合本》”。狄考文夫人邦就烈25岁时与狄考文同来登州，编写乐理启蒙，制订乐谱、音符，教导学生欣赏、演唱，创作歌曲，并收集民间曲调，配以新词传唱，很可能是近代最早把西方音乐教育引入中国的人。狄考文在山东从事宣教、教育长达45年之久，被誉为“十九世纪后期最有影响力的传教士教育家”，多家美国大学授予他神学博士和法学博士学位。

参考：

丹尼尔·W·费舍著，周振鹏等译，《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狄乐播著，郭大松译，《中华育英才：狄邦就烈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1863年

马雅各 James Laidlaw Maxwell 1836-1921

生于英国苏格兰，医师、长老教会传教士，于19世纪后期到台湾南部传教及行医，是英国长老教会第一位驻台湾宣教师，与马偕医师齐名。1863年，马雅各医生（27岁）抵达中国上海。1864年前往厦门宣教区，学习厦门和台湾通用的语言，以准备到台湾宣教。1865年6月16日，正式前往台南府城，在台南府城西门外看西街（现今台南市仁爱街43号）租屋，前面为礼拜堂，后面为医馆，开始医疗与传道的工作，此为英国长老教会在台湾设教的纪念日。1897年，在台湾台南建造新楼医院，并于1900年落成，该医院为台湾首座西式医院。马雅各还推行白话字运动与翻译新约圣经。长子在中国大陆永春行医，次子继承父志来台湾在新楼医院工作，也就是马医生二世或称年青的马医生。

参考：

林治平主编，《马雅各入台宣教150年历史图片巡回展》。台北：宇宙光，2015年。

1863年

郭显德 Hunter Corbett 1835-1920

美国人，1863年（28岁）携新婚夫人利滋·克柏逊小姐（Lizzie Culbertion）受美国北长老会派遣，前往山东登州，协助梅理士建立登州教会。1867年，在烟台成立烟台长老公会。1875年，创办博物院福音堂，陈列珍禽异兽和矿石标本、挂图、各种珊瑚等，规定先听道，后参观，以启迪民智，成为烟台的第一所博物院，一年参观人数就有七万五千至十万人之多。1890年，在烟台南山玉皇顶的“毓璜顶”开办了一家小型诊疗所，一方面为传教士服务，另一方面也为周围前来诊病的居民开药治疗。1896年，将他所创建的文先和会英小学合并扩充为会文书院。在中、美籍助手的帮助下，先后于福山、牟平、栖霞、莱阳、海阳、烟台创办小学40余所，以及医院、博物院、花边、罐头等事业和实业。在中国山东生活、传教、工作长达56年，一生施洗信徒不下三千。在义和团之乱时期，民间流行说：“外国人不杀郭显德，中国人不杀赵斗南（郭显德的学生）。”光绪年间，清廷颁予郭显德“双龙嘉木”勋章一枚。1914年，民国政府颁发给郭显德“双龙嘉禾”奖章一枚。1885年，美国杰佛逊大学赠予神学博士学位；1902年，美国华盛顿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学位；1906年，任纽约长老会总会主席；1907年，在白宫受到罗斯福总统接见。

1864年

富善 Chauncey Goodrich 1836-1925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中文圣经官话和合本译者之一。1864年（28岁）入华。他花费大量时间于翻译圣经（和合本）。1890年参与七人委员会，经过28年之久的翻译工作，富善是译经者中唯一活着看到和合本圣经诞生的人。富善累积了丰富的中文知识，于1891年出版了《中英袖珍字典》，包括10400个汉字。另外又出版了一本《官话特性研究》，包罗了39000句汉语。这两本书后来成为当时西方宣教士和各国外交人员学习普通话之必备参考书。经历两度丧偶，1880年5月与撒拉（Sarah Bordman Clapp）结婚，在通州事奉，负责公理会设立的神学院。比他年幼19岁的夫人在家是贤妻良母，对外是杰出公关人才，奔走呼吁戒绝

鸦片、倡导妇解、反对缠足、劝女孩子接受教育，筹办养老院等。1905年，二女儿露西因糖尿病逝世，富善夫妇把原准备给女儿读书的钱，另外再筹款，在通州为乡下女孩们创办了通州有史以来第一间寄宿女校，有学生500人左右。1907年，富善夫人来到北京，负责贝满女校。她关心中国妇女的福利，提倡解除妇女缠足和禁鸦片烟，带领无依无靠的妇女缝制衣服，使她们自给自足。富善夫人看见在天寒地冻的北京，人力车夫拉完车，满身大汗，常常脱去上衣，露天休息，有的受凉，得肺炎死的人不少，她就筹款，在一些人力车夫停车的地方盖起小房子，里面有煤炉子，热水供应，车夫可以在里面休息避寒，等候顾客；她还筹办老人院，收留无依无靠，无儿无女的穷苦老人。

参考：

林振时，《富善》。香港：福音文宣社，1987年。

1865年

李修善 David Hill 1840-1896

英国循道公会在华传教士，汉口训盲书院创始人，是圣徒般的人物。1865年（25岁）到中国湖北省传教。在华宣教31载，赈灾、禁烟、兴办教育与慈善事业。1878年，华北的山西省遭遇大旱，他和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到山西救灾。他吸引了一位嗜食鸦片的儒生席子直归向基督，后来改名席胜魔，成为山西省一代名牧，创立了戒烟馆，取名“天招局”。后来“天招局”扩展到山西、陕西、河南和直隶四省，共有45所之多，拯救了无数人的身体和灵魂。1881年，他在英国国会演讲中力陈鸦片的危害，敦促英国政府废除鸦片贸易，并且称：“对于鸦片的进口，中国各地的宣教团体抱全体一致的看法；三百五十位传教士中，没有一位准许吸食鸦片的人进入教会。”最后他坚定地指出：“只有英国政府采取坚决的行动，才能彻底解决中国的鸦片问题。”他将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大笔遗产全部供给中国宣教之用，而他自己终生未娶，日常生活极其简单。无论是在宣教还是在慈善方面，他总是奉行“尽量给”的原则，既出钱又出力，造福于中国的百姓。在武汉到处都留下了李修善的足迹，其最大贡献之一在于盲人教育方面。1888年，李修善在汉口创办了“汉口训盲书院”，采用盲文盲字教学，创造

出一套盲人授读法——“大卫·希尔法”。李修善还著有《华中的传教事业》（1882）和《在华中二十五年：1865-1890》等书。李提摩太在其回忆录《亲历晚清45年》中提到，李修善是“能用中文写作的，在传教士中少见的睿智之士。”在1890年于上海举行的第二次全国性宣教大会上，李修善与倪维思二人被推举为大会的共同主席，分别代表英国籍与美国籍的宣教士。1896年，李修善病逝于汉口，年仅56岁。他的棺木是盲校学生们亲手赶制出来的。

参考：

林辅华、鲍康宁，《向毒品宣战的先锋——李修善与席胜魔》。
台北：宇宙光，2006年。

1865年

花之安 Ernst Faber 1839-1899

德国基督教礼贤会传教士、汉学家、植物学家。在华35载，先后在香港、广东、上海和青岛等地从事宣教与著述，著作等身，被誉为“19世纪最高深的汉学家”。1865年（26岁）来华，起初以行医和办学等方式传播福音。后因喉部患疾导致发音困难，而不得不离开教会讲坛，专心从事写作和汉学研究，通过文字著述继续传扬基督福音。先后在圣教会（Book and Tract Society）和同文书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任职，出版发行了不少福音书籍。他继承了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观点，认为要使福音在中国广传，就必须适应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当基督信仰达到“补儒、合儒、超儒”的目的时，才能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可，进而透过他们，去影响人民大众。著有《儒教汇纂》、《中国宗教导论》、《中国妇女的地位》、《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等书，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是《自西徂东》（*Civilization, China and Christian*）。花之安还是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曾协助俄国著名植物学家贝勒编写了《中国植物》，并为该书写了《中国经书中的植物学》一章，于1892年出版。为纪念这位进入青岛的开拓者，同善会建立了“花之安医院”，又称为“华德医院”（今人民医院）。

1866年

曹雅直 George Stott 1835-1889

苏格兰人，温州教会的拓荒者。19岁因滑倒而膝盖受伤，被迫截掉左腿。申请加入内地会时，戴德生问，“是什么理由让你如此执着与坚持呢？”“因为那些两条腿的不愿意去，那就让我这一条腿的去吧！”他后来成为内地会的先驱之一。曹雅直于1866年（31岁）抵达宁波，次年来到温州。他的主要策略是开设学校，借着教育来传福音。他创立了男童寄膳寄宿学校，共有12个贫穷的男孩，为他们提供餐饮、书本、文具、住宿，每月十大洋的补贴。1870年，曹雅直迎来了妻子曹明道（Grace Ciggie Stott），成立了女子学校，拓展了在温州的事工。经过十数年辛勤耕耘，花园巷教堂和学生宿舍陆续完工，城外的平阳、桐岭等地也建立了教会。曹雅直服事中国23年后，于1889年复活节去世。奇妙的是，他带领信主的第一个中国人，与他一样，也是一个独腿人。

参考：

莫法有，《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神学院，1998年。

1869年

谢卫楼 Davelle Z. Sheffield 1841-1913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出生于美国纽约怀俄明的甘斯维尔，1869年（28岁），新婚才两个多月，就携妻从旧金山启程，远赴中国传教。在通州传教和办学40多年，建立潞河男塾，逐渐成为华北协和大学，担任院长，直到1909年退休。后与美以美会在北京开办的汇文大学合并成燕京大学。他还编译了第一部汉译西史中文教科书《万国通鉴》，起了启蒙作用。他相信“教育就是传教”。谢卫楼还积极参与“中国教育会”（1890年正式成立，当时中文名为“益智书会”，1902年改名“中国学塾会”，1905年正式定名为“中国教育会”）的有关活动。1890年他是首批会员，1896-1899年，担任主席职务，1899-1902年又任出版委员会主席。

1870年

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

英国大英浸信会传教士。1870年（25岁）抵达上海，随后去山东烟台、青州传教。1876-1879年华北五省发生空前严重的旱灾（丁戌奇荒），他在山东青州赈灾，后来那里成为大英浸信会山东传教区的中心。1878年，他又去灾情更重的山西太原赈灾，由此开辟了大英浸信会的传教区，同时也结交了中国官绅。1890年，李提摩太去天津临时任《中国时报》中文版主笔。接下来他几乎一生主要的时间都是负责上海广学会的工作。广学会1891年到1915年这段时间是中国最大、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出版社，出版过两千种书籍和小册子。他主持翻译并出版了一些著名书籍，如《在华四十五年》、《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20多种。内容是19世纪欧美各国变法图强的历史，出版后风行一时，印行3万部，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的主要参考书之一。李提摩太的传教方式类似于利玛窦，是以西方文化吸引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他和许多政府官员，如李鸿章、张之洞都有较深的交往，张之洞曾拨款一千两资助广学会。他还结交一些对中国政治改革有影响的人物，如康有为、孙中山等。梁启超担任过他的中文秘书。李提摩太对中国的维新运动有很大影响。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他积极活动于上层人士之间。1901年，庚子事变之后，李提摩太请求各国政府把一部分中国赔款拿出来，在山西等地设立大学。清政府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开诰封三代。1919年4月20日在伦敦病逝。

参考：

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

苏慧廉著，周振鹏译，《李提摩太在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870年

景雅各 James Gilmour 1843-1891

英国人，伦敦会派遣，于1870年（27岁）来华，是《在蒙古人中间》的作者。《观察家》杂志如此描述：“他确实什么都不害怕——无论是狗还是小偷，无论是饥饿还是气候，他对一切处之泰然。”他的朋友说：“他是受神的感召来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的，因为没有人能想象这么一个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的人做着这么一些平平淡淡的小事。”1922年出版的《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汉译本说：“伦敦会最抱布道热忱之景雅各君始创游行布道工作，远至本区恰克图等处，道途跋涉，莫迫安处垂二十余年。惟最先之十五年，景氏仅于本区北部游牧蒙人中专任布道工作……然尤勤奋不倦，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诚为吾道中之佼佼者。”伦敦会的传教士文显理（G. H. Bondfield）在《蒙古传务》中说：“景雅各对蒙古人的热爱以及为劝化他们而单独进行的努力将永远不会被忘记。”

1871年

马偕 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

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医师、长老教会牧师，于19世纪末期至台湾传教并行医，与马雅各齐名。汉名叫偕叡理，但在台湾，一般人皆称为“马偕博士”或“偕牧师”。西方历史学者以“宁愿烧尽，不愿朽坏”赞赏马偕的一生。1871年，马偕（27岁）抵达台湾打狗（高雄）。1872年4月10日开设北台湾第一所教会——淡水教会。同年，在其所租之寓所开始诊疗。1880年，获得加拿大皇后学院（今皇后大学）赠与荣誉神学博士学位。1882年，“Oxford College”（牛津学堂）落成，汉文名“理学堂大书院”。1883年，马偕前往宜兰、花莲等原住民的居住地传教。1887年，苏澳教会成立。1895年，完成 *From Far Formosa*（《台湾遥寄》）一书，这是他在台湾18年间的经历见闻和研究。1899年3月9日，马偕的两位女儿同日出嫁，大女儿偕玛连嫁给陈清义牧师，二女儿偕以利嫁给柯维思长老，成为“台湾媳妇”。1901年6月2日，马偕在淡水逝世，享年57岁，骨灰葬于今日淡江中学内。他的独子偕叡廉回台湾承接马偕衣钵，继续投入宣教与教育工作，并1914年创办了淡江中学，

在日据时期台湾子弟得以受教育。

1872年

明恩溥 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公理会来华传教士、基督徒政治家、宣教史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1872年（27岁）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华。先后居住在天津、山东等地，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1877年，山东发生大灾荒，被派往山东，在鲁西北一带赈灾，向115个村庄，4000余户人家，约12000灾民发放了12000银元的赈款，同时也把福音传给各地百姓，使多人信主。1882年，明氏夫妇在山东恩县庞家庄定居，此后生活在农村长达20年之久，先后在那里建立教会、小学、中学和医院，使庞家庄成为美国公理会在中国的第一个农村宣教据点。1893年，又在附近的临清县建立了教会。到1905年时，他已经在恩县若干村庄设立支堂38处，信徒也增至1260人，大大拓展了公理会在华的宣教工场。在中国54年，“在华日久，爱华日深”，他的爱并不完全表现在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赞美，而是爱之切，责之痛。他极力向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建议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用来兴办教育，是促成美国退还庚款、在华兴办高等教育和北京协和医院的重要人物。1907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宣教大会上，按照以往惯例，大会主席仍由一位英国籍和一位美国籍的宣教士共同担任，明恩溥和英国长老会牧师汲约翰（John C. Gibson）被公推为大会主席。著有多卷有关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书籍，包括《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国乡村生活》、《今日的中国和美国》等，其中《中国人的性格》一书曾由鲁迅向国人郑重推荐。

1873年

香便文 Benjamin Couch Henry 1850-1901

美北长老会传教士，1873年（23岁）由美北长老会派遣到中国，在广州传教。1884-1895年任岭南学堂第二任监督。他的儿子香雅各（James M. Henry）1924年-1927年担任岭南大学最后一任外籍校长。著有 *The Cross and the Dragon Light in Broad East*（《基督教与中国》）和《岭南记》（*Ling-Nam Interior View of Southern China*）。

1873年

慕拉第 Charlotte Digges “Lottie” Moon 1840-1912

美南浸信会传教士，21岁已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是少数女性获此殊荣的其中一位。1873年（33岁）入华，在华传教近40年。她反对妇女缠足，兴办女学，提高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赈灾济贫，深受当地民众的爱戴。慕拉第致函差会，要求给予女宣教士有平等的声音和服事的自由。要求差会差派更多宣教士来中国，并鼓励美南浸信会的妇女们在各堂会组织宣教部，用来支持宣教士，结果诞生了妇女宣教士联合会，为宣教筹募了许多经费。第一次“圣诞节宣教奉献”筹了\$3,315.26美元，足够差出三位新宣教士去中国。而为了纪念慕拉第领导妇女们第一次成功支持美国海外宣教事工的圣诞节奉献，每年的圣诞奉献就称为“慕拉第圣诞奉献”，至今总共筹募超过20亿美元。她于1892年及1902年回美国，期间，曾经坐在老罗斯福总统的轿车里，与总统交谈。一位中国牧者如此描述慕拉第：“她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乡间最不为人所知的村民，在崎岖泥泞的小路上奔走，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山村妇女、农夫；在荒野开垦福音良田，建立基督的教会。这一个曾有数位仆人伺候的大家闺秀，受过高等教育的阔小姐，却宁愿远航半个地球，来到中国，与最穷困的乞丐为伍，把自己的钱财与饥饿的人分享，最后却饿死在圣诞夜。”1911年，慕拉第在登州组织成立了“华北妇女传道协会”，并任会长。同时她在胶东地区经管着七个学校。最后为救助灾民，自己反因饥饿而死。

参考：

Benge, Janet and Geoff. *Lottie Moon: Giving Her all for China*. Seattle, WA: Youth with a Mission Publishing, 2001.

Harper, Keith, ed. *Send the Light: Lottie Moon's Letters and Other Writings*. Macon, Georgi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1875年

马根济 John Kenneth Mackenzie 1850-1888

十九世纪英国伦敦宣道会医疗宣教士。1875年（25岁）来华，先后在湖北汉口和天津行医传道，济世救人；与晚清重臣李鸿章交往甚密，在天津先后创立了西医院和医学堂。1879年2月，马根济奉调去天津担任伦敦会教会医院院长。1879年8月1日，李鸿章邀请马根济为李夫人看病。因治愈李夫人而声名大噪，不但成为李鸿章的家庭医生，也成为许多达官贵人的医疗顾问，是天津百姓心目中的再世华佗。1880年，在李鸿章支持下，近代中国第一所规模完整的私立西医医院“伦敦会施医院”或称“天津医病馆”（Viceroy's Hospital）建成。1881年，马根济通过李鸿章建立“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Viceroy'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这是晚清时期第一所官办的西医学堂，即“北洋医学堂”之前身。1886年秋，在华医疗宣教士决定成立“中华博医会”，马根济是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并且协助编辑出版该会会刊《博医会报》。因其在华的医疗成就和贡献，马根济荣获御赐双龙宝星勋章一枚。1888年2月（清光绪十四年二月），马根济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加之从病人身上感染天花而逝世，年仅38岁。1924年1月18日，马大夫纪念医院主楼落成，为日后“天津市人民医院”。

1880年

赐斐德 Harold Schofield 1851-1883

中国内地会医疗传教士，出生于英国名门富户，牛津大学毕业的医生。1880年（29岁）与新婚妻子一同来华，在山西太原落脚，从事医疗工作和街头布道。内地会发起征召70位来华同工，他写信表示愿意每日代祷，直到达到目的为止。他日复一日热切地为英国大学生能看重中国的需要而祷告。他尤其希望第一流的人才——像牛津、剑桥的毕业生——能够献身到中国来，因为中国的需要与挑战都太大了。最后，在1884年，征召70人的目标不仅达到，而且超过了7人。他在1883年的炎夏，为一位患者看病时不幸被感染，去世时年仅32岁，来华仅三年零一个月。他的遗言是：“请告诉戴德生和内地会，在中国的三年，是我平生最幸福的三年。”戴德生得悉赐斐德病逝的消息是在1883年8月1日这一天；在同一天里，他也收到“剑桥七杰”之一何斯德要求加入“中国内地会”的申请表，从而使他的心大得宽慰。真可谓：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1885年3月，“剑桥七杰”接过福音的火

炬，步赐斐德之后尘，来到中国。

1882年

司督阁 Dugald Christie 1855-1936

出生英国苏格兰，东北西医第一人。1882年（27岁）于爱丁堡大学医学传教士学院毕业，受长老会差派，携新婚妻子来到中国宣教。1883年5月，在沈阳创办东北第一家西医诊所——盛京诊所，行医治病和传播福音，因成功治疗霍乱而扬名沈阳。1892年开始创建“盛京医学院”。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创建七所红十字战地医院，抢救千余名中国伤病员。1895年，获光绪皇帝授予双龙敕书和勋章。1896年，在沈阳创建了东北第一座妇女医院。1910年-1911年间，沈阳流行鼠疫，司督阁担任沈阳抗击鼠疫总指挥，首次建立现代疾病防控指挥体系。1911年4月，沈阳国际鼠疫会议召开，11个国家33名学者、专家到会，司督阁在会议上发言，清政府摄政王在故宫接见会议代表。1912年，奉天医科大学建成，成为东北三省第一所医科大学。1922年4月21日，司督阁因年事已高，辞职回国。辞行前在北京受到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的接见，并获得民国政府授予的嘉禾勋章。1936年，司督阁在苏格兰病逝，终年81岁。去世前，他一直担任中国苏格兰协会会长，始终关心中国的留学生，关心中国，关心沈阳，为医院和医学院筹款。

参考：

陈醒哲，《盛京医事：东北现代医学奠基人司督阁与盛京医院的历史画卷》。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2年。

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奉天三十年》。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1882年

李佳白 Gilbert Reid 1857-1927

美国在华社会活动家，尚贤堂创办人。出生于美国纽约州长岛，父亲是一位牧师。1882年（25岁），毕业于纽约协和神学院，同年受美北长老会差遣，到中国山东省济南等地传教。1890年，李佳白到上海参

加第二届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全国大会，提出将传教对象转向中国上层社会的设想。经总税务司赫德、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和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引荐，他获得李鸿章的好感。1897年2月，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批准，在北京正式成立尚贤堂（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李佳白为督办，举办各种中外联谊活动。除举办新年茶会等各种中外社交活动外，还开设学堂、藏书楼和华品陈列所，并邀请多种宗教的人士聚集在尚贤堂，进行演讲和探讨，宣扬宗教大联合的思想，李佳白也因而受到许多传教士的批评。1900年，尚贤堂被义和团烧毁。1922年，北京恢复尚贤堂，致力于各种和平活动。1927年9月30日，李佳白在上海去世。其子李约翰将尚贤堂土地出售，另租博物院路亚洲文会大楼办公，维持到1950年代初。

1882年

苏慧廉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1861-1935

英国人，著名的教育家，汉学家。1882年（21岁）到上海。在温州定居二十余载，建教会，修医院，设学堂，开禁烟所。编撰便于外国人学中文的《四千常用汉字学生袖珍字典》。被聘为山西大学堂的总教习。随后受聘牛津，成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向西方介绍中文典籍，将《论语》翻译成通俗英文。与理雅各、李提摩太、赫德、严复、王国维、蔡元培、吴佩孚、胡适、顾颉刚、费正清等有着或近或远的联系。

参考：

沈迦，《寻找苏慧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

1884年

梅耐德 Annette Mills 1853-1929

美国长老会女宣教士，中国聋哑教育的先驱，山东烟台启喑学馆（烟台市聋哑中心学校前身）的创始人，曾在烟台从事聋哑教育达40年之久。梅耐德出生在纽约，幼年丧母，为了继母所生的聋弟弟能够受到教育，进入罗彻斯特聋哑学校，成为教师。在那里，她认识了在中国传教的查尔斯·罗杰斯·米尔斯先生（Charles Rogers Mills），开始了

一段影响中国聋哑教育发展的浪漫史。1884年，梅耐德（31岁）来到烟台，与大她24岁的米尔斯结为伉俪，成为他的继室夫人。梅耐德很快着手为中国聋哑孩子编写第一本教材《启喑初阶》。1887年，用美国罗彻斯特聋哑人学校“无声工作者”组织赠送的50美元，在烟台北部小城登州（今蓬莱）丹崖山下的一座平房里，催生出中国第一所聋哑学校。次年，学馆取名“登州启喑学馆”。它是烟台市聋哑中心学校的前身，中国的聋哑教育由此开始。1895年，施耐德的丈夫去世，学校资金短缺。为了筹资建学，她的足迹遍布欧美与中国16座城市，不断写信、宣传、演说，呼吁赞助，购置土地，兴建了教学楼。历经几十年的艰难奔波，最终建起了中国第一所男女混读全日制正规的聋哑学校。1906年，施耐德的外甥女安妮塔卡特小姐的到来，使烟台启喑学校的管理和教学又上了新的台阶，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从1898年至1941年间，学校多次组织师资培训班，先后培训教师44人，分别来自杭州、南京、上海、北京、成都、香港等地，其中还有一位来自朝鲜的平壤。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当地聋哑学校的创始人或骨干教师，在全国创建了11所聋哑学校，从而推动了聋哑教育在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开展。她被引见给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总统对她在中国所做的一切给予高度评价。

1885年

剑桥七杰 The Cambridge Seven

受戴德生影响而加入内地会，1885年去中国传教的七名剑桥大学学生。他们的行动影响到了美国，导致Robert Wilder发起学生志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盖士利 William Cassels 1858-1925

圣公会牧师，来华后在四川工作。10年后，1895年，被任命为圣公会新设华西教区的主教，直到1925年在那里去世。

司米德 Stanley Smith 1861-1931

前三一学院划艇队队长，被派到华北，不久能用流利的中文讲道。1931年1月31日在中国苏州去世。死前一天晚上，他还讲道。

施达德 Charles Thomas Studd 1860-1931

曾是英国著名的板球手，知名度最高。当时他毅然决定放弃板球传教，曾引起很大轰动。来中国后他主要在山西传教，1894年，由于健康恶化回国。后来又前往印度和非洲传福音。

杜明德 Arthur Polhill-Turner 1862-1935

于1888年被按立为牧师，长期在中国西北工作，曾深入西藏传福音。1900年庚子之乱中他留在中国，没有离开，直到1928年退休回到英国。1935年去世。

杜西德 Cecil Polhill-Turner 1860-1938

毕业于伊顿书院（Eton College），是骑兵中尉，后来放弃升迁机会，与兄弟杜明德二人日后在青藏高原、四川传教，负责西北部西藏边区。1892年，他和妻子在暴乱中几乎被杀。1900年，他因健康不佳回国，无法再回到中国。1938年在英格兰去世。

章必成 Montague Beauchamp 1860-1939

高大、强壮的划船选手，男爵之子，1900年庚子之乱中撤离中国，1902年又回到中国。1911年他回到英国参军。1935年，他的儿子成了第二代来华传教士，他也回到中国；1939年，他在儿子的传教站去世。

何斯德 Dixon Edward Hoste 1861-1946

出身皇家军事学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将军之子，原是炮兵少尉。后来接续戴德生领导中国内地会30年。1935年退休后仍留在中国，后来被日军关进集中营，直到1945年释放，在中国居留达60年。1946年5月，他在伦敦去世，是“剑桥七杰”中最长寿的一位。

参考：

蒲乐克著，尧孝秦译，《剑桥七杰》。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75年。

1886年

卜舫济 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 1864-1947

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教育家，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达35年。1886年（22岁）抵达上海。1887年，被派到美国圣公会在华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圣约翰书院任英语教习。1888年6月，年仅24岁的卜舫济被提拔担任圣约翰书院校长。在他领导下，圣约翰特别注重英语教学，规定所有科目（除中文）一律采用英语教学，校园内一律采用英语进行交流。体育是圣约翰的另一个特色，运动水平居各校领先地位。1905年，卜舫济使圣约翰成为一所四年制本科大学，拥有文、理、医、神四个学院，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立案，所授学位被美国各大学认可。卜舫济主张教育与政治分离，反对以学校为基地从事政治运动，为此曾与热衷于从事政治运动的学生发生数次冲突事件。1925年，一批学生因此退学，另组光华大学。卜舫济年轻时，曾经力排众议，在1888年9月27日，与圣公会华籍牧师黄光彩的女儿圣玛利亚女中校长黄素娥结婚。83岁逝于上海，葬于上海静安公墓。

1887年

柏格理 Samuel Pollard 1864-1915

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士，滇东北老苗文的创建者之一，著名社会改良实践者。1887年（23岁），抵达中国云南，1892年，在昭通负责当地的传教事宜。他与当地苗民从速记符号中（据说从苗民传统服装图案中）获得灵感，为苗语创建了一套被称为“滇东北老苗文”的书写系统，时至今日，这套书写系统仍然被不少苗民使用。他还设法改良当地风俗，引入各种体育、文化活动，使得石门坎这个偏远苗寨一度成为中国西南部最为先进文明的地区之一。

参考：

阿信，《用生命爱中国》。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

柏格理等著，东人达等译，《在未知的中国》。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

Grist, W. A. *Samuel Pollard: Pioneer Missionary in China*. London: United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1971.

1888年

古约翰 Jonathan Goforth 1859-1936

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1888年（29岁），加拿大长老会派遣古约翰夫妇到中国，在山东省烟台落脚。当他前往河南彰德府（今安阳）建立基地时，戴德生叮咛他说：“弟兄啊，如果你想进入河南省传福音，一定要以膝代步啊（Go forward on your knees）！”从此“以膝代步”这句话就成为古约翰与豫北同工们的座右铭，无论大小事情，除非先有充分的祷告，绝不冒然采取行动。11个孩子中有4个在中国病死。1908年，带领东北教会大复兴，主题是“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4：6）。这次的复兴使东北教会的受洗人数，从1907年的一千五百人骤增为1908年的三千五百人。1919年和1922年，有“基督将军”称号的冯玉祥将军，由于仰慕古约翰之名，特别邀请他到军中传扬福音，他欣然携师母同往。在那里，古约翰每天两次向一千多名军人讲道，其中多半属长官级。师母罗莎琳德亦与官太太们聚会，劝她们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古约翰在最后一天替960位军人施洗，为4000多名官长和士兵主持圣餐。1936年以东北四平街为基地，向吉林扩展。1930年，视网膜脱落右眼失明。书写《在中国的神迹》（*Miracle Lives of China*）。1933年，左眼失明。古约翰在中国宣教48年。死于加拿大，享年77岁。

参考：

陈福中译，《古约翰小传》。香港：基督徒出版社，2002年。

Goforth, Roslind. *Jonathan Goforth*. Minneapolis, Minnesota: Bethany House Publishers, 1986.

1895年

和受恩 Margaret E.Barber 1866-1930

英国女传教士，以对中国基督徒领袖倪柝声、王载的影响而著

称。1895年，作为英国圣公会传教士第一次来华，在福州一带传教，任教于圣公会在仓前山开办的陶淑女中。1911年，42岁时第二次来华，这次是独立传教士，住在闽江口附近，马尾罗星塔渡口对岸荒僻的乡村白牙潭（今属长乐市营前镇），过了20年卑微、隐藏的生活（1911-1930）。不久，她领会到，以自己外国女传教士的身份，难以取得成效，必须兴起中国青年传道人。十年之后，1921年，一艘中国军舰停泊在白牙潭，23岁的海军军官王载被和受恩住宅中的诗歌所吸引，上岸拜访。他辞去海军军官职位，专门传道。福州圣公会三一书院18岁的学生倪柝声、王载的弟弟王峙、王连俊、陆忠信、陈再生、姜活石、张诗贞等加入。和受恩是影响倪柝声最大的一位属灵前辈。是她将弟兄会和内里生命派的著作介绍给倪柝声，由此将中国早期福音的性质转入追求属灵生命经历的阶段。她也严格地训练倪柝声，要求倪柝声不论是否有道理，都要学习顺服年长五岁的王载。他形容她是一个发亮的基督徒，只要走进她的住处，立刻感到神在那里。和受恩1930年去世，享年63岁。她离世时身无别物，仅遗圣经一本给倪柝声。里面有一句话：“为己我无所求，为主我求一切。”

1896年

毕得经 Horace Pitkin 1871-1900

20世纪初期，美国宣教史上“耶鲁三杰”之一，另两位是路思义（Henry Luce）和艾迪（Sherwood Eddy）。三人在耶鲁念书时，与英国“剑桥七杰”一样，都加入了“学生志愿军”。在上一个跨世纪的年代中，成千上万的西方基督徒知识青年，响应“在我们这一代中将福音传遍世界”的号召，成立“学生志愿海外宣教运动”（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耶鲁在中国”的宣教计划应此而开创，旨在将福音传到未得之地，传给未得之民。耶鲁毕业后，三人一起进入神学院受装备，一起访问各大学，传递宣教负担。他们不仅才华洋溢，同工间也情同手足，因此被称为“耶鲁三杰”。毕得经是三人当中最早出发到中国的，他于1896年（25岁）进入中国，选定河北省保定府为工场。四年后，不幸遇上了义和团之乱，惨死在暴徒手中。他的妻子在兵慌马乱之中带著襁褓中的婴孩逃回美国。毕得经在临死前，仍顾念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恳请一位中国基督徒务必设法将自己

最后一个心愿转达给在远方的家人。他的心愿是：当儿子25岁时，一定也要来中国宣教。儿子后来果真回到中国，继续父亲的宣教工作。

1896年

穆德 John Raleigh Mott 1865-1955

长期领导基督教青年会（YMCA）和学生志愿宣教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为了实现“在这一代把福音传遍天下”，组织国内外青年投入宣教及社会服务工作。推动普世教会合一运动，于1910年，主持历史性的爱丁堡宣教会议（Edinburgh Missionary Conference），联合各宗派，在宣教大使命下合一，此会议成为二十世纪教会合一运动的起头。1948年，被推举为普世教会协会（World Christian Council）终身荣誉会长。1946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穆德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十五岁时就读上爱阿华大学（Upper Iowa University），1885年转学至康乃尔大学。次年他参加了剑桥七杰之一的施达德所主领的聚会。施达德的一句话深入他心：“你为自己求大事吗？不要求这些。你要先求上帝的国。”同年，他参加了慕迪在麻州北田（Northfield）营地所举行的聚会，在为期一个月的聚会中有一百位青年学生决志要成为海外宣教士，他是其中之一。1876年，上海有了第一个青年会，1885年福州英华书院和潞河书院，1890年杭州泓道女校都建立了青年会。1896年，穆德（31岁）来华访问，到广州、香港、上海、山东、天津、北京、上海、福州、杭州、南京、宁波等地历时三个月，访问所有高等教育机关，使中国学校青年会增加了22个。1898年，北美协会派格林、路思义、巴乐满等人到中国，分别负责天津、上海和香港的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901-1949年穆德8次来华，对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展开起到重要作用。

1896年

盖落窪 Archibald Edward Glover 1859-1954

内地会派往中国的英国籍传教士。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在国内担任牧师9年后，于1896年（37岁）加入中国内地会，来到中国山西省潞安（长治），协助“剑桥七杰”之一司米德传教。1900年夏季，义和

团事变期间，带着怀孕6个月的妻子、4岁的儿子和3岁的女儿，从山西潞安，经河南，颠沛流离，备极艰辛，终于逃生到汉口。1904年出版传记《神迹千里》。

参考：

蓋落窪著，张玫珊译，《神迹千里》。香港：海外基督使团，2000年。

1897年

路思义 Henry Winters Luce 1868-1941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服务于中国华北齐鲁大学与燕京大学两校的美国传教士，《时代杂志》、《生活》杂志创办人亨利·路思义（Henry R. Luce）之父。在耶鲁大学就读时，恰逢学生志愿海外宣道运动（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的潮流席卷美国各大学校园，八千多名大学毕业生远赴海外宣道。当时毕得经（Horace T. Pitkin，1900年在中国保定殉道）、艾迪（Sherwood Eddy）和路思义就是加入这一行列中著名的“耶鲁三杰”。1897年，路思义（29岁）带着新婚三个月的妻子伊丽莎白，受美北长老会的派遣，到达山东登州（蓬莱），在狄考文创办的文会馆中担任物理教师。在那里，路思义发起了山东省历史上第一场篮球比赛。1909年3月，路思义邀请文会馆校友丁立美牧师来校主领奋兴聚会，有116人决志献身传道，占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一以上，开始了著名的中华学生立志布道团。1917年，齐鲁大学在济南南关建校，路思义被推选为副校长。1919年，路思义又担任燕京大学副校长，受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之托，赴美募得巨款，建成燕京大学。校园中建有一个六角形的思义亭，以纪念他对燕大的贡献。在台湾台中市东海大学校园中，建有纪念他的路思义教堂。

1897年

金纯仁 Gershom Whitfield Guinness 1869-1927

生于法国巴黎的一个英国宣教士，1897年（28岁），受中华内地会派遣到河南开封福音医院行医传教。在中国服务30年之久。金纯仁的

父亲早年与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在宣教工作上彼此相知。首批到中国宣教的爱尔兰宣教士就是由他介绍给内地会的。金先生的长女金乐婷姑娘（Miss Geraldine Guinness）是戴先生的二儿媳，即戴存义夫人（Mrs. F. Howard Taylor）。金纯仁因抢救伤员感染伤寒而逝。他的亲密同工吉培生医生如此怀念金纯仁：“虽然他的心灵因中国的悲惨战祸而伤痛，但他并不气馁。可惜因其身心过度劳累，以致没有足够的体力战胜病魔。他热爱中国，甚至为中国人牺牲了生命，可以无愧地接受基督赐给他的冠冕。……金医生是基督耶稣的精兵，一位热爱传福音的使者，又是病人最真挚的朋友。我们为他的离世而哀悼，为他已得到的奖赏而高兴，并要效法他留给我们的美好榜样，至死忠心。”

1899年

马士敦 John Preston Maxwell 1871-1961

出生在台湾的英国宣教士，马雅各之子，医学博士。1899年（28岁）来华，在华40年。起先任职于福建永春医馆，承担散布在永春山区15间教会的牧养工作，并任教会学校的“名誉总理”。在“宣教医生的工作”一文中，提及中国女孩被迫缠足的惨状，以及当地任意杀死女婴的恶风。他写道：“孩子们，你们要为生在基督教世界中感谢上帝，因为只有基督教赋予女性应有的地位。”1919年，受聘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妇产科主任，直到1936年退休。期间曾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执行委员会三成员之一，代行院长职务。马士敦为中国妇产科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培养出了一批著名的妇产科专家，如林巧稚。

1902年

乐灵生 Frank Joseph Rawlinson 1871-1937

生于英国，移民到美国，1902年（31岁）被美南浸信会派往中国传教。1912年任上海《教务杂志》编辑，该杂志成为全国基督教的权威杂志。1919年前后，参与大型统计资料《中华归主》的编辑。曾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中国学校部主任。1937年8月14日，淞沪会战爆发的第二天，一架中国飞机重磅炸弹误投到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分界线的爱多亚路和西藏路（当时叫虞洽卿路）路口的中央，恰好在那里等候红

灯的乐灵生牧师被击中身亡。

1902年

盖群英 Alice Mildred Cable 1878-1952

20世纪初在中国山西、甘肃和新疆传教的著名女传教士。出生于英格兰，布商的长女，在伦敦国王学院接受了基本的医学知识，加入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1902年（24岁）经美国抵达中国，被派到山西霍州传教站，在此结识了一生的同伴冯贵珠（Evangeline French）。1908年又加上妹妹冯贵石（Francesca French）。她们在霍州建立了一座教堂、一个200人的女子学校、一个诊所和一个戒毒所。1923年，三位人到中年的女传教士前往甘肃肃州（酒泉），开辟了一个新的传教站。以此为基地，每年穿过戈壁沙漠，向西进入从没有传教士进入的区域，向新疆的穆斯林妇女传教。三人教会了许多人汉语，使她们能阅读圣经和其他属灵书籍。到处赶集，在每个集市上卖圣经，并且高唱圣歌。她们进入2700户住家和帐篷，举办650次聚会，送出4万册以上的圣经。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三人回到英国。1943年，三人都获得皇家苏格兰地理学会颁发的活石奖章。1942年，盖群英还获得皇家中亚学会颁发的劳伦斯纪念奖章。在英国，盖群英任圣经公会副主席。1952年4月30日在伦敦去世。

参考：

凯伯·法兰屈著，黄梅峰译，《戈壁沙滩》。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

1904年

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官。1876年6月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904年（28岁）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08年，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司徒雷登携妻儿离杭赴任。1919年，创办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并任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

开中国。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中美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于1949年8月8日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由新华社发布。历史学家林孟熹评论：“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司徒雷登晚年在病榻上完成了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

参考：

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司徒雷登著，常江译，《在华五十年》。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

司徒雷登著，陈礼颂译，《司徒雷登日记》。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

1906年

胡美 Edward Hicks Hume 1876-1957

美国传教医师、医学教育家。出生于印度艾哈迈德讷格尔，其父亲与祖父都是在印度的传教士。1897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01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1906年（30岁）受雅礼会（Yale-in-China Mission）邀请来到中国，在长沙西牌楼街的一家旅馆创办了雅礼医院（湘雅医院前身）并任院长。1914年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协会联合创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出任学校教务长、湘雅医院院长。在胡美的辛勤耕耘下，医学院得到长足发展，为中国培养出许多西医人才，从而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医学院校，在当时享有“南湘雅，北协和”之美誉。1946年，胡美出版了《道一风同：一位美国医生的在华生涯》（*Doctors East, Doctors West: an American Physician's Life in China*）可谓其中西医思想之集大成。1926年返回美国，任纽约医学研究学校与医院（New York Post-Graduate Medical School and Hospital）主管、执行副院长。参与创办了海外基督教医务理事会（Christian Medical Council for Overseas Work）并于1938年至1946年间担任秘书。1953年，雅礼会将其英文名称改为“耶鲁中国协会”（Yale-

in-China Association)，中文名称为“雅礼协会”，后被更名为“湖南医学院”，1987年升格为“湖南医科大学”。

参考：

Chapman, Nancy E. *The Yale-China Association: A Centennial Histor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906年

郭慕深 Karen Gormsen 1880-1960

出生在丹麦，毕业于哥本哈根医科学学校。1906年（26岁）受丹麦基督教长老会派遣，到安东（今丹东）传教，在八道沟元宝山麓开始了传教生涯。来华第二年开办了安东历史上第一所女医院，“安东基督教女医院”（丹东市妇产科医院前身），从此当地有了综合性妇产科医院。1909年安东发生霍乱传染疾病，她带领抢救医治。在医院周围，她不时发现被遗弃的病残婴儿。因此，于1916年，在安东市元宝山中学胡同14号建立了育婴堂，收养了大批孤儿。为了改善孤儿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她于1924年返回丹麦募捐。1930年回国，又将父母在丹麦留给她的遗产全部带回安东，用于育婴堂。她终身未嫁，在中国44年工作中，养育了近300个孤儿。为中国、为安东人民奉献了她的毕生精力和所有的爱。

1908年

富能仁 James Outram Fraser 1886-1938

中华内地会英国宣教士，1908年（22岁）来华，被誉为“傜傜人使徒”，老傜傜文字创造者，在中国云南边陲傜傜族人中间生活、宣教、服务近30年之久。1928年，被任命为云南省监督，负责云南全省的宣教工作。1938年，富能仁翻译的傜傜文《新约全书》在上海印刷出版。他将自己的生命献给傜傜族人民，是东亚最成功的基督教传教士之一。

参考：

林茨，《福音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Crossman Eileen著，然超智译，《山雨：富能仁新传》。伯克莱：福音文宣社，1989年。

Taylor, Howard. *Behind the Ranges: Fraser of Lisuland*. London: Lutterworth Press, 1944.

1908年

柏立美 Victor Plymire 1881-1956

美籍牧师，1908年（25岁）来华。开始在甘肃传教，后来与妻子和一岁的儿子到达青海西宁的湟源县，在那里生活了27年，向藏人传福音，在西宁民主街设立教堂。1919年，内地商人在湟源创办中华内地会，礼拜地点设在城内庆盛合商店，有教徒60余人。1921年，柏立美牧师夫妇到湟源布道，设立教堂，将中华内地会归为神召会，由柏立美和英籍传教士明约翰主持。1925年，又到同仁保安镇建立教堂。1949年柏立美回国后，由中国牧师石子明主持，教徒约100余人。

参考：

Plymire, David V. *High Adventure in Tibet: The Life and Labors of Pioneer Missionary Victor Plymire*. Springfield, Missouri: Assemblies of God Foreign Missions, 1959.

民国基督教

1912年 魏特琳（华群）

Wilhelmina “Minnie” Vautrin 1886-1941

美国基督会在华女传教士。1912年（26岁）毕业于伊利诺斯大学，同年受美国基督会差会（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来中国，担任安徽庐州府（合肥）基督会三育女中校长。1916年金陵女

子大学在南京成立时，她担任教育系主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她积极营救中国难民，利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保护了上万名中国妇孺难民。

参考：

Hu, Hua-ling. *American Goddess at the Rage of Nanking: The Courage of Minnie Vautrin*. Illinoi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0.

Minnie Vautrin. *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 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 Illinois: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2008.

The Nanking Massacre Project: A Digital Archive of Documents & Photographs from American Missionaries Who Witnessed the Rape of Nanking from the Special Collections of the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http://www.library.yale.edu/div/Nanking/Vautrin.html>

1916年

钟爱华 Lemuel Nelson Bell 1894-1973

美南长老会在华医疗传教士，1916年（22岁），携新婚妻子（Virginia Leftwich Bell），来到中国江苏省北部的清江浦（今淮安市区），担任仁慈医院的外科主任和行政院长。基督教仁慈医院由美南长老会创设于1892年，后来扩充到380张病床，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长老会医院（现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在华25年，救人无数。二女儿路得（Ruth）嫁给著名美国福音布道家葛培理。葛培理曾开玩笑说：“我想上帝给我路得，是要让我得到钟爱华这位岳父。”从1956到1973年，担任美国最具影响的福音派杂志《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执行编辑。

参考：

Pollock, John. *A Foreign Devil in China*. USA: 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1971.

1920年

贝德士 Miner Searle Bates 1897-1978

1920年，贝德士（23岁）作为基督教联合传教会（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即基督会）传教士，前往中国金陵大学任教，在中国服务长达30年之久。1935年，他在哈佛大学的中國历史系获得哲学博士。1937年，抗战爆发，贝德士以副校长名义负责留守金陵大学校产。南京沦陷前后，参与发起和组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后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并担任最后一届主席。从1937年到1941年，为保护中国难民和揭露日军暴行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的领导下，20多万难民安全逃离日军的魔爪。

参考：

章开沅，《贝德士文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1925年

李爱锐 Eric Henry Liddell 1902-1945

英国苏格兰宣教士、体育运动家、教育家。父母在天津一带宣教长达30年之久。李爱锐于1902年1月16日出生在中国天津。1924年巴黎奥运会400米赛冠军，被誉为“苏格兰飞人”。他如此描述自己对短跑的热爱与感受：“是上帝使我跑得快。我跑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喜悦。”1925年，李爱锐（23岁）参加完最后一次在苏格兰的赛跑后，毅然放弃了在家乡优厚的条件和待遇，放下享誉全球奥运金牌选手的美誉，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天津，到“新学书院”（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现为天津第17中学）担任老师，从此开始了他近20年的教学生涯。1932年6月，李爱锐在苏格兰公理会教会正式接受按立成为牧师。1925年英租界工部局邀请他参与民园体育场的改造工程。他以伦敦斯坦福桥运动场（今切尔西主场）为参照，设计、规划出一个标准化的运动场，同时还对诸如跑道结构、灯光设备、看台层次等改建提出了一系列的、具有先进水平的建议。在他的筹划与监督下，民园体育场成为当时亚洲范围内首屈一指的综合性体育场，且成为拥有最好运动跑

道的体育场之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关入山东潍县集中营；二战胜利前夜，病逝于集中营内，年仅43岁。临终，护士安妮把他抱在怀里，他最后轻声说：“完全降服”（complete surrender）。他平时喜欢唱歌，最喜欢教别人唱的一首赞美诗是“我灵镇静”（Be Still, My Soul）。李爱锐根据英文版 *Discipleship* 一书翻译成中文书《基督徒生活纪律》。

参考：

Caughey, Ellen, 华琳译，《因爱着中国》。北京：知识出版社，2008年。

Weatherby, W. J. *Chariots of Fire*.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1.

电影：《烈火战车》。

1928年

杨宓贵灵 Isobel Kuhn 1901-1957

出生于加拿大，是爱尔兰裔人。受富能仁牧师感召，到傈僳族传教，1928年（27岁）入华，与丈夫杨志英（John Kuhn）办“雨季圣经学校”。在中国云南的傈僳族中间宣教长达21年之久，被称为“傈僳人女使徒”。她一生总共写了8本书，其中自传性的有《寻》和《我成了一台戏》。

参考：

杨宓贵灵著，许崇明译，《寻》。台北：中国主日学协会，1961年。

狄贺妮著，徐成德译，《傈僳女使徒—杨宓贵灵》。香港：大使命基督徒团契，1996年。

魏外扬，《传爱组曲》。台北：宇宙光，1998年。

Repp, Gloria. *Nothing Daunted: The Story of Isobel Kuhn*. Greenville. South Carolina: Bob Jones University Press, 1994.

1930年

艾伟德 Gladys Aylward 1902-1970

英国独立女传教士，被称为“小妇人”，在西方广为人知。1930年（28岁）出发来华传教，接替年老的卫理会传教士珍妮·劳生（Jeannie Lawson）。在阳城，艾伟德创立了八福客栈，用于传教。曾接受当地道尹的请求，帮助妇女放脚，还曾帮助平息当地监狱的骚乱。她收养了很多孤儿。1936年，艾伟德加入中国籍。1949年回到英国家乡，英国广播公司的Alan Burgess将她的经历写成《小妇人》（*The Small Woman*）。1970年病逝台湾，长眠于环境幽静的关渡基督书院，面对淡水河出海口，朝向中国大陆。

参考：

Benge, Janet & Geoff. *Gladys Aylward: The Adventure of a Lifetime*. Seattle: YWAM Publishing, 1988.

Hildegard Horie著，朱惠慈等译，《比1000头水牛更够力》。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3年。

1932年

师达能 John Cornelius Stam 1907-1934

1932年，师达能（25岁）被内地会差遣前往中国宣教，与早一年到中国的未婚妻史文明（Betty Scott）汇合。次年，师达能和史文明在山东济南结婚。蜜月后，二人同返舒城，积极投入各项教会事工：主持主日崇拜和各种聚会；街头布道；售卖福音书或派发福音单张等。而史文明则更多地负责妇女和儿童工作。1934年9月11日，女儿爱连（Helen Priscilla Stam）在芜湖医院诞生，11月下旬，一家迁至旌德县。不料，12月7日，师达能夫妇被红军绑架撕票，双双引颈就戮。刚刚出生两个多月的女儿爱连被丢在床上，无人照料达36个小时之久。但在神的奇妙护佑下，竟被人发现并拯救出来，交给她的外祖父母史盖臣夫妇（Dr. & Mrs. Charles E. Scott D.D.）抚养，被称为“神迹婴儿”（Miracle Baby）。殉道时，师达能牧师年仅27岁，史文明28岁。在他们合葬的墓碑上，中间镌刻着一个十字架，十字架左边刻着：“师达能（JOHN

CORNELIUS STAM)，1907年1月18日。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十字架右边刻着“史文明（ELISABETH SCOTT STAM）），他的妻子，1906年2月22日。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师达能牧师和师史文明师母，成为中国内地会第73和74位献身于中国的殉道士。他们的殉道感动多人投入中国宣教事工。

1934年

艾得理 David Howard Adeney 1911-1994

英国内地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受戴德生和“剑桥七杰”传记的影响，剑桥大学神学院毕业后，于1934年（23岁）秋天来华，前往河南乡村，从事乡村布道。1941年，艾得理全家离开河南前往美国休假。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艾得理只得留在西方。1943年，艾得理回英国负责内地会的祷告事工。1945年二战结束，艾得理得以返回中国，与赵君影合作，在重庆成立了基督徒学生联合会，吸引许多流亡大学生成为基督徒，后来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基督徒领袖。1950年，传教士被逐出中国，加入美国校际团契（IVCF）。1956年，抵达香港，担任第一届国际学生福音团契（IFES）远东区总干事。1968年，在新加坡成立“门徒训练中心”，培育亚洲基督徒领袖。1976年，退休搬到加州柏克莱，又发起“守望中华”代祷。1979年，海外基督使团（内地会自中国大陆撤出后的新名称）在香港成立“中国事工部”，艾得理是北美支部的召集人。1994年5月，艾得理病逝在加州柏克莱家中，葬于邻近的中国山（China Hill）。

参考：

Carolyn Armitage，黄从真译，《艾得理传：全力以赴的一生》。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3年。

洪晓华、王晓春，《学生福音事工的推手：艾得理与韩宝琏》。台北：宇宙光，2006年。

附录

三集历史专题片

《宣教士》解说词

总撰稿：远志明、陈上宇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启示录 3: 20

第一集 叩门

第一章

福音的源头

人类就像一棵树，各民族是它的枝子。枝子在空中四处伸展着，地下却有一个共同的根。

这就是为什么，各民族都有一个寻根梦。

中国也不例外。从尧舜禹到夏商周，一直有敬天的道统。即使后来道统瓦解，人们在巛宕痛苦中依然穷极呼天、仰天长叹，流露着顽强的寻根情怀。

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历史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呼应史：人呼求神，神回应人。

公元零年，一个处女怀孕的奇迹，将耶稣送入人间。他以超凡的大智、舍命的大爱和复活的大能，印证他是神的儿子。

门徒们确信，他正是犹太人期待已久、各民族苦苦寻觅的生命之根。

离世前，耶稣对门徒们说：去，将这福音传遍天下。

于是一场血与火的洗礼，开始一寸寸席卷这个星球。

第二章

多马入华的传说

公元64年，耶稣离世大约30年后，罗马城一场大火，皇帝尼禄嫁罪于基督徒。6年后耶路撒冷被毁，基督徒被迫四散。

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多马来到印度，传说他也曾进入中国。

印度西南有一座城市叫马拉巴。在马拉巴教会珍藏的叙利亚文《圣务日程》里写着：由于圣多马，印度和中国听到了真理；由于圣多马，天国在中国飘然升起。

利玛窦也对多马来华一事确信不疑。他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里说：是圣多马本人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基督教早在公元一世纪的汉朝就传入中国了。但这件事毕竟缺乏史料，只能算作传说。而600年后的唐朝，基督教的一支景教入华，则因着1625年出土的一座石碑，从传说成为信史。

第三章

唐朝的景教

1625年，正是欧洲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登陆北美第五年，也是中国明朝天启五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古都西安出土。

这座珍贵的古碑，今天依然完好地保存在西安碑林里。

大秦一词，从汉朝起，常常指东罗马帝国。景教，是基督教东方教会的一支。碑文说：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景字的意思就是光明、广大。

当时基督教已是罗马国教，其中有一派叫聂斯脱里派，这一派将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分开，认为马利亚只是耶稣肉身的生母，不能当成神来崇拜。

公元431年，以弗所主教会议将这一派定为异端，放逐东方，就是后来传入中国的景教。

有一件事，看起来像巧合，那就是：基督教东来中国之时，正是

中国人西行取经之际。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西天有真经、西方有极乐的传说，一直撩拨着东方人的心。

公元629年，唐玄奘离开长安，一路向西走到印度。十几年后，带回657部佛经。

然而，印度《阿弥陀经》所向往的西方极乐世界，显然不是指印度本身。唐玄奘应该继续向西走下去才对。

天意冥冥。正当唐玄奘西行取经止步于印度的第六年，阿罗本主教带着圣经自西而来，直奔长安。

时值贞观大治，盛唐气象，雍容大度。宰相房玄龄出宫亲迎，阿罗本拜见唐太宗，住进皇宫，着手翻译圣经。

三年后，唐太宗宣诏：此教于社稷、世道和人心均有裨益，应该让它通行天下。于是朝廷出资，在长安城内的义宁坊修建了一座大秦寺，寺内住有21名教士。

陈怀宇，景教专家，剑桥大学访问学者，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教授：斯坦因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一幅绢画。绢画上有一个人物，虽然很残破，但我们能看出来，他戴著一个王冠，拿着一个权杖。他的权杖上有一个十字架，他的额头上也有一个十字架，就把它判断为是景教的绢画。

到公元781年唐德宗下令树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时，景教在中国已流行140多年。

陈怀宇：景教碑里面有一段话，就是讲到当时景教在中国流传的状况，叫“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因为当时唐朝的行政区划就是规划为十个道，比较确切的可以说，有景教徒活动的地方，基本上是我们所说的商业的中心。

景教碑借用了很多佛教和道教的术语。它只是借用而已，其实它还是非常严格地反映了景教的教义和它的思想。

比如说，它讲到“大秦寺”，其实讲的就是景教的教堂。

它讲到“三一妙身”这样一个词，其实是指基督教的三位一体，

圣父、圣子、圣灵。

讲到“阿罗诃”，就是叙利亚文的天父。

“弥施诃”，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

“净风”就是Divinity，我们说的圣灵。

“景尊”这个词就是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因为佛教里面有“世尊”，道教里面有“天尊”，那基督教里面就有“景尊”。所以，弥赛亚就叫“景尊弥施诃”。

景教碑上有一句话叫“匠成万物，然立初人”，这其实就是基督教的创世观。

“室女诞圣”，就是讲圣母玛利亚生下了耶稣。它又讲到耶稣的受难，他的复活，比如它里面有一句话叫“开生灭死，棹慈航以登明宫”，讲他怎么救赎这些罪人。

“判十字以定四方”，我们知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升真”，耶稣复活升天。

还有一句话叫“经留二十七部。”大家一般认为它就是讲新约一共二十七卷。

如此等等，虽然基督教教义已基本介绍过来了，但局限性是明显的：一是它对佛教的依附；二是它对皇权的依赖。

公元845年，唐武宗下令灭佛，景教也一起遭了殃。教堂被拆毁，教士被驱逐，景教碑也被埋入地下。

第四章

元朝的也里可温教

基督的福音再一次叩击中国的大门，是在五个世纪后的元朝。这一次与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有关。

1260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召见了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表示对天主教有兴趣，请二人捎信给教皇，索要耶路撒冷的膏油。

10年后，二人带着教皇的回信和圣地的膏油，再次觐见忽必烈。同来的马可·波罗深受忽必烈器重，留了下来。

在后来那本广为流传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这个在中国住了17年的威尼斯人，不仅首次向世界描绘了中国的丰饶和博大，也提到了忽必烈的信仰。

他写到，忽必烈认为，基督教是最真最好的宗教，因为凡是不美善的事，基督决不允许人做。

元朝基督教，实际上就是从唐朝延续下来、存留在蒙古族部落中的景教，蒙古语叫“也里可温”，意思是“信奉上帝的人”。

忽必烈的母亲别吉太后就是其中的一员。据说当时京城有大约3万基督徒，构成卫戍军团的主力。

1294年，中国迎来了第一位罗马教廷的特使蒙高维诺。这个意大利人开辟了天主教中国教区。

他在写给教皇的信中说，教堂离皇宫只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大汗在宫里可以听到我们的歌声。

可惜的是，元朝的基督教始终局限在皇室和蒙古人中，没有广泛传播。

1362年，朱元璋的明军攻入泉州，杀死了天主教的主教。几年后，元朝的基督教近乎绝迹。

第五章

明末的天主教之一

（沙勿略与范礼安）

时隔200年后，15世纪末至16世纪中，人类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大大唤醒了教会的福音使命。

另一件事，是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航海大发现，使世界连为一体。

这时候，上帝的使者再次出发，沿水路来叩击中国的大门。

耶稣会，凝聚了一群愿意为福音舍命的献身者。第一个前来中国的，是耶稣会宣教士、西班牙人沙勿略。

他在日本逗留了27个月。

丁松筠神父，台湾光启社制作人：在日本的时候，他发现日本人

非常崇拜中国人。日本人常常是，学习中国人怎么做，他们也会怎么做。所以他们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非常有关系。

满而溢神父，美国天主教中美交流中心主任：日本人，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奇怪，你讲这个耶稣基督那么伟大，可是，中国人从来都没有跟我们说有一个耶稣基督。方济各·沙勿略一听，就说：哦，那么我也应该到中国去。以后中国人要对日本人说，有过一个耶稣基督，OK，他们才信。

沙勿略带着对汉唐遗风的爱慕，于1552年乘船来华，登上与广东台山一水相望、只相距八海里的上川岛。

可是，当时没有人敢违法送他过去，不久他就在热病中遥望着他所爱慕的中国死去了，年仅46岁。他在遗言中说：我深信耶稣基督的圣名一定能传入中国。

沙勿略死后26年，另一位耶稣会宣教士，意大利人范礼安来到澳门。

面对中国这块巨大、封闭而坚硬的土地，他发出呐喊：顽石啊顽石，你何时才裂开呢？

虽然范礼安至死也没能进入中国，但他怀着信心说：中国一定可以被说服，允许一些以学识和品德而闻名的外国人进入中国。

丁神父：那个时候耶稣会发展得很快。他们把最好的、最聪明的、最有智慧的会士送到中国来。

第六章

明末的天主教之二

（利玛窦与徐光启）

四年后，1582年，他的学生利玛窦来了。在同学罗明坚陪同下，到了两广总督所在地肇庆。肇庆知府王泮欢迎他们，为他们的会堂题字：西来净土、仙花寺。

利玛窦以火热的使命感，带着对中国的热爱，一面潜心钻研中国古籍，一面四处走访，亲身体会中国的风土人情。

丁神父：利玛窦到了中国，他觉得，我是一个神职人员，我穿衣服打扮应该像一个中国的神职人员。那个时候，他所认识的神职人员是佛教徒，所以他就剃头发，穿佛教和尚的衣服。十年都是这样过。然后他发现，真正受尊敬的人不是和尚而是学者。所以，他那个时候有一个改变。他就开始穿儒家的衣服，也让人家知道他是一个学者，跟很多其他的学者就开始交换意见，交很多学者的朋友。

这样默默生活19年后，利玛窦获得中国人的好感，成了一位“以学识和品德而闻名的外国人”。1601年，利玛窦进京传道。

丁神父：他不像其他的传教士，把基督教的信仰套在中国文化上。他觉得，中国文化已经有一些种子，一定要在中国文化里面发现那些符合耶稣基督的真理，可以从那边开始，从那边开始发芽长大。所以他一直有这个概念，他觉得，孔子的思想跟耶稣基督的信仰，在很多地方可以配合。尤其是伦理道德、尊重别人、敬天啊，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

他引用《中庸》“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认为中国古人祭拜的上帝就是God。

利玛窦在罗明坚《天主实录》基础上，编写了《天主实义》一书，尽可能靠近中国文化的取向，简明介绍天主教教义。

有一点很重要，利玛窦等人，不仅是献身的教士，也是杰出的学者。利玛窦带来了令中国人大开眼界的西洋镜、自鸣钟、日晷和万国全图。

他向中国人介绍了水力、火炮技术，日月食的推测，西方音乐和透视绘画。

他用中文撰写和翻译了《交友论》、《西国记法》、《西字奇迹》、《四元行论》、《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同文算指》、《乾坤体义》等十几本书。

在利玛窦和郭居静、罗儒望等宣教士的影响下，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明朝重臣，先后受洗归信耶稣。

徐光启，文渊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基督信仰、又有科学素养的国家领导人。

丁神父：徐光启一直在问问题，他一直希望能够吸收西方的一些知识。那么利玛窦告诉他，如果你不懂《几何原本》，你可能没有办法了解西方科学这方面的知识，因为西方的逻辑跟中国的逻辑不一样。

所以，徐光启就下了决心。他要学习《几何原本》，而且愿意帮助利玛窦把这本书翻成中文。他是农夫。他常常会遇到一些自然灾害，叫老百姓受苦。所以他一直想了解怎么样解决这种很实际的问题。借著传教士，他引进、也学习怎么样种番茄，种花生，这些比较不容易失败的产品。这种学问累积起来好多年，最后他写了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农政全书》。有很多关于农业方面的学问在这本书里面。有人说，徐光启因为他的《农政全书》，和他那么多年的研究，他引起一个所谓的绿色革命，让中国的人口增加。

徐光启与利玛窦，没有徐光启，大概不会有利玛窦，利玛窦不会有那么大的贡献。同样，如果没有利玛窦，可能徐光启的贡献也不会那么大。利玛窦应该当作我们天主教的圣人。不过我们觉得，徐光启也应该陪伴着他当作圣人，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合作是没有话讲的。

徐光启说：国人若能敬畏上天、事奉上天，尧舜禹三代之风何不可还？

1616年，南京发生教难，有人捏造罪名，陷害宣教士。

丁神父：偶尔反对这些传教士、不能够接受耶稣的信仰的这些人，都会讲很多谣言，很多坏话，甚至会控告他们。每一次有这种事情，徐光启会以他自己的生命当作一个保证。他们是无罪的，他们是好的。他说，如果发现他们真的是有罪，真的是有问题，他自己愿意跟他们一起受苦，一起承担同样的结果。

水局郎中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圆容较义》和《同文算指》二

书，编纂了第一部天主教丛书《天学初函》。因为他纳妾，利玛窦一直不给他施洗，直到他46岁弃妾后，才得洗礼。

监察御史杨廷筠原来信佛，改信基督后，受到佛教界指责，他回应说：基督教一是崇拜上帝，二是爱人如己。就是儒家所说，昭事上帝，悯我同胞。

明末清初，天主教与中国朝廷度过了一段难得的蜜月期。

第七章

清初的天主教之一

（汤若望、南怀仁与康熙）

清朝顺治年间，德国宣教士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正，负责制订历法。他与顺治皇帝友情深厚，免礼相交。

宣武门第一座欧式大教堂建成时，顺治亲赐匾额：通玄佳境。

丁神父：顺治皇帝很年轻的时候生很严重的病（天花）。他在临死的时候请汤若望过来，请教他应该请哪一位做下一个皇帝。汤若望知道，皇帝要作久一点，要选择一个人已经有免疫力的人。这个皇帝就是康熙皇帝。

顺治死后，大臣杨光先率先以阴谋惑众罪名诽谤宣教士，扬言非我族类，其心必殊；宁可使中国没有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当时康熙才八岁，辅政的鳌拜听信谗言，逮捕了汤若望、南怀仁等宣教士。次年，汤若望被定凌迟死罪，其他宣教士杖刑流放。

汤若望被抓入狱时，已是古稀老人，在狱中很快中风，不能说话。拷打审问时，由助手南怀仁代为作答。

据清史记载，1665年4月13日，天空出现彗星。16日上午11时，汤若望的死刑判决书送到康熙和孝庄太皇太后手中，突然发生地震，故宫摇撼不已，京城天昏地暗。辅政大臣们惊恐万分，太皇太后当即传谕：立刻无罪释放汤若望等人。

汤若望75岁去世，葬于利玛窦身旁。他们的尸骨长眠在北京，他

们的名字写进了《明史》和《清史》，他们的生命属于他们所挚爱的中国。

满神父：你知道不知道？我们耶稣会派到亚洲那边去传教的人当中，五年以后，只有他们这些传教士的三分之一还在。我们耶稣会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派六个人去，我们就知道，在五年以后，只有两个人还在，其他四个人已经去世了。

聪慧通达的康熙15岁亲临朝政，召来反基督教大臣杨光先与宣教士南怀仁，一同到观象台推测日影和星象，结果南怀仁逐款皆符，杨光先逐款不合。康熙立即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正，追祭汤若望，放逐杨光先，逮捕鳌拜。

从此康熙以南怀仁为密友，要他不离左右。据南怀仁在《鞑靼旅行记》一书中回忆，康熙心情不好时，只要一看见南老爷，立即就会好起来。

1692年3月22日，康熙发布敕令，列数宣教士对中国的贡献，准许自由传教。

康熙还亲临宣武门教堂，题写了“敬天”和“万有真原”两副匾额。又作诗称颂耶稣：

功求十字血成溪，
百丈恩流分自西。
天门久为初人闭，
福路全是圣子通。
我愿接受神圣子，
儿子名份得永生。

满神父：皇帝写的。当他写“天”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用“天”这个字的定义是什么，因为也有很多其他的记载说明，当他写“天”，不是随便写的。所以可以说，他这样的一个对“天”的观念，比较接近我们所说的创造万有的唯一的真神。他们不用我们天主教现在的中文行话，可是他们那个时候，也有他们自己那个时代的行话。所以用他们的行话，看看他们自己怎么样去解释。他解释以后说OK，这个

你就可以放在那边使用。

“万有真原”，你就去分析这四个字嘛，没有异端嘛。任何一个基督徒，除非你要在鸡蛋里挑骨头，那么你就可以找到骨头。

当时，宣教士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数十种，帮助中国制造火炮数百门。

康熙每日请南怀仁、徐日昇、闵明我三位宣教士入宫授课两三个小时，内容涉及天文、地理、音乐、绘画、解剖、医药等，即使出京城去行宫也不中断。

康熙还在宣教士徐日昇、张诚协助下，与俄国彼得大帝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并以上帝的名义盟誓恪守。

南怀仁死后20多年，天主教与清朝的蜜月结束，从此不仅天主教遭受厄运，清朝的国运也急转直下。

第八章

清初的天主教之二

（礼仪之争）

自1645年始，罗马教廷以捍卫纯正信仰为由，一次比一次严厉地申明：God不能译为上帝，要用拉丁文徒斯（Deus）。教堂不许悬挂“敬天”一类匾额。信徒不能敬孔祭祖。不能称许中国古经。等等。

康熙表态：上帝就是真神。天不是物质的天。敬孔祭祖也不是宗教，而是敬心与孝心的表达，与基督教并不冲突。

满神父：刚刚来中国的时候，你懂中国懂得多少！说不定你还不会讲普通话呢。你就来说，这也不可以，那也不可以。你在那边又上香，那个意思是说，他就拜一个偶像。你已有领洗，为什么要去拜祖先。就是在传教士当中，有的人说，你们不是好的传教士，你们是魔鬼的走狗。你们给他们领洗，可是你们教的都不对，你们是搞异端的。我们在欧洲，比方说，我们跪在坟墓那边送花。是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已

经理在那边的那个人，他有鼻子还可以呼吸这个花朵的馨香吗？

教皇派34岁的主教铎罗来华，以开除教籍威胁中国信徒，被康熙逐出国门。

教皇又派主教嘉乐来华。康熙十三次接见他，直到索阅了教皇毫无妥协余地的强硬通谕后，硃批如下：

只说得西洋尔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那神父：导致这个悲剧都是天主教来的。这个跟中国没有关系。最支持天主教的是康熙。你看，到了最后是不得已。也说，你们不要按照教宗要你们做的，如果你们是要像教宗的话，你滚，不准留在这里，我不准你们留在这里。

那福增，香港崇基神学院院长：我觉得，当时康熙和基督教的关系是欣赏。但是，是不是真的去到一种很深的、他是一个基督徒这个角度，我想还是有一段距离。他最关心的还是，他可以去接受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宗教。但是，他还是把它放在中国一直以来的传统。就是这些东西，都不要挑战中国的王权的权威跟社会一般的礼教。这是一个秩序的维持。你能顺服的，你能跟他融合的，那你信什么都没关系。但是如果你要挑战他，这就会动摇了整个统治的根基。所以我想，礼仪之争其实是，你可以说，他们把一种默契、一种共识打破了。

1724年，康熙禁教4年后，雍正发布通谕，令中国信徒一律退教，否则处以极刑；限各省宣教士半年内离境。

当时全国30万信徒陷入危难，300座教堂被没收，50多位宣教士躲的躲，逃的逃。

丁神父：那么到底这是谁的错？是教廷那边太傲慢，或是皇帝太固执；是人的错，或是上帝的旨意？这个可能每一个人都要做自己的一个判断。不过，最近我们的教宗梵蒂冈觉得，梵蒂冈的责任很大。在这一方面，教廷的责任非常大。太硬，太不了解中国文化。

在当时国情下，中国信徒如果按照教廷，就不能参加宗族祭祀和科举考试，成为不孝之子和不良公民；如果按照康熙，信徒依旧祭祖，也的确不合乎基督教的体统。

那时候，做一个好中国人与做一个好基督徒，两者似乎水火不容。

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做了最好的选择。特别是后来，当中国经过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一次次冲刷，今天做一个好中国人，已经不必违背基督信仰，反而需要基督信仰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感叹说：上帝的选择总是最好的！

从唐朝的景教，元朝的也里可温教，到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一次次的叩门、开门和关门，一次次的撒种、发芽和拔出，一次次的遥望、希望和失望，都不是徒然的，都带着上帝的美意。

在他们对中国的舍己献身中，我们看见上帝对中国人无条件的爱。

在他们对中国的前赴后继中，我们看见上帝对中国人的不离不弃。

在他们一次又一次成与败的艰难尝试中，我们看见上帝在精心开辟一条最适合中国人的福音之路。

1807年，中国禁教一百年后，马礼逊、戴德生等一大批基督教宣教士，用血和泪将福音的种子植入中国最底层。这一次中国的灵魂之门被打开后，就再也关不上了。

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约翰福音 12：24

第二集 落地

第一章

拓荒期

从马礼逊来华到鸦片战争（1807—1840）

1724年，雍正一纸诏书，赶走宣教士，关上大门，过起与世隔绝的“太平盛世”。

不久，西方工业革命爆发。纺织机、蒸汽机、飞行器、电力、电讯、铁路，短短几十年，人类文明跨入了一个崭新的纪元。

中国，怡然自得于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充斥着迷信、裹足、鸦片、纳妾、弃婴、科举等沉疴痼疾。

面对这样一块蒙昧、巨大而遥远的处女地，西方一些人觉得神秘，一些人显出轻蔑，一些人发现了商机。而基督徒看见的，是四亿灵魂的饥渴，是上帝爱的召唤。

1799年，在英国方兴未艾的宣教热潮中，马礼逊心里萌生了海外宣教的渴望。

八年后，1807年，英国泰恩河畔这个鞋匠的儿子，受伦敦传教会差遣，成为第一位基督教来华宣教士。

Christopher Hancock，牛津大学教授，马礼逊传记作者：正当马礼逊开始思考人生意义的时候，他受到了新思潮的影响。英国的基督教开始觉醒，带来了一个强烈的宣教热潮，那时交通发展了，航海变得容易，铁路运输也已开始，马礼逊恰巧生活在这么一个文化、知识和机遇交织的时代。那是英国社会的一个转折点，正如我们今天在世界一些地方看到的，马礼逊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时代。

年仅25岁的马礼逊，含泪离开伦敦，他写道：我孤单一人，孤身去中国，但我并不孤独，我的神与我同行。

林治平，宇宙光创办人，台湾中原大学教授：他是第一个嘛，他就是觉得上帝呼召他。他自己心里也很忐忑不安。所以，当他上了船以后，那个船上的人就嘲笑他说，“嘿，小伙子，你以为凭着你就能够改变古老的、传统的、迷信的中国来归信基督耶稣吗？那么，马礼逊被他一问楞住了，小声地回答说：“我不能。但是，我相信上帝能。”

9月的广州天气炎热，但马礼逊的生存环境一片冰霜。

清朝已闭关50年，禁教100年。虽然广州是唯一的通商口岸，但外国人的活动范围只限于珠江北岸的一小片地方，叫作十三行。

马礼逊的第一道难关是学中文。当时的中国，洋人学中文是犯法。中国人教洋人中文，则以汉奸罪论处。

马礼逊出高价聘来一位不要命的中文老师。这位老师随身带着毒药，一旦被发现，就服毒自杀，以免遭酷刑。为了保护他，马礼逊每天晚上上课。

在广州生活和学习花费很高。马礼逊住在一间仓库，节衣缩食，一日两餐，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

他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孤独中，一年寄出200封信，只收到两封回信。他说：我身边没有一个可以视为朋友的人。

上帝是他唯一的依靠。他在日记中鼓励自己：我的灵魂啊，你要靠着上帝刚强起来。不要怕，只要信！

刚强的信心产生顽强的毅力，两年后，马礼逊已经可以熟读《四书》，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广东话。

为了在中国合法居留，他应聘担任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员，同时编纂《华英字典》，业余时间翻译《圣经》。

林治平：马礼逊在早期会有一些人误解他，因为他是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官。而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从事经济贸易，到后来东印度公司卖鸦片，到十九世纪后卖鸦片卖得很严重。所以他们说，你看这个基督教的第一个宣教士，就是在中国从事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卖鸦片给中国的，这个很可恶的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官。这个证据确凿。但是，在当时，满清政府对外国人是关闭的。除了你来做生意，换句话说，除了你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你就没办法进到中国本土。

马礼逊痛恨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他说，这无论对英国的国旗，还是对基督教国家的国格，都是奇耻大辱！

当时的马礼逊，里面孤独，外面艰难，交织在一起，几乎令这位只身闯入中国的拓荒者垮掉。

1813年出现转机，马礼逊与玛丽在澳门结婚。与此同时，英国宣教士米怜夫妇，前来协助他。

1814年，马礼逊来华7年后，才在僵硬的大地上培育出第一株嫩芽。7月16日，秘密帮他印刷圣经的工人蔡高，在澳门接受洗礼，成为中国第一名基督徒。

不久，蔡高的兄弟蔡兴和蔡三也相继受洗。

1818年，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建立英华书院，开创了对华教育的先河。

1819年11月25日，马礼逊和米怜写信报告伦敦传教会，新旧约圣经全部翻译完成。

马礼逊翻译圣经用了12年零3个月。他说，古时神的仆人在黑暗的监牢里，给后人带来光明；但愿我孤苦的辛劳，将来能祝福亿万中国人。一想到这里，心中就快乐了。

Christopher Hancock：1820年，广东发生了一场大火。他看到中国邻居们完全不顾周围的人，心里很惊讶。这件事引导他开始思考，怎样将爱带给中国人，怎样通过实际的爱，让中国人理解基督教信仰。他心

中有了一个清楚的信念，就是福音需要活出来，而不仅仅是说出来。

1820年，马礼逊与李文斯顿医生一起开办中国第一家西式诊所，服务贫穷的中国人。诊所后来发展成博济医院。

1821年，马礼逊教堂在澳门建立。这座中国最早的基督教教堂，至今完好的座落在澳门的马礼逊墓园里。

Christopher Hancock：他讲了许多道，非常精彩。在他的讲道里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神爱世人，不仅仅是爱教会。神不偏待人，他超越文化语言肤色等等的不同。神爱世界，神爱世人。这是马礼逊宣讲的伟大信息之一。他说，我们到中国来，不应该试图改变中国文化。不是来说，我们比中国好。我们是来爱中国的。

1823年，马礼逊编完《华英字典》即《五车韵府》。这是中国第一部中英大字典，共4595页。它的出版，对西方的汉学研究，意义重大。

同一年，马礼逊按立了中国第一位本土牧师梁发。梁发是在马六甲跟随米怜夫妇信耶稣的。此后他传道40年，被囚受刑，忠心不移。第一本由中国人撰写的福音小册子《劝世良言》，作者就是梁发。

马礼逊给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开创了许多第一。然而在每一捧小小的收获背后，都隐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付出。

1819年，中文圣经译完前半年，米怜的妻子丽切尔在接连失去两个孩子后，自己也害热病去世。

两年后，马礼逊的妻子玛丽感染霍乱去世，去世时，年仅29岁的玛丽腹中正怀着孩子。

马礼逊悲痛欲绝，他写道：我绝不对自己说“莫伤心！”不，绝不！我要为玛丽伤心！我要痛哭！因为她值得我如此！

马礼逊将一双年幼的儿女托付给朋友，独自一人住在广州。

Christopher Hancock：我读到马礼逊的一些未发表的信件，写给他孩子的小纸片，末尾亲昵地署名爹爹、爸爸。你顿时发现，这个在世界上无比刚强、坚定、干练、专注的男人，原来有如此温柔的一面。

不到两年，马礼逊唯一的同伴米怜，积劳成疾，突然去世，年仅37岁。

马礼逊写道：9年前，我和妻子欢迎米怜夫妇的到来。如今我们四人中，有三人不到40岁就离世了，留下我一人在这里。然而当我想到，他们都是在福音岗位上、在应许和盼望中离世的，我就深感欣慰。我在这里虽然举目无亲，但我仍要感谢神。

那时，应马礼逊的请求，许多教会为他祷告，求神恩待他，恩待中国人，延长他这个当时世界上唯一精通中文的宣教士的寿命。

米怜离世后，马礼逊继续在华宣教11年。1834年7月30日，长期被头痛折磨的马礼逊，病倒在广州，8月1日晚逝世，享年五十二岁。

马礼逊的遗体由长子马儒翰护送至澳门，安葬在妻子玛丽身旁。

马礼逊在华27年，是中国基督教最艰难的开拓期。27年间，只有10个中国人受洗。

马礼逊离世一年后，1835年，长子马儒翰与裨治文牧师一起写信通报，第一间华人基督教会在广州建立，共有成员12人：

梁发，48岁，牧师。

屈昂，50岁，牧师助理。

黎氏，31岁，梁发妻。

梁进德，15岁，梁发子。

梁亚沾，11岁，梁发女。

梁亚新，梁发助手。

李新，31岁，砖匠。

周亚生，25岁，制笔匠。

吴亚清，31岁，印刷助手。

梁亚道，28岁，制笔匠。

刘庶泉，38岁，秀才。

赵清，秀才。

第二章

撒种期

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1840—1900）

马礼逊死后6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无情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1842年8月29日，中国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口岸。此后，又与美国和法国等国签订《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等。

所有条约中都有一条：允许西方宣教士进入中国通商口岸。在此前后进入中国的有：

麦都思，第一个到上海的宣教士，创办了第一份活版铅字杂志《各国消息》。

台约尔，戴德生的岳父，研制出当时最好的三千个金属中文活字。

裨治文，第一位来华的美国宣教士，曾给林则徐当翻译，参与《望厦条约》的签订。1854年前往考察太平天国是否合乎基督教，予以否定。

郭实腊，第一个去过内地的宣教士，杰出学者，中文著作61本，英文、德文、荷兰文、日文著作23本。他参与了《南京条约》的签订。

卫三畏，宣教士、外交官、汉学家，其著作《中国总论》被视为美国汉学研究的开端。参与《天津条约》的签订。

伯驾，第一位来华医疗宣教士。创立广州眼科医局和博济医院。曾任美国驻华大使。

罗孝全，来华向麻疯病人传福音。1847年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请求在他的广州教堂受洗，被他拒绝。

1854年，戴德生来华，将福音从沿海大踏步推向内地。

戴德生17岁决定献身传道，经过4年的医学和体质训练，21岁告别家人，坐船156天来到上海。

他租用一所民宅，兼作诊所、学校和教堂。又与别的宣教士结

伴，十八次在江浙两省旅行，一边行医，一边传道。

戴德生不顾一些西方人的反感，穿中国衣，吃中国饭，还剃头染发，蓄了一条大辫子，毫无顾忌地接近中国人。

林治平：他这样一个举措，对戴德生带来非常大的麻烦。因为当时那些西方的传教士们，他们是英国人。我们知道，英国人讲究绅士风度。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服装，他们的仪表，他们有他们的一套。这样穿才算是一个绅士，那样就不行。所以，当戴德生穿上中国衣服，尤其留上那条小辫子以后，外国人简直受不了。说，你好好的人，怎么留一个猪尾巴在头顶上？简直受不了。所以，戴德生当时跟玛丽亚谈恋爱的時候，他就遭遇到很大的困难。玛丽亚当时的监护人就是艾迪绥。Aldersey是一个很好的宣教士，她也拼命反对。我们说，艾迪绥是一个非常爱中国的一个宣教士啊，她办了学校，特别办女子教育，在中国她的贡献很大很大的。可是，她反对玛丽亚跟戴德生在一起交往。她觉得，主要的理由是，从她的角度来看，戴德生数典忘祖，忘了我们英国人的尊严，忘了我们英国人的骄傲，忘记了我们英国人的那些东西。戴德生规定，内地会的宣教士一律都要穿中国衣服，都要留辫子。为了这个缘故，有些人退出了内地会。

戴德生说：我们不是要消除中国人的民族观念，而是希望他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盼望看到他们既是真正的基督徒，也是道地的中国人。

当时正闹太平天国和小刀会，战乱四起，瘟疫流行。1858年，戴德生失去第一个孩子，妻子玛丽亚的姐姐、同工帕克的妻子也因病去世。

从马礼逊到戴德生，200多位来华宣教士中，有40位宣教士和51位妻子病死。进入内地的宣教士，平均存活只有7年。

1860年，戴德生在宁波的教会已有21人，但他身患重病，极度虚弱，不得不返回英国接受治疗。

Tony Lambert，前英国驻华外交官、内地会史学家：我们必须承认，戴德生有非常艰难的时刻。据我所知，他一度接近精神崩溃的边缘。他好几次身体很糟糕。妻子去世，那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带

来的同工纷纷死于疾病和环境。他经历的痛苦很深，但是在所有痛苦中，他知道主与他同在。所以我认为，他的信仰非常深，非常真。

在英国，他常常看着中国地图，为他服侍过的地方祷告，也为福音还没传入的内地十一个省份祷告。

1865年的一天，戴德生在布莱顿参加一场千人聚会，他眼前是一张张英国人喜乐的脸庞，心中却是一张张中国人饥渴的面孔。他默默向神祷告：主啊，请差派24名宣教士到中国内地，11个省加上蒙古，每地2人。

第二天，戴德生在伦敦以中国内地会名称，建立了一个银行账户，存入十英镑。他说，这不仅是十英镑，这是十英镑加神的全部应许。

1866年9月，戴德生一家和内地会首批16名宣教士抵达中国，在杭州新街弄一号设立了中国内地会总部。

第二年，戴德生按立一名中国牧师王来君，来照管杭州教会。自己则带领宣教士们，向内地十一个省进发。

此后二十年，内地会来华宣教士137人，建立45间教会，141个布道所，为1764人施洗。

与此同时，西方教会各宗派，纷纷派人来华。到1894年，来华宣教士已经达到1324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885年，剑桥大学7名学生一起来华，称作剑桥七杰。他们深入山西、四川、甘肃、西藏等地，办教育、传福音，将青春献给了中国。他们是：

施达德，著名板球手。

司米德，圣三一学院划船队长。

何斯德，皇家军事学院将军之子。

章必成，男爵之子、划船选手。

盖士立，圣公会牧师。

杜明德，上校之子。

杜西德，杜明德兄弟。

到20世纪初叶，宣教士的脚步已经踏遍中国的每一个省份。所到

之处，不仅带来福音，也带来了音乐、文化、教育、医疗、慈善等等。

宣教士们虽然是带着爱来中国，但毕竟是借助强权、乘着硝烟、在民族冲突中进来的。猜疑、敌视和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令中国人渐渐将怒火转向宣教士，各地反教活动频频发生，史称教案。

自鸦片战争后，全国各地发生大小教案400多起，直到爆发震惊世界的义和团运动。

1900年夏天，以扶清灭洋为口号，从山东、山西到湖南、浙江，义和团一个月内杀害了241名西方宣教士和两万多名中国基督徒。

北京近万家住宅被焚烧。日本和德国驻北京大使被刺杀。5月24日，慈禧下令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发动总攻击。25日，慈禧向所有邦交国宣战。

接下来，日、英、美、法、俄、德、奥、意八国联军6万人，攻陷天津，闯入北京。清廷被迫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

在那个残酷的时刻，西方宣教士与他们的政府截然不同；他们效忠的，是差派他们来华的耶稣基督。他们没有仇恨，没有反抗，甚至没有抱怨。

在内蒙古殉道的林牧师在遗书中写道：我们手中有武器，但我们不能使用它们。若是神的旨意，我们就甘心殉道。

来自耶鲁大学的毕得经牧师在河北保定殉道，遇害前给妻子留下一封信，埋在教堂地下，上面写着：亲爱的，你要告诉我们的儿子小何理，他父亲最后的遗愿是，当他25岁时，要以宣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来！

28岁的艾瑞延女士遇难前写给家人的信中说：我全心全意热爱中国人，只想留在他们当中。我把一切交给主，欣然对主说：愿你的旨意成全！

庚子教难中，来自美国欧柏林大学的13名宣教士和5个孩子在山西遇难，其中一位艾德华师母在遗嘱中说：亲爱的，我相信你们不会忘记躺在中国土地上的我们。我一点也不后悔来中国，只是遗憾为她做的事太少了。

义和团事件中，内地会58名宣教士和21个孩子遇害。当时正在瑞士养病的戴德生心如刀割，无法承受。他说：我不能看书，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不能祷告；我只剩下信靠。

根据《辛丑条约》，清政府给予各国宣教士以巨额赔偿。戴德生代表内地会声明放弃索赔。

Tony Lambert: 根据和慈禧太后签订的条约，许多国家向中国索赔。戴德生却说，不。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基督。我们知道有风险，我们来中国前，就预料到这个危险，我们决不向中国要一分钱。所以义和团事件后，内地会没有接受任何赔款。我认为，这是上帝喜悦的。因为，这就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基督的福音之间，清楚地划了一道界限。否则，两者就混淆了。

这一声明震撼了世界，激起了更壮烈的宣教浪潮。义和团事件7年后，在华宣教士增加到3833人。

1905年，戴德生在长沙逝世。他21岁入华，服侍了中国56年。他和妻子，四个孩子，长眠在这块他们深爱的土地上。他的一代又一代后人，用生命的长链，兑现着他的一个承诺：

我若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

林治平：戴德生的传记在人民日报出版。那本书叫做《带着爱来中国》。我觉得那个书名写得非常的好。带着爱，爱是什么？爱生命，爱每一个不同的人。

第三章

扎根期

义和团以后（1900—）

显然，只要基督教在中国人眼中还是洋教，就无法在中国扎根。戴德生早就说过，宣教士是手脚架，房子建好就得拆掉。

梁家麟，香港建道神学院院长：中国人常常讲“洋教、洋教”。

“洋教”这个字，已经代表着他们是抗拒基督教作为一个西方来的宗教。但它不单单是来源的问题，是它的外观，它的内容，都是西方的。而这个是构成一个很大的文化的拦阻，让他们不能跨过去。所以我想，宣教士也在思考怎么样去本土化。包括比如说，怎么样有效地把福音用中国人能明白的方法传开。他们最终还是希望福音能在中国扎根，希望能栽培本土的信徒，本土的传道人的。

1919年，在宣教士狄考文和富善带领下，经过28年翻译，至今通行的和合本圣经问世。圣经66卷书，囊括各种文体，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锋。

1907年，马礼逊来华100年时，西方各宗派在上海召开第三届宣教士大会，取得一个共识，就是中国必须建立自治、自传、自养的本土教会，外国人应逐渐淡出中国教会事务。

宣教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只有当种子死去，地上才能结出百倍的子粒来。

历史绝非巧合。正是在1900年宣教士殉道的血泊中，诞生了几个婴孩，后来成为中国本土教会的领袖。他们有：王明道、杨绍唐、宋尚节、计志文、倪柝声等。

义和团之后，还有神学家贾玉铭、布道家王载、灵粮堂赵世光、耶稣家庭敬奠瀛、中华归主赵君影等一大批本土传道人成长起来。

中国调子加中文歌词的圣诗也流传开来。

林治平：我曾经收集到早期的家庭教会，在河南的家庭教会，他们唱的一首叫做《想念灵同胞》。那个词就很怪，“想念灵同胞，眼泪往下掉，你今天早上起来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祷告。”想念灵同胞，眼泪往下掉……我怎么听也不像圣歌。我后来发现，哦，原来是我被圣歌符号化了，symbolized。所以我以为，圣歌一定要“圣哉、圣哉、圣哉”才是圣歌。但是，当我忽然间转过来，我说，噢，这是中国乡村农家在唱的，把他们心里的那个苦难，弟兄姐妹隔离的那种不能彼此问安的感觉唱出来。难怪他们一边唱一边哭。当我撇弃掉我过去几十年的基督徒的经验，我进到他们里面去，我就忽然发现，哇，那是另外一种感觉。我自己唱我也会哭。就是你进到里面去了。

本土化的语言，本土化的体悟，本土化的情感，有如长江黄河，涌流神州，形成一派本土气候。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1200名西方宣教士被日军关进潍坊集中营。1945年日本投降，只剩下600名。1952年后，全部撤离中国。

林治平：上帝是掌管一切的。所有的历史，都是His story。都是他的历史，都是上帝的历史。所以有些东西，在某一个阶段发生，我们用我们的理智去想想不通，因为我们是很有有限的。上帝是超越我们的理智的。这些东西要等到回头去看，过了若干年以后回头去看，才恍然大悟：原来有这个道理在。把宣教士赶逐出去，我们也不要从完全负面的角度去看，因为这个缘故，就逼迫着中国教会也必须思考到本土化的问题。

种子已经死去，果实已经累累。上帝让他们走了，留下的是他们生命的凯旋，是他们爱心的烂漫。

中国的基督徒奇迹般地增长着。1834年马礼逊去世时，只有10人。1906年马礼逊来华100年时，有17万人。今天，马礼逊来华200年后，中国基督徒已有几千万！

今天，基督教在中国，再也不会像唐朝如影掠过，不会像明清如风吹过，因为它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信仰。

当我们满怀信心迎接未来的时候，决不能忘记过去宣教士们洒下的热血。在他们的热血里，滚动着上帝对中国人永远的爱。

来华宣教拓荒者名单：

广州

1807年，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1830年，裨治文 Elijah C. Bridgman

上海

1831年，郭实腊 Karl F.A. Gutzlaff

1843年，麦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福建

1841年，雅裨理 David Abeel

1842年，文惠廉 William J. Boone

香港

1842年，罗孝全 Issachar J. Roberts

1843年，理雅各 James Legge

浙江

1843年，玛高温 Daniel J. MacGowan

1857年，戴德生 James H. Taylor

江苏

1845年，文惠廉 William J. Boone

1867年，童跟福 George Duncan

北京

1861年，雒魏林 William Lockhart

1863年，丁韪良 William A. P. Martin

山东

1861年，倪维思 John L. Nevius

1862年，梅理士 Charles R. Mills

湖北

1861年，杨格非 Griffith John

1865年，李修善 David Hill

湖南

1863年，郭修礼 Josiah Cox

1875年，都天德 Adam C. Dorward

台湾

1865年，马雅各 James I. Maxwell

1871年，马偕 George L. Mackay

吉林

1866年，韦廉臣 Alexander Williamson

1908年，古约翰 Jonathan Goforth

辽宁

1867年，宾惠廉 William C. Burns

1882年，司督阁 Dugald C. hristie

四川

1867年，维吉尔·哈特 Virgil Hart

1868年，伟烈·亚力 Alexander Wylie

黑龙江

1868年，韦廉臣 Alexandra Williamson

1923年，盖群英 Alice Cable

冯贵珠 Evangeline French

冯宝珠 Francesca French

河北

1869年，谢卫楼 Devello Z. Sheffield

安徽

1869年，密道生 James J. Meadows

内蒙古

1870年，景雅各 James Gilmour

天津

1872年，明恩溥 Arthur H. Smith

河南

1875年，戴亨利 Henry Taylor

1934年，艾得理 David H. Adeney

山西

1876年，秀耀春 Francis James

1876年，德治安 Joshua J. Turner

陕西

1876年，鲍康宁 Frederick W. Baller

1876年，金铺仁 George King

西藏

1876年，康慕伦 James Cameron

甘肃

1877年，义世敦 George F. Easton

1877年，巴格道 George Parker

广西

1877年，爱德华 Edward Fishe

云南

1877年，麦卡悌 John McCarthy

1887年，柏格理 Samuel Pollard

1908年，富能仁 James O. Fraser

贵州

1877年，祝杨名 Charles H. Judd

1877年，巴子成 James F. Broumton

江西

1881年，库思非 Carl F. Kupfer

新疆

1906年，胡进洁 George W. Hunter

宁夏

1917年，兹威默 Samuel M. Zwemer

1936年，毕敬士 Claude L. Pickens

青海

1915年，胡立礼 Harry F. Ridley

1921年，柏立美 Victor G. Plymire

第二集主题插曲
迦南诗歌第868首

《大海啊能否告诉我》

小敏词曲

大海啊大海，
能否告诉我，
有多少宣教士来到中国？
不同的语言肤色，
却深深爱着中国。
在误会中度过，
将生命献给中国。
他们为了什么？
他们为了什么？
每一座高山、每一条小路也这样问过。
他们是一粒粒麦子，
埋在了苦难的中国，
中国才有今日的收成，
漫山遍野的硕果。
弟兄啊同胞啊，
我们要永远记得，
他们是上帝的使者，
带着爱来到中国。
高举燃烧的圣火，
走遍每一个角落。
蓝蓝的大海边，
是谁唤醒了中国？

你们是世界的光。马太福音 5:14

第三集 光照

序言

1881年，创办中国第一所大学前身、山东登州文会馆的美国宣教士狄考文，在校园里点亮了中国第一支电灯。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前景无比美好。我很庆幸有机会为她迈向辉煌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狄考文1906年11月27日给詹姆斯·穆尼的信。

当太阳升起来，它照亮的不仅仅是教堂。上帝的使者给中国带来的，是世界的光。

利玛窦来华，不仅带来了天主教教义，也带来了科学与文化。马礼逊来华，不仅翻译了第一本圣经，建立了第一间教会，也创办了第一所学校，第一家医院，编纂了第一本《华英字典》，印刷了第一本中文期刊。

第一所孤儿院，第一所聋哑学校，第一套盲文，第一个戒毒所，第一份报纸，第一个实验室，第一所女校，第一支球队，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中国许多第一都与宣教士有关。连第一个发现大熊猫的阿尔曼·大卫，也是一名法国宣教士。

毫不夸张地说，在近代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人们都可以发现宣教士尘封的脚印。

第一章 创办现代教育

今天，中国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等院校达2000多所。每年出国留学学生40万，名列世界第一。

然而谁能想到，据李提摩太统计，100多年前，在4亿多人口的大清帝国，有高等阅读能力的只有4万人，不到万分之一。

最早的一间华人学校，是1817年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的，名为英华书院，开始只有3名学生。

十年后，第一位中国牧师梁发和他的同乡古天青一起，创办了内地第一所学校。

又过了十年，德国宣教士郭实腊夫人和美国耶鲁大学的包留云，在澳门建立第一所西式学堂，马礼逊学堂。一开始只有6名学生，其中包括第一批赴美留学的容闳、黄宽、黄胜。

林治平，宇宙光创办人，台湾中原大学教授：包留云，教书一段时间后，他身体也是受不了了，他就要回美国。他就问他的学生说，你们谁愿意跟我到美国去读书的？那个时期没有什么人愿意到美国来，拜夷人为师这是数典忘祖的事。但是，当时有三个人，黄胜、黄宽是兄弟俩，再加上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容闳。容闳就跟他一起来到这边，进到耶鲁大学。黄宽后来就到爱丁堡大学，读到医学的学位，后来成为中国的第一个西医。

然后容闳回到国内以后，他就开始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带领幼童出国。他觉得，要从小给他们接触西方，让他们了解西方。这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个扎根的工作。

这里面又出来了一些重要的人物。譬如说，我们说工程师之父詹天佑，就是他当时带出去的学生。民国时期的国务总理唐绍仪，也是他带出去的学生。清末民初，从事现代化建设很多重要的人物，都是他带出去的学生。这个当然也影响到以后的学习西方的潮流，民国以后的很多留学潮，一直到今天。

1842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宣教士在中国建立了学校共50所。鸦片战争后，随着《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到1877年，教会学校达347所。

这一年，西方宣教士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决定成立教科书委员会，编写统一教材。此后，在宣教士林乐知、傅兰雅、狄考文、丁韪良、韦廉臣、黎力基等带领下，编写教材59种，出版约三万册。

中国的高等教育比西方晚了几个世纪。使中国的高等教育与世界接轨的，也是西方宣教士。

宣教士狄考文于1864年在山东创办登州蒙养学堂，招收了6名家境贫寒的学生，为他们提供衣食和文具。1876年改名文会馆，后来演变成中国第一所大学。

另一位美国宣教士郭显德，在烟台创办了40多所学校，并建立医院和博物馆，先后受到清朝光绪皇帝和民国袁世凯总统的嘉奖。

英国宣教士傅兰雅，1866年建立中国第一个科学班，1874创办第一所理工学校“格致书院”，1875年出版第一份科学杂志《格致汇编》，并翻译了一百多种科学书籍。

在中国南方，最早的大学是由美国宣教士施若瑟于1879年开办的上海圣约翰书院。

宣教士早期在中国创办的大学还有：

1888年，南京汇文书院

1889年，北京潞河书院

1897年，杭州长老会学院

每一所大学开始时都非常艰难。汇文书院初创时，只有三个男生入学。作为他们上大学的奖赏，学校每天付给他们一碗米。

不像今天学生申请学校并缴纳学费，那时是学校邀请学生并养活他们。

学校的办学经费，大多来自宣教士家乡教会的募捐，每一块钱都凝结着万里之外的一份爱。

到1900年义和团前夕，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小学、中学和大学，

已达2000所。

义和团惨案给初兴的中国教育带来了灭顶之灾，各地学校惨遭破坏。

英国宣教士李提摩太率先说服本国政府，用清廷赔款创立了山西大学堂。

美国宣教士明恩溥等人，游说美国国会，用赔款创办了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前身。

西方各国纷纷仿效，不仅用部分赔款在中国办学，而且迫使中国政府改革陈腐的科举制度，设立理工科目，开放出国留学。

短短十几年后，据1918年统计，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学校，已从义和团前的2000所，猛增到7382所。

先前，李提摩太曾向李鸿章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每年拨出100万两银子投资教育。李鸿章回答说，政府拿不出这么多钱。李提摩太说，这是“种子钱”，将来会有百倍的回报。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看到回报？李提摩太说，大概需要20年。李鸿章摇头说，啊！我们可等不了那么久。

李鸿章和李提摩太都没想到，义和团事件导致清朝政府大赔款，大赔款用于中国教育的大发展。这等于强迫政府拿出一大笔教育投资来。

圣经说：撒种有时，收割有时；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949年7月4日，在刘少奇写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仅英美两国在中国设立的大学就有31所，图书馆29所，中学324所，小学2364所。

第二章 建立大学体系

宣教士在中国创办的著名大学有：

北京燕京大学，由美国和英国教会于1919年联合创办，首任校长为美国宣教士司徒雷登。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后来文理学院并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校址现在北京大学。

上海圣约翰大学，第一所在美国华盛顿注册的中国大学，包括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农学院、神学院。校训是：光明与真理。后来各院系划入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交大等。校址现在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沪江大学，美国浸信会创办，设立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后来归入华东师范大学。校址在上海理工大学。校训是：信、义、勤、爱。

南京金陵大学，美国美以美教会创办，南京大学前身，校址现在南京大学。

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美国多家教会联合创办，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1919年首届毕业生5人。至1951年归入南京师范大学，共有999名女毕业生，人称中国的999朵玫瑰。

山东齐鲁大学，美国长老会和英国浸信会等联合创办，包括文、理、医、农、天文、生物、经济、教育的大型综合大学，后来归入山东大学和南京大学等，校址现在山东大学。

江苏东吴大学，美国监理教会创办，以法学和生物化学领先，演变成今日江苏大学。1951年在台湾复校，即台湾东吴大学。

杭州之江大学，美国长老教会创办，后来归入杭州大学和浙江大学。校址现在浙江大学。

广州岭南大学，美国长老教会创办，后来归入中山大学，校址现在中山大学。

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美国英国加拿大教会联合创办，中国西部第一所综合大学，后来并入四川大学，校址现在华西医学中心。

武昌华中大学，后来并入华中师范大学，校址现为湖北中医学院。

长沙湘雅医科大学，由耶鲁大学宣教士创办，后来归入湖南医科大学、中南大学。

福建协和大学，由美以美会创办，为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的前身，校训是：博爱、牺牲、服务。

福建华南女子大学，由美以美会创办，为福建师范大学前身之一。

天主教在中国创办的大学有：

天津津沽大学，河北大学的前身，校址现在天津外国语大学。

北京辅仁大学，1951年并入北京各大学，校址现在北京师范大学。1961年在台湾复校。

上海震旦大学，后来并入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等。

第三章

开文化之先河

林治平：很多学者都已经公认，我们要找出中国现代化的媒介人物，叫做 intermediary person。这个媒介人物，当时西方人来媒介今天的现代化，有三种人有可能：一个就是军人，来打仗的，政客，打完仗他们就走了。第二种就是生意人，做完生意赚完钱，他们也走了。只有一种人就是宣教士，一方面他们受了很好的当代的训练，一方面他们深入到中国的基层社会里面，他们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有些宣教士名垂青史。

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蒙昧走向文明，领我们迈出第一步的是上帝的使者。

1815年，英国宣教士米怜在马六甲刊印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1823年，英国宣教士麦都思创办第一份活版铅字中文月刊《各国消息》。

1832年，美国宣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第一份英文期刊《中国丛报》。

1833年，德国宣教士郭实腊在广州创办第一份中文报纸《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1870年，英国宣教士李提摩太来华，创办当时影响巨大的广学会，出版《万国公报》，宣教士林乐知担任主编。

维新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是《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他参加过

该报在1894年举办的征文。康有为说：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宣教士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

另一位维新变法领袖梁启超，曾经担任李提摩太的私人秘书。他有一份推荐给中国人的《西学书目表》，其中基督教广学会出版物二十二种，首选为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和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

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当时交由《万国公报》发表，可见这份报刊的影响之大。

林治平：我想讲一个比较有争论的人物——丁韪良。在宁波宣教十年，他也了解中国的文化。他写了那本很有名的书，叫《天道溯源》，这本书在日本也很通行。

当时1858年跟1860年，所谓英法联军之虞，跟着美国公使在天津条约谈判和北京条约谈判，他就成为美国公使谈判的翻译官。哇，这个罪名可大了。后来我们去查他的资料就发现，在条约谈判过程中，他发现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法。所以他得到一个结论，中国人是在谈判中，接受绝对不应该接受的，拒接绝对应该接受的。

举例而言，譬如说，领事裁判权，这是丧权辱国的大条款，中国人很快就接受了。中国人说，很简单哪，自古以来，华夷分治，夷人管夷人，华人管华人。所以领事裁判权就同意了。丁韪良急得跳脚，没有用。

可是，他觉得中国人最该接受的，比如说，两国互派大使，建立外交关系。这个是太好了嘛，但是，中国政府坚决就是不肯。为什么呢？他说中国人觉得，夷人其貌不扬，入京有碍观瞻，拒绝了。哇，他说这怎么得了！

所以后来他就去学，专攻国际法，取得国际法的博士学位。他就开始翻译国际法给中国。他觉得中国如果不懂得国际法，中国跟外国人交往一定会吃很大的亏。中国国际法的开端就是丁韪良。因为第一本国际法的书《万国公法》就是丁韪良写出来的。

他觉得中国需要办好的教育，让中国人能够懂得外国的语文，可以跟外国人交往，彼此了解。所以后来在条约里面就定下来，要成立同文馆，希望训练中国的语言人才。他也花了很多功夫去请了很多不同的

老师，包括科技的、化学的、医学的都请来了。但是结果招生没有人来考。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科举考试不会考这些东西。

丁甦良觉得，要救中国，就要改革中国的考试制度，所以他就开始反对科举考试。后来梁启超、康有为他们就跟他很接近，所以后来在变法运动中，就把科举考试取消了。这是中国不得了的一件大事，其实丁甦良在背后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第四章

让世界了解中国

宣教士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也让中国影响了世界。

早在19世纪初，马礼逊就在英国建立了第一个中文班。

苏格兰宣教士理雅各，是第一个系统研究中国古经的人。从1861年到1886年，他用了25年时间，将四书五经等28卷中文经典译成英文。

林治平：这个人的功力就吓人了。他把中国的十三经全部翻译成英文，我们现在连十三部经是哪十三部我们都说不出来。他可以把十三部经都翻译出来，加上注释。我看过他那本书。上面小小的一段，譬如说，孟子见梁惠王，他就翻译。然后下面很多页，全部都是历代的注解。哇！这个功力深到不可思议嘛。后来他退休以后，就回到牛津大学，在牛津大学创办牛津大学中文系，成为最早的伟大的汉学家。

他们这一系列，苏惠廉作过理雅各的学生。然后，苏惠廉后来退休了，也去那边教书，教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当代最有名的学者，就是哈佛大学的费正清，Fairbank。这是一脉相传哪。所以汉学，我们说今天整个欧美的汉学，其实传教士是最重要的。

生长在中国农村的宣教士之女赛珍珠，写出《大地》三步曲，生动地描绘了中国的风土人情，因此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

第五章

倡导禁烟戒毒

19世纪，吸食鸦片就像癌细胞一样在中国扩散着。

西方宣教士一致谴责鸦片贸易。首位医疗宣教士伯驾于1840年写信给林则徐，称之为令人担忧的罪恶。

美国宣教士丁韪良1856年出版专著，剖析鸦片的道德和法律问题。

汉学家理雅各警告英国政府：停止作恶，学习行善！

戴德生说：鸦片贸易一个星期对中国人所干的坏事，抵消了宣教士们一年时间所干的善事而绰绰有余。

1874年，西方宣教士成立“禁止鸦片贸易协会”，要求在华宣教士向本国政府写信，呼吁禁止鸦片贸易。

1895年，杜步西等1000名在华宣教士，联名上书清廷和英美政府，获得美国国会和万国禁烟会的支持。

正是在宣教士的强大影响下，中美《望厦条约》才明确规定鸦片为违禁品。

宣教士一面施压政府禁烟，一面帮助人们戒烟。1871年，宣教士在杭州设立第一家戒烟所，到20世纪初，全国已有一百多所。

英国宣教士李修善，带领山西儒生席子直战胜了烟瘾，席子直改名席胜魔，在山西各地建立“天招局”，帮助无数人成功戒毒，传为历史佳话。

第六章

引进体育精神

150年前，西方列强曾嘲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而西方宣教士送来了体育精神。

1876年，基督教青年会进入中国，引进和推广近代体育项目，包括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网球、棒球、田径、游泳、跳水、体操等等。

1925年，奥运冠军、宣教士李爱锐从英国来到天津，指导创建了当时世界一流的民园体育场，引来不少国际大赛。

1932年，推动中国人第一次进入奥林匹克运动的，正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董事王正廷。

第七章

让妇女得自由

中国妇女缠足的陋习由来已久。1874年，英国宣教士麦嘉温在厦门创立中国第一个反缠足组织，1000多名妇女签名。

1895年，李提摩太师母等在上海发起天足会，借书刊和集会号召中国女人回归天然。

教会学校的师生，读圣经的妇女，没有一个缠足的。

宣教士林乐知大声疾呼：妇女不得自由，中国休想振兴！

胡适感慨说：忽然从西方来了一些宣教士，除传教以外，还带来了一点新风俗，几个新观点，不少新教训，其中最大的一点，是教我们把女人也当人看待。

虽然中国女人受教育的权利1907年才得到清政府的承认，但早在1844年，宣教士艾迪绥就在中国宁波建立了第一所女子学校。

1850年，宣教士裨治文夫人在上海设立裨文女塾，即今日上海九中。这所学校的学生中，有一位罕见的大脚女生名叫倪桂珍，她是明朝基督徒、大学士徐光启的后代。倪桂珍后来生了三个女儿，她们是：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倪桂珍的丈夫，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嘉树，原来是一位牧师。

1905年，宣教士们在北京灯市口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后来又创办了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为中国培养出最早一批女大学生，包括作家冰心等。

宣教士丁韪良在《古老帝国的觉醒和重生》一书中预言：不久，中国人将从母亲的膝盖上开始受教育。这一预言早已由无数中国母亲们实现了。

第八章

兴办慈善事业

在公元第三世纪的一次大迫害中，罗马官员命令圣罗伦斯神父，将教会的珍宝交出来。圣罗伦斯就带来一群赤贫的、残疾的、病痛的人，说：这就是教会的珍宝。罗马士兵将他挂在铁架上烤死。

今天在美国佛州，仍有一间以圣罗伦斯命名的流浪人收容所。

耶稣曾说过：这些事你们既做在一个最卑微的人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中国第一间育婴堂，1840年由巴陵会在香港开办。到1914年，教会办的孤儿院37所，收养孤儿约2500人。

中国第一间盲人院，1874年由宣教士莫莱士于北京建立，并设计出一套普通话盲文。

中国第一间聋哑人学校，1898年由梅耐德在烟台建立，到1936年抗战以前，全国建立了十几所。

中国第一所疯人院，1898年由嘉约翰医师在广州建立，名为惠爱医院。

中国第一间麻风病院，1892年由梅藤更在杭州建立，名为广济麻风院。1940年全国51家麻风院，其中40家与教会有关。

李提摩太对中国慈善事业影响巨大。他先后建立了5个收容100名儿童的孤儿院，并将他们训练成技术娴熟的工人。

1877年大饥荒，李提摩太在山东救助了7万灾民，建立了7所灾民子女学校。

李提摩太说：真实的爱心要比空洞的教义更伟大。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期间，金陵大学的美国宣教士魏特琳将大学变成避难所，保护了上万名中国妇孺。另一位美国宣教士贝德士发起组织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救助了20多万难民。

第九章

发展医疗事业

李提摩太曾经问一位中国绅士对圣经《新约》的看法，绅士想了一下说：也许其中最美妙之处就是，人的身体可以成为圣灵的殿宇。

从耶稣开始，出于同一份爱，拯救灵魂与医治身体一直并肩而行。

最早于1565年，天主教卡内罗主教已在澳门建立一座医院，不分教会内外，有病者一样诊治。

马礼逊来华后，于1820年邀请李文斯顿医生在澳门开设诊所。

1835年，美国宣教士伯驾医生，在广州新豆栏开办了眼科医局，设有接待室、诊断室、配药室、手术室、观察室，能容纳200人候诊。1842年发展成一所综合医院，即博济医院。孙中山就是这家医院的实习生。

1838年，英国宣教士雒魏林，建立上海第一家西式医院，即仁济医院前身，一律免费诊治。他回忆说，每一天大街上都挤满了病人们。

有一位女宣教士名叫道济，被美国长老会派到北京。当时中国女人饱受生产之苦。孩子生下来，接生婆从炕席上抽根席篾将脐带割断，撒上一把土灰止血。很多孩子出生几天就死去。

看到此情此景，道济大哭一场。她随即返回美国，以8年时间在各教会募集资金，1885年回到北京，在安定门交道口北二条盖了12间平房，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妇产医院道济医院，即北京今日第六医院。

后来，道济又引进妇产科以外的西医各科，在中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医院。

据1920年统计，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医院和诊所共820间。

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著名医院有：

北京协和医院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上海同济医院 Tongji Hospital

成都华西医院 West China Hospital

济南齐鲁医院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上海仁济医院 Renji Hospital
广州博济医院 Canton Pok Tsai Hospital
上海同仁医院 Tongren Hospital
上海广慈医院 Guangci Hospital (现瑞金医院)
上海普仁医院 Pu Ren Hospital
青州广德医院 Tsingchow Guangde Hospital
苏州博习医院 Soochow Hospital
长沙雅礼医院 Yali Hospital
杭州广济医院 Hangzhou Guangji Hospital
(现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天津马根济医院 Mackenzie Hospital
福建永春医馆 Yong Chun Hospital
台湾马偕医院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驱使宣教士们不顾一切前来服侍中国人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所以从建立第一座医院开始，每建一座，他们都在门口挂一幅十字架。

今天中国人对医院的十字标志早已习以为常，许多人联想到国际红十字会。

其实，美国的医院没有十字，欧洲的医院没有十字，印度的医院更没有十字。唯独中国的医院都有十字，这是因为中国的医院最初都是宣教士建立的。

1949年以后，虽然斗转星移，却没有挪去遍布中国城乡医院和诊所的十字标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神迹，一个恩典。

有一天，当这些十字标志的来历和内涵尽人皆知的时候，它们一定会发出更大的光，生出更大的爱。

美国硅谷工程师们：神在一千多年前，中国就是祂福音的计划里的一部分，中国从来没有被遗忘过。

这么多的人，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关顾了我们中国的这片土地。

他们和这个世界列强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他们来是帮助中国，使中国人民能够走向世界，使中国人得到真正的福音。

真的是，上帝这个爱，带领他们来到中国。同时也想到我们自己，我们是反过来，当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是一个美好的生活。所以这个反差特别大。

他跟你无亲无故的。我们愿意去帮自己周围的好朋友，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去帮。他跟你没有关系的，远隔重洋，看到这个国家这么贫瘠，他就过来帮助你呀。这种无私的爱是从哪来的？从神，神说爱人如己，这种爱，太伟大！

连精神病人、麻风病人祂也不忘记。祂差遣祂的仆人来，把爱带给这样的人。我觉得上帝的爱真的很广大。

这么多上帝的使者，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这片土地。有上帝的爱触摸的地方，有上帝的灵降临的地方，生命得到翻转，民族得到复兴。因为上帝是创造生命的。有祂的同在，就有生命，就有活力，就有文明。

中国人常说，吃水不忘挖井人。今天，我们不应忘记为中国现代化的方方面面，艰难地挖掘出第一口井的宣教士们。

我们也不应忘记，引导他们来到中国、献身中国、造福中国的，是天上的光，是十字架上的爱。一切颂赞归于上帝！

迦南诗歌76首

《同一个地球》

小敏词曲

同一个地球，
同一个蓝天，
同一个太阳，
月亮和众星，
同一个空间。
旋转的世界，
满了神的恩典，
我们同声歌唱，
神爱在人间。
十字架的爱，
冲破不同肤色语言，
南北东西神的儿女，
紧紧相连。
啊，十字架，
你爱最完全，
你爱最美善，
直到永远。

参考书目选录

汉朝

皮埃尔·佩里那 (Pierre Perrier)、沙威·瓦尔特 (Xavier Walter),
《多默宗徒在华建立教会》(Thomas fonde l' Eglise en Chine)。巴黎: Hachette出版社, 2008。

唐朝

陈怀宇, 《景风梵声: 中国宗教之诸相》。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2年。

林悟殊, 《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科院, 2003年。

朱谦之, 《中国景教》。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年。

明朝

德礼贤,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

杜赫德(法)编,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中国回忆录》。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5年。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

利玛窦、金尼阁, 何高济等译, 《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 中华书局, 2001年。

利玛窦著, 上海博物馆编, 《利玛窦行旅中国记》。北京: 北京

大学出版社，2010年。

李兰琴，《汤若望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

林华等编，《历史遗痕：利玛窦及明清西方传教士墓地》。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孙尚扬，《利玛窦与徐光启》。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

严格嘉乐（捷克）著，李梅译，《中国来信1716-1735》。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

通史

艾得理，《中国教会长征录》。美国：中国信徒佈道会，1988年。

顾长声，《中国基督教简史》。美国：长青文化公司，1999年。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梁家麟，《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香港：天道书楼，1979年。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59年。

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

远志明、陈上宇，《宣教士》。美国：神州传播协会，2016年。

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台北：中国福音会，1997年。

Lambert, Tony.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Chinese Church*.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91.

Latourette, K.S.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9.

纪年

黄光域，《基督教传行中国纪年（1807-194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数据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中、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85年。

合集

顾长声，《欧风美雨袭中华：推动中国走出中世纪的十二个西洋人传略》。加拿大：长青文化公司，2001年。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黄锡培编，《殉道血：1900年义和团事件殉道宣教士的生命故事》。美国加州：中信出版社，2010年。

黄锡培，《舍命的爱》。美国加州：中信出版社，2006年。

伟烈亚力，赵康英译，《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867年。

魏外扬，《中国教会的使徒行传》。台北：宇宙光，2006年。

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http://www.bdconline.net/zh-hans/stories/by-person/a/ai-deli.php>

专著

陈少兰编，《中文圣经翻译简史》。香港：环球圣经公会有限公司，2005年。

邓肇明，《沧桑与困境》，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

社，1997年。

梁家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香港：建道神学院，1999年。

林治平，《科学与救恩》。台北：宇宙光，2006年。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王忠欣，《中国教会学校纵横：启蒙与造就》。加拿大：恩福协会，2000年。

邢福增，《冲突与融合：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论集》。台北：宇宙光，2006年。

魏外扬，《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78年。

图片

禰浩荣，《图片中国基督教史》。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2011年。

林治平主编，《马礼逊入华宣教二百年：历史图片巡回展导览手册》。台北：宇宙光，2006年。

林治平编，《基督教与中国：历史图片论文集》。台北：宇宙光，1979年。

Tiedemann, R. G. *Reference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China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lifornia: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2009.

个人

查时杰，《马礼逊与广州州十三夷馆》。台湾：宇宙光，2006年。

海恩波著，简又文译，《传教伟人马礼逊》。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0年。

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汤森，《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河南：大象出版

社，2002年。

游紫玲，《平民阶级中的英雄马礼逊》。台湾：宇宙光，2006年。

戴德生，《带着爱来中国》。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年。

蒲乐克著，严彩绣译，《戴德生与玛丽亚》。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77年。

史蒂亚著，梁元生译文，《戴德生：挚爱中华》。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90年。

徐欣娴，《全然奉献为中国的戴家：从戴德生到戴继宗》。台北：宇宙光，2006年。

张陈一萍、戴绍曾、戴继宗等编，《唯独基督：戴德生生平与事工图片纪念集》。香港：海外基督史团，2005年。

丹尼尔·W. 费舍（Daniel W. Fisher），关志远等译，《狄考文传：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

苏慧廉著，关志远等译，《李提摩太在中国》。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林辅华、鲍康宁，《向毒品宣战的先锋：李修善和席胜魔》。台北：财团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2006年。

Eileen Crossman著，冉超智译，《山雨：富能仁新传》。香港：福音文宣社，1989年。

爱德华·V. 吉利克（Edward V. Gulick），董少新译，《伯驾与中国的开放》。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